

从研中海  
书究国外

刘东主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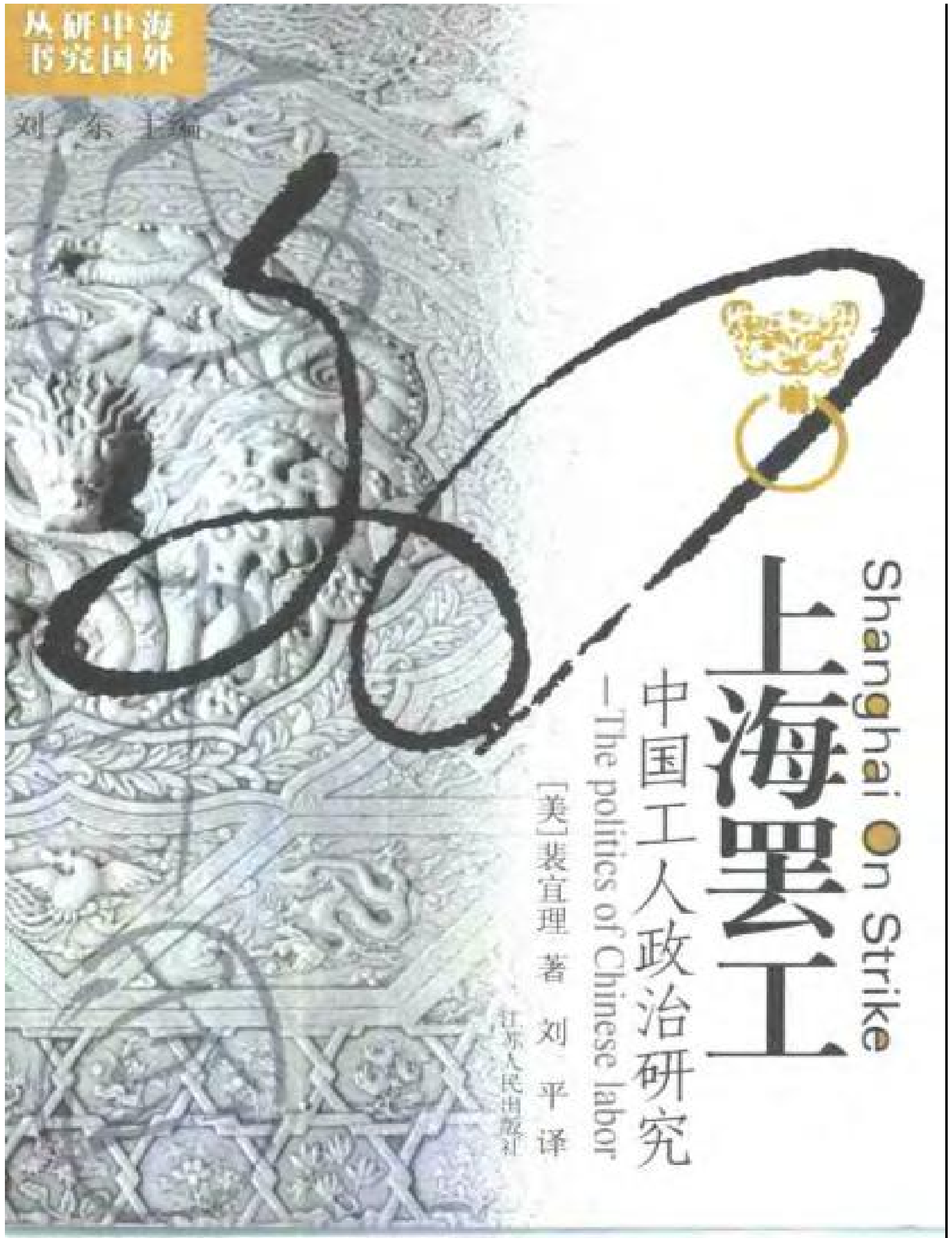
Shanghai On Strike

# 上海罢工

中国工人政治研究  
—The politics of Chinese labor

〔美〕裴宜理 著 刘平 译

江苏人民出版社





海外  
中国  
研究  
丛书

刘东 主编

Shanghai On Strike

# 上海罢工

中国工人政治研究  
—The politics of Chinese labor

〔美〕裴宜理 著 刘平 译

江苏人民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上海罢工:中国工人政治研究/(美)裴宜理著;刘平译. —南京:江苏人民出版社,2001.8

(海外中国研究/刘东主编)

ISBN 7-214-02993-6

I. 上... II. 裴... III. 工人运动—研究—上海市 IV. D412.851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01)第029213号

- 书 名 上海罢工:中国工人政治研究  
编 著 者 (美)裴宜理 著 刘 平 译  
责任编辑 花 蕾  
责任监制 王列丹  
出版发行 江苏人民出版社(南京中央路163号 210009)  
网 址 <http://www.jspph.com>  
<http://www.book-wind.com>  
经 销 江苏省新华书店  
印 刷 者 通州市印刷总厂  
开 本 850×1168毫米 1/32  
印 张 11.875 插页5  
印 数 1—6 125册  
字 数 277千字  
版 次 2001年9月第1版,2001年9月第1次印刷  
标准书号 ISBN 7-214-02993-6/D·464  
定 价 19.00元  
(江苏人民版图书凡印装错误可向本社调换)

## 序《海外中国研究》丛书

列强的船坚炮利迫使中国人逐步地改变关于世界秩序的古老观念，却远远没有改变他们反观自身的传统格调。50年代以来，在中国越来越闭锁的同时，世界的中国研究却有了丰富的成果，以致使我们今天不仅必须放眼海外去认识世界，还需要放眼海外来重新认识中国的过去、现在和未来。因此，不仅要向国内读者译译海外的西学，也要系统地输入海外的中学。

这套书可能会加深我们100年来怀有的危机感和失落感，它的学术水准也再次提醒：我们在现时代所面对的，决不再是过去那些粗蛮古朴、很快就将被中华文明所同化的、马背上的战胜者，而是高度发达的、必将对我们的根本价值取向大大触动的文明。也正因为这

样，“他山之石，可以攻玉”这古老的中国警句便仍然适用，我们可以借别人的眼光来加深自知之明。故步自封，不跳出自家的文化圈子、透过强烈的反差去思量自身，中华文明将难以找到进入其现代形态的入口。

收入本丛书的译著，大多从各自的不同角度、不同领域接触到中国现代化的问题。在从几代学人的成果中撷取较有代表性的作品或见解时，我们自然不能从各家学说中只挑选那些我们乐子接受的东西。如果那样做，这“筛子”本身就使读者失去了选择、挑剔和批判的广阔天地。但这次译介毕竟只是初步的尝试，成败利钝，欢迎论评。

**丛书编委会**

MAH 23/02

## 中译本序

裴宜理

拙著《上海罢工——中国工人政治研究》中译本面世，对我来说乃是极大的荣誉。我想，书中的许多观点肯定会引起中国学者的争议，我希望他们的反响能够激发出针对中国工人之社会起源和政治影响的热烈讨论。就本书主题而言，中国学者比我更有发言权，我期待着从他们的批评中学到更多的东西。

我对上海工人运动发生兴趣，源于自己对近代中国的民众反抗、革命和政治力量之间相互关系的长期痴迷。我的处女作是有关19世纪中期至20世纪中期淮北地区农村动乱问题的研究\*。我认为，传统形式的农民暴动之发生，亲缘与地缘关系比起阶级地位更为重要。我在该书中指出，这些传统的东西，在一定程度上使得进入这一地区开展动员农民工作的共产主义革命者陷于两难境地。尽管共产党干部吸收利用了既有的暴动模式，但在1949年后，他们也将全新的阶级斗争方式引入了

---

\* 即《华北的叛乱者与革命者，1845—1945》，斯坦福大学出版社，1980年。此书已由河北大学历史系池子华教授与我共同译出，等待出版。——译者注



中国农村。

当我将研究目光从遥远的淮北农村转向世界大都会上海时，我的研究重点也从农民叛乱问题研究变为工人运动研究。但即便是在这一高度“现代”的背景之下，我发现，在不断演进的反抗方式中，与工人中存在的世俗关系——地缘祖籍、性别、文化程度等等——相比，阶级地位的作用仍然不那么突出。当共产党和国民党的干部着手在上海工人中开展组织工作时，他们的努力受到了工人队伍中既有壁垒的深刻影响。反之，这两个政党不同的社会基础也深深地刻画出了先是国民党政权然后是共产党政权的不同特性。

虽说本书研究立足于上海、南京、台北和美国的档案文献，但我很清楚，书中肯定还有不少重大局限和疏忽之处。而且我也知道，其他学者从不同的分析角度入手，虽然占有同样的资料，却有可能得出完全不同的结论。所以，重复一遍，值本书中译本问世之际，我期待着批评与建议——无论是经验上的还是理论上的。

我要对那些为本书在中国的翻译和出版作出不懈努力的人表示感谢。尤其，对刘平先生在翻译上以及对刘东先生在协调出版方面所作的努力，我深表谢意。同时，我要再次表达对我的许多上海朋友——他们分布于上海社会科学院、上海市档案馆、上海图书馆、上海师范大学、复旦大学等单位——的感谢，感谢他们在过去岁月里所给予我的慷慨支持。最后，我要强调一点，对于本书事实上或是诠释中可能存在的缺点，文责自负，与上述个人和单位无涉。



## 英文版原序

裴宜理

对我来说,写作本书有一种回家的感觉。我出生于共产党占领前夕的上海,当我在日本和美国长大时,我一直对这座我父母曾经度过二十载动荡岁月的城市迷恋不已。三十余年的隔断,我一直期盼着能回到我的出生地上海——不仅仅是作为一个获得签证通行的目的地。第一次回乡是在1979年春天,当时不仅仅是一次消解乡恋情怀的旅行,也是一次寻找研究机会的访问。然而,直到好几年过去,在众多个人和单位的支持、帮助下,我才最终得以在我的出生地开展认真的研究。

在此项研究的众多援助者中,首先要感谢两家单位:中国方面,以张仲礼院长为首的上海社会科学院(巧的是,张先生曾经在我父亲所在的圣约翰大学学习过);美国方面,乃美中学术交流委员会(the Committee for Scholarly Communication with the People's Republic of China)尤其是玛丽·布朗·布洛克和罗伯特·盖耶。后者提供的资助使我得以在上海社会科学院进行为期一年的访问研究(1986—1987年)。

上海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和经济研究所丰

富的档案资料使我所从事的上海工人运动研究得以完成。这些资料中,包括成百上千件老工人访问记录,这些访谈录 2 都是 20 世纪 50 年代末至 60 年代初中国学者辛勤劳动的结果。可以肯定,这些访谈录反映了特定的政治环境,其目的是揭示共产主义革命的无产阶级基础。而且,因岁月流逝,被访问者的叙述肯定会有疏漏之处。然而,瑕不掩瑜,这些资料为我们提供了一个独一无二的机会去了解上海普通劳动者的生活、工作和反抗情形的窗口——通过工人自身的语言。而且,在相同事件上,工人口述史与共产党官方记述之间的差异似乎验证了这些访谈的坦率。也正是这些差异使我形成了本书的核心观点——我的发现往往与以往上海工人运动史论著不同。对那些引导我接触到这些宝贵资料的学者——虽然他们可能不同意我的许多结论——我深表谢意:上海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的陈卫民和郑庆声,经济研究所的陈增年和徐新吾。

工人访谈录虽说很重要,但它们只是我在上海所使用的大量资料中的一部分。确实,我对这些访谈录的信赖是建立在其他可信的档案文献基础之上的。工厂档案——最著名的为英美烟公司档案和上海第四丝织厂档案——既有工人访谈录,又有厂方档案,实为珍贵难得的第一手资料。本书引用的资料还包括上海市档案馆收藏的政府文件,包括罢工统计、警方报告和仲裁记录等;以及上海市总工会保存的数十种厂史未刊稿;上海港则提供了其他资料。本书使用的关键性期刊主要保存于上海社会科学院图书馆和上海市图书馆。对这些单位的负责人和职员所提供的友好合作,以及对上海社会科学院外办(特别是王德华和田国培)穿针引线的帮助,我表示最衷心的感谢。

除上海之外，其他地方的几个档案馆和图书馆也使我获益良多。台北的党史文献馆以及南京的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使我得以利用国民党时代的许多重要政府文件。台北的调查局提供了颇有价值的共产党方面的报告。台北的中央图书馆、东京的东洋文库、华盛顿国家档案馆、斯坦福胡佛研究所以及西雅图华盛顿大学东亚图书馆都为我提供了真诚热情的帮助，我也要向这些单位的负责人和职员，向为本人到上述地方开展访问研究提供资助的美国学会理事会(the American Council of Learned Societies)表示衷心感谢。

在为本书写作搜集资料的不同阶段，我要向下列诸位表示谢意：乔治·布朗、蔡少卿、戴英璠、耐尔·戴芒、江柯林、李逊、刘昶、刘石吉、凯文·马其奥罗、施家英(音)、马修·索默、蒂尔·托恩顿、萧功秦和杨久义(音)。与本书相关的论文曾经提交在台北中央研究院、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芝加哥大学、密西根大学、上海社会科学院、国立台湾大学、华盛顿大学和耶鲁大学召开的学术会议，有关学者的评论使我受益匪浅。该书主体部分完成于1988—1989年华盛顿大学给予的学术休假年。初稿出来后，玛丽·克莱尔·白吉尔、查尔斯·伯吉斯、周锡瑞、马克·弗雷齐尔、爱伦·富勒、爱米莉·荷尼格、安德鲁·瓦尔德、杰弗瑞·瓦瑟斯特龙和叶文心等人细心阅读，提出了宝贵意见。本书的出版得到了华盛顿大学中国研究计划秘书劳莉·波拉克和斯坦福大学出版社资深编辑莫利尔·贝尔的指点帮助。本书索引工作由蒂尔·托恩顿完成。尽管有幸得到如许帮助，上述个人对本书存在的问题不负任何责任。

本书——专注于上海工人的起源及其政治倾向——乃

是本人计划中的两卷本中国工人政治研究的第一卷。在第二卷中,我将探寻工人运动与现代中国政府之形成和演变的关系。

海外中国研究丛书

主 编 刘 东

总策划 周文彬

### 内容提要

二十世纪的中国经历了一系列根本性政治变革。从推翻帝制的辛亥革命到共产党取得全国政权，所有这些变革都曾受到工人运动的极大影响。

本书在广泛吸收欧美工人问题研究成果的基础上，将工人政治放在比较的角度加以研究，以一种更普遍的眼光关注罢工、工会、政党等问题，探讨了工人的文化与生活状况，为人们展示了一幅二十世纪上半叶中国工人丰富多彩的形象。

责任编辑 花 蕾  
装帧设计 阿 海

### 作者简介

裴宜理(Elizabeth J. Perry), 1978年毕业于密歇根大学, 获博士学位。现任美国哈佛大学亨利·罗索夫斯基政治学讲座教授, 费正清东亚研究中心主任。所著《上海罢工——中国工人政治研究》于1993年获国际劳工史协会“优秀著作奖”, 并于同年获美国历史学会东亚史研究最佳著作奖“费正清奖”。他因杰出的教学、研究成果获得威廉·史密斯学院、耶鲁大学、杜克大学、哈佛大学、华盛顿大学、惠特曼学院等院校的表彰。

## 目 录

中译本序.....	裴宜理(1)
英文版原序.....	裴宜理(1)
<b>导 论</b> .....	(1)
中国工人的政治影响.....	(2)
政治——从头开始.....	(4)
<b>第一部分 地缘政治, 1839—1919</b> .....	(13)
<b>第一章 移民城市</b> .....	(18)
广州移民.....	(21)
宁波移民.....	(24)
江苏—华北移民.....	(26)
原籍、职业与工人团结.....	(29)
<b>第二章 来自南方的工匠</b> .....	(39)
行会与工匠群体.....	(39)
早期的工匠抗议.....	(46)
政治化.....	(48)
“传统”的激进主义.....	(52)
行业意识与阶级觉悟.....	(55)
<b>第三章 来自北方的无产者</b> .....	(62)
乡土源流与帮会.....	(63)
工厂以外的劳动者.....	(67)
产业无产者.....	(71)

大众文化 .....	(73)
罢工模式 .....	(76)
结 语 .....	(80)
<b>第二部分 党派政治, 1919—1949</b> .....	<b>(93)</b>
<b>第四章 激进主义的全盛期, 1919—1927 年</b> .....	<b>(99)</b>
五四运动 .....	(99)
共产党的诞生 .....	(103)
保守派的挑战 .....	(105)
统一战线 .....	(108)
五卅运动——脆弱的联盟 .....	(113)
三次武装起义 .....	(117)
<b>第五章 保守主义时期, 1927—1937 年</b> .....	<b>(126)</b>
帮会与蒋介石的崛起 .....	(126)
国民政府时期——工人组织由盛而衰 .....	(130)
帮会的插手 .....	(134)
共产党“左派” .....	(144)
结 语 .....	(146)
<b>第六章 激进派的复活, 1937—1949 年</b> .....	<b>(156)</b>
抗日战争与工人民族主义 .....	(156)
内战与共产党工匠 .....	(165)
国民党内的派系斗争 .....	(168)
积极反共 .....	(172)
国民党势力的瓦解 .....	(174)
结 语 .....	(178)
<b>第三部分 产业政治</b> .....	<b>(185)</b>
<b>第七章 烟草业</b> .....	<b>(189)</b>
劳动状况 .....	(191)



地缘性分裂	(196)
共产党的介入	(200)
帮会因素	(203)
五卅罢工	(204)
三次武装起义	(208)
国民党政权统治下的英美烟公司	(210)
共产党的收获	(218)
内战时期的斗争	(219)
结 语	(222)
<b>第八章 纺织业</b>	<b>(233)</b>
缫丝业	(234)
早期罢工及其组织	(237)
帮会的介入	(238)
共产党的收获	(242)
缫丝工人之有限的激进主义	(244)
丝织业	(249)
贵族工人的觉醒	(252)
社会构成与大众文化	(255)
1934年美亚绸厂罢工	(259)
1936—1937年的全市罢工	(272)
共产党的复活	(280)
结 语	(285)
<b>第九章 运输业</b>	<b>(298)</b>
电车业	(298)
法商电车公司	(302)
人力车夫	(310)
码头工人	(318)

结语	(321)
结    论	(328)
中国内部的比较	(329)
工匠和欧洲工人运动	(332)
半技术性工人和美国工人运动	(335)
非技术性工人—农民与工人运动	(338)
无产阶级罢工的意义	(340)
中国工人运动的遗产	(346)
附    录	(357)

## 导 论

由于对 20 世纪的工人未能实践马克思恩格斯的崇高理想感到失望，新一代工人问题研究者开始关注无产阶级政治的局限性，特别是关注工人的分裂特性。由于有性别、年龄、人种和技术水平的差异，在共产主义梦幻家的眼里，工人行动分散，缺乏阶级觉悟。当工人问题研究者勉强接受其研究对象的缺点时，这种论调带有很深的悲观主义色彩。当学者们发现工人对于激进运动——最具工人阶级特征的部分——天生缺乏热情，与《共产党宣言》所描绘的无产阶级英雄形象相去甚远时，他们又不免加以冷嘲热讽。<sup>①</sup>

作为对马克思主义未竟事业的回应，工人问题研究者常常被“为什么不”的问题所困扰：工人为什么不能走向统一？工人，尤其是绝大多数惨遭剥削和压迫的工人为什么不去组织一个激进的政党？工人阶级团体特别是发达资本主义社会的工人阶级团体为什么不举行马克思主义革命？此类问题促使人们去寻找工人阶级的缺点。结果，人们对欧美工人力量分裂的原因予以特别关注，许多研究令人信服地证明，男人和女人、老人和青年、北欧和南欧、美国的黑人和白人、技术工人和非技术工人之间的矛盾，使得工人们无法表现出阶级觉悟和对党的忠诚，或是在需要他们采取革命行动时置之不理。<sup>②</sup>

- 这种分析导致人们带着有色眼镜去看待现代工人阶级。但是,这种阶级分裂是否只起负面作用,只是实现无产阶级“真正”使命的障碍呢?我的答案是否定的。我认为,工人的分裂能为具有政治影响的工人阶级行动提供基础——不只是在支持这个或那个政党,而是在是否支持新成立的政权。社会的不同部分,甚至一个阶级内部的不同部分,可以构成与政府官员的不同联系——可以改变各自命运的联系。这并不是说,各种社会集团总是各行其道,对立的方面在这种扰人心绪的关系中总是得不到自己想要的东西或是期望的结果。然而,我们的分析可以从头开始——严肃面对各分裂阶层的政治潜力,提供一种探索政府—社会互动模式的具体方法。

中国工人——与其欧美兄弟难分伯仲——也是四分五裂。然而,分裂并不意味着消极被动,无论他们当中存在着如何重要的地缘、祖籍、性别和技术熟练程度的差异(在很大程度上也正因为有了这种差异),中国工人阶级自己完全有能力采取有影响的政治行动。

## 中国工人的政治影响

在 20 世纪中国的政治变革中,工人骚动起了重要作用。推翻帝制的辛亥革命、带来新政治文化的五四运动、国民政府的兴衰、共产党的胜利,甚至 1949 年以后政治形势的发展,无不深受中国工人运动的影响。<sup>③</sup>在一个农业占绝对优势的国度里,尽管工人人数相对较少,但中国工人往往以出其不意的或是自相矛盾的方式对现代中国政治产生重大影响。

有组织的工人运动的影响,在所有中国城市中,以作为产业

中心的上海最为显著。过去的一个世纪里,在上海工人与学生的联合推动下,预示全国政治形势变化的工人运动呈周期性高涨。<sup>④</sup>这些事件后面都有一个有规则的模式,即每隔二十年就要发生一次大事件。也许,正如托马斯·杰斐逊(Thomas Jefferson)描述美国那样,每一代新人都发现有必要采取自己的革命行动。

上海最著名的运动是1925年爆发的五卅运动——标志着新一轮运动的开端,其后,即1926—1927年,紧接着就爆发了三次工人武装起义。在五卅运动中,由于激进派学生的刺激,工人们愤怒抗议日英帝国主义的暴行,要求结束军阀统治。1927年3月,蒋介石北伐军占领上海,无疑受到了工人的大力支持,但是,这位总司令很快就发觉,受共产党人影响的工人对其新政权而言是个威胁。1927年4月,蒋介石及其帮会盟友开始镇压工人,正在形成的国民政府身上不可避免地涂上了一层“白色恐怖”的色彩。<sup>⑤</sup>

20年后,即1946—1948年的内战时期,上海广大工人和学生充塞于街道,抗议国民党统治。通货膨胀、贪污腐败与(一定程度上的)美帝国主义侵略,导致他们采取反抗国民党、准备迎接共产党势力的行动。<sup>⑥</sup>

无论是在19世纪20年代、40年代、60年代,还是80年代,上海的抗议都具有重大的政治影响。党派、政权和个人命运的兴衰都与这个城市的集体行动有关。然而,这并不是说,工人(或者他们的学生盟友)总能主导潮流。由政治化工人阶级的幽灵所造成的恐惧常常导致政府——无论是冠以共和主义还是社会主义的名号——采取与许多上海工人愿望相违背的政策。故关键点不在于现代中国政治直接反映了工人的要求,而在于中国工人在现代中国政府的定义和发展中一直是一支特别重要的力

量。

20 世纪的中国政治领袖在描绘新社会蓝图时均予以工人阶级一种特别的地位。现代化几乎就是产业化的同义语，工人则被视为发展的代表。一个宣称代表进步力量的政党因而没有理由不需要全体工人阶级的支持。但是，工人在政治事件中开始发挥关键作用，意识形态并不是惟一解释。与实际人数不成比例，组织起来的工人有力量，是因为他们能导致严重的经济破坏（中国如此，世界其他地方也是如此）。有鉴于晚清帝国与军阀政权简单地将工人队伍视为破坏性力量，无论是国民党人还是共产党人，都积极采取措施，将这一不断增长的势力纳入议事日程，为自己的政治目的服务。

## 政治——从头开始

尽管共产党人和国民党人开展中国工人运动的计划很重要，但是两党及其产生的政府都未能充分控制上海工人。问题不仅来自对立党派的竞争，历史环境使两党都有机会取得垄断。而且，上海工人运动有着自己的发展历程，与该市工人来源于农村地区有着密切关系。早在该市任何政党出现之前，上海工人即已发动多次成功的抗议，他们是集体行动之传统的继承者，其行动并不总是轻易符合外来组织者的计划。

要了解上海工人政治，我们必须考虑到这一抗议的遗产。工人运动的进程不能简单地解释为参考了外来干部的党派战略，尽管后者可能常常得心应手。工人政治发端于工人自身；其地  
5 缘、祖籍、性别、大众文化、教育程度、工作经历，等等。这些都是对集体行动传统之延续造成影响的工人背景的特征。

以往针对中国工人运动的诸多研究都是作为党史内容出现的,其着重点在于诠释共产党的政策(或者有时是国民党的),而非分析工人自身的行动与动机。<sup>⑦</sup>这就往往导致这样一个结论,认为中国工人运动直到1921年中国共产党成立时才开始,或者至多是在1919年五四运动开始的。根据此种流行观点,中国工人运动之诞生,只是在知识分子——在俄国革命的影响下——开始对组织工人发生浓厚兴趣之时才出现。方福安(音)在其著名的中国工人问题研究中强调的一个常识是,倾心于欧洲模式的学生教导工人如何罢工。<sup>⑧</sup>正如尼姆·威尔士(Nym Wales)所说:“除了旧式行会——且主要在手工业中——以外,(中国工人)仍是强大的阶级运动未曾涉足的一块处女地……组织者首先要建立,而非破坏……学生只是告诉工人什么是工会,工人便开始依样行动。”<sup>⑨</sup>同样,谢诺(Jean Chesneaux)认为,中国工人运动“是在与共产党的密切合作中发展起来的,紧跟党的领导……共产党与工人阶级的政治目标完全一致<sup>⑩</sup>”。

在政治因素影响下的知识分子加入其中之后,中国工人运动肯定经历了一个重要的转变过程。而且,在这些学生-干部的指导下,工人无论是在国民党还是在共产党的发展中都扮演了重要角色。因此,中国工人运动问题研究局限于党史研究框架之内的趋向不是没有道理。确实,本书第二部分“党派政治”在相当程度上保留了这种看法。然而,中国工人并非白板一块,党的干部可以随心所欲地将符合本党意愿的政治色彩涂抹上去。工人是其自身抗议传统——植根于故土文化与工作经历之中——的继承者,他们和学生组织者之间自然有一种紧张关系,领导工人并非轻而易举之事。

工人不是油灰腻子,党的干部不能拿在手中随意捏弄。同时,工人自身也不是铁板一块。正如学生中间由于家庭背景、生



- 活方式和价值观的不同而存在差异一样，工人自身也由于同样的原因存在差异。江南制造局的宁波技工，能读书写字，收入颇丰，工作稳定，而新来自苏北农村、在缫丝厂或纺织厂工作的年轻女工，教育阙如，工资微薄，工作条件恶劣，两者奚止天壤。这两类工人，不仅原籍不同，工作环境不同，他们的抗议在方式上、宗旨上也是不同的。

当学生组织者满怀兴趣在上海开展工人运动时，他们很快就发现，只有部分工人对其热情产生反应，最初对国民党和共产党干部的提议作出反应，随后对国民党和共产党政权作出反应，均据其久已存在的政治界限而各有不同。要弄懂工人运动之政治含义，我们就必须从头开始，从上海工人阶级之源流开始。

本书第一部分，即“地缘政治”，追溯了上海工人的地理源流，说明该市早期的工人抗议依据不同的祖籍界限而表现不同。第二部分，即“党派政治”，论述了20世纪20年代和40年代的上海工人运动情形，揭示了外来组织者是如何被迫——有时甚至和他们偏爱的意识形态相违背——与先其存在的传统达成妥协的。第三部分，即“产业政治”，将眼光转入工作场所，说明不同产业部门的工人对当时政治形势是如何作出反应的。在上海经济领域，由于来自特定地理区域的工人占有特定的工作岗位，技术性工人、半技术性工人和非技术性工人各自有着相同的政治趋向。\*

---

\* 原著中的 *skilled, semiskilled, and unskilled laborers*，我译作技术性、半技术性和非技术性工人。在国内一般又叫做熟练工人、半熟练工人和非熟练工人。“技术”与“熟练”，有时还是有些差别的。我一般使用前者，偶尔使用后者，望读者识之。——译者注



在该项研究中,我着力于普通形式的集体行动——罢工——并且以此作为探索政治变动的工具。罢工可由一系列经济的与社会的原因导致:要求增加工资、抗议工友被解雇,或是要求改善工作条件。但罢工也可以是政治形势的直接反映。工人们可以拒绝工作,以表示对当局的抗议,或者,作为对企业违反政府有关规定的一种反抗。罢工领导人掌握着公开举行政治罢工的许多借口。而且,领导者可以依仗人数之众取得成功。大量比较性研究表明,政治立场不同者,各分营垒。要了解民众的政治动向,就要了解民众的习惯和意愿,如同要了解其文化背景一样。

为什么要选择罢工作为研究工人政治的不二途径呢?我要向读者做些解释。毕竟,大量“新”工人史之出现,远离工会和罢工,将工人政治之定义宽泛化。同样,在民众反抗问题研究中,总的趋向是关注影响不大的“日常反抗”,避免关注公开的、有组织的抗议。<sup>④</sup>尽管这种研究充满同情心,将眼光放在更为普通的民众行动之上,但是我仍然注重研究公开的反抗。正是因为其影响面广的特征,罢工之类的对抗,比起旷工、偷窃、怠工或毁坏机器等“小打小闹”,具有更为直接的政治效果。而且,正如詹姆斯·克罗宁(James Cronin)指出的那样:“迄今为止,在大多数临时罢工中,比起其他方式,个人的冒险和破坏,为产业斗争形式提供了一种更好的决定个人态度和行为的指示器。”<sup>⑤</sup>正如米切尔·佩罗(Michelle Parrot)在其研究法国工人骚乱之颇有深度的著作中所揭示的那样,罢工既是一种文化表达方式,也是一种为改变经济和政治关系而刻意进行的努力。语言与符号深印在工人的头脑之中,在工人为其自身利益开展“合理”斗争时,他们会提出自己的正当要求。<sup>⑥</sup>幸好,有关上海罢工的资料丰富而有用,其他国家有关罢工的高质量研究为我们对此种形式的反抗开展比较研究提供了特别有效的帮助。

在工人的武器库中,罢工是惟一的武器,而且也是一种特别有效而重要的武器。\*其价值超出了罢工者针对特定企业采取行动的实际经济成本,因为罢工常常招致政府干预。即便罢工只是基于经济要求,以一种有秩序的、非暴力的方式进行,也常常是在政府调停下得到解决。由于工业与政府有着密切联系,使罢工具备了独有的政治特性。如果有人有意探讨社会反抗与政府之间的互动作用,罢工不失为一条有效的途径。

最新研究认为,团结起来的工人阶级不是资本主义发展的天然副产品,而是工人在参加了成功的集体行动之后的伴生物。<sup>8</sup>以此为出发点,罢工及其他公开示威不是工人阶级形成的结果,而是前提。如同戈登·马歇尔(Gorden Marshall)所说:

过分强调建立于阶级行动之上的阶级形象,也许可以归因于学者们广泛持有的信条,即在男人和女人可以改变社会之前,先让他们理智地包围社会可能是必要的,这一前提并未得到阶级行动历史的证实——无论是以革命的还是以更为平和的方式进行。……觉悟产生于社会行动,也在社会行动中发生变化。<sup>9</sup>

本书分三个部分,我将从三个不同的但又密切联系的角度对工人阶级的行动加以探讨。在此过程中,我将力求运用多种学科研究方法,对有关问题加以综合研究。第一部分着重于民间文化(限于祖籍故土),这是一个主要属于社会史范畴的主题。第二部分考察了党的组织者所采取的策略以及党与党之间、党内的

\*在1918—1940年间上海发生的2291起罢工事件中,有65%以上赢得了完全胜利或部分胜利。这些资料取自《上海罢工统计资料,1918—1940》(Shanghai Strike Statistics, 1918—1940)——在我的指导下,我的一位研究助手使用SPSS方式经电脑统计得出,其中包括2291个案例和35个变数。该项资料源于上海市社会局统计资料。

竞争方式。这是一个众所周知的政治学主题。在第三部分，注意力转到工作场所——属于工业社会学范畴。我认为这三部分决不是互不相关的。文化背景造就了工作条件，然后又对不同的政治党派产生了影响。对政治的研究脱离不了历史学、经济学和社会学。政治后果——从一般抗议到现代政府的形成——均建立于普通民众的文化背景和工作经历之上。

本书将尽力探求工人阶级分化演变的原因（从地缘政治和产业政治的角度），探索此种分化对于政治动员（或党派）的影响。如此，便可为分析工人在现代中国政府形成过程中所起的作用打下基础——这是本书姊妹篇的任务。中国政府——皇权主义的、共和主义的以及共产主义的——往往被冠以“专制”、“官僚”、“自行其是”、“极权主义”等名目。这种指称给社会力量以最小的空间。相反，我的这项研究将强调地方社会——尽管四分五裂——对政府演变的能动影响。

从 20 世纪 20 年代至今，镇压浪潮滚滚不断，每次镇压均接踵于民众抗议之后，其中工人斗争是一个重要方面。应当承认，政府的镇压表明了对民众参与（政治）的严厉限制。但同时也在一定程度上表明，政府政策本身也正是在作为对此种参与的反应中形成的。尽管结果与马克思恩格斯想象中的天堂相去甚远，但却证明，工人的政治影响远比引导我们去探索的新生代工运史研究者所想象的大多了。

#### 注 释

① 有关重要著作可参见 Jeffrey Haydu, *Between Craft and Class: Skilled Workers and Factory Politics in the United States and Britain* (Berkeley, Calif., 1988); Ira Katznelson and Aristide R. Zolberg, eds., *Working-Class Formation: Nineteenth-Century Patterns in Western Europe and the United States* (Princeton,

N. J. , 1986); Victoria Bonnell, *Roots of Rebellion* (Berkeley, Calif. , 1983); Ronald Aminzade, *Class, Politics, and Early Industrial Capitalism* (New York, 1981); Dick Geary, *European Labour Protest, 1848—1939* (London, 1981); Diane Koenker, *Moscow Workers and the 1917 Revolutionary* (Princeton, N. J. , 1981); William P. Sewell, *Work and Revolution in France* (New York, 1980); Michael P. Hanagan, *The Logic of Solidarity* (Urbana, Ill. , 1980); I. Prothero, *Artisans and Politics in Early Nineteenth-Century London* (London, 1979); Herbert G. Getman, *Work, Culture, and Society* (New York, 1977); Bernard H. Moss, *The Origins of the French Labor Movement: The Socialism of Skilled Workers* (Berkeley, Calif. , 1976); Joan W. Scott, *The Glassworkers of Carmaux: French Craftsmen and Political Activism in a Nineteenth-Century City* (Cambridge, Mass. , 1974).

② 特别参见 Richard Jules Ostreicher, *Solidarity and Fragmentation* (Chicago, 1986); Charles F. Sabel, *Work and Politics: The Division of Labor in Industry* (New York, 1982); David M. Gordon, Richard Edwards, and Michael Reich, *Segmented Work, Divided Workers* (Cambridge, Mass. , 1982); Ira Katznelson, *City Trenches: Urban Politics and the Patterning of Class in the United States* (New York, 1981); Suzanne Berger and Michael J. Piore, *Dualism and Discontinuity in Industrial Societies* (Cambridge, Mass. , 1980); and Stanley Aronowitz, *False Promises: The Shaping of American Working-Class Consciousness* (New York, 1973).

③ 关于辛亥革命的背景,特别参见 Mary C. Wright, ed. , *China in Revolution: The First Phase, 1900—1913* (New Haven, 1968); and Joseph W. Esherick, *Reform and Revolution in China: The 1911 Revolution in Hunan and Hubei* (Berkeley, Calif. , 1976). 关于五四运动,参见 Chow Tse-tung, *The May Fourth Movement: Intellectual Revolution in Modern China* (Cambridge, Mass. , 1960); and Vera Schwarcz, *The Chinese Enlightenment: Intellectuals and the Legacy of the May Fourth Movement of 1919* (Berkeley, Calif. , 1986). 关于国民政府,参见 Hung Mao Tien, *Government and Politics in Guomintang China, 1927—1937* (Stanford, Calif. , 1972); Lloyd E. Eastman, *The Abortive*

*Revolution: China Under Nationalist Rule, 1927—1937* (Cambridge, Mass., 1974); and Eastman, *Seeds of Destruction: Nationalistic China in War and Revolution, 1937—1945* (Stanford, Calif., 1984); 关于共产主义革命, 参见 Lucian Bianco, *Origins of Chinese Revolution* (Stanford, Calif., 1967); and Ch'en Yung-fa, *Making Revolution: The Communist Movement in Eastern and Central China* (Berkeley, Calif., 1986). 关于 1949 年以后的中国政治制度, 参见 A. Doak Barnett, *Cadres, Bureaucracy, and Political Power in China* (New York, 1967); and Franz Schurmann, *Ideology and Organization in Communist China* (Berkeley, Calif., 1970). 这些重要的著作都没有对工人加以特别描绘。

④ Jeffrey Wasserstrom, *Student Protest in Twentieth-Century China: The View from Shanghai* (Stanford, Calif., 1970). 该书对 1919—1949 年间上海学生的作用进行了生动而深入的研究。

⑤ 对这些事件的详细描述可参见 Jean Chesneaux, *The Chinese Labor Movement, 1919—1927* (Stanford, Calif., 1970).

⑥ 参见 Suzanne Pepper, *Civil War in China: The Political Struggle, 1945—1949* (Berkeley, Calif., 1978).

⑦ 重要的例外可参见 Emily Honig, *Sisters and Strangers: Women in the Shanghai Cotton Mills, 1911—1949* (Stanford, Calif., 1986); and Gail Hershatter, *The Workers of Tianjin, 1900—1949* (Stanford, Calif., 1986). 这两本著作都从全新的、“颠倒的”角度去看待中国工人问题, 但两书均未将工人运动作为主题。

⑧ Fang Fuan, *Chinese Labor* (1931; rpt. New York, 1980), p. 4.

⑨ Nym Wales, *The Chinese Labor Movement* (New York, 1945), p. 15.

⑩ Jean Chesneaux, *Chinese Labor Movement*, p. 405. 最近出版的一套关于上海工厂历史的丛书序言断言: “中国工人运动自始至终都是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进行的。”见《上海工厂企业党史工运史丛书》, 上海, 1991 年, 序言, 第 1 页。

⑪ James C. Scott, *Weapons of the Weak: Everyday Forms of Peasant Resistance* (New Haven, 1985), 该书是此种观点的有力提倡者。另参见 Forrest

D. Colburn, ed. , *Everyday Forms of Peasant Resistance* (Armonk, N. Y. ,1989).

⑫ James E. Cronin. "Theories of Strikes: Why Can't They Explain the British Experience?" *Journal of Social History* 12(1978): 194.

⑬ Michelle Parrot, *Les ouvriers en grève*, 2 vol. (Paris, 1978)

⑭ Gerald Friedman, "The State and the Making of the Working Class," *Theory and Society*, no. 17(1988): 402. 同时参见 Katznelson 的介绍文章, 载 Katznelson and Zolberg, eds. *Working-Class Formation*, pp. 3 ~ 41.

⑮ Gordon Marshall, "Some Remarks on the Study of Working-Class Consciousness," *Politics and Society* 12(1983): 272.

## 第一部分 地缘政治, 1839—1919\*

资本主义城市会产生团结的无产阶级吗? 他们会为了集体利益而斗争吗? 这些问题吸引了不少社会理论家的注意, 其中许多人将产业罢工视为可能的无产阶级政治的指示器。马克思主义观点将资本主义剥削视为推动无产阶级化的力量, 此种力量导致工人形成强有力的新型团结。当阶级觉悟产生时, 以产业罢工为形式的工人斗争也开始了。相反, 现代化理论家认为, 资本主义城市产生的不是悲惨的无产者, 而是造就了一群新型中产阶级成员, 其趋向不是斗争, 而是静止。<sup>①</sup>

尽管这些观点互相对立, 但它们却有某些共同之处: 两者都强调资本主义的改造功能; 有鉴于前资本主义时期的农村被认为是“传统的”和“封建的”, 资本主义城市——无论其构成者是无产者还是中产阶级——均被明确视为“现代的”。而且, 两种分析都将工业化进程视为消弭工人阶级差异的进程; 封建特征在机器的匀速运转中消失。

---

\* 此处标题的原文为 *The Politics of Place*, 直译为中文应为“地方政治”, 但作者主要谈的是上海工人的原籍问题, 即 *native place*。同时, 严格说来, 英语的“地缘政治”为 *geopolitics*。两相比较, 我还是选用了“地缘”一词, 其中含有“祖籍源流”的意思。——译者注

然而，近来，学术界开始对马克思主义和现代化理论家的上述观点产生怀疑。我们越来越多地发现，“传统”仍在延续，不仅是作为古风遗韵，而且是作为工业生活的主要组织功能。所以，工人阶级及其行动步调一致的能量，不单是资本主义改造的结果，也是前资本主义遗留的产物。毛泽东在描述中国革命时提到了这种反向关系，即“农村包围城市”。这一比喻非常贴切，不仅适用于毛的社会主义革命，同时也（近乎讽刺地）适用于资本主义革命。与其说一个统一的工人阶级在形成时失去了其乡村遗产，还不如说资本主义是在农村包围中形成的。

农村习俗之遗留在渗入工业化城市后，使得来自不同地区的工人四分五裂，各行其是。但是分裂并不等于被动。就像农村居民——不仅是中国的，也包括其他地方的——能够为了追求其利益而发动大规模反抗一样，工人也是如此。他们的罢工是工人阶级政治的表现，但在一定程度上，他们反抗的是某些典型的、傲慢的资本主义发展范例。

上海！正是这个名字蕴涵了世界资本主义的意味。20世纪伊始，上海被称为东方的巴黎，来自全球各个角落的人聚集此地，创造出一个世界仅见、五方杂处、充满活力的资本主义商业中心。各种肤色的洋人在数量上与操着各种方言的中国居民几乎相等。这些国内移民，来自帝国各地乡村，在来到这座大城市后，发现自己比起那些洋人同类来，更感陌生与不安。

与绝大多数洋人不同，成千上万的中国人在19世纪末20世纪初涌入上海后，进入了工人阶级底层。\*上海早期的产业工

---

\*有些洋人，特别是俄国十月革命以后逃到上海的白俄，穷困潦倒，多属普通工人行列。



人,与其世界各地的同类一样,都是农村的产物。移民们生长于农村环境,原本与城市少有联系,乍然来到,人生地不熟,便求助同乡,逐渐消释对城市生活的陌生感。结果便形成了一个以同乡关系为特征的国中之国:来自该国特定地区的雇主与雇工均居住、工作在相近的地方。来自同一地区的人们将其原来的社会移入城市,工人们以同乡关系加入其中。正如罗威廉(William Rowe)所看到的那样:“地理背景决定了亚人种差异……这是中华帝国晚期识别中国人的最重要的特征。”<sup>②</sup>在上海以及其他中心城市,工人很容易就陷入“地缘政治”。来自何处,有助于决定一个工人对该城市种种挑战的反应。

当然,上海的人种文化并非一成不变,或是人们原有乡土习俗的简单复制;城市生活要求用新手段解决新问题。因此,工人阶级的文化不仅仅是消极被动的产物,也包含了积极主动的因素。然而,产生这些新文化的原材料很大部分产自人们原来的文化。正如彼得·伯克(Peter Burke)在谈到近代初期的欧洲时所说:“民间文化被视为地方文化……主导忠诚的是地区,或是城镇,甚至是村庄。”<sup>③</sup>中国的情况也不例外。

在强调乡土忠诚与城市需求之间的互动关系时,我要感谢在工人之民间文化方面做出杰出研究的欧美学者。<sup>④</sup>像纽约或芝加哥一样,上海是个移民城市,尽管上海的工人阶级移民主要来自国内而非国外。无论如何,工人们将其故乡的生活方式和思维模式带到了新环境中。正如赫尔伯特·古特曼(Herbert Gutman)在其研究美国劳工的经典著作中所指出的那样:

由于国内和国外新鲜血液的注入,包括农民、农场主、熟练手工业工人以及临时工等,美国工人阶级的成分不断改变……出卖劳动力的男人和女人,比起其自身存在而言,给新的、变化中的工作环境带来了更多东西。他们给工厂

带来的东西,在很大程度上依赖于原来的文化;他们的行为方式,则受到了原有文化与他们所进入的社会之间相互作用的影响。<sup>⑤</sup>

要了解工人是如何以及为什么从事某种形式的政治,我们首先必须知道他们来自什么地方。本书第一章题为“移民城市”,将上海工人阶级的地理源流与其早期反抗方式联系起来。来自不同地区的工人往往从事不同的职业,他们原有的地方文化,势必对工人阶级的行为造成影响。第二章“来自南方的工匠”,探讨了技术性手工业工匠——大多来自广东和江南地区——的组织及其罢工行动。第三章“来自北方的无产者”,将眼光转到非技术性工人中的抗议方式上来,他们中的绝大多数人都来自北方农村。

---

① 马克思主义理论的浓缩精华可从马克思和恩格斯合写的《共产党宣言》(原版于伦敦,1848年)中找到。现代化观点由罗斯(Ross)等人提出,见 Arthur Ross and Paul A. Hartmann, *Changing Patterns of Industrial Conflict* (New York, 1960); and Clerk Kerr, “Industrial Peace and the Collective Bargaining Environment,” in *Collective Bargaining*, ed. A. Flanders (London, 1955), p. 121 ~ 137.

② William Rowe, *Hankow: Commerce and Society in a Chinese City, 1796—1889* (Stanford, Calif., 1984), p. 213. 罗氏强调了汉口人超越这种分裂的能力(见该书第 121 ~ 137 页)。

③ Peter Burke, *Popular Culture in Early Modern Europe* (New York, 1978), pp. 50.

④ 尽管很不全面,但我还是要列出下列有关工人阶级文化的重要研究著作: John E. Bodnar, *Immigration and Industrialization: Community and Protest in an Industrial Society, 1900—1940* (Baltimore, 1982); Craig Calhoun, *The Question of Class Struggle* (Chicago, 1981); Milton Canton, ed.,

*American Workingclass Culture: Explorations in American Labor and Social History*(Westport, Conn. , 1979); John Clarke, , Charles Critchen, and Richard Johnson, eds. , *Working-Class Culture*(New York, 1979); Robert Darnton, *The Great Cat Massacre*(New York, 1984); Natalie Zemon Davis, *Society and Culture in Early Modern France*(Stanford, Calif. , 1966); Michael H. Frisch and Daniel J. Walkowitz, eds. , *Working-Class America: Essays on Labor, Community, and American Society*(Urbana, Ill. , 1983); David Montgomery, *Workers' Control in America* (Cambridge, Mass. , 1979); Barrington Moore, Jr. , *The Social Base of Obedience and Revolt*(White Plains, N. Y. , 1978; E. P. Thompson, *The Making of the English Working Class* (New York, 1963); Sean Wilentz, *Chants Democratic: New York City and the Rise of the American Working Class*(New York, 1984); and Paul Wills, *Learning to Labor*(Westmead, Eng. , 1977).

⑤ Herbert G. Gutman, *Work, Culture and Society*(New York, 1977), p. 15, 18.

## 第一章 移民城市

近代上海的迅速发展，与其作为条约口岸的地位是分不开的。鸦片战争(1840—1842)后，由于允许对外通商及外国人在华居留，短短数十年，上海就从一个繁荣的沿江码头，发展成为一个真正的世界大都市。由于位于扬子江与黄浦江汇合之处，邻近中国著名的丝茶产区，上海很快成为全球性商业中心。对外通商不过数年，这个城市便占据了全国进出口贸易的绝大部分。<sup>①</sup>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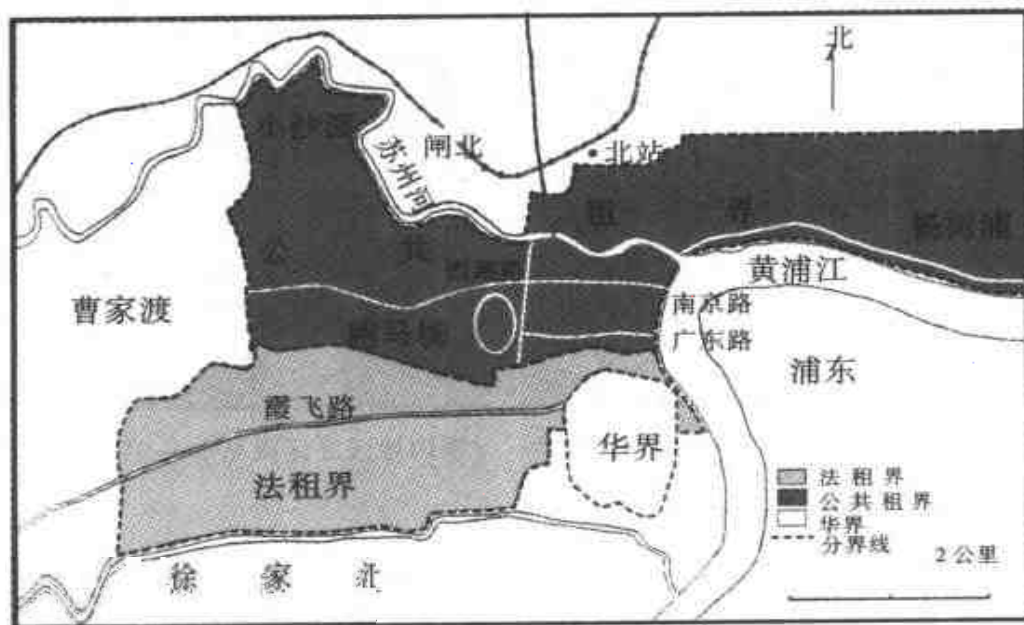
这种国际贸易吸引了越来越多的外国人来到新辟的英租界(1863年与美租界合并称为公共租界)和法租界(参见地图1)。这些租界位于老城的北面，不久便汇聚了成千上万的外国人，矗立起大大小小欧式风格的建筑，出现了一个与原先中国领地完全不同的世界。老城(16世纪为了防止倭寇而筑有围墙)的建立原本是为了满足国内贸易的需要。在那里，木头门面的小商店沿街而立，街巷名称揭示出贸易内容：咸瓜街经营咸肉和水果，豆市街经营豆类和粮食，等等。<sup>②</sup>相反，在洋人居住区，引人注目的西式写字楼、住房、教堂、赛马场、花园和夜总会，如雨后春笋一般出现，为不断增长的洋人社会提供工作、居住、信教和消遣娱乐的场所。不久，为了保护洋人的利益，以洋人为主导的政府机构如工部局、会审公廨和巡捕房相继出现。

17 有份地方志这样描绘上海在19世纪末的情形：

上海一隅，洵可谓一粒粟中藏世界。虹口如狄思威路、

蓬路、吴淞路尽日侨，如在日本；如北四川路、武昌路、崇明路、天潼路尽粤人，如在广东。霞飞路西首尽法人商肆，如在法国。小东门外洋行多闽人行号，如在福建。南市内、外咸瓜街尽甬人商号，如在宁波。国内各省市民，国外各国侨民，类皆丛集于此，则谓上海为一小世界亦无不可。<sup>③</sup>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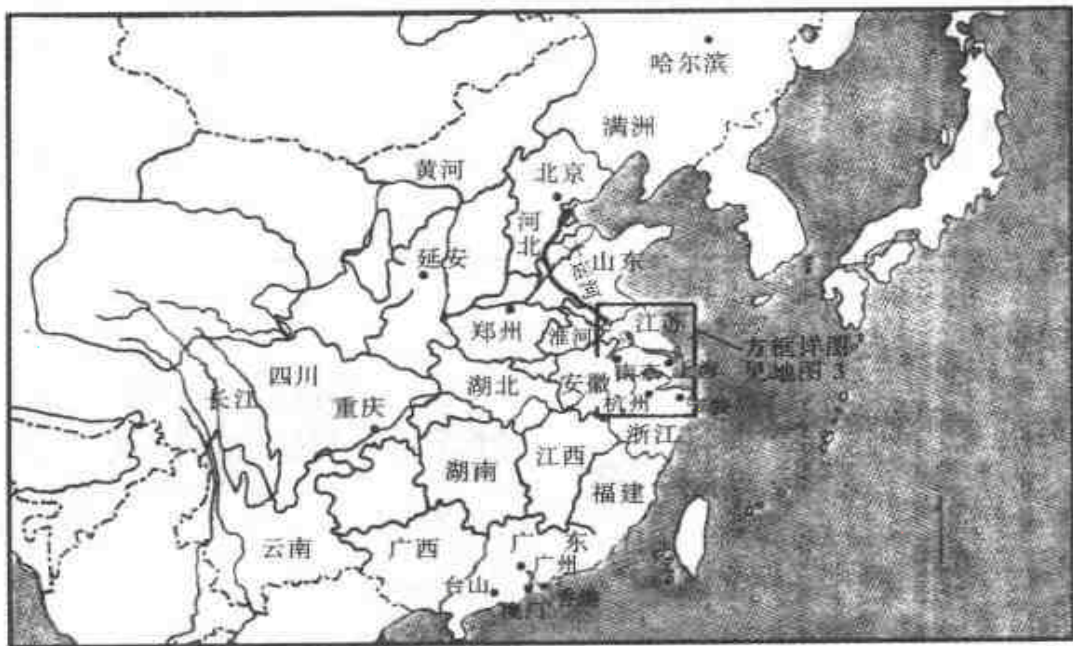
如果说商业在早期上海的发展中起了决定作用的话，那么，工业投资的作用接踵显现。外国公司不断出现，与国内新兴企业展开竞争，其产品有棉织品、丝织品、烟草、机器等，上海由此开始名闻遐迩。1861年，第一家蒸汽缫丝厂（英商）建成投产，四年后，著名的江南制造局（华资）建立。到1911年，中国所有的华洋工厂中，有1/4在上海。到1933年，这个比例升至几近一半。在1949年共产党取得胜利前夕，全国工厂足有60%集中于上海。<sup>④</sup>



地图1, 1919年时的上海口岸。转引自爱米莉·荷尼格(Emily Honig) *Sisters and Strangers: Women in the Shanghai Cotton Mills, 1911—1949* (Stanford, Calif., 1986).

工业发展带来了城市人口尤其是工人阶级数量的巨大增长。1852年,该市人口仅有50余万,到1949年,增至500多万。<sup>⑤</sup>

遍布各个劳动阶层的工人来自全国各地(参见地图2)。因此,从其近代的发展来看,上海一直就是一个移民城市。1885年,非本地人占了上海华人总数的85%;到1949年,该比例为84.9%。尽管移民浪潮连续不断,但不同移民群体的人口比例却随着时间推移而发生了显著变化:广东人被宁波人超过,后者最终又被来自江苏以及其他更北面一些省份的人超过。\*



地图2,1928年时的中华民国疆域,方框内地区之详图见本书31页地图3。

\*1885年,上海约有20%的华人原籍广东,40%的人原籍浙江,37%的人原籍江苏。到1935年,该市只有4%的人原籍广东,而有37%的人来自浙江,53%的人来自江苏。来自安徽、湖北、山东和河北的人也有了实质性增长。尽管非本地人所占的百分比在65年中起伏不定,但该市华人人口从未低于73%。见邹依仁:《旧上海人口变迁的研究》,上海,1980年,第112~115页。

## 广州移民\*

紧接在鸦片战争之后，上海的外来移民主要来自广州地区<sup>19</sup>。长久以来，作为中国惟一的对外通商口岸，广州因为对外贸易的需要，造就了一批劳动大军。当上海口岸开放的阴影笼罩过来时，成千上万的广州人——大多为水手和造船工人——掉头北上，到新的商业和工业中心从事其老本行。随着1843年会讲洋泾浜英语的广州买办吴健彰被任命为上海道台，这股迁移潮流进一步扩大。吴健彰的“三官”名号为洋人所习知，他驻于虹口，靠近其英美朋友的保护地区（即英美租界——译者注）。<sup>⑥</sup>至19世纪50年代初期，在上海可以找到吴的成千上万同省人，绝大部分居住在吴所在的虹口地区或是邻近主要船坞的广东路一带。这一地区出现了大批粤菜馆，反映了这一地区新居民的饮食口味。<sup>⑦</sup>这些广东移民，与其他将接踵而至的外省人一样，不断将其原来的行会习俗带到他们所不熟悉的城市环境。<sup>⑧</sup>这些组织既是新来乍到者的就业代理人，有时又起到福利机构的作用。这些组织多称为“公所”或“会馆”（英语可分别译为“行会”或“同乡会”），是同乡人礼拜其熟知的地方神祇的庙宇，是上演地方戏的舞台，是儿童或学徒接受教育的学校，是储蓄和信贷组织，还是死后葬身之地。<sup>⑨</sup>

中国学者有时喜欢把同乡会的大量出现视为国人“独一无二的”宗族本质的一种表现，粤人尤甚。然而，这类组织在世界

---

\* 英语中的 Canton 或 Cantonese 一般译为“广州”或“广州人”。此处主要指广州，也有广东的意思。——译者注

其他出现类似移民情形的地方也有。例如在美国,移民工人的组织也以种族与地域界线划分。1914年,单是在纽约,就有500多个同乡性质的慈善团体,“各团体均提供就业机会(通过来自家乡的雇主)、救济金、医疗、无息信贷和墓地。”<sup>20</sup>

无论是在纽约还是在上海,同乡会为那些背井离乡的工人提供了一种归属感。同乡社区不仅是找工作、求保障的依赖,也是新来乍到者在一个陌生环境中得到认同的途径。因此,公所和会馆最重要的活动包括宗教仪式和同乡宴会。同乡移民通过参与这种集体行动逐渐形成了特有的集体精神。

早在1853—1855年间,上海就从小刀会身上看到了同乡组织的爆炸性威力。<sup>21</sup>此次事件将对中国历史造成巨大影响(例如因为小刀会占领上海达17个月而导致外国人接管海关),溯其源流,与同乡因素有关。在一位会说洋泾浜英语、吸鸦片、与道台吴健彰同村的三合会成员领导下,这次叛乱主要以粤籍会馆为依靠(以闽籍会馆为盟友)。

至19世纪中叶,上海约有3500艘远洋帆船,逐渐吸引了大约8万名广东人和5万名福建人前来寻找就业机会。鸦片战争后,由于外国轮船的竞争,使得许多旧式中国帆船难以抵敌,面临失业的水手随时准备加入抗议行列。本地造船业的衰落损害了一些行会头面人物的利益,促使他们也步入叛乱行列。

失业水手纠合一体,构成了小刀会的主要战斗力量,他们主要来自广东和福建,由各自所在的公所和会馆组织。尽管这些行会首领都是上海新生通商阶层的头面人物,他们同时也是一方老大,扮演着其失业的同省人的保护人的角色。李少卿——系广东嘉应会馆首领,也是小刀会叛乱初期的重要人物——一直是长江下游粤籍鸦片走私者的保护人。鸦片走私贸易是将上海地区城乡秘密会党联合起来,共同发动反清叛乱的关键纽带。道台



吴健彰也是嘉应人，早先曾经利用职权，批准成立一支公所团练武装，具有讽刺意味的是，这支武装后来成为叛乱的组织基础。公所民兵卷入集体暴力长期以来就是广东人的习俗，此前最著名者为三元里抗英事件。<sup>⑩</sup>

1853年9月7日，叛乱者在几小时内即占领上海县城。是日，上海知县正身着礼服，率众参加祭孔典礼，突遭攻击，于顽抗中被杀。后来证明凶手早先曾是吴健彰团练中的一个首领，曾因教唆斗殴被知县囚禁数月。吴本人也被叛乱者俘获，但不久即应 21 美国领事馆的请求开释。小刀会在占领县城时遇到的惟一抵抗来自40名道署亲兵，即便如此，其中仍有17人拒绝开火，因为他们都是三合会的人。

同乡身份保证了叛乱初期的成功，但是好景不常。占领上海不久，叛乱者内部的纷争即暴露出来。为了争夺县衙库银，粤籍和闽籍叛乱者发生争斗。闽籍叛乱者将一部分战利品搬上其帆船，扬言开航离去。这批人要求杀掉吴健彰，携带掠来的银子逃回其南方原籍。广东人则更具大志。正如小刀会大元帅照会美国领事馆的那样，如果吴健彰忠于小刀会新政权，他们可以考虑让他恢复原职，叛乱者则挥师西进，占领省城苏州。不幸计划落空，美国人放走了吴健彰，吴随后在清政府镇压叛乱的过程中扮演了重要角色。

尽管小刀会叛乱在政府镇压和闽粤两籍分子冲突不断升级的情况下失败了，但它开创了上海通商社会的复杂局面。上海开埠不过10年时间，影响以后多年的集团暴力便开始形成。在外国人、政府官员、地方头面人物以及附属于他们的工人阶级的相互影响下，引发了持久的犯罪加抗议模式。帮会分子与叛乱者一样，都在这五方杂处的环境中滋生。这些人物周期性地联合行动，领导心怀不满者和被迫离开家乡的工人，发起带有政治意味



的运动，有时甚至带有强烈的民族主义色彩。然而，尽管这些运动可能规模很大，雄心勃勃，但却从未完全超出同乡关系的影响。

## 宁波移民

小刀会不是这一时期向清政府发起挑战的惟一叛乱者。在 22 上海西面，太平军建都南京（改名为“天京”）并派兵占领了江南大部分地区。<sup>③</sup> 1861 年春，太平军占领通商口岸宁波。<sup>④</sup> 惊恐万状的地主和商人，不愿看到其财产落入农民叛乱者的手中，纷纷涌入上海寻求避难。浙江有钱人——大多来自宁波地区——的涌入，形成著名的甬帮，操纵上海金融界达数十年。<sup>⑤</sup> 这批新来者的财富，部分投资新式企业，部分投资传统的手工业如珠宝业或木作业，生产出来的奢侈品可以满足其上层生活方式的需要。由于有 8 个多世纪的对外贸易的经验，加上其家乡邻近上海，宁波商人在上海市场上很快就超过了其广东竞争者。

经济竞争因文化冲突而加剧。1870 年代，宁波籍文人写了一系列文章赞颂其家乡“优秀的”习惯。相反，在这些文章中，粤妓、粗俗成了远道而来的广东人的代名词。结果导致了广东人的愤怒回击。<sup>⑥</sup>

文化差异还反映在居住方式上。广东人聚居于美国人所在的虹口区，而宁波移民一般居住在老城所在的南市，紧靠在宁绍码头——这可是上海与其家乡浙江省之间的商业生命线。这里有符合其口味的高档茶馆，1912 年，这些消遣场所有 64 个，到 1919 年，竟达 164 个。在此，他们一边手捧一壶杭州著名的龙井

茶，一边欣赏绍兴戏\*或是苏州评弹。还有些空间则是卖艺、测字或玩鸟的地方。而且，茶馆还是解决争端的场所。冲突双方在调解人的陪伴下可到茶馆“讲茶”。当双方对解决结果感到满意时，便喝下红绿茶混合的茶水一杯，表示握手言和。<sup>30</sup>

与茶馆交相辉映的是无数会馆公所，来自相同地区的商人和工人在此相聚，交换经济或社会信息。<sup>31</sup>这些会馆公所，清波一盛(Shiba Yoshinobu)概括为宁波旅居者“强烈的地区忠诚”形成之地。宁波人常常挂在嘴边的一句话是“阿拉同乡人”，宁波雇主最喜欢雇用男性亲属，其次是同村或同镇人，再其次是同县人，最后才是宁波地区其他地方的人。<sup>32</sup>

四明公所是旅沪宁波人的主要行会，创立于1797年，地处老城北门外。随着时间推移，宁波人愈聚愈众，公所财产大幅扩张。1844年，当时的上海知县——一位宁波人——宣布豁免四明公所的税额，该公所的特权地位得到确立。尽管十年后公所厅堂在小刀会与清军的交战中被毁，但很快重新建造起来，且更为华丽。公所包括停棺处、墓地、办事室、赙材（即赙购棺材之处——译者注）、客房以及礼拜土地与关帝的庙堂。旅沪各界宁波籍人士在每年敬拜神祇的节日都在此处聚会。<sup>33</sup>

即便是很有势力的四明公所也因毗邻的法租界的建立而面临着可怕的对峙。法国人宣称该公所的停棺处与墓地有害健康，遂于1874年决定开辟一条马路，穿过公所墓地，以扩展其领地。作为回应，1500多名宁波人聚集在公所，抵制外国人的侵入。冲突中，有7名公所成员被杀，并因此引发了一场针对法国人的复仇骚乱，无数法属房屋和商号被付之一炬。当法国军队开

\*关于绍兴戏，可参见原书第187页的脚注。

来强行拆毁墓地围墙时，宁波人一致反对。被法国人雇用的宁波人拒绝工作，宁波籍居民拒绝购买洋货，拒绝为洋人服务。由此引发了一场长达6个月的斗争——常被誉为中国历史上的第一次爱国罢工——它的胜利印证了同乡忠诚所发挥的政治力量。<sup>24</sup>

宁波人对外国人侵占其墓地的武装反抗反映了葬仪在中国文化中的中心地位。<sup>25</sup>正如一位知识渊博的外国居留者所作的评论那样：“对西方人来说，当然希望辟路成功，未曾想，建一条马路，迁走几座坟，竟然招致那么多中国人的反对，看起来真是荒谬。对中国人来说，洋人似乎缺乏对死者的尊重，而生老病死乃中国人最重要的迷信。”<sup>26</sup>无论是在士绅还是普通民众眼里，丧事都是极其神圣的，其习俗的地区差异，就是识别人群籍贯的标志。由于将目标对准了极重信仰的一群人，法国人激发了宁波人的强烈情绪。如果说有什么能有效激发地缘政治之出现的话，那么非其信仰莫属。

## 江苏—华北移民

近代上海的第三次移民浪潮，开始于19世纪60年代，持续至20世纪，移居者主要来自江苏及其北面各省。由于太平军兴以及随后发生的战事和自然灾害，在这些背井离乡者中，包括了一些富裕的江南地主（来自无锡和苏州者尤多），但绝大多数都是来自苏北、山东、安徽、湖北等地的贫苦农民。<sup>27</sup>当他们的渔船抵达上海后，绝大多数贫苦移民都猬集在沿江沿河的棚户区内。起初，许多难民均以船为家，在小船顶上铺上一层芦苇茅草，以避风雨。这种船家，尽管狭小寒冷，如果需要，却不失为一种返回农村的便利工具。在码头找活做或是在临近河边的纺织厂工

作的移民便离开水面,在附近租点地方,用竹子烂泥搭起简陋的棚屋。<sup>⑧</sup>那些收入和工作条件稍有改善者的下一步便是租房或是住进工厂宿舍,但这些地方的拥挤程度和卫生状况并不比自搭的棚屋好到哪里去。<sup>⑨</sup>

作为江南茶馆的对应物,老虎灶分布于贫困的工人居住区,出卖饮用开水和洗澡水。老虎灶旁的一块地方,有几条长凳,工人可以坐下来,用热毛巾擦擦脸,喝着开水聊聊天,便开始了新的一天。<sup>⑩</sup>这些地方还有提供廉价的扬州、山东饭菜的小饭摊,服务对象是那些无钱上饭馆餐厅的人力车夫之类的人物。<sup>⑪</sup>

这些北方人因贫穷而无力像广州和宁波移民那样建立像样的公所厅堂,以供形成社区和加强联系之用。尽管对于贫苦的码头苦力或缫丝工人来说,正规公所难以企及,但地方团结仍可从许多帮口——来自同一地区者的帮口轻易便可结成——中表现出来。这些狭隘的地方联系往往通过该市沿水道蔓延的帮会形成更大的组织势力。 25

青红帮——在民国时期的上海政治经济中作用非凡——起源于清朝漕粮水手中的保护网络。19世纪初,漕粮运输路线由运河改走海道,上海成为连接华北与盛产粮食的长江三角洲的主要中心。<sup>⑫</sup>对成千上万名漕粮水手(绝大部分为北方人)而言,准宗教性质的帮会为他们动荡不定的生活提供了安全与安慰的保证。

尽管青红帮起源于粮船水手中的佛教互助组织,随着时间推移,其势力越来越大。\*

\*戴维·凯利(David E. Kelley):《庵堂和漕粮船队:罗教与粮船水手组织》,载《近代中国》第8期(1982年),第361~391页。该文针对早期粮船水手组织提出了新的看法,认为这些组织是罗清教义影响下的世俗佛教教派的组成部分(罗是16世



这种转变的动力之一便是鸦片走私。如同小刀会叛乱中所见,鸦片走私与秘密帮会往往是并行不悖的。在同一条水道中,保护粮船的组织转变为保护鸦片走私,应在情理之中。鸦片属违禁品,产于云南或四川,从重庆上船,沿长江而下,直抵上海。洪帮(红帮)成员一直护送至上海,由青帮成员负责卸货,转交给广东人开的烟膏铺。鸦片战争以后,法租界建立,法国人开始插手这项买卖。法国巡捕允许帮会分子在法租界的某个便利码头卸货,从中分一杯羹。<sup>④</sup>

帮会中人的种种勾当往往处于警察的保护之下,上海的滨江地区成为其活动的天堂乐土。以帮会为媒介的同乡忠诚——多数集团暴力均从中产生——构成了上海码头生活的一个固有特征。有位观察者述称:

昨天下午五点钟,在浦东某公司码头做工的山东、湖北两帮工人……放工后,山东帮有三十多人从码头西门出来,人数约略相同的湖北帮从码头东门出来,就像有约在先,两帮人来到义中(音)机器厂西边的一块空地上,立即大打出手,器械有铁棍、杠棒、刀子。混战多时,双方互有杀伤。<sup>⑤</sup>  
上海码头工人中的械斗使人联想到中国乡村中普遍存在的

---

纪的一位思想家)。17世纪中期,该教派活跃于江浙直至华北的大运河上的粮船水手中。至19世纪中期,这些组织已从公开的福利兼宗教组织演变为秘密帮会,从事走私及勒索勾当。详情可参见森田明(Morita Akira):《清代水手结社的性质》,载《东洋史研究》第13期(1955年),第364~376页;李世瑜:《青帮·天地会·白莲教》,载《文史哲》第3期(1963年),第67~78页;以及庄吉发:《清代洪帮源流考》,载《汉学研究》第1期(1983年),第91~108页。

作者在上文中两处提到青红帮起源于粮船水手,有误,青帮起源于罗教、粮船水手,没错。红帮乃哥老会在长江下游的俗称,其起源与长江中上游的嘭噜、湘军有关。青红帮合流是另一概念。——译者著

宗族械斗——工人们新近才从那里来到城市，如果在城里找不到工作或是农忙时，他们往往返回原籍。<sup>26</sup>然而，工人中这种地缘关系的对立，并不只是一种乡村习俗，帮会中的包工头——他们往往招收来自其家乡的工人——总是煽动地缘冲突，以便从中扩张控制范围。<sup>27</sup>例如，湖北帮抱成一团，便可阻止山东人进入有钱可赚的装卸行列。所以，工人阶级的文化表现，与上海劳动市场密切相关。

## 原籍、职业与工人团结

同乡身份与工作机会之间的密切关系意味着移民工人的职业依赖于他们的地理源流。广州木匠、宁波铜匠和盐城人力车夫成为人们熟悉的近代上海劳工世界的形象。这些职业群体在一定程度上受到移民原籍条件的限制。广州早在其他中国口岸开放很久以前就是对外通商口岸，为了修理停泊在那里的外国船只，产生了一大批熟练木匠。19世纪中期，当上海发展速度超过广州时，广州木作工人自然大批涌入新的都会，利用其手工技艺，寻找就业机会。盐城人力车夫，原本是在天灾人祸打击下被迫放弃农田活路的贫苦农民，来到上海时一无所有，惟有出卖其体力。所以，这个城市中有那么多盐城人在从事苦力劳动并不令人感到惊讶。

来自同一地区的移民在寻找特定的工作时，如果说有什么逻辑可言的话，包工头和同乡老板的私人介绍十分重要。从粤籍道台吴健彰到宁波公所首领，到盐城黄包车大王，对于想要进入工作行列的新来乍到者而言，同乡老板不啻起到孔道作用。地理源流因此成了保护人与被保护人之间的媒介，由此产生一定的



职业,其中,不同籍贯的人群很容易被区分开来。其恩人的关系和能力决定了上海工人的就业方向。<sup>29</sup>来自相对富裕、条件较好的南方老板——广州人、宁波人和江南其他地方的人——使来自这些地方的工人自信可在上海找到最好的饭碗。结果,他们确实一直都占据着这些行业。相反,来自北方(尤其是苏北)的劳动者一般都缺少技艺,工资很低,工作不稳定。(江南与苏北的地理情况参见地图3)

逐渐地,上海劳工世界的两极分化轮廓开始变得清晰起来:来自南方的熟练工匠掌握着稳定的、报酬高的工作,而来自北方的农民则以人力车夫、码头工人、缫丝工人、纺纱工人等职业为归宿,报酬仅能糊口。当然,在现实中,职业的差异,比起地域分布的模式来要复杂得多,变化也要快得多。在两类不同地区的内部,不同的县,县内不同的村,均可为不同的工作提供劳动力。而且,原籍身份不是工人从事特定行业的惟一因素。性别自然是另一个重要因素。例如,苏北扬州来的男人充斥于上海的理发、澡堂帮工和开肉铺等行当,而扬州妇女则往往从事卖淫。

从原籍(根据性别)招募工人从事同类工作的习惯,能够在不同的移民群体中培养强烈的团结精神。这种团结——我将说明——涉及面广,足以解释上海工人为什么那么容易发起集体行动。以往的学者也曾指出工人团结在上海引人注目的工人骚动记录中的重要性。然而,在他们看来,这种团结通常是阶级觉悟的表现。他们将同乡忠诚、性别、行会、帮会之类因素视为真正的工人阶级团结的“封建”包袱。只是因为上海工人在外来力量的领导下,才能够克服这种分裂,才使一个“现代”工人运动的出现成为可能。

两代中国学者以及西方研究中国工人运动的代表人物,都将工人行动主义的兴起(主要是在上海)归因于工人之阶级意识





地图 3, 江南与苏北。转引自爱米莉·荷尼格, *Sisters and Strangers: Women in the Shanghai Cotton Mills, 1911—1949* (Stanford, Calif., 1986).



的增长。尽管对于工人何时才具有完全的阶级意识这一问题还存在相当多的争论——中国的分析家一般认为这个过程开始于19世纪20年代中期。法国历史学家谢诺(Jean Chesneaux)也有类似结论：“在1919—1927年间经济的与政治的斗争过程中，中国工人阶级内部经历了深刻的变化。相反，正是其阶级意识的增长、其组织的迅速发展和加强，才使之能承担起斗争任务。”尽管谢诺承认中国工人中的地区差别和职业差别，但是其重点在于强调20年代武装罢工中表现出来的“阶级团结的进步性”。<sup>⑤</sup>

与这种阶级团结不断发展的描绘相反，美国历史学家的最新研究强调的是中国工人的分裂特征。埃米莉·荷尼格(Emily Honig)主要从原籍角度出发，探讨了上海纺织厂女工中存在的深度分裂，认为：“很少有证据说明，20世纪20年代的妇女罢工表现出了阶级觉悟或是革命精神。”盖尔·赫尔沙特(Gail Hershatter)在对天津工人的研究中也发现：“分裂、不和与性别差异，一直以一种令人苦恼的非线性方式增长。”<sup>⑥</sup>荷尼格和赫尔沙特认为，只是在20世纪40年代中叶的内战时期，共产党干部才克服困难，因势利导，消弭工人内部的分裂，成功地担当起领导革命工人运动的任务。

我的研究建立在这一最新分析的基础上，着重探讨中国工人中的分裂情况，同时对那种用铁板一块的工人阶级意识来解释工人运动之兴起的观点予以驳斥。<sup>⑦</sup>然而，与前述作者观点不同的是，我强调的是工人阶级与其行动主义之间的正面联系。上海工人中的分裂，产生了系统而长久的团结：来自相同地区的移民和相同行业中的同性，构成了集体行动的潜在基础。与其将这些派别视为“现代”革命的障碍，不如将其理解为工人行动主义的摇篮，这样可能更精确一些。

目前有关工人战斗性的理论强调工人阶级文化在引发集体

行动中的重要性。文化认同可能是工人中按人种关系分派的最重要因素。正如约翰·冈博勒(John Cumbler)在观察美国的情况时所说：“当某个种族集团在某个行业中占主导地位时……种族语言、饮食口味、传统、历史、民间传说和反抗方式汇集成为一种强有力的工人阶级文化。”<sup>30</sup>

在中国城市,就像在许多其他移居地一样,原籍与种族身份密切相关,正如D·K·刘注意到的那样:

从方言、习俗、礼仪角度来看,中国各个地方差异甚大……所以,在所有的大城市中,来自相同地方的人们,都有一种特别的兄弟感情;为了增进合作和互助,便有了同乡公所和会馆。上海有这类组织上百个。此外,来自相同地方的人们都愿意定居在同一地区……原籍相同者集中居住,导致特种风格的茶馆、饭馆、娱乐场所纷纷建立,以迎合该社区的绝大多数顾客。这些地方,一方面是同乡人聚会谈天、传播消息、增进乡谊的场所,但在另一方面,它们也是制造麻烦的温床、与不同籍贯者发生冲突械斗时的集合地。<sup>31</sup>

由地缘政治培育出来的团结很容易产生战斗性,尽管不必以阶级觉悟的方式表现出来。<sup>32</sup>有时,例如在宁波墓地之争中,同乡人身份能将富人和穷人联合起来,以保护他们共同的文化财产。有时,例如在小刀会叛乱或码头工人的械斗中,同乡忠诚可以使一派工人反对另一派工人。在这些事例中,地缘关系压倒了阶级关系。然而,正如我们将要看到的,这种状况并非一成不变。对有些行业的技术工人而言,他们为自己的工种感到自豪,只是偶尔瞥一眼不幸者。<sup>33</sup>而且,即使当阶级觉悟并非促动因素时,在有些关键时刻(例如本书第四章中将要探讨的五四运动和五卅运动),不同籍贯的工人——常常由同乡人物领导——发现有可能在改变近代中国历史进程的大规模抗议中协调行动。

因此,地缘政治是一柄双刃剑,既为集体行动的发展提供了机会,又是一种人为的壁垒。当工人阶级斗争出现,使得产业问题变得如同地缘忠诚一样(或更加)突出时,人们也很少放弃同乡关系。相反,地理源流将来自同一地区的人们汇聚到同一行业的事实表明,地缘关系和产业关系往往是交相为用的。正像我在本章中已经指出的,既是移民社区的又是工人集合体的组织加强了这两种身份的联系。对来自南方的技术性工人来说,行会发挥着这一重要功能;对来自北方的非技术性工人来说,帮口则是关键媒介。可以肯定,实际生活中的差异并不是僵化不变的。正如同乡行会不止一次地奋起抵抗北方工人的攻击一样,有不少南方工匠也加入了帮会。即便如此,差异仍值得重视——我在接下来的两章中要详细讨论,它产生了工人抗议富有特色的内容。

## 注 释

① 郑祖安:《近代上海都市的形成》,载《上海史研究》,上海,1984年,第172~173页。对近代上海城市发展的一般看法,可参见唐振常主编:《上海史》,上海,1989年;刘惠吾编:《近代上海史》,上海,1985年;Rhoads Murphey, *Shanghai: Key to Modern China* (Cambridge, Mass., 1953); F. L. Hawkes Pott, *A Short History of Shanghai* (Shanghai, 1928); and G. Lanning and S. Couling, *The History of Shanghai* (Shanghai, 1921)。

② 朱梦华:《上海南市话旧》,载《上海地方史资料》第一辑,1982年,第43~47页。

③ 胡祥翰:《上海小志》卷10,上海,1930年。

④ 全汉升:《上海在近代中国工业化中的地位》,台北,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集刊》第29辑,1958年,第461~462页。

⑤ 邹依仁:《旧上海人口变迁的研究》,上海,1980年,第90~91页。

⑥ John K. Fairbank, *Trade and Diplomacy on the China Coast* (Cambridge, Mass., 1953), pp. 394~396.

⑦ Leung Yuen Sang, "Regional Rivalry in Mid-Nineteenth-Century Shanghai," *Ch'ing -shih wen-t'i* 4, no. 8 (1982): 30; 吴祖德:《酒楼饭馆一瞥》,载《革命史资料》1987年第5期,第146~151页。

⑧ 上海主要行会详表可参见《上海碑刻资料选辑》,上海,1980年,第507~513页。关于广东行会之传统,可参见 Edward J. Rhoads, *China's Republican Revolution: The Case of Guangdong, 1895—1913* (Cambridge, Mass., 1984), p. 58.

⑨ 吴馨修:《上海县续志》,卷3,上海,1918年,第2~8页;《近代上海地区方志经济史料选辑》,上海,1984年,第58页。

⑩ James R. Green, *The World of the Worker* (New York, 1980), p. 28.

⑪ 以下有关小刀会叛乱的论述主要取材于上海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编:《上海小刀会起义史料汇编》,上海,1980年。引证的其他材料及对此次叛乱的进一步探讨,可参见裴宜理:“Tax Revolt in Late Qing China: The Small Swords of Shanghai and Liu Depei of Shandong,” *Late Imperial China* 6, no. 1 (1985): 83~112。将小刀会叛乱作为劳工运动的有趣阐述可参见王尔敏:《五口通商初期上海地区暴乱事件所反映秘密会社之生机》,载《中国文化研究所学报》第12期,1981年,第65~90页。

⑫ Frederic Wakeman, Jr., *Strangers at the Gate* (Berkeley, Calif., 1966), chaps. 1~3; Ming K. Chan, “Popular Mobilization and Labor Resistance in the Canton Delta, 1831—1927,” paper presented at the annual meeting of the Association of Asia Studies, 1989.

⑬ 南京落入叛乱者之手后,导致大批技术工人从南京逃到上海避难,其中有关于家具木工、某丝织行会的成员和其他受过教育的逃难者的例子,可参见《北华捷报》1856年8月30日、11月15日和1857年5月16日。

⑭ Jen Yu Wen, *The Taiping Revolutionary Movement* (New Haven, 1973), chap. 19.

⑮ Susan Mann Jones, “The Ninbo Pang and Financial Power at Shanghai,” in *The Chinese City Between Two Worlds*, ed. Mark Elvin and G. William Skinner (Stanford, Calif., 1974), pp. 73~96.

⑩ Leung Yuen Sang, "Regional Rivalry in Mid-Nineteenth-Century Shanghai," p. 40; 《申报》, 台北重印本, 第7册, 第4161页、4170页、4217页、4242页、4265页。英国报刊也不喜欢广州人, 用“残酷”一词加以描绘, 因为粤人犯罪活动在19世纪60年代中期有增无减。参见《北华捷报》1865年3月25日。

⑪ 雨前:《春风得意楼及其它》, 载《上海掌故》, 上海, 1982年, 第65~68页; 钱化佛:《三十年来之上海》, 上海, 1947年, 第23~24页。

⑫ 有关浙江行会与同乡组织的情况, 可参见 R. Keith Schoppa, *Chinese Elites and Political Change: Zhejiang Province in the Early Twentieth Century* (Cambridge, Mass., 1982), pp. 23~24.

⑬ Shiba Yoshinobu, "Ningbo and Its Hinterland," in *The City in Late Imperial China*, ed. G. William Skinner (Stanford, Calif., 1977), p. 437.

⑭ 《上海研究资料》续集, 上海, 1937年, 第295~296页。

⑮ Jones, "Ningbo Pang," pp. 86~88; 《甬光初集》, 上海, 1941年。

⑯ James L. Watson and Evelyn S. Rawski, eds., *Death Ritual in Late Imperial and Modern China* (Berkeley, Calif., 1988).

⑰ Pott, *Short History of Shanghai*, p. 98.

⑱ 吴祖德:《酒楼饭馆一瞥》, 第146~151页。苏州陷落后当地难民涌入上海的情况, 可参见《北华捷报》1865年1月28日。(作者在第二次及以后引用著作或期刊中的论文时, 往往只注明论文或论文简称, 而省略了著作期刊的全名及其出版地和出版年月, 中译本随之。另外, 注释中第二次及以后出现的著作, 一般也省略了出版地和出版年月。——译者注)

⑲ 至20世纪20年代, 约有20万~30万上海居民住在5万处这种棚屋里。据调查, 1926年, 在公共租界约有77%的棚户居民有工作——主要为工厂工人、人力车夫和码头工人。见《上海棚户区的变迁》, 上海, 1962年, 第34页。

⑳ 朱懋澄:《调查上海工人住屋及社会情形记略》, 上海, 1926年, 第4~12页; 唐海:《中国劳动问题》, 上海, 1926年, 第9~10页; 杨美珍(音):《杨树浦女工状况》, 浦江大学毕业论文, 1930年。

㉑ (日)井上清:《上海穷人的面貌》, 东京, 1934年, 第31~32页。

⑳ 吴祖德：《酒楼饭馆一瞥》，第 149 页。

㉑ 郑祖安：《近代上海都市的形成》，第 172 ~ 173 页。

㉒ 薛畊莘：《近代上海的流氓》，载《文史资料选辑》1980 年第 3 辑，第 160 ~ 162 页。

㉓ D. K. Lieu, *The Growth and Industrialization of Shanghai* (Shanghai, 1936), pp. 175 ~ 176.

㉔ 关于华北农村的械斗问题，参见裴宜理：《*Rebels and Revolutionaries in North China, 1845—1945* (Stanford, Calif., 1980), pp. 74 ~ 80。关于东南地区的械斗传统，可参见 Harry J. Lamley, “Lineage Feuding in Southern Fujian and Eastern Guangdong Under Qing Rule,” in *Violence in China: Essays in Culture and Counterculture*, ed. Jonathan N. Lipman and Stevan Harrell (Albany, N. Y., 1990), p. 297.

㉕ 陈港：《上海港码头的变迁》，上海，1966 年，第 46 ~ 47 页；《上海港史话》，上海，1979 年，第 297 页。

㉖ Emily Honig, “The Politics of Prejudice: Subei People in Republican-Era Shanghai,” *Modern China* 15, no. 3 (1989), p. 259 ~ 262.

㉗ Jean Chesneaux, *The Chinese Labor Movement, 1919 — 1927* (Stanford, Calif., 1968), pp. 393 ~ 400.

㉘ Emily Honig, *Sisters and Strangers: Women in the Shanghai Cotton Mills, 1911—1949* (Stanford, Calif., 1986), p. 245; Gail Hershatter, *The Workers of Tianjin, 1900—1949* (Stanford, Calif., 1986), p. 7.

㉙ 其他强调中国工人阶级内部变动的最新研究，可参见 Lynda Shaffer, *Mao and Workers: The Hunan Labor Movement, 1920—1923* (Armonk, N. Y., 1982); and Ming Kou Chan, “*Labor and Empire: The Chinese Labor Movement in the Canton Delta, 1895—1927*” (Ph. D. Dissertation, Stanford University, 1975).

㉚ John Cumber, “Migration, Class Formation and Class Consciousness: The American Experience,” in *Confrontation, Class Consciousness, and the Labor Process*, ed. Michael Hanagan and Charles Stephenson (Urban, Ill., 1986), p. 53.

③⑨ Lieu, *The Growth and Industrialization of Shanghai*, p. 166.

④⑩ 参见 Michael Hanagan and Charles Stephenson eds., *Proletarians and Protest* (New York, 1986), p. 4, 其中认为——与汤普森 (E·P·Thompson) 的观点相反——社会团结比思想意识更能解释以往经历与无产阶级反抗之间的重要联系。

④⑪ 同样的情形在其他环境的技术工人中也有, 特别参见 David Montgomery, *Workers' Control in America: Studies in the History of Work, Technology, and Labor Struggles* (Cambridge, England, 1979).



## 第二章 来自南方的工匠

人们一般都认为,由于近代工业的出现,突然产生了一个新式的无产者阶级,他们缺乏技艺或是无法驾驭其命运。我认为情况并非如此。中国第一批机器工厂中的绝大多数工人都是工匠。手工活有这样几个特征:掌握技艺要经过一个时期的学徒生涯,有行会性组织,从生产到销售的用人都有一定规矩。鸦片战争后建立的船坞、兵工厂和机器厂都雇用有经验的木匠和机匠,\*他们从其所在的外国人的或中国官员控制的企业领取很高的薪水。负责招工的工头几乎总是从南方招收训练有素的工匠,因为在南方有很多技艺娴熟的手工业者。

### 行会与工匠群体

在对 19 世纪的汉口的研究中,罗威廉(William Rowe)恰如其分地强调指出,行会乃“社会与经济生活中最重要的因素”<sup>①</sup>。很多研究者都认为中国行会主要是作为商人团体出现的,在中国经济近代化过程中发挥了主要作用。<sup>②</sup>然而,中国行会也是工匠团体,负责招徒授艺,传承特定行业的技艺。因此,就像在欧洲

\*原文中的 metalworkers 我译为机匠,在下文有时也译作“机器工人”。——译者注



一样，这些团体在工人运动发展中具有重要意义。<sup>33</sup>然而，与其欧洲的同类相比，中国行会更典型地将其从业人员资格局限于某个特定的地理区域。<sup>34</sup>

33 作为通商口岸的上海，在建立同乡行会（公所）和招收技术工人之间存在着密切联系。例如，上海造船厂的第一个木匠包工头李荣是个广州人，他本人也曾是广州某外商船厂的一名木匠，1850年左右来到上海。作为包工头的李荣常常往返于上海和他的家乡台山县之间。短短几年里，他就招来数百名台山木匠（有些是有经验的大师傅，其他的则是年轻学徒），到不断发展的上海造船厂工作。后来，另一位广州包工头卢文从台山以外的县份招工。卢文的“仁德堂”专包外国船厂的木船舱面上的生意，称为“上架行”；李荣的“荣记号”专包外国船厂的木船船体生意，称为“下架行”。1858年，卢文要下属工人每人每工捐铜元三枚，积有成数后，筹建木业行会，名为“鲁班殿”，以鲁班为行业神。鲁班殿位处虹口区，这里是广东人聚居的中心地带。很快，鲁班殿就成为所有广东木匠共有的行会，无论他们原籍何县或是干的什么专门活计。凡从广东新到上海者，在他能作为木匠找到工作之前，都被要求加入鲁班殿。入会费和年费为加入者薪水的15%~30%，鲁班殿则保证其成员的就业机会，并在遇到生老病死时，并提供一定的救济救助。<sup>35</sup>

广东木业行会的成功，使得随后而来的移民纷纷仿效。1866年，上海的宁波木工建立了自己的鲁班殿。新的鲁班殿有600名成员，其中2/3的人在船厂工作，其余的人则行无定踪。每年春天，在本业祖师鲁班诞辰日，宁波木工师傅被请来从新加入的行会成员中招收徒弟，每人一名。<sup>36</sup>

尽管作为行会中人拥有不少优势，但不是说不会遭遇到挑战。1879年，家住虹口、在英属浦东样生船厂工作的三位弟兄，

拒绝交纳行会规定的高昂年费。声称自己在洋人企业干活，应免交此费。他们认为行会无权加以控制。这一行为性质严重，导致广东会馆也卷人其中，代表鲁班殿说话。在广东会馆头面人物的压力下，上海知县发布谕令，要求三人交纳年费。然而，因为三人住在美国人控制的虹口区，县衙门的传票须得美国领事签字才能有效。尽管领事白蕾(H. D. Bailey)很愿意签署此项命令，但他还是附加了一项条件，要求几位木匠先到会审公廨——1865年<sup>34</sup>在上海成立，由中外法官共同审理涉及外国人的案件——听取判决。在听取答辩的过程中，祥生船厂的英方经理辩称，华人的行会规则妨碍了外国企业雇用工人的权利。会审公廨接受了有关意见，裁定几位木匠可以免交年费，并将他们送交英国(工部局)警察保护，以免受到粤籍鲁班殿的干涉。<sup>⑦</sup>

正如本案所揭示的，在通商口岸上海这样一个五方杂处的环境里，行会并不总是稳操胜券。对工人的垄断会遭到多方面的干扰。然而，行会的势力仍相当大，部分地是因为他们在上海劳动力市场保护技术工人的特权地位。行会对有关生意加以限制的能力使其工匠成员可得到高额薪水。例如，1880年，英属耶松船厂控告六位木匠，因该厂工头雇用了一些不属宁波木工行会的工人，这六人出于报复，将工头打伤。当会审公廨开庭时，宁波鲁班殿所属的工人将公廨团团包围，嚷闹着要求保障行会权利。<sup>⑧</sup>

行会的力量在其建筑物中有充分表现。一位外国观察者曾这样描述上海的木业行会：

沿华界江堤前行四分之一英里，出现在眼前的是一座寺庙。哦，不是寺庙。是浙江人的……一处公所。有两个大院，一个戏台，一处庙宇。庙里供着三尊神像，主神为鲁班，木商们如发生争执，就要请神调解……再往前走，是一片破

烂不堪的棚户区,其中有一处公所,是上海最华丽的公所之一……还有一处木业公所。这里可称为中式建筑风格的典范,其庙宇和戏台描金绘红,屋顶立着锡制白鹤,供桌上有锡制香炉,墙体格局错落有致。<sup>⑨</sup>

公所之庙宇戏台的种种摆设,表明公所起着社区中心的作用。对大多数成员来说,一年中最重要的事情莫过于一年一度的宴会,届时,所有的工匠均被邀请参加。例如印刷公所,每年秋天,大约在中秋节前后,商务印书馆、中华书局以及《申报》、《新闻报》的熟练技师和排字工人均被邀请前来,在听完和尚唱经后,便开怀大吃一顿丰盛的素宴。饭后看戏,最后是搓麻将。<sup>⑩</sup>

金属加工业的行会也是人多势众。该行会于1800年由13名白铁工创立,名为“菊社”,每当秋天菊花盛开时,菊社便举行年会。届时,白铁工人聚集一堂,礼拜其行业神李老君。后来,当上海的铜铁器商店合并经营后,菊社便吸收两业工人加入。鸦片战争后,金属加工业发展迅速,开始渗透至新式造船工业。为了平息冲突,保持控制能力,菊社制定了统一的价格规则,并限定每个工场每隔3年方可招收一名单身学徒。<sup>⑪</sup>至1920年,该白铁工行会已拥有相当财产,能保证其4万名成员每天工作9小时,其成员一般来自无锡、宁波和江南其他地区,大多为受过良好教育的手艺人。<sup>⑫</sup>

有势力的行会在其从事的行业中养成了一种“行会精神”。在其3年学徒期开始时,白铁工场的学徒必须持香向师傅和李老君各行三磕头礼。<sup>⑬</sup>即使在上海最“新式的”工厂里,白铁工人中均盛行着类似的仪式。1920年,一位记者对上海最大、获利最丰的机器厂之一进行了采访,他对厂内沿袭的“封建行会关系”感到惊讶。该厂建筑均为西式,引人注目,与此形成鲜明对比的是,在围墙内工作的工匠中存在着“传统的”人际关系模式。新学

徒须行“拜师傅”仪式，举行仪式的地方必须备有香烛和临时供桌。燃香后，学徒要对白粉墙三磕头，以示向工厂行礼，然后是再向师傅磕头3次。虽然以工厂围墙代替李老君表明店铺和工厂中的工人文化有着很大不同，工厂中这类仪式的延续却是明白无误的。<sup>④</sup>

对构成上海第一代产业工人之大多数的技术工匠来说，当他们从手工工场进入工厂时，并不像人们最初想象的那样会中断其习俗。江南制造局——上海第一个机器工厂——的情形就很能说明问题。该局建立于1865年（比上海第一个棉纺织厂约早25年），招收的大多是外国人在广州和香港所属船坞和机器厂的工匠师傅，学徒也从很远的外地招雇。这样做的部分原因是，当地有谣言说：“进局的人要被丢到大烟囱里去，”“要被机器轧死。”（被劝说进局的为数不多的当地儿童来自附近的一所孤儿院——他们因太平军叛乱而失去了亲人。）起初，所有工人均被要求住在局内宿舍，但随着工人数量的迅速增加，能容纳1500人的宿舍区已不敷使用，许多工人便在紧邻制造局大门的广东街一带搭房居住。<sup>⑤</sup>来自遥远的相同地区的工人一般都集中居住，很快，在制造局内的广东人中间形成了一个联系紧密的移民群体，其同乡公所一类的组织（如广州木匠中的鲁班殿）进一步巩固了这种联系网络。随着时间推移，当其他地方来的移民逐渐增多，厂家有可能雇用非广州籍工匠时，这些新来的工人开始形成自己的同乡关系，组成自己的行会，以便在不稳定的上海地界有安全保障和竞争能力。

至19世纪与20世纪之交，江南制造局内的职业分层已很清晰，这与工人的籍贯大有关系。木匠来自广州，机匠（俗称铜匠——译者注）来自宁波、绍兴，白铁匠来自无锡。人们择业往往受到垄断性行会的限制。要想成为江南制造局锅炉车间的学徒，不



仅必须是无锡人,而且必须是无锡锅炉工的亲生儿子。该局几乎所有技术活都从特定的南方地区招收工人(尤其是江南),大师傅拒绝招收苏北等北方人为徒。只是那些工资低微的工种才有苏北人和浦东人的份。\*

37 地缘、血缘关系在获取技术工种中的重要性表明,“技术”具有主观专断的含义。有鉴于大多数“技术”工种经过一个较短的训练时期即可掌握,几乎每个行会均将学徒定期为3年,满师后方可自行择业。\*\*所以技术在作为客观生产能力的体现时,往往具有社会文化的特征。

地缘关系造成职业分立——其媒介为各式各样的行会,在特定行业的工匠中养成了某种差异感和独立社会,工匠们喜欢到各自所属公所会馆附近的同一茶馆喝茶,更加深了这种亲和力。就像我们在谈到中国商人时所看到的,同乡关系很可能是为了适应城市环境,代表了一种注重实际的战略,而不仅仅是一种乡恋情结:“地方主义的表现,部分地是一种做作,是为了向某位主顾表示公正和信赖。在这个意义上说,在中国,要想生意兴隆,地缘宗族关系很重要,就像在美国边远地区宗教关系之对于生意成功很重要一样。”<sup>④</sup>就像商人做生意一样,中国城市的工人都

---

\*上海社会科学院经济研究所编:《江南造船厂厂史》,南京,1983年,第154~155页。李次山:《上海劳动状况》,载《新青年》第7卷第6期(1920年),第37页。李次山在文中描述了某棉纺厂一位勤劳而有技术的学徒遭到虐待的悲伤故事——仅仅因为自己是苏北人。由于不堪讲吴语者经常性的辱骂,他最终被迫离开工厂。

译者按:辛亥革命后,江南制造局改称江南造船所,以下行文中一般仍用习称的江南制造局。

\*\*正如彼得·戈拉斯(Peter Golas)在研究中国行会时所说:“学徒期及其时限只是拖延时间,这个阶段是学徒走向自立必不可少的。”见戈拉斯:《清初的行会》,载施坚雅编:《中华帝国晚期的城市》,加州斯坦福,1977年,第566页。

被迫跻身同乡社会,以保障其经济生存。这种关系既受到城市市场的深度刺激,也是一种家乡感情的流露,而且这两方面都是集体行动的基础。

社会科学研究中对于同乡团结与抗议能量之间的关系有很好的叙述。查尔斯·蒂利(Charles Tilly)首开先河,将抗议内容的变化与社会组织的变化联系在一起。<sup>⑩</sup>最近,合理选择论者米切尔·泰勒(Michael Taylor)指出:“在革命和叛乱中,农民集体行动均以村社为基础(正如许多历史学家已经指出的那样),这便是人们大量卷入为什么能克服自由散漫问题的主要原因,研究集体行动的学者们对此很熟悉(这种情况还没有被历史学家认识到)。”\*换言之,势力强大的村社,可能压倒“理性”倾向,阻止积极的集体加入行为。尽管人们——例如爱弥儿·杜尔肯(Emile Durkheim)——经常说到城市化招致团结的农民社会的终结,开始了城市无家可归者的杂乱步伐,但是,“传统”社会与“现代”分裂之间的这种假设特征并不总是显而易见的。城市居民也能形成强有力的社会,就像他们原来的农村地区一样,从中 38  
产生依从。

\* 米切尔·泰勒:《理性与革命集体行动》,载泰勒编:《理性与革命》,英国剑桥,1988年,第64页。泰勒认为,当“传统”农民村社让位于“现代”协会和组织时,集体行动的社会基础便遭到削弱,使得“非理性行为更加普遍,集体行动的成功更难以预料”(第93页),我的研究将对这种所谓的“传统”与“现代”之间的两分理论提出质疑。



## 早期的工匠抗议

在很大程度上,由于上海工厂工匠中之工作、居住和业余生活的宗族性质,他们很快就以发动集体抗议而闻名。1868年,上海耶松船厂工人因反对削减工资而举行罢工。<sup>98</sup> 1879年,浦东机器厂的铁匠因洋人监工对其采取非人待遇而愤然离厂。<sup>99</sup> 1883年,江南制造局的工人在该局总办办公室门外发生骚乱,原因是该总办试图延长工作时间。<sup>100</sup> 两年后,他们又举行怠工,要求增加工资。<sup>101</sup> 1890年,制造局新任总办宣布将每天工作时间从8小时延长至9小时,引发了全局罢工。新工时生效的当天早上,没有一个工人到局上班。<sup>102</sup>

这些早期的抗议带有很大的自卫性质。削减工资、非人待遇和延长工时使得冲突骤然发生。然而,1894—1895年甲午战争之后,随着工业发展,工匠罢工方式发生了显著变化。技术工人的要求越来越高,引发了这批原本就受到优待的工人更富冒险精神的抗议方式。最终导致1919年五四运动发生。20世纪头二十年的工匠罢工,其主动精神引人注目。这些事件的大多数由要求增加工资引起,但是,因行会权利、组织工会和工厂纪律等因素而引发的冲突也时有发生。

从我们收集到的65次罢工事件来看,有90%以上为工人向雇主要求增加工资的主动罢工。在上海劳动力市场,工厂工匠



的牢固地位,显然导致他们勇于举行更坚决的抗议。\*有关这些罢工的记载都很简略,无法做进一步的分析,但我们还是可以从 39 中找出几个主题。首先,罢工矛头主要是针对监工和工头。由于职业有保障,技术工人在厂里遇到不公平待遇或是增加负担时,会很快采取行动加以反对。其次,在为数不多的有详细记载的罢工事件中,我们发现,同乡忠诚之重要性(以行会为媒介)十分明显。

例如,1902年,上海耶松船厂一位英籍经理在会审公廨作证,他曾被广东木帮公所请去开会。当他到达公所时,受到大批广州木匠的迎候,声言要求增加工资。为了使其行动合法化,木匠们要求他在拟好的文件上签字。他们又找到一名跑掉的公所委员,强迫他在文件后加盖公所图章。另一位证人在回答询问时说,工匠们来找他,质问为什么宁波木匠还在工作。<sup>②</sup>

几年后,不同籍贯的木匠之间的分裂再次发生,当时在中国和外国船厂工作的上千广州木工举行罢工,要求增加20%的工资。在几家工厂做工的宁波木匠,尽管其工资要比广州人低1/3,但拒不参加罢工。罢工者声言其高超技术无人可以取代,如果不满足其要求,他们将离开上海回广州,或是到其他工资较高、生活水平较低的通商口岸做工。由于广州人以回乡作为经济斗争的方式屡有发生,他们的威胁产生了效果。<sup>③</sup>无论如何,其行动在一周内即得到答复:厂方签署了一份协议,将广州木匠的工资提高了15%,并保证将来遇有空缺,优先雇用广州木匠而非

\*工厂的迅速发展使得市场对技术工人的需求不断增加,需要大量技术工人的工厂主要包括印刷厂、机器厂和器材厂。1875—1894年间,上海仅有印刷厂1个,机器厂1个,器材厂2个,而1895—1919年,约出现72家印刷厂,224家机器厂,28家器材厂。参见罗志如:《统计表中之上海》,南京,1932年,第63页。

宁波木匠。<sup>40</sup>

正如这些案例表明的，籍贯不同自然会加剧工人内部的竞争。即便如此，低估此种狭隘地域关系的组织能量仍是不可取的。同乡忠诚——虽然存在分裂——与其说是抑制了工人的战斗性，不如说是引导工人走向行动主义的桥梁。

## 政治化

40 虽然地缘政治造成了工人力量的分裂，但并不能说它与更广泛的政治事业水火不容。同省忠诚与炽热的民族主义是相吻合的。就像上海建筑业表现出来的情况一样——木工和泥瓦工混合组成了一个单一行会，目的就是要在面对新的西式建筑业竞争之时维持其市场占有率。<sup>41</sup>有条建筑工人行会的碑刻资料（建立于1906年，行会所属工人全部是来自上海和绍兴的木匠和石工），证明同乡身份并非民族主义感情的障碍：

外人乘吾之弊，输送其物品，……官署有洋员，工厂有洋匠，学堂有洋教习，欧（风）墨雨卷地东来，……然则吾中国四万万同胞中，差强人意，不倚赖而能自立者，惟此水木工业尔！且夫人必能自立，而后能自由；必能自由而后能自强；必人人能自强，而后其国强，其种强。虽然，一人不能强，必合十百千万人而强，必合十百千万人为一人而强。盖自立者自强之原素；而团体者，自强之妙用也。……精神何在？在捍御外侮，而爱护其同类。命脉何在？杜（疑为“在”之误）联合心志，而切其智识才能。……惟此……以之对外则优胜，以之竞争于世界则生存。<sup>42</sup>

为经济和政治力量提供精神基础的团体观念反映了工匠组织的发展历程。在行会传统的培养下,绍兴与上海籍建筑工人在遇到棘手的问题时均强调团体纽带。尽管很狭隘,但即便是从革命角度而言,这种感情并不必然阻碍政治行动主义的发展。<sup>38</sup>

就像参加民族主义行动一样,参加革命也与同乡身份十分合拍。1911年11月4日,孙中山的革命军(绝大多数为广州人)包围了江南制造局,广州木匠协助推倒木栅门,向军火库进发。此次袭击得到的大批武器为该市革命取得成功提供了重要保证。\*当取得胜利的革命者刚刚建立政府,就有一百多广州工人涌至都督府要求参军。<sup>39</sup>

辛亥革命成为上海工人历史的转折点。随着清王朝的被推翻,以往严厉惩处罢工者的刑律不再有效。<sup>40</sup>更为重要的是,伴随着新共和国的建立,城市演说政治给了工人们极大鼓舞,尤其是技术工匠,促使他们提出更为激进的要求。

---

\*上海社会科学院经济研究所编:《江南造船厂厂史》,第16页;《辛亥革命在上海史料选辑》,上海,1981年,第675~676页。广州技术工人与辛亥革命的关系比这次事件所表明的还要深刻。大多数早期革命领导者,包括孙中山,都是广东人。他们吸引了不少在香港和广州外国船厂做工的同省匠人加入到自己的队伍。这些有文化有技术的工人——与外国经理都有直接关系,对孙中山及其同志发出的民族主义和经济改革的信息作出了积极反应。马超俊,一位早期兴中会成员,曾是一家香港船厂的技工学徒。后来他在旧金山一家船厂做工,在那里认识了孙中山,在孙的劝说下,他跟随着来到日本,在明治大学学习政治经济学并做革命工作。1906年回国后,马参与组建了广东机器工会——一般被认为是中国第一个近代工会,他还远赴武汉和上海,联络了许多在这些城市兵工厂和船厂工作的粤籍技术工人。辛亥革命成功后,孙中山指派马超俊负责全国工人运动。参见马超俊等编:《中国劳工运动史》,(5卷本),台北,1959年,第1卷,第52页;苏启明(音):《北伐期间工运之研究》,台北,1984年,第63~65页。



帝制被推翻伊始,由于环境较为宽松,各政治党派开始积极介入组织工人的活动之中。陈其美——孙中山革命党的骨干,辛亥光复后曾短期担任沪军都督——也成立了一个政党,是为1911年上海涌现的80余个政党之一。该党称为共进会,其成员包括与帮会有联系的工人和工头。<sup>42</sup>

在推进工人运动发展中更有影响的是中华民国工党,其成员来自各行各业的工匠,如珠宝业、制帽业、木业和机器制造业等。凡加入者必须有稳定的职业,能够“自营生计”。<sup>43</sup>出身工人的徐企文为该党的实际领袖,他劝说好几位激进的实业家加入进来(其中有几位系社会党党员)。该党以孙中山为名誉主席,提出了五点宗旨,其中有“促进工业发达”(如组织物品陈列所、劝工场、模范工场、工业赛会和工业学校等)、“开通工人智识”(如组织补习所、发行杂志新闻和开通俗演讲会等)、“消改工人困难”(如开办劝业银行、工人储蓄银行、议定做工时间及优待职工等)、“提倡工人尚武”(如组织工团等)、“主持工界参政”(如主持国会关于工业上之议案等)。<sup>44</sup>

更富戏剧性的是,工党还数次插手大规模罢工——每次都有技术工匠参加——它们都是在紧接辛亥革命之后不久的上海发生的。第一次发生在翻砂业,工党在该行业中建立了一个分支机构,名为“同义会”,在新式工会的鼓励下,翻砂工人在1912年夏季提出增加工资、减少工时的要求。当业主拒绝工人们的最后通牒时,工人们离开了工厂。工党领袖徐企文立即组织了一个罢工委员会,向罢工工人提供经济资助,协调各方,使罢工工人在不到一天的时间即取得了胜利。数周后,徐企文的谈判技巧再次得到证明,此次他是代表豆腐业工人说话,最终使他们长期要求的增加工资的问题得到了解决。<sup>45</sup>

对工党领导人的一场更大的挑战发生在11月木匠们举行

的另一场罢工中。<sup>42</sup>当月约有 7000 名木业工人(只有来自温州者除外,他们直到后来才被强迫加入)突然提出要求提高 20% 的工资。当县署调停失败后,工匠们转而求诸工党。徐企文代表罢工者说话之举遭到业主们的忌恨,他们将他告到官署,讼称“数地演说,散发传单,煽惑愚民,从中渔利”。尽管地方官署因证据不足而未予受理,但上海警方警告徐某不得再惹事端,这位受到警告的工党领袖有些畏缩,要求工人停止罢工,但工人们未予理睬,延至 1913 年 1 月底,业主们终于答应增加 10% 的工资。

工党的一个支部于 1912 年 12 月在领导珠宝工匠罢工时所发挥的作用更是虎头蛇尾。<sup>43</sup>为了宣传工匠增加 10% 的工资的要求,该支部成立了一个罢工事务所,印发传单,为罢工工匠发放补助。然而,在警方干预和高额罚款的压力下,事务所被迫解散,罢工以失败告终。

工党支持工匠罢工的效验渐趋衰微与政府加大压力有着直接关系。徐企文在工人中的活动,尤其是他组织工人的行为,使沪军都督十分恼火,后者于 1912 年底颁令禁止组织工会。大约 43 在同时期,北京的袁世凯政府发布了处罚罢工的刑律。<sup>44</sup>

考虑到政府的反对构成了工人利益的最大障碍,徐企文决定采取极端行为。1913 年 5 月 28 日,他参与了一次大胆的袭击江南制造局的事件。策划此次袭击的不是别人,正是前革命党人陈其美(他也开始对大肆镇压工农的北京政权产生了失望),这次起义被视为武装反抗袁世凯的第一枪。徐企文手执白旗,将其党人队伍命名为“中华民国国民军”。徐及其工匠队伍于凌晨 1 点钟冲入制造局货栈。然而,不幸的是,制造局总办事先得知袭击消息,不到半小时即将徐企文雄心勃勃的计划打个粉碎。徐企文当场被捕,旋即被送往北京执行枪决,其工党也遭到查禁。<sup>45</sup>

辛亥革命后,上海工人享受政治自由的权利昙花一现,工匠



袭击江南制造局事件标志着这种自由的终结。徐企文及其工党的被查办表明了地方以及国家当局对工人运动更为严格的限制。\*然而,徐企文及其工党为后来者留下了许多东西。在后来上海的多次工匠罢工中,要求组织工会、印发传单谋求公众支持、汇集罢工经费等成为普遍特征。

## “传统”的激进主义

44 第一次世界大战迎来了中国“民族企业发展的黄金时期”,同时人们也看到,罢工活动水平有了很大提高。中国民族企业的激增——在外国资本家及欧战的刺激下——导致工人数量和罢工频率均有显著增加。在大战前夕,上海产业工人的人数为10万人;至战争结束,该数字增加了一倍。\*他们的抗议呈加速度发展的态势:战前五年里(1909—1913年),大约发生了30次罢

---

\*1916年袁世凯死后,在韩恢的领导下,中华民国工党短期复活,韩曾为同盟会会员,后积极反袁,而且他是陈其美被刺杀后上海帮会的老大。(这种革命党人、帮会分子和工人身份交织一体的情况在中华民国时期不断出现。)复活的工党成员大多仍为技术工人,按行业加以组织——印刷业、木业、油漆业、锅炉业、机器业,等等。这个复活的工党主要致力于建立储蓄银行和实验工厂,偶尔参与组织罢工。1917年韩恢被法租界警方枪决后,该党即停止了活动。参见樊崧甫:《上海帮会内幕》,《文史资料选辑》第3辑,1980年,第155页;《民国日报》1916年12月16日,1917年1月4日、12日、17日,2月2日、15日、19日、25日,3月4日、9日、12日、13日、15日,4月15日、20日、22日、24日,6月13日、17日、26日,7月10日、29日,8月22日,9月18日、29日,11月2日、10日;《时报》1916年11月27日,12月13日、14日、21日、24日、30日、31日,1917年2月20日,3月14日、15日、20日,4月16日、26日,5月10日、16日,7月28日。

工；战争时期的5年里（1914—1918年），大约发生了86次罢工，后者较前者增加了几近3倍。<sup>⑧</sup>在罢工频率加快的同时，罢工时间延长，罢工规模加大。<sup>⑨</sup>

这一时期，罢工斗争、尤其是工匠举行的罢工斗争，不但数量增加，且明显地表现为跨行业合作。例如，1914年11月，该市木匠和泥水匠加入油漆工为了增加工资而举行的罢工。此次行动在此前一个月即已开始，当时漆工们聚集在自己的公所里，备好垃圾污物，随时准备扔向其业主。工人们的战斗姿态迫使业主们很快作出答复。漆工们为胜利而欢欣鼓舞，请了戏班子来到公所，连续三天唱戏酬神，而后欢欢喜喜复工。然而，在接下来的一个星期里，业主们显然无意实践其诺言。对此背叛行径，漆工们——约有100多号人——一起来到知县衙门，持香跪请知县做主。对此，知县不为所动，要求工人们以更“温和”的方式行事，即推举代表，呈递一份正式请愿书。同时，应业主们的请求，上海警方派兵进入公所大厅，防止漆工聚会于此。<sup>⑩</sup>

漆工同胞被兵驱逐的场面激起了其他行业工匠的极大同情。11月18日，约有100多名泥水匠和木匠代表聚集在公共租界的一个茶馆里，议定传单内容，支持漆工罢工。次日，因6名散发“鼓动罢工”传单的木匠被捕，有1000多泥水匠和木匠聚集于

\*《中国近代工业史资料》，4卷本，北京，1957—1961年，第2卷，第1184—1185页，1190页；李次山：《上海劳动状况》。据日本学者古屋氏(T. Furuya)的估计，1919年，上海约有261785名在“近代企业”（即用机器生产的企业）工作的工人，有132250名非产业工人（包括人力车夫、码头工人等），有20万名职员和店员，以及212833名工匠。806868名职工的总数约占该市200万人口的40%。见古屋氏(T. Furuya)：《第一次世界大战时期上海城市的发展与劳动者人口》，载《人文科学研究》第68期（1985年），第85页。



鲁班殿。虽然开始时他们被公所门房挡在外面,但愤怒的工人还是设法冲入供奉鲁班牌位的厅堂。抗议者抬着象征合法的鲁班牌位,先是游行至公所负责人的家中,然后行至警署,要求释放被捕的罢工领袖。当警察对空开枪以驱散人群时,惊恐的工匠们丢弃牌位,四散奔逃。混乱中有许多人受伤,这次警署门前的悲剧激起了全市木匠和泥水匠的愤怒,次日即举行总罢工。<sup>46</sup>

46 尽管这场罢工具有跨行业的性质,但其组织基础仍深深扎根于同乡忠诚之中。参加罢工的木匠和泥水匠来自三个地区——上海、宁波和绍兴,他们各自推举代表参与谈判。该市漆工也基本上是上海人、宁波人和绍兴人,此种地缘关系无疑有助于促进工人们在这场罢工中的团结。<sup>47</sup>

来自上海和宁绍地区的工人由于习俗和生活方式相同,相互之间容易沟通,即便是跨行业也不能割断其联系。这些匠人或多或少都讲吴方言,都经常聚集在同类茶馆,一边喝着浙江茶,一边听着绍兴戏,或是乘兴聊天。而且,上海工人的来源渠道导致这些年来江南匠人大量涌入。而在19世纪,外人所属的船厂主要依赖广州工匠,后来随着中国资本主义的迅速发展,上海资本家主要由江南人构成,他们招收的技术工人也主要来自那个地区。\*

在此次三行业联合罢工期间,罢工工人每日聚集在上海老城内相邻的茶馆里,听取他们所推举代表的报告。最后,经过一系列在鲁班殿与宁波、绍兴和上海籍业主举行的谈判之后,工人代表赢得了增加工资的全面胜利。<sup>48</sup>

---

\* 上海公共租界的人口统计数字也大致说明了原本占优势的粤籍工人的减少。1885年,粤籍居民占人口的20%,但是到了1915年,这个比例降至8%,见邹依仁:《旧上海人口变迁的研究》,上海,1980年,第114页。



正如上述案例所揭示的,依照同乡界限组织起来的现象,并未能阻止罢工者强烈提出自己的要求,即便是针对与之同籍的业主。同乡身份促进了不同行业之间的工人之间的联系。但它并不必然包含对原籍的忠诚,或是必然与行业利益、阶级利益相冲突。看到其业主大发战争横财,工匠们坚持要求分润。同乡网络(因为他们是跨行业联系的纽带)不是阻碍而是壮大了罢工工人的队伍。

公所会馆的“传统”标志如神祇牌位、上香及宗教性庆祝仪式不应成为我们透视这些早期工匠罢工中之激进主义的障碍。早在五四运动和中国共产党诞生之前,上海工匠即积极要求增加工资、争取组织工会的自由。尽管公所会馆仍是这些斗争的中枢,但罢工工匠也开始加入原始工会。而且,就公所会馆本身来说,其首领与普通会员之间的裂缝不断扩大。工人们越来越觉得有必要向其公所会馆首领发出公开挑战。

## 行业意识与阶级觉悟

在有些情况下,匠人们也建立自己的行会分支机构,其组成分子均为工人。1916年,漆工们在上海北面建立起一个“工匠公所”,与原来的“行业公所”相对立,后者仍在上海老城。同年,广东帮木匠开立“公事议堂”,以开办集体宿舍为主(当时单身工人占多数),并向本堂成员提供各种社会服务。数年后,该组织向“母公所”提出增加工资的请求。有证据表明,即便是就沪-宁-绍籍木匠而言——他们是其同乡会馆的重要组成部分——隔阂亦开始产生:在1918年的一次罢工期间,工匠们在鲁班殿神堂



聚会,而公所首领则在隔门的议事处碰头。\*

47 19世纪法国的类似情形也与工人阶级意识的发生有着联系。<sup>④</sup>如果说阶级意识指的是对业主剥削有所认识,工人们倾向于采取独立的集体行动来发泄不满、争取权利的话,那么,上海工匠早在马克思主义知识分子来到之前就已表现出此种趋向。虽然“现代”干部们会将同乡认同与行会公所视为产生真正的工人阶级意识的“封建”障碍,但这类组织在工人战斗精神的发展中却发挥着重要作用。共产党组织者对于这份遗产虽然很忧虑,急于否定,但是如果没有它,他们在后来取得组织上海工人运动的成功就无法理解。

五四运动之前,上海工匠的阶级意识是很明显的。1912年,有报道引述江南制造局一个由200名技术工人组成的制造工人同盟会称,“其演说之词,则以工匠比劳动家,该局比资本家。劳动家须脱离资本家的钳制。”<sup>⑤</sup>同样,1916年,商务印书馆一个由熟练印刷工人组成的忠义同志会在成立宣言中开宗明义:“资本家压迫日急,工人生活困苦不堪,数十同志聚集一起,谋求解放。”<sup>⑥</sup>

这些工匠明显早熟的语言并不令人感到奇怪——如果将它们与国外有关情形作一番对比的话。如同罗纳德·阿明扎德

---

\* 《时报》1918年5月11日;上海社会科学院经济研究所编:《江南造船厂厂史》,第168页。对商人公所和工匠公所之间隔阂的有益探讨,可参见庄泽宣和陈学恂:《中国职业团体的研究》,载《岭南学报》第7卷第1期(1947年),第1~14页。罗威廉(William T. Rowe)在 *Hankow: Conflict and Commerce in a Chinese City, 1796—1895* (Stanford, Calif., 1989), pp. 54~56 中讨论了19世纪晚期汉口某些行会分裂成业主与工匠相对立的组织的情况。这一过程的更早情形发生在“发达地区的发达经济”之中(如苏州织布业),参见 Golas, “Early Ch’ing Guilds,” p. 558.

(Ronald Aminzade) 对法国工匠(他们对于发生在本国的早期共产主义和社会主义运动予以重要支持)的解释一样,他们“集体行动的巨大能量来源于丰富的组织与社团的经历,那可是工匠文化的标志。”<sup>①</sup>同样,威廉·塞韦尔(William Sewell)将法国工匠激进主义的兴起与合作传统的继承——主要指互助、崇拜行业神、团体仪式之类——联系起来。正如塞韦尔在其研究欧洲工人阶级起源的代表作中概括指出的:“19世纪的工人运动诞生于手工工场,而非黑暗邪恶的工厂。”<sup>②</sup>

#### 注 释

① William T. Rowe, *Hankou: Commerce and Society in a Chinese City, 1796—1895* (Stanford, Calif., 1984), p. 252.

② 行会对于中国经济发展是具有阻碍作用还是促进作用,仍然存在争论。对立的观点,可参见今堀成二(Imahori Seiji):《中国社会结构》,东京,1953年;彭泽益:《十九世纪后期城市手工业商业行会的重建和作用》,载《历史研究》总第91期(1965年),第71~102页;以及何柄棣:《中国会馆史论》,台北,1966年。

③ 有关欧洲的事例,特别参见 Bernard Moss, *The Origin of the French Labor Movement, 1830—1914: The Socialism of Skilled Workers* (Berkeley, Calif., 1976).

④ 关于欧洲行会与中国行会之对比,可参见 Peter J. Golas, “Early Chinese Guilds,” in *The City in Late Imperial China*, ed. G. William Skinner (Stanford, Calif., 1977), p. 563.

⑤ 中国社会科学院编:《上海民族机器工业》,北京,1979年,第59~60页;《上海船厂工运史》,上海,1984年,第16页。

⑥ 《上海民族机器工业》,第60页;《上海船厂工运史》,第16页。根据碑刻资料记载,早在1823年,来自上海、宁波和绍兴的商人和雇工曾在该市建立鲁班殿。参见《上海碑刻资料选辑》,上海,1984年,第509页。

⑦ 《北华捷报》1879年1月10日；《中国近代工业史资料》(4卷本)，北京，1957—1961年，第1卷，第1224～1246页。

⑧ 《北华捷报》1879年11月4日；《中国近代工业史资料》，第1卷，第1247～1248页。

⑨ *All About Shanghai and Environs* (Shanghai, 1935), p. 60.

⑩ 毛齐华：《大革命初期上海中华书局总厂的党团组织与工人运动》，载《上海工运史研究资料》1984年第4期，第2～3页。

⑪ 中国社会科学院编：《上海民族机器工业》，第19页。

⑫ 李次山：《上海劳动状况》，载《新青年》第7卷第6期(1920年)，第44页。

⑬ 《解放前上海五金商业概况》，载《上海五金商业职工运动史料》，上海，1985年，第20～23页。

⑭ 《民国日报》1920年6月21日。入会式后，徒弟对师傅的从属地位仍未改变，在工厂食堂进餐时，徒弟要先进饭厅，将饭盛好，递给师傅。

⑮ 上海社会科学院经济研究所编：《江南造船厂厂史》，南京，1983年，第86～91页。

⑯ Gary G. Hamilton, "Why No Capitalism in China?" *Journal of Developing Societies* 1(1985): p. 204.

⑰ Charles Tilly, "Collective Violence in European Perspective," in *The History of Violence in America*, ed. Hugh Davis Graham and Ted Robert Gurr (New York, 1969), pp. 4～45.

⑱ 中国社会科学院编：《上海民族机器工业》，第786页。

⑲ 《申报》1879年11月11日。

⑳ 《北华捷报》1883年5月11日。

㉑ 上海社会科学院经济研究所编：《江南造船厂厂史》，第92页。

㉒ 《北华捷报》1890年9月5日；《中国近代工业史资料》第1卷，第1250页。

㉓ 《北华捷报》1902年5月21日、28日；《中国近代工业史资料》第2卷，第1260页。

㉔ Ming K. Chan, "Popular Mobilization and Labor Resistance in the

Canton Delta, 1831—1927,”提交亚洲学会年会论文,1989年。1858年,在一场反对英国人加税的罢工中,7万名在香港做工的广州工人中,有2万名回到了他们的家乡。

②⑤ 《北华捷报》1911年9月30日。

②⑥ 根岸贞(Negishi Tadashi):《上海的基尔特》,东京,1951年,第325—327页。就像根岸氏所指出的,将木匠和泥瓦匠(有时还有油漆匠)聚合起来的建筑业基尔特(行会)在大约同时期的北京和无锡也有,目的也是为了抵制外国竞争。

②⑦ 《上海碑刻资料选辑》,第321—322页。

②⑧ 关于工匠团体语言与法国革命之间的关系,可参见William H. Sewell, Jr., *Work and Revolution in France: The Language of Labor from the Old Regime to 1848*(New York, 1980)。

②⑨ 《时报》1911年11月8日。

③⑩ 杨绍英:《中国工人的罢工斗争》,南京,1957年,“前言”。

③⑪ 上海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编:《辛亥革命在上海史料选编》,上海,1981年,第892—893页;陈明路(音):《民国初年劳工运动的再评估》,向“中华民国初期历史学术研讨会”提交的论文,台北,1984年,第4页;《上海洪门辛亥浴血记》,载《上海轶事》,上海,1987年,第169—175页。樊崧甫:《上海帮会内幕》,载《文史资料选辑》1980年第3辑,樊在该文第155页中称,上海的共进会主要由“码头官”组成,“码头官”的地位随着清王朝的被推翻已不复存在。这些码头官同时也是帮会头目。

③⑫ 关于工党排外特征的进一步讨论,可参见小岛氏(S. Kojima):《辛亥革命时期的工党和农党》,载《历史评论》第256期,1971年。

③⑬ 《辛亥革命在上海史料选辑》,第903—906页;《民立报》1912年1月2日、8日、25日,2月10日、21日,6月23日;《民权报》1911年12月21日,1912年4月25日、27日,5月23日,6月13日,12月15日;《太平洋报》1912年7月6日;李时岳:《辛亥革命前后的中国工人运动和中华民国工党》,载《史学集刊》1957年第1期,第63—86页;马超俊等编:《中国劳工运动史》,5卷本,台北,1959年,第1卷,第73—78页。

③⑭ 《民权报》1912年6月12日,7月15日、16日、17日;《太平洋报》

1912年7月15日;《时报》1912年12月2日。9个月后,业主食言,不愿照章行事,同义会成功地进行了另一场罢工。见《民权报》1913年3月14日、18日、19日、20日、30日。

⑳ 此次木匠罢工详见《时报》1913年11月26日、27日、30日,12月21日、25日,1913年1月7日、10日、23日;《民权报》1912年11月24-29日,12月2日、11日,1913年1月5日、9日、13日、30日。

㉑ 《北华捷报》1912年12月11日;《时报》1912年12月18日。

㉒ 中国社会科学院经济研究所编:《上海民族机器工业》,第840~841页;骆传华:《近日中国劳工问题》,上海,1933年,第153页。据说,袁世凯对江南制造局内的“工人同盟会”——可能系工党所为——尤其感冒。参见《民权报》1912年5月23日。

㉓ 《民权报》1913年5月30日、31日,6月1日、2日、3日、5日、6日、10日、15日。

㉔ 《中国近代工业史资料》,第2卷,第1299~1301页;刘明逵编:《1911—1921年中国工人罢工斗争和组织情况资料汇编》,载《中国工运史料》1960年第3期,第91~159页,第4期,第28~85页;马洪林等:《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上海工人阶级的壮大和工人运动的发展》,载《史学月刊》1964年第7期,第11页。

㉕ 马洪林等:《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上海工人阶级的壮大和工人运动的发展》,第12页。

㉖ 《时报》1914年10月29日、31日,11月8日、10日、11日、13日。

㉗ 《时报》,1914年11月19日、20日、21日。

㉘ 《时报》,1914年11月22日、23日,1916年9月3日。

㉙ 《时报》,1914年11月21~26日。

㉚ Ronald Aminzade, "The Transformation of Social Solidarities in Nineteenth-Century Toulouse," in *Consciousness and Class Experience in Nineteenth-Century Europe*, ed. John M. Merriman (New York, 1979), pp. 85~105; William H. Sewell jr., "Artisans, Factory Workers, and the Formation of the French Working Class, 1789—1848," in *Working-Class Formation: Nineteenth-Century Patterns in Western Europe and the United States*, ed. Ira

Katznelson and Aristide R. Zolberg (Princeton, N. J., 1986), pp. 45 ~ 70.

④⑥ 《太平洋报》1912年7月2日，同见《中国近代工业史资料》，第2卷，第1278页。

④⑦ 《商务印书馆工会史》，上海，1924年，第1~2页。

④⑧ Ronald Aminzade, *Class, Politics, and Early Industrial Capitalism: A Study of Mid-Nineteenth Century Toulouse* (New York, 1981), p. 78.

④⑨ Sewell, *Work and Revolution in France*, pp. 1 ~ 179.

### 第三章 来自北方的无产者

上海工匠的特权与工作保障对于普通无产者而言是无法企及的,后者经常生活在被解雇与被人取代的恐惧之中。就像技术含量可能具有的威力一样,工匠的学徒身份与行会组织之制度化,使得他们提出的要求往往能得到满足,而大多数其他劳动者则无力做到。工资收入即反映了此种悬殊状况。在五四运动前后,上海工人的工资收入情况,见表1所示。\*

技术工人与非技术工人之间存在着鸿沟。正如临时工不可能受到行会公所的保护一样,非技术工人在工资上很少拥有讨价还价的能力。而且,在非技术工人中,性别与年龄也是工资比例的重要决定因素:男性的工资要比女性多许多,童工的收入最少。

---

\*《五四运动在上海史料选辑》,北京,1980年,第15页。当时一名单身非技术性工人的日支出平均为四角,而一名单身技术性工人的日支出为六角四分。如果成家(按月以一家五口计算),一名非技术性工人平均日支出为七角一分,而一名技术性工人日支出为一元二角。(同前,第16页。)尽管辛亥革命至五四运动期间上海工人工资增加无几,但该市的消费指数却上升极快,如布价上升了46%,米价上升了38%。见刘明逵:《中国工人阶级历史状况》,北京,1985年,第1卷,第483页。



表 1 1919 年前后的上海工人工资

49

职业	日工资(银元)
技术工人	
机匠	1.00—2.00
泥水匠	0.60—0.80
木匠	0.50—0.80
漆匠	0.50—0.70
砖匠	0.50
非技术工人	
纱厂工人(男)	0.30—0.40
苦力	0.25—0.35
纱厂工人(女)	0.20—0.25
纱厂童工	0.10—0.20

资料来源：刘明逵编：《中国工人阶级历史状况》，北京，1985年，第1卷，第390页。

## 乡土源流与帮会

大多数非技术工人是从广大贫苦农民尤其是华北农村地区的贫苦农民转化而来。由于受天灾人祸的打击，广大农民被迫离开他们赖以生存的土地。这些难民来到上海时，身无长物，举目无亲。既没有受过适应城市工作的训练，控制进入技术职业之门、由南方人掌握的行会公所也不欢迎他们，这些农民—工人只能去做那些收入最低、保障最差的工作。

所以，不要感到奇怪，许多非技术性工人只要一有机会，就会返回农村。他们无法适应城市生活的情况常常被上海劳动力市场的观察者加以评论。从外国雇主的眼光报道有关内容的科特内夫(A. M. Kotenev)曾在1927年注意到：“一个……独立的、如同欧洲情况一样的无产者阶级的形成过程尚未完成。上海的绝大多数劳动者直接来自农村……他们是农民、渔民或季节工人，要让他们适应基本的劳动纪律必须花费相当的时间。”这种情形在尼姆·韦尔斯(Nym Wales)——一个工人抗议的拥护者——的嘴里说得更为肯定：工人们刚刚来自农村，“尚未沦为工资的奴隶，无力企求更好的生活条件。”<sup>①</sup>

无论观察角度如何不同，观察家们均认为，与农村的密切联系使得上海的非技术性工人难以驾控。就这一评价而言，他们无疑是正确的。从上海工人运动发生伊始，非技术工人的罢工绵延不绝。1895—1913年间，在有记载的50多次工厂罢工中，至少有75%是由非技术工人发起的——其中由丝厂和纱厂女工发起者最多(前者占了所有罢工的几近50%，后者占了20%)。<sup>②</sup>

50 在诠释工匠抗议时，我曾强调同乡关系的重要性。那么，我们如何解释非技术工人——他们的流动性和被排除在行会公所之外的地位似乎削弱了其集团凝聚力——的罢工趋向呢？这只是一直一种社会反常状态(粗鲁的、不习惯都市标准的农民自发行使暴力，反抗城市制约和工厂生活)吗？

对上海非技术工人构成情况的审视揭示了不同的团结类型——尽管与富有个性的工匠存在很大不同，他们仍有着罢工的巨大潜在素质。即便是非技术劳动者中生命力最短暂的分子——如乞丐、掏粪工和码头工人之类——都可归在都市网络之中。应当承认，他们缺乏技术，存在着籍贯、性别和年龄的差别，这些因素制约了非技术工人跨行业联合起来的发展过程，但是，

阶级意识的缺乏并不能阻止工人战斗性的形成。由不同成分组成的工人的相对集中,为行动主义打下了坚实基础。

非技术性工人常常通过帮会形式开展集体行动。特别是辛亥革命——当时青红帮分子是革命军的主要盟友——以后,这些地下组织在上海经济生活中扮演了一个更活跃的角色。\*在控制鸦片生意使得腰包鼓胀起来以后,帮会分子又开始插手劳动力市场。几乎所有非技术性行业渐渐地都由与帮会有联系的同籍大亨如丐头、妓院老鸨、粪霸、码头包工头和工厂把头所把持。从乡村来上海寻找活路的移民很快就发现,这个城市的工作机会都与犯罪活动有着联系。

工作关系与帮会身份的重叠使得非技术工人的生活具有很浓的权力主义意味。帮会本身均按照严格的师徒等级关系组织起来。徒弟之间互相以兄弟相待,一切行动惟师父之命是从。这些要求在入会仪式中有着很好的体现。一位名叫崔锡麟的苏北籍军人是这样描述其加入张镜湖青帮的情形的(张原籍山东,当过军官,辛亥革命后成为上海滩上的著名青帮大亨):

我(和杜凤举军长一道)来张府前,已先有张门老门徒罗鑫泉(上海牙医)在客厅内等我们了。我们到后,罗到楼上通报张老,张老才入客厅,杜军长与我就地向张老行了一跪三叩首见面礼(这是杜军长事前同我言明的见面礼节)。张

\*辛亥革命时,青帮与红帮的合作导致这两个主要帮会之间的界限日趋模糊,青红帮的地位在新的民国秩序中也有了提高。在陈其美的积极庇护下,帮会在上海市场中所起的作用越来越重要,例如1914年商务印书馆总经理因拒绝陈的金钱要求而被帮会分了暗杀一事即是明证。有关这一时期帮会的作用,参见姜豪:《洪门历史初探》,载《旧上海的帮会》,上海,1986年,第68~86页;薛畊莘:《近代上海的流氓》,载《文史资料选辑》1980年第3辑,第170~172页;樊崧甫:《上海帮会内幕》,载《文史资料选辑》1980年第3辑,第155~156页。

老便问我大致经历，军中情况，家庭情况。罗鑫泉已在佛堂（内中供有青帮三祖的牌位）前燃烛焚香，入客堂，请我们入佛堂上香。罗司仪口称崔老弟向祖师爷行大礼，面向如来佛三跪九叩首。又称：崔老弟向张师父行拜师大礼（张师父立香案左首并未坐下），我仍向佛前三跪九叩首。又称：向师兄杜大哥行大礼，我面向佛前一跪三叩首。接着杜凤举军长说向罗师兄（指罗鑫泉）行大礼，我即向佛前一跪三叩首。入门礼仪完毕。<sup>③</sup>

尽管这种进帮礼仪很简单，但对不同辈份者有着不同的行礼方式，如对同辈为一跪三叩首，对师父尊长为三跪九叩首，此种差异揭示了青帮内部森严的等级特征。帮中人的辈份在人会仪式上确定后即一成不变。某人的在帮师父即某人做工的工头，所以，这种等级关系浸润于各种工作场合。

有意思的是，青帮的入帮仪式与学徒的拜师仪式——标志着其在技术性职业行会中拥有了一席之地（参见本书第二章）——没什么两样。然而，在行会与帮会的权力结构中存在着重大差别。在三年学徒期满后，行会学徒与其从前的师父保持着一种或多或少的平等关系。因而，与权力主义的帮会比起来，行会公所多少带有民主的色彩。\*相反，对非技术工人而言，拜师进帮等于判了无期徒刑，惟一的脱身之法便是返乡。只要身为都市无产者队伍中的一员，他就必须将服从师父的意愿作为其生存战略的不二法门。

\* 20世纪初，行会内部发生争端时，往往付诸表决。参见《时报》1918年5月13日，1920年6月17日。

## 工厂以外的劳动者

可以相信,上海居民中没有比乞丐、娼妓或是掏粪工更悲惨的了。然而即使是在这些“游民无产者”中,等级现象仍清晰可见。将这类劳动者与其职业联系起来的网络仍具有权力主义的性质,就其普通成员而言,自由活动的空间极小。但是,正是这种组织纽带产生了一呼百应的力量。

至20世纪,上海的乞丐按照籍贯(有凤阳帮、淮阳帮、山东帮、苏北帮和上海帮),各分地段(大致将该市分为北区、南区、东区和西区)。每帮各有一个“老大”,老大之下有8个“丐头”,分别控制该市东南西北四区。老大们提供劳动力(约有2万名男人、女人和孩童,从事大约25种行乞方式),丐头则负责向店主收费,而辖区所有乞丐也必须逐日缴费。这些日常收入使得丐头们能为其手下乞丐建立一整套福利机制。对上海700名乞丐的调查显示,几乎所有被询问者都声称来自苏北农村,由于家乡遭灾,被迫来沪行乞。绝大多数被询问者称,亏得丐头们提供衣食,他们认为行乞要比在工厂做工好过多了。然而,这种保护另有代价。乞丐们无不俯首听命于丐头,后者与经常性卷人犯罪活动的青帮有着密切联系。<sup>④</sup>店主或者其他与帮会发生过冲突的人物首先要想到处理好与本市乞丐大军的关系。

娼妓是上海地下社会另一个组织严密的阶层。<sup>⑤</sup>据1920年上海市一份调查称,该市约有6万多名妓女,按身价和服务性质分成数等。<sup>⑥</sup>妓女的生活与活动受到龟头(又叫“龟奴”——译者注)和老鸨的严密控制,后者与帮会网络联系紧密,向青帮头子进贡输钱是从事这一行当者必不可少的一项开销。<sup>⑦</sup>由于处于 53

严密控制之下，妓女们几乎无力采取集体反抗其主人的行动，只是在个别情况下，在其主人的指使下，他们才会采取集体抗议行动。例如，1948年，成千上万的舞女拥向上海社会局，抗议该局不许舞厅营业的禁令。<sup>⑧</sup>

掏粪工也在帮会的严密控制之中。数千名担当该市清厕所、倒马桶之事的工人构成了一个真正的农民—无产者群体。其中许多人在该市西郊兼种蔬菜水果，每日掏粪倒马桶之前或事毕，他们会将其种植的蔬菜水果挑到市场上去卖。然后他们会将新出的粪肥运回浇地（或是卖给其他农民）。掏粪工一般由“粪头”操纵，后者向消费者收费并向掏粪工发薪。然而，在民国成立之后，这一肥缺渐归“粪霸”控制，他们按月向政府交费一次。为了抗议这种于己不利的变化，粪头们煽动其手下的掏粪工在1912年春季发起了一场很有影响的罢工。在将近一个星期的时间里，掏粪工们既不掏粪，也不卖菜。然而，政府当局并不愿意放弃此项计划，该行当还是落入了与青帮有联系的粪霸手中。许多年里，法租界的粪霸不是别人，就是青帮大亨杜月笙的情妇。她死后，这一肥缺又落在了她儿子手里。<sup>⑨</sup>

对上海下层社会中人而言，帮会的严厉控制限制了他们独立行动的机会，但是由其工头、把头激发出战斗性并非不可能。应当承认，单单一个丐头或是妓院老鸨很难会想到去发动一场抗议运动。可是，粪头们却经常挑动掏粪工举行罢工（尽管经常是无功而返），反对政府加大对公共场合卫生状况的干预。<sup>⑩</sup>

码头工人——至20世纪20年代时为数约在5万~6万人之间——是另一个由农民—工人构成的群体，在把头的鼓动下，他们往往爆发激进行为。虽然码头货栈的主人与工人之间的联系比较疏远，但专管招工、有权有势的包工头却为之架起了桥梁。绝大多数受雇者都是临时工（俗称“野鸡”），有时在码头打工

挣钱,有时回乡务农。上海码头工人的乡村源流在民国时期更为凸显。对上海港口 361 位退休码头工人的调查表明了此种趋向(见表 2)。这些劳动者主要来自苏北、湖北、湖南和山东乡村。不少码头也有小部分固定工人,一般称为“堆装工人”,他们收入较多,多数来自宁波港。<sup>⑩</sup>

表 2 上海码头工人的祖籍情况

54

开始工作	农村	上海	其他城市	小计
1918 年及以前	49(58%)	33(39%)	3(3%)	85
1919 — 1937 年	233(86%)	10(4%)	28(10%)	271
1938 年及以后	4(80%)	0(0%)	1(20%)	5
总 计	286(80%)	43(12%)	32(8%)	361

资料来源:上海港调查,1963 年。

在码头工人之集团暴力中,最常发生的是抢地盘之争。\*在包工头的率领下,这种暴力常常以帮口之间的武装冲突为形式,目的是争夺对码头货栈的控制权。<sup>⑪</sup>在这些冲突中,同乡身份的作用再次体现——同乡会经常卷入帮死者家属讨说法或提供补助的活动之中。\* \*但是,相互之间发生械斗并非码头工人在其

\* 纽约滨海地区有着类似的情况。丹尼尔·贝尔(Daniel Bell)写道:“控制货物‘装卸’及其他油水乃纽约码头血腥争战延续 30 年之久的主要原因。”(见 Bell, *The End of Ideology* (New York, 1988), p. 183. 贝尔还注意到,争码头在美国其他大港口不是大问题,当与地理空间不同有关。纽约码头不能直通铁路,工人密集,街道狭窄,货物装卸很困难。上海情形略同。

\* \* 例如,1926 年 7 月,为了争夺浦东某货栈的卸货权,湖北帮与苏北帮码头工人发生械斗,两名湖北人死亡,江淮同乡会同意向死者家属支付 1000 元赔偿金。一份由湖北同乡会拟就的控诉书交到了货栈经理手里,并由他转交给江淮同乡会,其中提出了解决此事的经济赔偿问题。见《民国日报》1926 年 8 月 13 日。



把头指使下所进行的惟一集体行动。作为就业条件之一，码头工人要按一定比例将工资的一部分交给包工头，所以，增加工资利于双方。虽然把头不可能为了讨好码头老板而公开煽动罢工，但在背后，他们常常煽动其属下罢工，要求增加工资。

55 1914—1915年间，上海17个码头的堆装工人发动了一场大罢工。此次罢工系由包工头激劝而成，他们先是以宁波同乡会的名义组成一个“裕后社”，庆祝会后，工人们向上海县衙进发请愿，但该社试图将罢工限定在一定范围之内。最终，44天以后，17个码头中，除了两个外，均同意了包工头们提出的温和的要求。另两个不肯妥协的码头声称，包工头行事不当，严重损害了资方利益，他们拒绝接受有关协议，并解雇了所有挑起事端的包工头。<sup>⑨</sup>

包工头、把头和监工在控制和利用其属下进行罢工中的关键作用最清楚地将非技术性工人与技术性工人的战斗性区别开来。正如戴维·蒙哥马利(David Montgomery)在其对美国工人的研究中所发现的那样，农村移民在监工在场时，工作卖力，监工不在场时，表现懒散；而工匠们则相反，当老板在场监视时，他们往往拒绝干活。<sup>⑩</sup>不同的劳动管理文化会产生不同的罢工方式。工匠罢工常常将矛头对准工场或工厂的权力机构，而非技术性工人的罢工则常常在把头、监工的操纵之下。

当然，听命于把头、监工并不意味着非技术性工人对更高级别的权力部门不构成威胁。这类罢工常常向雇主或政府官员提出要求。但是，居间调停者又往往是这些挑起事端的把头和监工，在确定罢工目标时，他们要保证自己的利益至少要与其属下的利益一样重要。



## 产业无产者

由于是中国新生的真正的无产者，非技术性工厂工人受到了研究中国工人运动的马克思主义历史学家的极大关注。大量研究向人们昭示，20世纪20年代的无产者积极而激进，易于接受共产党人的动员。<sup>⑤</sup>然而，产业工人不是一个清一色的群体。对共产党人的支持主要来自那些与底层无产者的生活和工作条件大不相同的工人。非技术性产业工人（最多的是女工）的生存环境与“游民性质的”乞丐、掏粪工、妓女或码头工人的生存环境大致不二，与同一工作场合的木匠或技工的状况则相去甚远。

一份1922年对沪西地区纱厂工人的调查表明，他们原来大多为苏北难民，因遭受水灾而被迫离开土地。由于对新工人大约只需一星期的训练时间，没有技术、作为纱厂工人的妇女和女孩的报酬很低。<sup>⑥</sup>进厂工作一般都由包工头掌握，就像一位纱厂女工回忆的那样：

我来自苏北，小时候住在一个村子里……家里很穷。十三岁时，一个来自上海的包工头到我们村里招收童工。他说：“上海好的不得了。你们可以吃鱼吃肉，米饭尽管吃。到那里，可以住洋房，挣大钱。”所以许多父母都愿意将自己的孩子送去当包身工。<sup>⑦</sup>

爱米莉·荷尼格（Emily Honig）曾指出，包身工们来到上海后才发现，纺织工人的工作条件与包工头原先所吹嘘的奚止天壤。<sup>⑧</sup>然而，农村难以生存的现实迫使她们别无选择。

到上海的工厂做工的工人们都要受到包工头及其帮会朋友的控制。另一位纺织工人回忆道：

年轻人要想进厂做工，就要过三道门。一是从乡下到城里，要有朋友带着。二是到上海后，要过招工一关。三是在进厂后，对其他工人来说，你是陌生人。而且，厂长经理故意让各种各样的“帮派”存在于工人之中，以便分化利用。新工人常常挨打，不许工作。无奈中只好去找带你来上海的朋友。朋友所能做的便是带你去见某位帮会头子。帮会头子会说：“不要怕，大家都是自己人。请大家吃顿饭，就没事了。”新工人便要向这位帮会头子纳钱十余元，再化上五六元请大家吃顿饭。此外还要向招工者交钱五元。这样一来，就要化去二十余元。进帮后，你就得终生在帮。<sup>57</sup>

20世纪初，有成千上万的上海纺织工人加入青帮——原籍苏北的人帮者尤多。共进党系青帮分支，在纺织业中势力强劲，吸收入党者不仅包括大量普通工人，还有不少苏北籍门卫和把头。男工（在纺织厂里位居少数）比女工显然更热心于入帮，但两者对于厂方维持局面而言是同等重要的。<sup>58</sup>

非技术性工人与其流氓无产者同类一样，受到把头、监工的严厉控制。在许多工厂里，这些车间老大——人称“拿摩温”——  
57 从前都是女工，因个人关系而得到提升。拿摩温是什么角色呢？一位住在上海、喜爱收集逸闻趣事的外国人曾详细描写道：

雇用女工和女童工之事一般都归中国工头管，她要保证她们全额完成工作量。这些女工头都很机敏、有条理，对自己的位子很是心满意足。近日有位拿摩温上了辆电车，进了头等间。她穿着一件蓝大褂，系着一条围裙，头上包着一块做工者戴的头巾，华人售票员见状，走过来粗声粗气地说：“老太婆，你只能坐三等间。走开。”“为啥我要走开？”她挺直腰板回答道：“我有钱付得起头等间的座位。”售票员此时知道人不可貌相，语气态度立即有了改变，“对不起，太

太。”他一边温和地说道，一边收下了叮当作响的钱币。<sup>①</sup>

每个车间或工作场所都有一名拿摩温管事，监视工人们的工作情况，凡偷懒违规者，她有权责打和罚款。<sup>②</sup>控制工人言行的这些基层管理者使他们在镇压或挑起工人罢工的过程中起着关键作用。据从前的纱厂老工人回忆，日属工厂特别容易罢工，因为他们付给拿摩温的工资只比普通工人略多一些。这些心怀不满的拿摩温常挑动工人闹事。<sup>\*</sup>

## 大众文化

就非技术性工人和游民无产者而言，受把头 and 监工支配的情形不完全相同。两者的生活状况则有相似之处，许多家庭甚至相差无几——男人当苦力，女人在纱厂或丝厂做工。<sup>\*\*</sup>所有家庭成员都要为家庭收入出力是区别非技术工人和技术工人之家庭经济的重要特征。1930年的调查清楚地表明了这种差别。在对杨树浦（位于上海东北地区，那里有许多纺织厂）的100名工厂工人家庭的调查中发现，在家庭收入中，丈夫的收入只占26%，妻子占6%，儿子占43%，女儿占9%，女婿占6%，其他收

\* “江元青与宋三妹访谈录”，1957年9月12日，见上海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工人运动档案。《民国日报》1919年6月6日曾报道，一位在日本内外棉工厂工作的湖北籍拿摩温因领导了一场罢工而被判刑三年，湖北同乡会雇请一位律师为她进行辩护。另外，《民国日报》1919年2月10—16日曾报道，在日属日华纱厂的一次罢工中，工头们拒绝上面要求他们劝说罢工者复工的指令。

\*\* 正如一份对上海苏北人的研究指出的那样，苏北男人一般都以人力车夫、修路和苦力为业，女人则在棉纺织厂做工，见金远（音）：《江北人在上海》，载《女神》第2卷第14期（1934年）第10页。



人占10%。相反，在对商务印书馆 100 名印刷工人的调查中发现，在这些技术工人的家庭里，丈夫的薪水占了家庭收入的 97%。同样，对邮政工人——另一个收入颇丰的技术性职业——的调查发现，丈夫的薪水占了家庭收入的将近 90%。<sup>④</sup>

非技术工人家庭的多数成员奔走挣钱，并不能使自己的生活动得舒坦。对上海贫困劳动家庭的住房状况进行的一份调查表明，如果能往上两到四家合租的两层楼套间便是他们的最高愿望了。他们住的地方，一排平房只有一个水龙头，家庭卫生设备就不要谈了。每个家庭大约只有 100 平方英尺左右的住房面积。相形之下，住在工厂住房或棚户区的工人，住得更拥挤，卫生状况更差。<sup>⑤</sup>

上海劳工家庭平均每户约 4~5 人。<sup>\*</sup>在最贫困的家庭里，性别比例严重失调，男人数量大大超过女人。中青年男性尤多，反映了市场对非技术性壮年劳动力的需求。老年男性由于丧失了上海劳动市场的竞争价值，只要有会，就会返回家乡。<sup>\*\*</sup>

在工人阶级家庭中，很少有声称上海为其本籍者。无论其

---

\* 对沪西纱厂集中的曹家渡的 230 个家庭的调查表明，平均每户近 5 人；对东部纱厂集中的杨树浦的 100 个家庭的调查表明，平均每户 4.11 人，见杨西孟：《上海工人生活程度的一个研究》，北平，1931 年，第 18 页；方福安：《上海劳工》，见《中国经济杂志》第 7 卷第 2、3 期合刊，1930 年，第 872 页。家庭收入与人口数量之间有着密切关系。方福安氏发现，一年收入在 300 元以下的家庭，每户约 2.7 人，而收入在 900 元以上的家庭平均每户有 7.5 人，1000 元以上者，平均每户 9 人。同前，第 873 页。

\*\* 方福安：《上海劳工》，第 876 页，他在对杨树浦 100 个家庭的调查中发现，100 户中共有男人 235 人，女人 176 人，男女之比为 135.5 比 100。相反，在邮政工人中，其家庭中的男女比例基本扯平，在印刷工人家庭中，女性甚至超过了男性——男女之比为 94.2 比 100，见《上海劳工》，第 993 页、1004 页。

籍贯源流如何,绝大多数工人均与同籍者婚配。\*

59

可想而知,劳工阶层保持着强烈的乡土情结,婚姻状况反映了传统的农民习俗。买卖婚姻依然盛行,媒妁之言、父母之命决定了新郎新娘的前途——只要给新娘的彩礼合适,双方父母即同意婚事。给未来新娘的彩礼可能取决于其年龄、收入和长相。新娘年龄一般在十四五岁,在缫丝厂工作的女工更多的是在这个年龄做新娘——他们一般在八九岁进厂。一旦定下彩礼价值,就要请个算命先生来为新娘和新郎“测八字”,说明两人适合婚配。婚事定下后,男方就要以现金或布匹、珠宝、家具和被子等实物给付彩礼,随后便可举行婚礼。婚礼一般很简朴,新娘或坐轿,或坐黄包车,被送到新郎住处。洞房门前挂着一块红布,香烛必备,新郎新娘须拜天地、拜祖宗,然后是请亲戚朋友及媒人吃喜酒。<sup>⑤</sup>

婚礼和葬礼的举行方式、对世俗佛教的信仰、祖宗崇拜及信鬼神构成了绝大多数上海工人家庭的信仰形态。但民间习惯往往将工人区分开来——一般依照籍贯界限。例如,来自江南与来自苏北的纺织厂女工,穿着式样迥异。江南妇女爱好蓝色、黑色和灰色,式样则模仿上海学生——长褂、皮鞋,冬天是绒线大衣,外衣上少不了别支自来水笔作装饰。苏北妇女则喜欢穿色彩鲜艳的红绸绿缎、绣花鞋和粉红袜子。<sup>⑥</sup>穿着上的区别乃是来自这两个地方的纺织女工深层裂痕的外在表现形式。就像爱米莉·荷尼格(Emily Honig)所看到的:“地方主义——表现在穿着打扮、饮食习惯、婚姻习俗和方言等方面——乃是工人中分裂与对抗的最重要的基础。”<sup>⑦</sup>

\* 杨西孟:《上海工人生活程度的一个研究》,北平,1931年,第23页。他发现,在他掌握数据的家庭(174家)中,有95%的人与同省人婚配。

60 将来自不同地方的工人区别开来的文化鸿沟——最显著地表现在南北方的差异——由于工厂工种按籍贯性别划分而进一步加大。在纺织厂，江南女工在纺纱间和织布间干活，苏北女工——据说因为身材较高，体力较强——在粗纱间干活，男工则在门房和机器间做工。<sup>②</sup>这些工作场合的区别，乃是招工方式——以包工头——把头为媒介——的产物。例如，在福新面粉厂的两个分厂里，在轧面车间的都是宁波籍工人，包装车间的工人都来自无锡和常州，而在户外装卸小麦的都是苏北人。每个车间都由一位与其工人同籍的包工头——把头负责。<sup>③</sup>

以地缘与性别关系相区分，工厂车间本身往往就形成了一个独立世界。其界线决定了工人社会关系的范围。姊妹结拜——女工互助的小圈子——以车间（也就是以籍贯）为单位结成。<sup>④</sup>工人眼界的狭隘由于非技术性工人一般都缺少文化而进一步加深。对杨树浦地区女工的调查显示，受过教育者不足1%。<sup>⑤</sup>同样，在曹家渡地区的内外棉七厂，3000多名女工中，只有五六十人是“有文化的”。而她们中实际上只有一部分人能达到读报的水平。<sup>⑥</sup>

## 罢工模式

工作场所的分隔和普遍缺乏文化带来的消极后果可能会阻碍阶级觉悟的产生，但是，这并不妨碍非技术性工人采取集体行动。1895至1910年间，有记载的上海工人罢工为33次，其中

76%系非技术性女工发起的。\*在随后的岁月里,尽管共和革命后由他们主动发动的罢工比例有所下降,但他们的罢工频率仍有增加。在紧接于辛亥革命之后的动乱时期(1911—1917年),非技术性女工只参加了该市大约40%的罢工。<sup>61</sup>在1918年,即五四运动前夕,该比例甚至跌到了33%。<sup>62</sup>这种战斗精神的相对减退(无论上海工厂女工数量在这一时期有了多大增长),\*\*表明这些工人对当时政治形势影响不大。而在这一时期,工匠们开始加入新的政党,发动武装起义,建立以阶级阶层划分的行会,强烈要求增加工资,要求自由结社的权利。总体而言,非技术性工人则继续采用更有节制的罢工方式。

本书附录B显示,非技术性工人的罢工主要是对收入减少的反应。在占74%的案例中,罢工系由工作条件恶化、尤其是工资上的原因而引起的。可以肯定,要求增加工资的呼声随着第一次世界大战引发的通货膨胀而越来越高。然而,这种呼声仍是有限度的,尤其是与技术工匠的情况相比而言。工匠家庭一般都依赖单个的挣钱人,这种情况有助于解释技术工人为什么在罢工要求中更多地以增加工资为重点。他们声称要养家糊口,会随时行动起来要求增加工资,而不论当时是否存在降低其生活标准的通货膨胀压力。对于非技术性工人而言,他们个人的工资在家庭总收入中所占比重不大,个人收入与家庭生活水平之间的关

\*《中国近代工业史资料》第2卷,第1299~1301页。在19、20世纪之交,上海大约有3万名纱厂和丝厂工人,其中女工约有2万名,童工约有7000名,同上,第2卷,第1181页。

\*\*女工增长数量情况可从这一时期上海纺织厂的迅速发展中看到。1895—1910年间,上海仅有11家新厂开工,在1911—1917年间的7年时间里,出现了43家新厂。而在1918—1919年间,一下子出现了29家。见罗志如:《统计表中之上海》,南京,1932年,第63页。

系可能不那么直接明了。无论如何，虽然雇主们通常会对技术工匠提出的加薪养家的要求予以满足，但对非技术性劳动者就没那么好说话了。

技术性工人与非技术性工人提出的要求和结果不同，与他们在劳动力市场中所处的地位各异有关。工厂工匠知道自己在工厂中的地位旁人无法取代，所以敢于向其雇主发起挑战。相反，非技术性工人之与增加工资有关的罢工一般都是低调的。这一时期的工匠斗争也没有提出明确的结社权利。

对最早的纺织女工罢工的报道显示，这些斗争都带有防御性。<sup>62</sup>最常见的罢工理由是扣发工资——特别是在华商工厂。然而，防御性罢工不一定是和平性质的。对抗往往伴随着暴力，尤其是在女工与印度门卫之间。工人中的暴力，也因籍贯与性别的因素而带有某种规律性。<sup>63</sup>如果发工资由计日改为计件，也往往会突然引发罢工。<sup>64</sup>这种新工资制在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日本大量收购上海的纺织厂后特别盛行。日本人还引进了许多其他管理措施——步其本国奏效之后尘——但中国工人却不那么领情。其中最遭人非议的是不许带婴儿进厂——上班的母亲不得将婴儿带进厂喂奶。<sup>65</sup>

反对这些不受欢迎的改革措施的罢工往往由拿摩温领导，特别是在工资成为罢工主题时尤其如此——这可是关系到工头与普通工人双方的事情。<sup>66</sup>要求驱逐特别凶狠的工头的罢工也时常发生<sup>67</sup>，尤其是在外国人所属的工厂里。正如一位正视上海产业状况的观察者所说：

对外人工厂表示不满的理由，不一定存在于华人工厂，反过来也是如此。中国厂主有时会拖欠工资，这一点在外国工厂则不一定发生。另一方面，外国厂主……（必须面对）撤换监督、工头和监工的要求，他们常被指控欺压凌辱工人。



英国厂主习于集群产业和工厂制度已达一个世纪之久——日本的时间要短一些。在中国的英国厂主有时——日本厂主则常常——雇用外国工头和监督。两者都雇用锡克监工和公共租界的警察。如同在英国或日本或任何其他工业国家一样，工人只是一个零部件，一只喂机器的手。但是在中国，除此以外，对外国厂主来说，工人还是异族人，总被视为低人一等。还有，他们的姓名和他们的面孔对外国厂主和工头来说，总是难以分清，面对这一切，丧失人性之举便开始了。<sup>④</sup>

在许多外国人所属的工厂里，种族主义到处弥漫，为工人反抗提供了现成的借口。<sup>⑤</sup>在五四运动和五卅运动的“爱国”斗争中，纺织厂女工广泛参与，在一定程度上，她们是为了发泄长期遭受日本和英国监工欺压的积怨。然而，我们不要把这些反抗仅仅视为中国民族主义的兴起，还要探寻其更为世俗的结构因素。当洋人充当工头、监工时，工人们不再拥有原来那种同籍包工头——把头对待他们的主顾关系。结果，他们更有自由要求撤换工头。当然，这一招对洋人经理起了作用，五卅运动后，他们越来越倾向于使用包身工制度，帮会把头在其中起着招收和监视其同乡工人的作用。<sup>⑥</sup>可以肯定，这些监工和把头能够并且确实经常教唆其属下发动罢工。还有，由工厂把头煽动的要求增加工资的罢工，与马克思主义干部号召的推翻资本主义制度的罢工相比，其威胁要小得多。



## 结 语

无论是技术工人还是非技术工人，同乡关系有助于其团结和反抗模式的形成，但是这种地缘政治以两种很不相同的形式表现出来。在工匠中——他们主要来自比较富裕的南方地区——行会乃同乡认同、工作机会和罢工方式的媒介。公所会馆的公共仪式有利于滋生表现民族主义和革命色彩的工会、工党和政治。对非技术工人而言——他们绝大多数（虽然不是绝对）都来自多灾多难的北方地区——权力主义的帮会为他们提供了进入令人生畏的上海劳动市场的入场券。这一群体的劳工力量的反抗，常常在工头兼帮会中人的煽动下进行，明显地带有防御姿态。

可以肯定，这些概括——如同社会科学领域的大多数这类概括一样——必须从大量史料中加以筛选提炼。对于以广州和江南籍为主的南方工匠来说，在他们进入更广泛的政治事业之前，互相之间常常存在竞争。在非技术工人行列中，也包含了大量江南人。上海本籍纺织工人和宁波籍码头堆装工人便是两个例子。然而，从总体来说，这些江南籍工人比来自北方乡村的工人，无论是工作保障还是收入情况，都要好一些。

性别差异使得非技术工人中的地缘政治进一步复杂化。从同一地区来的工人中，男性显然要比女性更热衷于加入帮会。也许男性非技术工人要比其女性同类更热衷于都市生活，他们更有可能接受工厂训练，得到提升，步入半技术性职业行列。随着时间推移，半技术性男工与帮会政治分子之间的联合变得越来越重要。非技术性女工——她们与农村的联系更紧密一些——

在这一发展过程中却作用甚微。

在对烟草、纺织和运输业中的工人运动详加探讨的第三部分中,我将对这些差异作出仔细分析。但是为了理解那条将要划分支持共产主义革命的工人阶级与投入国民党怀抱的帮会操纵的工人之间的鸿沟,我们首先要掉转眼光。在本书第二部分中,研讨重点放在党派政治上——政党人物在争取上海工人之忠诚的激烈战斗中的所作所为。尽管如此,政党斗争仍远远不能避免先已存在的社会模式的影响。

#### 注 释

① A. M. Kotenev, *Shanghai: Its Municipality and the Chinese* (Shanghai, 1927), pp. 13 - 14; Nym Wales, *The Chinese Labor Movement* (New York, 1945), p. 9.

② 《中国近代工业史资料》,北京,1957—1961年,第2卷,第1299~1301页。

③ 崔锡麟:《我所知道的青红帮》,载《江苏文史资料选辑》第20辑,1980年。

④ 吴元树(音)和江思泰(音):《上海七百个乞丐的社会调查》,浦江大学毕业论文,1933年。作为其善举之一,青帮大亨杜月笙成立上海乞丐收容所,见梅臻、邵善:《海上闻人杜月笙》,河南,1987年,第38页。

⑤ 盖尔·赫尔沙特(Gail Hershatter)即将出版的著作对我们理解这一重要主题非常有用。译者按,该书已出版,见 Gail Hershatter, *Dangerous Pleasures: Prostitution and Modernity in Twentieth-Century Shanghai*,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Berkeley, 1997.

⑥ 沧海生:《闲话娼门》,上海,1935年,第7页;鲍祖宝:《娼妓问题》,上海,1935年。

⑦ 杨洁曾、贺宛男:《上海娼妓改造史话》,上海,1988年,第17~19页。

⑧ 《上海舞潮案内幕》,上海,无日期。



⑨ 李次山：《上海劳动状况》，载《新青年》第7卷第6期，1920年，第76~77页；薛畊莘：《近代上海的流氓》，载《文史资料选辑》1980年第3辑，第171~172页；上海市卫生局编：《上海市清除粪便工作概况及改进计划》，上海，无日期；《申报》1912年6月22日、23日、24日、25日、27日、28日、29日、30日；朱梦华：《旧上海的四个废品大王》，载《上海地方史资料》第3期，1984年，第162~163页。

⑩ 掏粪工反对政府卫生法规之举主要发生在1913年、1914年和1919年，见《时报》1913年12月14日，1914年8月18日，10月26日、29日，11月5日、23日；《民国日报》1919年6月15日、16日，1920年1月4日。掏粪工并非惟一反对新卫生法规的群体。1910年，水果商贩们为了反对使用玻璃售货架的规定而发起抗议，屠夫们则反对私屠的禁令，店主们为了逃避针对控制该市疫情蔓延的卫生检查而关门打烊。见《时报》1910年4月2日，7月8日，10月12日。

⑪ 上海港工运情况访问记，1987年5月26日，1988年9月26日。

⑫ 参见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南京）档案，案卷号：722，4~503，其中谈到了上海帮与山东帮码头工人之间的严重械斗问题。

⑬ 《上海港史话》，上海，1979年，第298~300页；《时报》1914年12月14日、15日、16日，1915年1月1日、17日、18日、20日、21日、22日、24日。

⑭ David Montgomery, *Workers' Control in America: Studies in the History of Work, Technology, and Labor Struggles* (Cambridge, England, 1979), p. 42.

⑮ 例见傅道慧：《五卅运动》，上海，1985年；任建树、张铨：《五卅运动简史》，上海，1985年。

⑯ 《民国日报》1922年5月1日。

⑰ “方兰英访谈录”，1958年4月16日，见上海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工人运动档案。

⑱ Emily Honig, *Sisters and Strangers: Women in the Shanghai Cotton Mills, 1911—1949* (Stanford, Calif., 1986).

⑲ “刘阿九访谈录”，1958年4月16日，上海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工人运动档案。

⑳ 李次山：《上海劳动状况》，第 10～11 页；《民国日报》1922 年 5 月 1 日。

㉑ Mary Ninde Gamewell, *The Gateway to China* (New York, 1916), p. 226.

㉒ 朱邦兴等：《上海产业与上海职工》，上海，1984 年，第 47 页。

㉓ 方福安：《上海劳工》，见《中国经济杂志》第 7 卷第 2、3 期合刊，1930 年，第 882 页、998 页、1008～1009 页。

㉔ 朱懋澄：《调查上海工人住屋及社会情形记略》，上海，1926 年，第 4～12 页。

㉕ 朱邦兴等：《上海产业与上海职工》，第 93～95 页；方福安：《上海劳工》，第 877 页；杨美珍：《杨树浦女工状况》，上海，1930 年。

㉖ 朱邦兴等：《上海产业与上海职工》，第 87 页。

㉗ Emily Honig, *Sisters and Strangers*, p. 5.

㉘ 李次山：《上海劳动状况》，……第 9～11 页。

㉙ 许维雍、黄汉民：《荣家企业发展史》，北京，1985 年，第 265 页。

㉚ Emily Honig, *Sisters and Strangers*, p. 212.

㉛ 杨美珍：《杨树浦女工状况》，上海，1930 年。

㉜ 朱邦兴等：《上海产业与上海职工》，第 107 页。

㉝ 刘明逵：《1911—1921 年中国工人罢工斗争和组织情况资料汇编》，载《中国工运史资料》1960 年第 3、4 期合刊，第 91～159 页、29～85 页。

㉞ 《上海罢工资料统计，1918—1940 年》（见本书第 7 页脚注）。

㉟ 有关 19 世纪末 20 世纪初上海工厂女工罢工的情形，可参见《中国近代工业史资料》第 2 卷，第 1236 页、第 1257～1260 页、第 1268 页、第 1286～1292 页。

㊱ 参见《时报》1913 年 6 月 16 日，其中记载了龙章纸厂一次全部由女性参加的罢工——因男性工人肆意辱骂而引起。

㊲ 1898 年，在杨树浦数家英商纱厂发生的罢工，目的就是反对计件工资。英国企业改行新工资制主要是使工人能“从机器中产生最大效益”，从而加强与印度棉布的竞争力，见《北华捷报》1898 年 9 月 26 日。

㊳ 日商日华纱厂工人反对此项禁令及计件工资的罢工情况，参见《民

国日报》1918年8月13日、14日、15日、16日,1919年2月10日;《申报》1918年8月5日;《时报》1919年2月2日、11日、13日、16日。

③ 1898年,有家纱厂的女工头因削减工资而领导了一次罢工,参见《中国近代工业史资料》第2卷,第1291页。

④ 《申报》1918年8月16日;《民国日报》1918年9月21日。

⑤ C. L'estrangé Malone, *New China Report of an Investigation* (London, 1926), pt. 2, pp. 11 ~ 13.

⑥ 种族歧视不仅仅存在于洋人之中。有关江南籍资本家歧视苏北工人的情况,可参见 Emily Honig, *Sisters and Strangers*, p. 76.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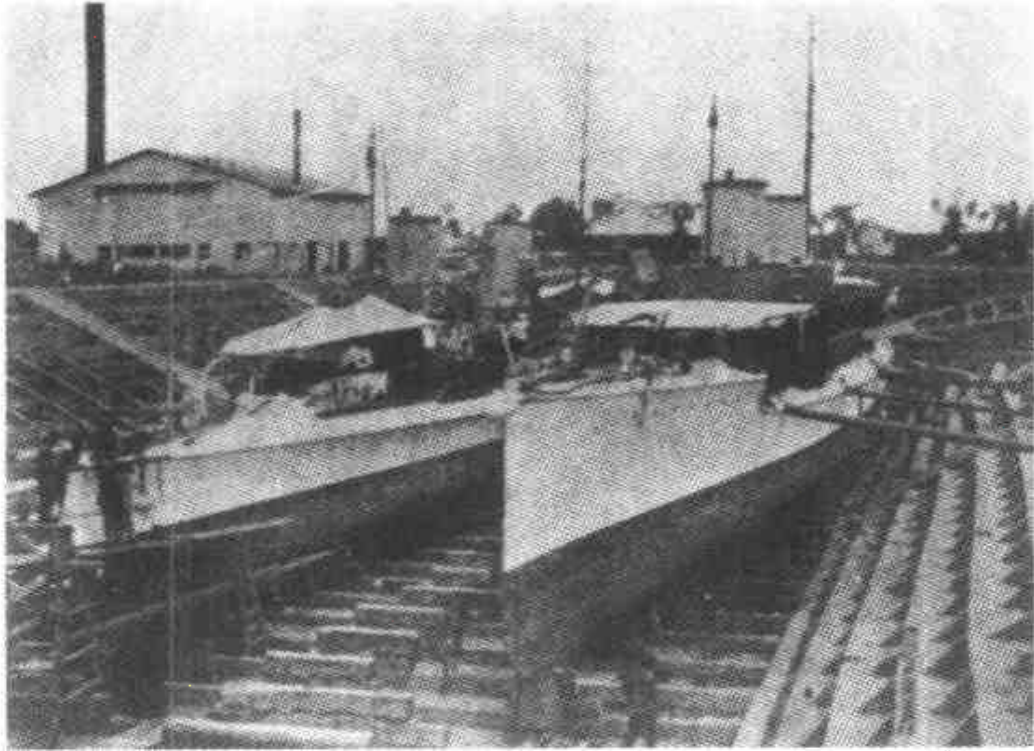
⑦ 在对上海纺织厂之包身工制度的演变进行分析时,荷尼格在其著作中指出:“在工人运动中,包身工制度意义重大,从1925年5月30日开始,厂主们倾向于与青帮结盟,以便控制工人。”



四明公所旧址。1874年和1898年，旅沪宁波人与法国殖民者两度在此地发生激烈冲突。引自《上海人民革命史画册》，上海，1988年



19至20世纪之交的上海棚户区。引自《上海画报》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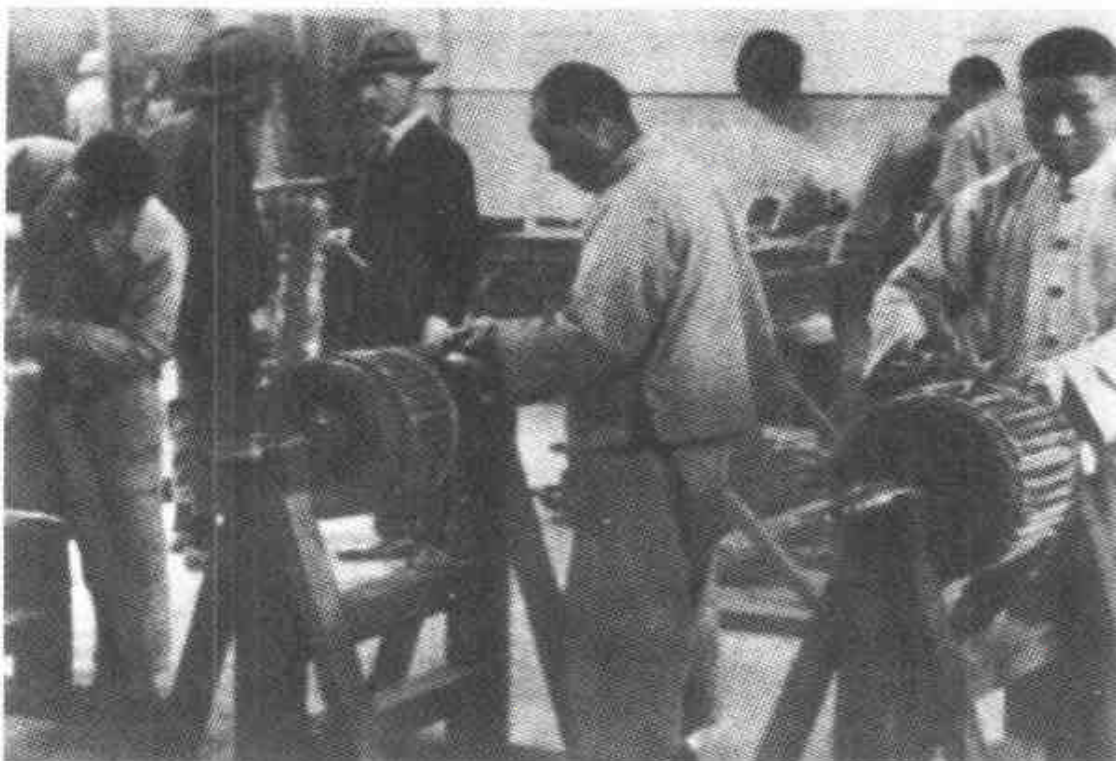


1853 年外资经营的上海船坞公司。引自《上海工人运动史》(上卷), 沈阳, 1991 年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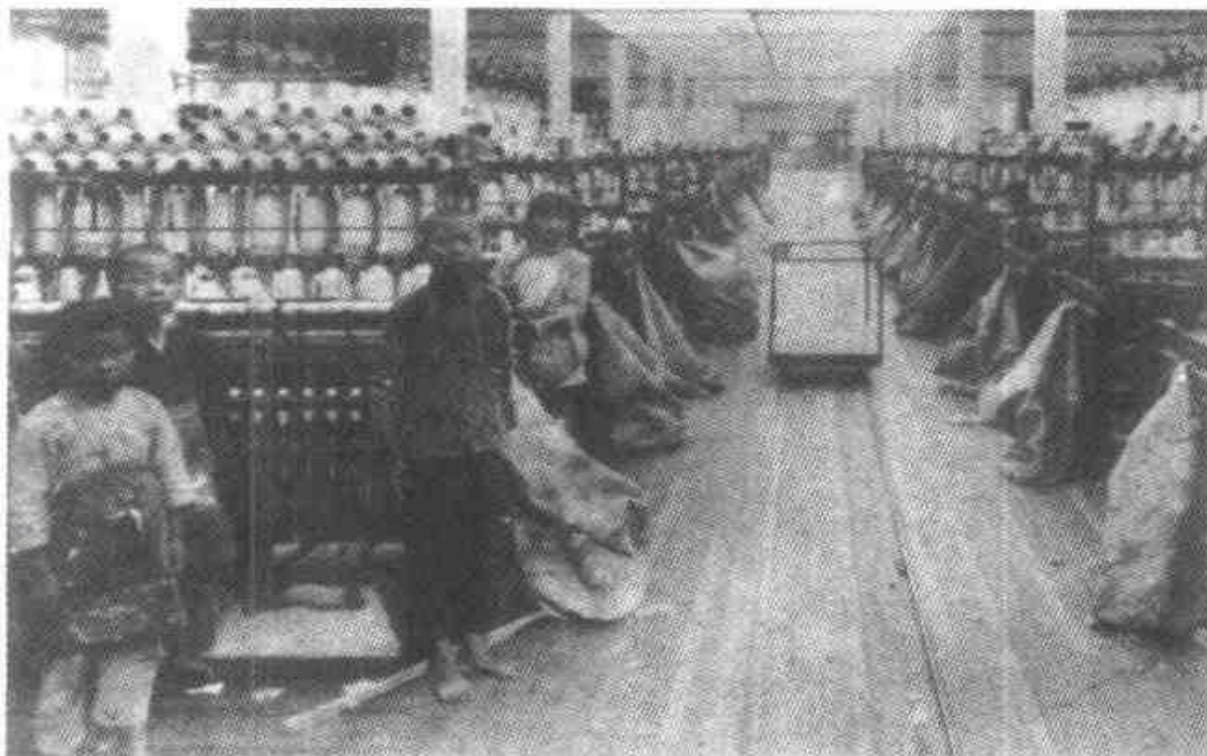


英商电车公司(1908 年创立)车务部最早的雇员。引自《上海画报》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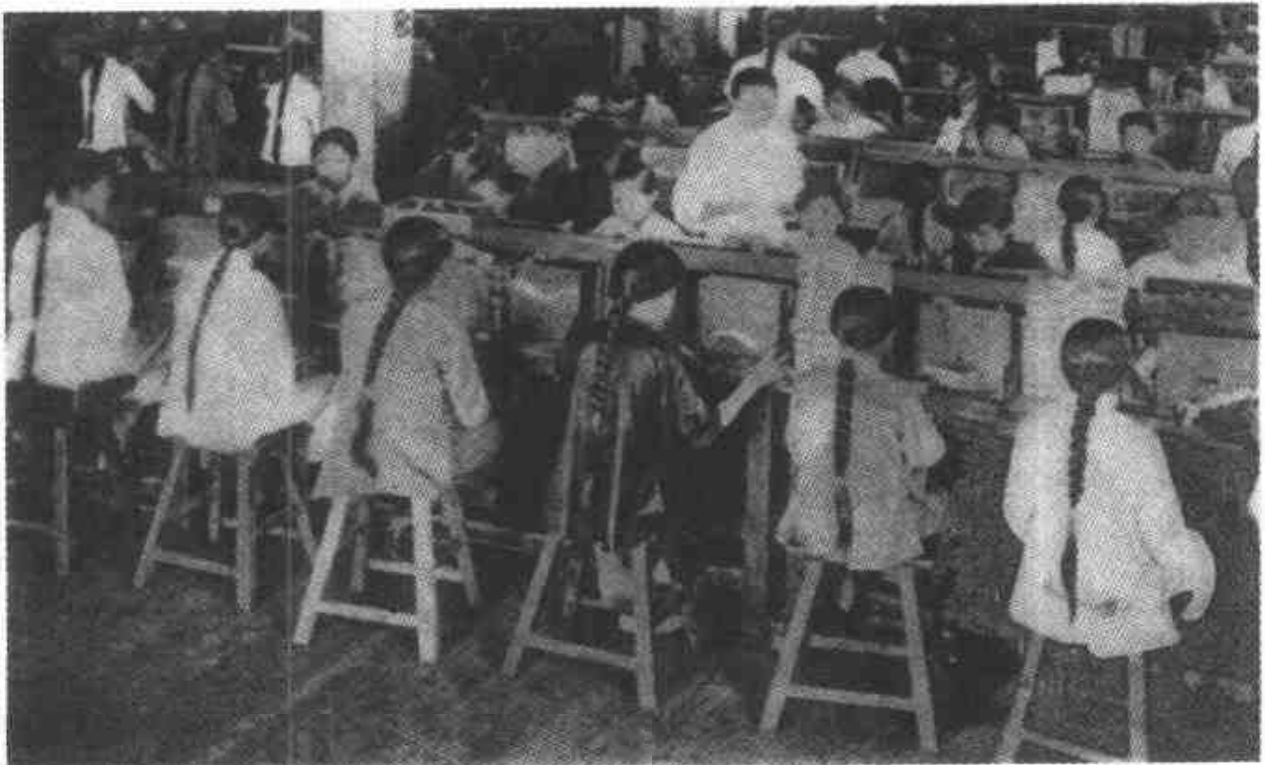
工作中的电车公司机务部技工。引自《上海画报》



日商日华纱厂的童工每天要在车间连续站立操作 12 小时。时为 1920 年。引自《上海画报》



烟厂包装部正在工作的年长女工,时为 1921 年。引自《南洋兄弟烟草公司史料》,上海,1960 年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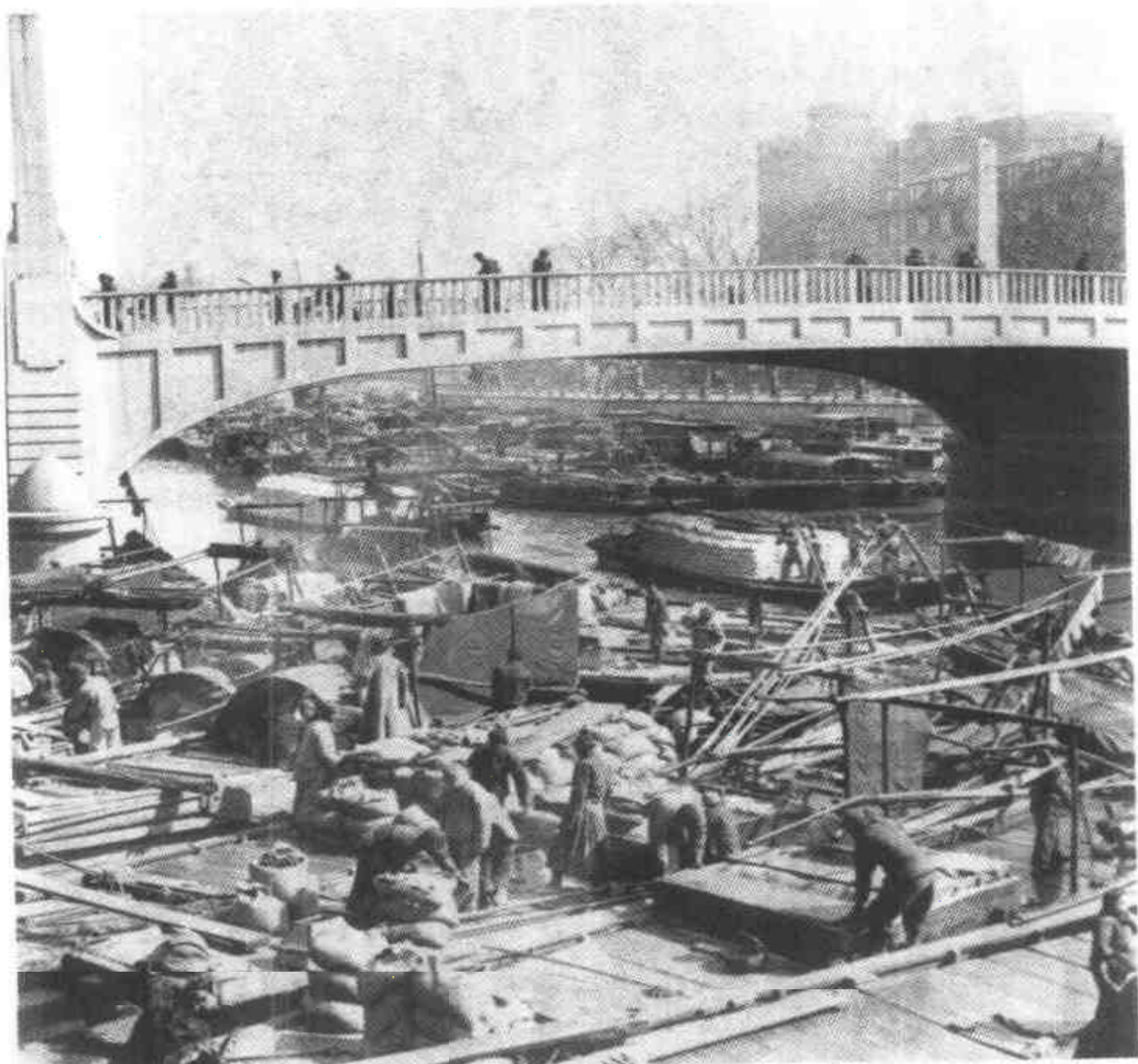
烟厂烟叶部正在工作的年轻女工,时为 1921 年。引自《南洋兄弟烟草公司史料》



1957年的一幅绘画，描述的是历史性的五卅运动：纱厂工人顾正红（中立者）与日商内外棉厂门卫（左立者）之间的冲突成为五卅运动的导火索。引自《上海画报》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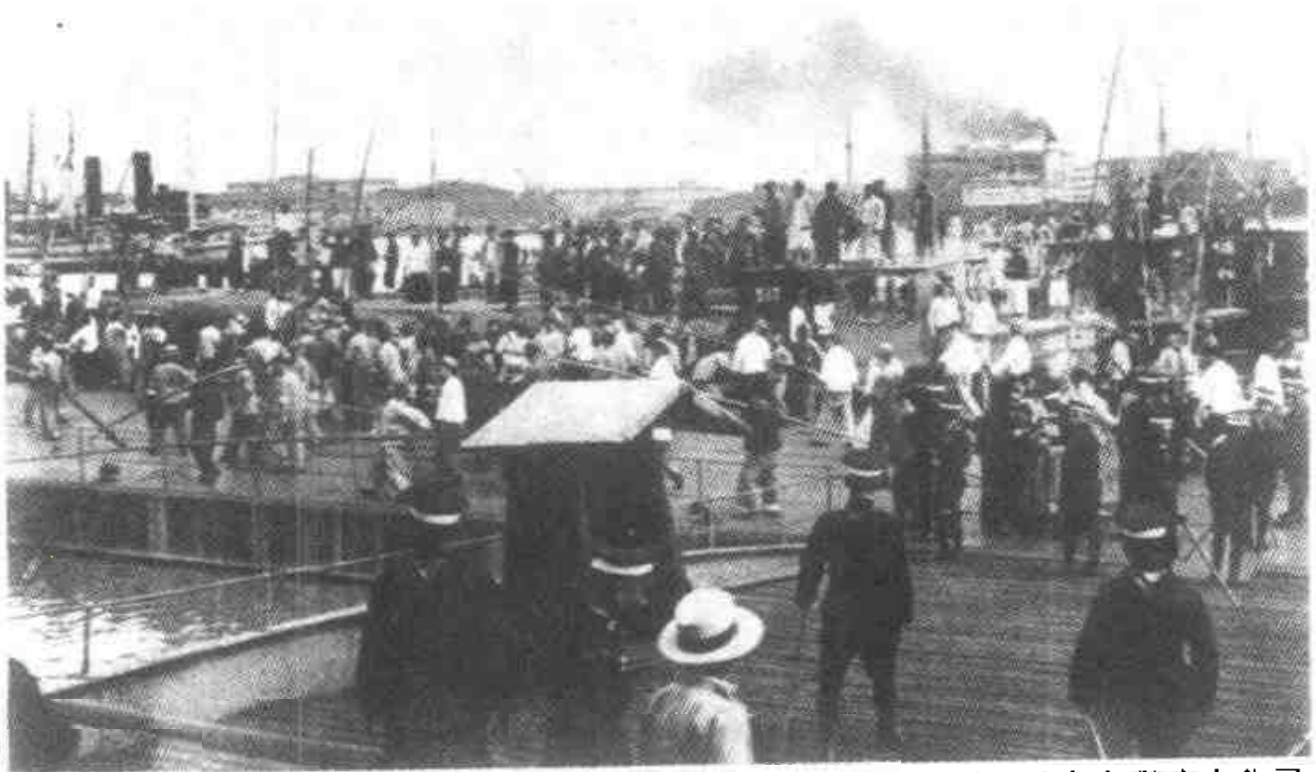
1927年3月，上海工人第三次武装起义胜利后，工人纠察队游行穿过街道。引自UPI/Bettmann Archive



1927年的罢工使上海内河航运陷于混乱。引自 UPI/Bettmann



1927年3月27日，为了庆祝上海工人第三次武装起义的胜利，上海总工会在湖州会馆大厅前举行升旗典礼，中共上海区委赠“全国无产阶级革命之模范”锦旗一面。引自《上海画报》



1934年，英美烟公司工人举行罢工，抗议公司关闭老厂。图为工人们与警察在公司码头前对峙。引自《上海画报》



1946年，上海妇女游行庆祝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的第一个国际“三八”妇女节。引自《上海画报》



1948年，一名共产党工运组织者因在上海电力公司开展工作而被捕。引自《上海画报》

## 第二部分 党派政治, 1919—1949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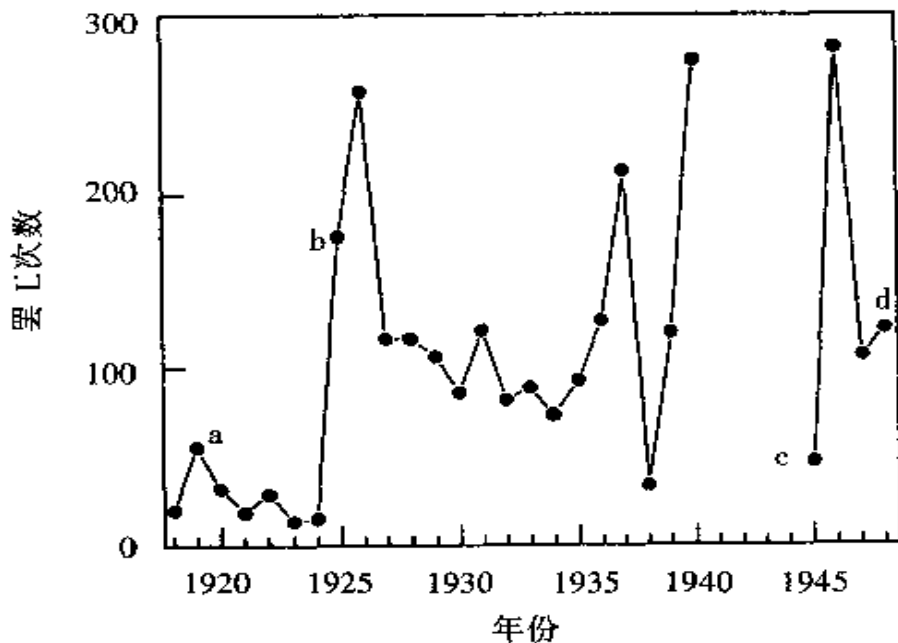
1919年五四运动前夕,上海成为日后工人运动向两个方向发展——反映了其主要成分的不同来源与劳动状况——的温床。当五四运动积极分子在1920年代涌入上海劳动市场时,他们发现有必要修订其行动目的以适应原已存在的传统。然而,这些没有经验的劳工组织者并非仅有的改变立场者。他们的开创行为乃是上海工人运动发生戏剧性转变的强力催化剂。

在1919年五四运动至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的三十年间,中国工人运动逐渐成熟。无论是以中国的还是国际的标准来衡量,上海都是这一时期工人运动当之无愧的舞台。其发展线索,由于以往学者的辛勤探索而轮廓毕具。<sup>①</sup>到20世纪20年代中期时,中国工人在共产党人的激励下已经高度政治化,只是在1927年,他们沦为蒋介石四一二政变之“白色恐怖”的牺牲品。十年后,日本人人侵为激进的工人运动注入了新的活力,到抗日战争结束时,共产党人发动的罢工又成为都市生活一道闪亮的风景线。

如图表1所示,我们有可靠的统计资料证明:这三十年间,罢工事件波动明显。罢工之波深受当时政治经济形势的影响。就像经济学家指出的,罢工一般依据经济繁荣而增长,这一模式适用于整个产业领域。<sup>②</sup>爱德华·肖特(Edward Shorter)和查尔斯·蒂利(Charles Tilly)将政治环境视为罢工浪潮爆发的促动

因素。政治危机,如同经济增长一样,容易导致工人罢工水平的全面增长。<sup>③</sup>在上海,这些经济政治契机,既有国外的因素,也有国内的因素。该市多种政权并存,既有国外投资者,也有国内投资者,很容易卷入全球政治经济发展中出现的漩涡。

66



图表 1 上海罢工的频率,1918—1948年。a 包括与五四运动有关的 33 次罢工事件; b 包括与五卅运动有关的 100 次罢工; c 只包括当年 8—12 月; d 只包括当年 1—7 月。

上海罢工的第一次大浪潮发生在 1919 年反日的五四运动期间。当年,在 56 次罢工中,有 33 次与五四运动有关。六年后,在反对英日帝国主义斗争的影响下,一场次数更多、规模更大的罢工浪潮出现了。当年,在 175 次罢工中,有 100 次与历史性的“五卅”总罢工有关。次年,为了迎接北伐军进军上海,工人们发动起义。作为配合,上海至少发生了两次总罢工。

尽管四一二政变后蒋介石采取了严厉的镇压措施,但在国



民党十年统治时期，仍不断爆发罢工，1937年达到高潮，总数达213次。那年罢工次数的显著增加，部分地可以归因于日本侵略前夕上海经济的相对繁荣。1937年8月，日本大举入侵（并伴随着大批难民涌入公共租界），给上海经济带来浩劫。但是到了1940年，生产又恢复到战前水平。<sup>④</sup>这一年经济的高速增长，也带来了前所未有的罢工浪潮：1940年上海发生罢工275次，比以往任何一年都多。

1940年的罢工不单单是经济相对繁荣的反映，它们也是对无法抑制的通货膨胀的抗议。从1911年辛亥革命到1937年抗日战争爆发，上海的消费指数缓慢增长，年通货膨胀率约为2.5%。<sup>⑤</sup>然而，1937年8月以后，生活费指数迅速飙升——这股势头直到战后仍汹涌不止。1940年罢工次数的猛增以及此种情形在内战时期的再现，显然与当时严重的经济危机有关，并给上海经济带来危害。这一主题——比任何其他因素更重要——使都市人口团结起来，一致反对国民党。

中国近代史研究者对这些罢工浪潮很熟悉，它们都被认为是新兴知识分子激发出来的新生事物。研究工入史的学者往往将中国工人之命运与政党之命运联系起来，并认为前者乃后者之先驱，他们一般都满足于诠释共产党的政策。但是共产党人并非五四精神的惟一倡导者。国民党人在20世纪20年代初也曾花费相当精力深入工人之中。在统一战线的旗帜下，两党的动员行动互相补益。然而，因为发生了蒋介石的四一二政变，两党的分裂加剧了他们对工运工作的竞争。

无论是忠于三民主义还是忠于马列主义，共产党和国民党的领导人都认为必须高度重视工人阶级。国民党人和共产党人都相信工业化是未来的希望，所以都花费极大精力，试图将工人运动纳入自己的政治旗帜之下。在此过程中，党和政府都经历了

根本性的变革——如同工人自身的变化一样。

可以肯定,这些对立党派的意识形态有着实质性的不同。有鉴于共产党的工运组织者强调以团结的、有阶级觉悟的无产者为主导的阶级斗争的重要性,国民党着力于强调阶级调和(劳资合作)的必要性,即为了国家经济的发展,工人与资本家应当携手合作。<sup>68</sup>然而,共产党的马克思主义逻辑和国民党的工业化梦想都很难符合上海工人之实际。饱受苦难的工人削弱了劳资合作的可能性,但频繁的斗争也不表明他们具有一致的阶级觉悟。工人阶级中存在着深深的裂痕,国共两党都能利用其中的一些群体。

哪些工人接受共产主义革命者的领导?哪些工人倾向国民党政权?又是哪些工人抵制外来者介入、抵制其政治图谋呢?受过教育的人可能会猜测,共产党人在大工厂收入低微的非技术性工人中能站稳脚跟。毕竟,这些工人与无产者的定义最接近,理所当然地成为受马克思主义社会变革论影响的干部们的动员目标。国民党人则被认为有可能在赞成劳资合作、反对激进的共产主义工人运动的白领工人中发展势力。至于独立的工人运动的社会基础,我们自然会把目光投向工匠——他们有能力为了自身利益而采取激进行动,全世界都不例外。

对上海工人历史的初步调查为这些猜测提供了某些佐证。五卅运动——共产党领导的罢工运动的一个顶点——即开始于纺织厂,是典型的无产者行业(参见本书第四章)。国民党所控制的工人的一个基地是白领的上海邮政局。有几位高级国民党兼青帮领导人即从组织该局工人起家。(参见本书第五章)。最后,独立的工人运动确实存在于墨业工人中,他们在20世纪20年代和30年代的罢工中显然游离于政党领导之外。<sup>69</sup>

然而,当我们由表及里加以探讨的话——正如本书剩余部

分所要做的那样——上述猜测模式难以成立。党的干部们的思想和策略不一定能导致完美结局。本书第二部分名为“党派政治”，将要探讨共产党人和国民党人在争夺中国工人控制权过程中的表现。第四章名为“激进主义的全盛期”，对共产党人在该市的早期活动进行编年叙述。第五章名为“保守主义时期”，对国民党的巅峰时期即1927—1937年间南京国民政府时期的有关情况进行了论述。第六章为“激进派的复活”，讲述了从打败日本侵略到内战时期共产党恢复活动的情形。

#### 注 释

① 关于1919—1927年间的情况，有谢诺(Jean Chesneaux)的开拓性著作：*The Chinese Labor Movement, 1919—1927* (Stanford, Calif., 1968)。1928—1948年间的情况，可参见：S. Bernard Thomas, *Labor and the Chinese Revolution* (Ann Arbor, Mich., 1983)。关于整个这一时期中国工人运动的情况，有马超俊等人所著的多卷本《中国劳工运动史》，台北，1959年。

② Orley Ashenfelter and George E. Johnson, "Bargaining Theory, Trade Unions and Industrial Strike Activity," *American Economic Review* 59(1969): 35-49; John I. Griffin, *Strikes: A Study in Quantitative Economics* (New York, 1939); Alvin Hansen, "Cycles of Strikes," *American Economic Review* 11(1921): 616-621; K. G. J. C. Knowles, *Strikes* (Oxford, 1952); Jack W. Skeels, "Measures of U. S. Strike Activity," *Industrial and Labor Relations Review* 24(1971): 515-525; John Vanderkamp, "Economic Activity and Strikes in Canada," *Industrial Relations* 9(1970): 215-230; Andrew Weintraub, "Prosperity Versus Strikes: An Empirical Review," *Industrial and Labor Relations Review* 19(1966): 231-238; Dale Yoder, "Economic Change and Industrial Unrest in the United States," *Journal of Political Economy* 48(1940): 222-237.

③ Edward Shorter and Charles Tilly, *Strikes in France, 1830—1968*

(Cambridge, Mass. ,1974) ,p. 104.

④ Robert W. Barnett, *Economic Shanghai : Hostage to Politics, 1937—1941* (New York, 1941) ,p. 104.

⑤ 《解放前的上海物价》，上海，1961年。

⑥ 关于国民党领导工人运动的指导思想问题，特别参见潘公展：《中国国民党劳动政策的研究》，上海，1930年；以及陆京士：《中国劳工政策之理论与实际》，台北，1954年。

⑦ 有关墨业工人的情况，可以参见刘石吉：《一九二四年上海徽帮墨匠罢工风潮》，提交近代中国区域史研究学术研讨会的论文，台北，中央研究院，1986年。

## 第四章 激进主义的全盛期， 1919—1927年

对上海工人来说，从五四运动（1919年）到三次工人武装起义（1926—1927年）是动荡不宁的岁月。中国城市居民对世界大势的了解日益加深，有助于将工人运动与国内及国外政治经济形势联系起来。当时国人最关注的问题——国耻、军阀主义、通货膨胀——为原本分散的工人队伍提供了前所未有的合作条件。促使工人斗争政治化的因素乃是新生政党的活动，其成员多为在“新式”学校受过教育的爱国学生。然而，正如这些活动家们将要发现的那样，工人们由于文化传统和斗争经历各不相同，其行为方式千差万别，只有部分人对外来干部的动员作出积极反应。

### 五四运动

共产党、国民党和西方学者一样，都认为五四运动乃中国近代史的分水岭<sup>①</sup>。在1919年命中注定的那一天，成千上万的中国学生走上北京街头，对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后签订的凡尔赛和约发出愤怒的抗议。和约中关于将中国北部省份山东实际上变为日本殖民地的条款激怒了学生。示威者抗议政府屈服于日本侵略的行径，一股炽热的民族主义浪潮奔涌而出，迅速流遍于中

国大地。

70 知识分子不是惟一的被爱国情绪感染的群体。6月5日,北京大规模逮捕学生的消息传到上海,有6万名工人举行了罢工,各商店随之关门,全城陷于瘫痪。首先受影响的是日属棉纺织厂,但工人罢工不久便波及到造船、市政、印刷、烟草、运输等行业。这个中国最大工业城市为期5天的瘫痪迫使北京政权对为时一个月、僵持不下的学生抗议行动作出让步,政府作了公开道歉,释放了被捕学生,解除了3位与巴黎和谈有关官员的职务,拒绝签署凡尔赛和约。<sup>②</sup>

尽管政治家与知识分子被工人阶级政治斗争的新景观搞得一筹莫展,上海的“五四”罢工并不意味着工人绵延不息的行动和组织传统有了新突破。罢工期间,人们熟知的城市团体在迅速动员工人阶级方面发挥了关键作用。

在工匠中,同乡会、行会和原始工会起着领导作用。宁波同乡会在推动甬籍工商业者抗议方面尤为积极,其激发爱国热情的举动可以追溯到半个世纪前与法国人斗争一事。\*各行各业的熟练技师包括铁路机匠、自来水厂工人均在其公所行会的支持下举行罢工,商务印书馆的印刷工人也在同义会的激励下大量卷入<sup>③</sup>。原籍上海、宁波、绍兴和苏州的印刷工人迅速加入。不久,建筑工人也接踵而至。<sup>④</sup>坐落在老城咸瓜街的参业公所在罢工开始时正准备庆祝其行业神的诞辰,聚餐的分子钱都捐献给了这场爱国事业。<sup>⑤</sup>

---

\*《五四爱国运动资料》,北京,1979年,第454页、458页、468页、473页。可以肯定,爱国热情后面还隐藏着经济利益。例如,“五四”总罢工之前的几个月,该市制伞工人为了抵制进口日本洋伞而举行罢工。参见古屋氏(T. Furuya):《五四时期上海的社会条件和人口》,载《五四运动史再检讨》,东京,1986年,第226~227页。

对缺少技术的工人而言,工厂工头起着关键的中间作用。有十多名在外国棉纺织厂工作的工头号召工人结成团体(约有200名工人),抵制洋货。<sup>\*</sup>青红帮的表现尤为突出。6月5日,两帮头子开会,决定让他们控制下的所有小偷扒手参加总罢工。乞丐们也被命令在罢工期间暂停乞讨;乞丐们的日常饭食由丐帮头子提供。甚至有报道说,有些妓女唱起爱国歌曲,“停牌歇业”。<sup>⑥</sup>

技术工人与非技术工人的差别也反映在他们的公开示威行动上。6月10日发生的两件事可以做个比较。在沪东,约有500名普通工人聚集在一个邻近的小庙准备出发。大多数参加者都手执木棍和方布,一如农村抗议者的习惯。当庙里的人为他们在布上写好字后,他们就像农民起义者那样将布扎在木棍上。但当工人们看到警察排列在通往公共租界的路上阻挡他们前进时,其首领便叫大家解散回家。这群抗议者立即丢弃了他们刚刚准备好的旗帜,四散回家。<sup>⑦</sup>相反,同日在老城由工匠举行的一场罢工中,每位工匠手执一面自制的旗帜,昂首阔步,行进在所有的主要大街上。正如一家报纸带着明显的惊讶口吻所说的:“尽管他们是匠人,他们的演讲极得人心,他们懂礼貌,有纪律。”<sup>⑧</sup>

这种抗议方式上的差异并不妨碍技术工人与非技术工人在此民族危机时刻采取一致行动。而且,许多工人甚至对开展持久合作表示出兴趣。6月12日,当罢工浪潮渐息之时,有2000多名技工、工头和普通工人聚集在四明公所,即宁波旅沪同乡会。在那里,他们决定成立一个工人组织,将罢工进行到底。<sup>⑨</sup>

<sup>\*</sup>《五四爱国运动资料》,第467页。在决定工厂工人是否参加罢工上,性别显然也是一个重要因素。据一份英国警务处报告称,在公共租界参加罢工的两万名纺织工人中,有2/3系男性(尽管女性占了纺织工人的绝大多数)。见 Joseph Chen, *The May Fourth Movement in Shanghai* (Leiden, 1971), p. 150.

当时的观察家们也许未曾充分认识到这一工人行动主义发生发展的深层原因，但他们无一不被觉醒了的工人阶级的政治潜力所震撼。早期共产主义工人运动的领导者李立三在罢工爆发后不久写道：“在五四运动以前几乎没有认识群众力量，到了五四运动以后，一般进步青年，便受了这个浪潮的冲击，认识国民革命前途，必须唤起广大的群众来参加，尤其是工人群众。”<sup>②</sup>

第一次世界大战以后，像他们在世界其他地方的兄弟一样，上海工人阶级很容易被唤起。正如詹姆斯·克罗宁（James Cronin）评论的那样：“自相矛盾的是，这场战争是以国际主义的消亡为开端的，又以国际范围的罢工浪潮结束。”<sup>③</sup>就像在欧洲一样，遍及中国的罢工浪潮部分地是极度通货膨胀的产物。<sup>④</sup>但是，无论是欧洲工人还是中国工人所要求的远非增加工资；他们还提出了组织上的和政治上的要求。

欧洲与中国的罢工战略具有类似之处并非偶然。一战期间，约有1万多名中国工人被欧洲工厂招募，以取代那些上战场的人们。战争结束，从战场归来的欧洲人重新取代了中国人，后者回到中国时已经掌握了很好的斗争技巧。\*

旧的罢工方式与新的世界性意识相调和在这一时期的罢工中表现明显。该市油漆工人于1919年10月举行罢工时，他们首先在公所里举行由来已久的仪式，在神祇面前焚香祷告，然后发

---

\*单是在法国，中国工人在1916年11月至1918年7月就举行了25次罢工。他们还至少两次作为工贼破坏了法国码头工人和煤气工人的罢工。参见陈三井：《华工与欧战》（台北，1986年），第142-144页。当回国工人抵达上海时，他们常常在码头上受到法租界捕头、青帮大亨黄金荣的迎接，在法租界当局的授权下，由黄金荣向回国工人发放安家费，黄便借此机会为其正在扩张的帮会网络吸纳新成员。参见《民国日报》1921年1月24日，2月12日，5月4日。



表声明称：“全世界的工人都在要求增加工资。而且，许多国家的工人每日仅工作 8 个小时，不像上海漆工，从早上一直干到晚上。”<sup>⑮</sup>

对世界其他地方的工人运动了解得越来越多，促使上海工匠采取了越来越勇敢的行为。工会组织的不断增加便是这一进程的结果之一。1920 年初，在药王庙举行了一次总集会后，该市 5000 名中医药剂师成功地举行了一场要求增加工资的罢工。尔后，为了保卫劳动成果，他们仿效外国人的样子，成立了一个“友谊联合会”。<sup>⑯</sup>

## 共产党的诞生

上海的战后罢工浪潮使左翼知识分子感觉到有必要深入到工人阶级中去。<sup>⑰</sup>与此精神相符合，陈独秀——未来的共产党缔造者——在 1920 年初来到上海。至当年 5 月，在第三国际使者维经斯基的指导下，陈独秀发表了对该市工人状况的综合调查报告，并聚集一批年轻的激进分子，成立马克思主义研究会，准备发起一场进步的工人运动。<sup>⑱</sup> 73

来自浙江省的学生——浙江旅沪学会在五四罢工中表现出了极大的兴趣——成为这一中国共产党先驱团体的主要成员。<sup>⑲</sup> 到年底，这些富有朝气的组织者已经在共产主义旗号下建立了两个工会。也许并非巧合的是，这一突破发生在机器业和印刷业，两者均以来自浙江的工匠占绝对多数。<sup>⑳</sup>新工会反映了江南工匠长期以来的愿望。上海机器工会，最初的参加者约有 70 人左右，都来自造船、纺织等行业。他们在其成立宣言中宣称，坚持

学徒制和互助的传统。<sup>⑧</sup>

上海，既是中国的工业都会，又是工人罢工传统的温床，回顾起来，似乎还是新型中国共产党的当然发源地。但对当事人而言，情况远非如此。正如陈独秀在中共一大于该市召开的近一年前所写的关于上海社会情况的系列论文中所指出的：

上海社会，分析起来，一大部分是困苦卖力毫无知识的劳动者；一部分是直接或间接在外国资本势力（力）底下讨生活的奸商；一部分是卖伪造的西洋药品、卖发财票的诈欺取财者；一部分是淫业妇人；一部分是无恶不作的流氓、包打听、拆白党；一部分是做红男绿女小说、做种种宝鉴秘诀、做冒牌新杂志骗钱的黑幕文人和书贾；一部分是流氓政客；青年有志的学生只居一小部分，——处在这种环境里，仅仅有自保的力量，还没有征服环境的力量。……我因此联想到国民大会如果开得成，总以不在上海开会为宜（着重号为引者所加）。

上海社会是哪一种人势力最大？从表面上看来，政治的、经济的大权不用说都在西洋人手里，但社会的里面却不尽然。大部分工厂劳动者，全部搬运夫，大部分巡捕，全部包打听，这一大批活动力很强的市民都在青帮支配之下。去年学生运动时（指五四运动——引者）的大罢工已经显现出他们的威信……他们老头子的命令之效力强过工部局……消灭他们之根本办法，惟有使各业工会在法律上都公然成立……在这一点看起来，上海工会发达不发达，不仅是劳动界利害问题，简直是上海全社会治安问题。<sup>⑨</sup>

74

无论陈独秀的意见如何，上海仍然成为1921年7月中共成立大会的召开地。这个新型政党颁布的第一个纲领开头便写道：“本党的基本任务是成立产业工会。”<sup>⑩</sup>次月，为了实践纲领内容，

中共在上海成立了中国劳动组合书记部。书记部里最积极的成员、一个名叫李启汉的学生，业已显示出组织工人的极大才能，他在此前一年即已协助创立机器工会和印刷工会。但是这些工会是建立在早有框架的行会的基础上的。为了打破只在有文化的工人中打转转的局面，在比较缺少技术的广大无产阶级中开展工作显得尤为迫切。正如一位早期活动家所指出的：

工作的开始，是遇到了不少困难的……（最难对付的是青红帮）。最后我们决定把几个同志设法加入青帮或洪帮；但是在当时我们同志都是学生出身，如果要上台去讲一套，下台来写一套，倒还有人；如果要到青帮里去拜老头子，到洪帮里去做小兄弟，先要低首下心去学他们的清规戒律，然后再转弯抹角，开展工作，那真是谁也没有那个耐心，而且也不容易找到那个门路。<sup>④</sup>

幸运的是，在共产主义工人运动的发展过程中，李启汉（也许值得注意的是，他来自湖南省）有着极大的耐心，在帮会中开展工作。作为一名共产党创办的工人补习学校的教师，李与一名纺织女工建立了密切联系，后者是一名帮会成员。她将这位年轻的马克思主义者介绍给了她的青帮师傅，后者欢迎李启汉加入青帮。在其深入纺织和烟草工人中开展工作时，这种关系证明具有极大的帮助。到1921年底，李在这两个产业部门已站稳脚跟，建立起左倾工会。<sup>⑤</sup>

## 保守派的挑战

并不只是共产党人在寻求组织上海的工人阶级。国民党政治家和工厂工头为了其自身利益同样热衷于打通工人行动主义



的渠道。五四运动后的次年，这类人物在上海成立了十多个工会。<sup>75</sup>尽管他们的努力是有限的，却表现了“五四”总罢工以后激发起来的对组织工人的普遍兴趣。在改良主义的影响下，还出现了自立“工会”，如“实业振兴会”，由一位纺织厂工头和一位学校校长发起，接受大生铁厂老板的指导。该团体在一家新式纺织厂发行股份，但最终只有一架织机投入生产。<sup>76</sup>这类团体的另一个是上海职工联合会，该会在1919年10月的一场罢工中遭到干涉，此次罢工发生在三新纱厂，罢工者要求增加工资，工人应拥有每周休息的权利。<sup>77</sup>第三个是中华全国工界协进会，该会每周发表演讲，发行了一份报纸，办了一个工人业余学校。在该会成立仪式上，国民党显要如胡汉民、戴季陶和廖仲恺均发言表示支持，该会负责人是一位与粤籍政客有着密切关系的资本家。该会还有更雄心勃勃的设想，如建立工人诊所和信贷部等，但终于未能实现。<sup>78</sup>

在一定程度上，上海刚刚出现的共产主义运动可以与这些保守派合作。例如，陈独秀就曾参加过几个“招牌工会”——正如后来中共正统史学的称呼一样（又叫“冒牌工会”——译者注）——的成立仪式。<sup>79</sup>对保守的劳工团体提出的于1920年5月1日在上海联合庆祝第一次国际劳动节的倡议，共产党也表示支持。尽管警察局关闭了预定的庆祝场所，但仍有约5000名工人聚集在附近的一个公园里，高呼“劳工万岁”以及关于三班制、八小时工作制等要求。<sup>80</sup>

共产主义革命家可从改良团体提出的改善工人权利的主张中获益，但两者并非不存在紧张关系。在几位招牌工会领袖的操纵下，1921年11月召开了一次大会，讨论将全市工会在一个单一组织的保护之下加以合并的可能——包括那些中共支持下的工会。虽然李启汉和另一位共产党代表参加了这次会议，但

是，当他们提出的几项要求遭到拒绝时，他们便离开了会场，以示抗议。<sup>④</sup>

“五四”以后上海工人运动的特征是：激进派与保守派之间的合作与冲突方式不断转换。即便是在这早期阶段，党派之间的对立由不同成分组成的工人中间也有着鲜明的表现。1922年，一场在某种程度上可以说是由外来组织者掀起的罢工浪潮席卷该市。工人斗争非同寻常的水平——因为紧接在劳动组合书记部成立之后——往往被说成是正在壮大的共产党影响的结果。<sup>⑤</sup>确实，有许多证据来支持这种观点。例如，当年持续最久的罢工（坚持达27天之久）是由金银器业工人发动的，具有共产党员身份的工匠成立了一个俱乐部，工人们要求资方予以承认。<sup>⑥</sup> 76  
此次罢工的一位参加者后来回忆道，罢工的中坚力量是工匠（90%来自宁波），他们对自己的待遇不像那些销售其产品的白领职员感到不满。<sup>\*</sup>虽然1922年这场由技术工匠发动的罢工历时最久，但在规模上不是最大的。规模最大的罢工是由1万名非技术性缫丝女工发动的，领导者不是共产党，而是与国民党政客关系密切的帮会中人。

对共产党人来说，不仅保守派的挑战令人烦恼，军阀的镇压更是他们控制工人运动的障碍。1923年2月7日，军阀对劳动组合书记部领导的京汉铁路工人罢工进行的血腥镇压严重危害了全国的共产主义事业。正如书记部领导成员之一的邓中夏后

---

\*“杨孟言访谈录”，1959年5月30日，上海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工人运动档案。共产党的影响并不意味着从根本上打破了传统的斗争方式。金银业工人的罢工最终是在宁波同乡会的调解下解决的。后者坚持工人必须为其罢工之鲁莽行为道歉——罢工期间，一个商店在骚乱中被毁，工人们在其处焚香，燃放爆竹。见《民国日报》1922年11月2日。

来回忆的那样：

中国共产党自成立以来，便在上海做职工运动，但是，总做不起来，做起来一点，便又覆灭。1922年冬，日华纱厂、英美烟厂与金银业的所谓三角同盟罢工失败以来，什么也没有，仅仅还保有很小一部分的印刷工人和机器工人，再加上一部分店员。“二七”失败的消沉期中，简直没法活动。<sup>77</sup>

二七罢工中，有35位罢工者在军阀吴佩孚及其盟友的三次主要袭击中丧生，那以后，劳动组合书记部停止了活动。工运主导权再次落到保守的工会领袖手里，其中的许多人喜欢与帮会和国民党右派保持密切联系。<sup>78</sup>

## 统一战线

1924年初，国民党与共产党宣布结成统一战线，政治气氛焕然一新。统一战线允许共产党人以个人身份加入国民党，并在新成立的国民党中央工人部的统一领导下恢复工运活动。两个政治竞争者的正式合作使上海工人阶级很快动员起来。1924—1925年间，上海有国民党党员4448名，其中职业为“工人”者几近1/3(1482人)。在那些标明身份者中，来自宁波和其他江南地方的机器工人、木匠、技工、印刷工人和男性纺织工人的数量很大。学生在上海国民党党员中占了绝大多数，其中有很多著名的共产党工运领导人。<sup>79</sup>

在很大程度上，推动工人运动新高潮来临的动力大部分来自上海大学。上海大学成立于1922年10月，校长是于右任，一位参加过辛亥革命的同盟会会员；副校长是邵力子，身兼国民党党员和共产党党员。该校从一开始就是国共两党的一项冒险事

业。该校很快就赢得了行动主义的名声,吸引了全国各地有抱负的青年。来自浙江的学生最多,他们也是校园中出现的许多同乡会中政治观点最激烈的。<sup>⑧</sup>

1923年夏,上海共有43名共产党员,分为4个小组,其中之一就在上海大学。上海大学的党小组有11名党员,包括邓中夏、瞿秋白等有影响的党的中央委员,他们担当起了领导工人运动的重任。1924年1月的国共合作宣言为这类活动提供了更多的支持和保护。该小组据此指示所有的共产党员和共青团员加入国民党,并同意国民党在该大学成立一个地方支部。<sup>⑨</sup>

在统一战线的保护下,上海大学的师生开始关注劳工界。新成立的社会学系引人注目,瞿秋白和邓中夏要求学生们将课堂中的马克思主义社会学与工人运动实践相结合。这些学生中的一位便是杨之华,她很年轻,来自浙江,当过小学老师。进上海大学不久,她与瞿秋白结婚,后来成长为上海工人运动中一名著名人物。动员工人的最初渠道是工人夜校。到1924年夏,中共上海大学小组为工人们踊跃入校的热情所鼓舞,开办了沪西工友俱乐部,作为进步的工人-学生的聚会场所。<sup>⑩</sup>

上海大学工人夜校办得成功的最初例子是刘华,他是中华书局的一位印刷工人。在中华书局当了3年学徒后,刘华进入上海大学工人夜校,3个月里,邓中夏和瞿秋白发展他加入中国共产党,几个月后,他当上了沪西工友俱乐部的主任。俱乐部设于纺织厂集中的小沙渡地区的中心地段,他将工作重点放在该地区各日属棉纺厂的工人身上。 78

中共组织纱厂工人的一个关键人物是内外棉厂的工人陶静轩,陶既是俱乐部成员,又是共产党员。与绝大多数共产党组织者不同的是,陶静轩出身于苦力劳动者——他原籍湖北,还当过码头工人。陶首先着手在厂内联络五大帮口首领(安徽帮、湖北



帮、苏北帮、山东帮和绍兴帮)，最终让他们尽弃前嫌，在厂后的一座小庙里举行结拜仪式。在互换帖子、喝过鸡血酒后，五人共拜陶静轩为“大哥”。<sup>79</sup>他们的工作成效很快得到证明。1925年2月，内外棉八厂发生罢工，抗议厂方用女工取代50名男工，其中有几位是俱乐部成员。<sup>80</sup>工人们四出联络，使俱乐部得以将罢工扩大至22家日商工厂，并领导成立了一个总罢工委员会，组织纠察队，向罢工工人发放补贴。<sup>81</sup>

与在他前面的李启汉一样，陶静轩发现，要有效地动员无产阶级，就必须借助人们熟知的团结方法，甚至包括一些“封建性”习俗，诸如结拜盟誓之类。李、陶二人都不是江南人，但都能利用非技术性工人——大多不是江南人——的同乡忠诚。<sup>82</sup>近年，中国学者开始承认，初期共产党组织者在吸引妇女加入自己的事业时遇到了很大困难，他们认为：“由于封建传统的束缚，女工都带有依附性，缺乏战斗精神。”<sup>83</sup>然而，从19世纪以来纺织女工的斗争传统（参见本书第三章）来看，此种解释缺少说服力。尽管其行动的步调很少被共产党干部提及，实际上有许多女工卷入了20世纪20年代的罢工浪潮。由于只是注意到妇女特殊的条件和关系，如在烟草业中开展女工工作的杨之华（参见第七章），故非技术性工人看起来对中共没有多大热情。

所以，尽管统一战线使共产党人在工人运动中获益很多，但仍存在许多缺点。国共两党的合作并未消除双方所有的分歧，即便当共产党已成为国民党的一部分时也是如此。国民党“右派”反对两党合作，极力阻挠激进工人运动的发展。这种阻挠往往直接采取卷入劳工事务的方式——通常是通过支持保守工会表现出来。帮会控制的劳工组织如南洋烟草公司的工会或是缫丝女工中的工会往往是最有可能插手的。1923年8月，上海工团联合会成立，将32个这类工会团体紧密聚合在国民党右派的周



围。<sup>④</sup>这种组织给激进的劳工运动带来阻碍,在2月的纺织工人罢工中即已暴露出来——当时联合会的一位领袖将罢工消息告诉了日本方面。\*

来自国民党右派的威胁是当时共产党人必须面对的一个问题,1925年1月,中共第四次全国代表大会在通过的职工运动决议案中指出:

民族革命运动时期中职工运动里,尤其在现时工会有公开的可能的時候,不但是对于国民党的关系应当非常注意,便是普通的工会里也很容易发现各种反动派……国民党右派现在有集中这些反共产党于自己之手的阴谋……此种阶级斗争的进行,必然能打倒工会各种反动派,尤其是国民党右派的势力……我们应竭力设法到国民党的工人部里去工作,以便借此改造国民党之工会为阶级斗争的工会,而筑成统一的工人运动。<sup>⑤</sup> 80

这种努力到1925年5月1日召开第二次全国劳动大会时取得了成效。与三年前召开的第一次全国劳动大会相比,此次会议遭到了国民党右派的抵制。保守派的缺席(以及国民党在其领袖孙中山去世后陷入混乱的情形)使得共产党得以放手准备此次会议。结果,大会批准了全国总工会的成立。总工会表面上是

---

\* 据日本外务省档案显微胶卷(#S-350) 有关档案显示,南洋烟草职工会的负责人兼上海工团联合会的王光辉,1925年2月利用前往北京的机会向日本方面报告了上海日商纱厂将要举行罢工的消息。见上海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编:《五卅运动史料》(二卷本,上海,1981年、1986年),第1卷,第394~395页。王以前曾在湖南领导工运,他在1923年长沙一家纺织厂的罢工失败后,为了躲避迫害,逃到上海,被吸收进入保守派工会。另一位丝蚕女工领袖穆志英,也曾在2月罢工时警告工人们不要被外来党派所利用。见《申报》1925年2月24日。

国民党的一个机构,但实际上掌握在共产党的手中。⑤

统一战线在中共的严密控制中得到巩固,进而更加强了马克思主义组织者按照自己的政治意图领导工人运动的力量。这一结果很快就在上海纺织业中得到了验证。1925年2月的罢工刚刚结束,李立三就在沪西工友俱乐部召开上海纱厂工会联合办事处和各纱厂工会负责人联席会议,决定组建上海纱厂工会联合办事处委员会,项英为主任,刘华为副主任兼宣传主任。该组织领导了1925年5月爆发的、富有历史意义的罢工。5月15日,即新一轮罢工开始的次日,内外棉七厂的一名男工顾正红(2月罢工中俱乐部的一位积极分子)在工人与厂方的对峙中被日本大班枪杀。此次事件被共产党干部很好地利用起来,极大地激发起人们对工人烈士的同情。5月24日,刘华发起有数千工人参加的顾正红烈士追悼大会。⑥有位记者估计参加者达1万多人。他说:“我敢说,此次上海无产阶级大集会可以说是史无前例的。参加者十分之九是工人。”⑦5月30日,广大同情者——绝大部分是工人和大学生——联合举行大游行。一位亲身经历此次事件的邮政工人(也是一位党员)回忆道:

我们这支队伍一共有三十来个人,绝大多数是职工,有邮局的职工,有雕花工人,有铁厂工人、摇袜工人、红木工人和其他手工业工人,还有估衣店员和洋行职员,此外,就是中小学教员。其中多数是“大学”(共产党员)、“中学”(共青团员)和靠拢我们党的积极分子。也有一些是国民党员,但右派分子一个也没有来,还制造紧张空气,说什么“去不得”,“去了一定会出毛病,不要上共产党的当”。我们有好几个同志,一面咬着大饼,一面谈笑,大家在讥笑那些右派嘴上讲得漂亮,实际上进行破坏的无耻行为。每个人都作好了牺牲的准备,准备被捕关起来,可是绝未想到会有别的意外

发生。<sup>49</sup>

然而，出乎人们意料的事发生了，英国巡捕向示威者开枪射击，造成10人死亡，50人受伤——五卅运动就此爆发。<sup>\*</sup>

## 五卅运动——脆弱的联盟

“五卅”惨案为共产党人打开工运新局面、反击右派势力提供了一个绝妙的机会。5月31日，即南京路惨案发生的次日，上海总工会——作为全国总工会的分支——迅速宣告成立，李立三为委员长，刘华为副委员长，刘少奇为总务主任。在他们的领导下，上海总工会成立了10个办事处（后来增加到30个），担负起指导全市各行其是之各业工人的重任。

首先站到总工会旗号之下的是上海印刷总工会，它是在浙江旅沪工会（之所以叫这个名称，是因为上海的绝大多数印刷工人都来自浙江）的衍生机构上海印刷工人联合会的基础上成立的，该工会是两年前由来自杭州的共产党人帮助建立的。<sup>④</sup>其他各业工会接踵而至，不久，上海总工会即号称拥有117个工会、20多万工人。<sup>⑤</sup>当刘少奇在幕后默默无闻地处理各种繁琐事务时，李立三在台前扮演了一个风风火火的形象。李立三又高又胖，坐着汽车，在几名身强力壮的保镖的护卫下，穿行于全市各处。李立三的表现给许多人留下了深刻印象，其中有一位澡堂老板兼青帮头子要李立三做自己的徒弟。经过党的批准，李立

<sup>\*</sup> 此次事件中，当时及后来因伤而亡者共有13人，有9人为工人，其中有一位是广东籍厨工，其余8人均为江南籍。参见《五卅运动史料》，第1卷，第720～721页。

三——像他前面的李启汉一样，他也来自湖南——正式加入了青帮。<sup>82</sup>在共产党领导的工人运动中，帮会关系再次发挥了重大作用。当时一份英国警务处的报告称：“青红帮与工运鼓动者相联合……效忠于李立三。”<sup>83</sup>

至少在一定程度上，正是因为有了帮会方面的关系，上海总工会得以将五卅运动发展成为一场史无前例的罢工。<sup>84</sup>单是在上海一地，就有 200 多家企业、20 多万名工人参加了这场大罢工。<sup>85</sup>工厂里的拿摩温——绝大多数都是帮会分子——在支持总罢工上起着关键作用。到 7 月时，日本厂主用上利诱一法：只要男女工头每日在厂里转悠两小时，停止向工人发放补贴（绝大部分的罢工基金来自上海总商会的捐献），就给他们发全额工资。拿摩温们以当时罢工情形为借口，说如果日方不能压迫总工会就范，自己的生命就要受到威胁。<sup>86</sup>

帮会的支持在上海大规模罢工中是必不可少的条件，但这种支持并非唾手可得。沪西有位极有势力的穆斯林帮会分子在吃了总工会花钱请的两顿宴席后仍在不断制造麻烦。只是在不下 10 位共产党工运领袖同意与之拜把以后，他才安分下来。即便是“五卅”烈士顾正红（原籍苏北），也有一位在帮的亲戚惹是生非，背着总工会与日本厂主就赔偿的事情讨价还价。直到 40 来位总工会纠察队员在一个晚上冲入这位帮会分子的家中，将他从床上拽出，拖到总工会的一个办事处，狠狠揍了他一顿，此事才算了结。<sup>87</sup>

对共产党人的行动更为关注的是帮会控制的上海工人联合会。尽管这个保守组织的能量由于五卅运动的爆发而遭到削弱，但并没有消除。整个夏天，该联合会一直都在发布消息，内容尖酸刻薄，把总工会及其领袖说成是非法的，都是些暴发户，根本无法担当领导上海工运的重任。李立三尽管有着帮会身份，仍是

这次攻击的主要目标：“罢工开始的时候，李某乘一次黄包车已经是奢侈的享受了，可是现在他有汽车，两个老婆，好几个横行霸道的保镖。”总工会也毫不客气地加以回击：“工会是人民的组织，不是衙门……它能随便抓人吗？”<sup>9</sup>至8月22日，此种紧张关系演至极致。近100名歹徒手执刀棍，袭击了总工会的办公场所。危急时刻，李立三从后门逃出，但有8位工会干部被歹徒打伤。事情很快被证明，工人联合会是此次事件的主谋。<sup>9</sup>

帮会与右翼工会不是李立三及其总工会面临的惟一难题。“五卅”罢工期间，心怀不满的工人也在不断制造麻烦。作为坚持罢工的重要杠杆，罢工生活补贴的发放由总工会各下设办事处负责，对饥饿者而言，办事处不啻是一块磁石。办事处人员很快发现，不少工人重复排队，重复领取罢工补贴。为了加以控制，总工会要求工人从其包工头或拿摩温那里开出证明，凭证发放一周补贴。此种方法对于那些有比较固定的职业、在有同情心的工头手下工作的人来说，当然不成问题，但对于那些打零工的人（如“野鸡”码头工人）来说就不那么简单了。当罢工进行之时，心怀不满的码头工人开始对总工会及其经费支持者采取暴力行动。8月12日，大约2000名码头装卸工人冲进上海总商会，抗议商会拖欠罢工经费。当时商会正在办宴席，抗议者将酒饭嚼食一空，又将杯盘桌椅摔坏砸烂。随后又有乞丐和上海下层社会的其他各色分子卷入进来，这群人又一窝蜂地袭击了上海总工会。<sup>10</sup>

即便是普通的纱厂工人——尽管他们被称为典型的无产阶级革命者——也并不总是与共产主义鼓动者保持一致。有位工人就曾这样回忆五卅运动：

有些学生来到我们厂里，我们不知道他们是共产党。我们知道的只是他们是来帮助我们工人的。他们要我们起来

罢工,并允诺在罢工期间会付给我们足够的生活费。对此我们很高兴,就开始罢工。每隔两个星期,我们就可以领到我们的生活费……我曾被警察逮捕关押过一段时间。当时人们都很迷信,认为我出狱后会交坏运道。所以,我去洗澡、剃头,然后焚香驱邪。<sup>61</sup>

在来自帮会和心怀不满的、或是不受约束的工人的压力下,总工会决定平息事态。经与日本总领事谈判,日方同意给予烈士顾正红家以抚恤,保证改善日商工厂的工作条件。尽管日方的让步没有什么价值,但总工会还是决定结束罢工。至8月下旬,即距罢工开始约三个月以后,这场历史性罢工终于宣告结束。

五卅运动规模之大,持续时间之久,充分显示了这一时期共产主义运动的力量,虽然激进分子的行动并非一帆风顺。当然也有人不同意这样看,有人就曾这样说:

84

五卅运动使得好战的共产党人和当地雇主及国民党右翼培养的团体之间在上海无产者中开展了数年的争取主动、扩大影响的激烈斗争宣告结束……在这些群众斗争中,整个工人阶级站在总工会一边,后者一直控制着上海无产者的经济政治斗争,直到1927年4月。<sup>62</sup>

五卅运动并不是共产党单方面取得的完全胜利,将它归为一个结构松散而脆弱的联盟的产物可能更为贴切。在一定程度上,共产党人可以和帮会及其他有势力的代理人一起在工人阶级中开展共同的事业,他们可以发起一场强有力的、具有深远政

治影响的抗议运动。\*这种联合使他们在五卅运动中得益匪浅，并且在后来的三次工人武装起义中也再次发挥作用，但其内部的紧张关系也确实存在，就像1927年四一二政变所暴露出来的那样。

同时，上海总工会还受到来自军阀方面的高压。10月，总工会所在地被查封，11月，工人领袖刘华被逮捕。1925年12月17日，这位出身印刷工人的上海总工会副委员长被秘密杀害。<sup>⑥</sup>另一位来自商务印书馆的印刷工人被选为总工会负责人，后于1926年4月被捕。<sup>⑦</sup>

### 三次武装起义

尽管遭受了如许挫折，上海激进的工人运动不久便被来自远方的政治势力所挽救。当蒋介石领导的北伐军取得了一系列军事胜利之时，孙传芳军阀政权的地位开始倾斜。在国民党胜利形势的激励下，共产党工人领袖开始振奋精神，动员上海工人阶级。尽管还处在秘密状态，上海总工会——与江浙中共党组织步调一致——开始领导民众反对孙传芳政权。在1926年一次流产的起义之后，周恩来被派到上海，直接领导上海工人斗争。1927

\* 该联盟留存下来的一个小型组织是“打狗队”，由商务印书馆一名加入共产党的印刷工人、两位其他行业的工人及一位红帮大哥领导。这支武装队伍专门严惩工贼和其他反对激进工人运动的人。据它的一位领导人回忆，该组织一直很活跃，延续至1936年。见徐梅坤：《忆起义前后》，载《上海工运史料》1987年第2期，第1页。1933年，英国警务处的报告说，上海共产党的“打狗队”用斧头铁棍来对付他的对手，在工厂里挑起事端，旨在全城发动总罢工。见上海工部局警务处档案，存美国国家档案馆（华盛顿特区），案卷号：D-2554/36。



85 年2月，紧接在一次卷入35万名工人的大罢工之后，第二次武装起义爆发。部分的原因是因为未能将工人罢工与起义结合起来，但最主要的还是由于孙传芳的镇压，这次起义仍归于失败。陈独秀反对继续组织起义，他在向党中央提交的一份报告中指出，用“组织时代代替罢工时代”。周恩来则赞成作第三次尝试。3月21日，上海总工会发动总同盟罢工（估计全市有8万工人参加罢工），随即罢工转为起义，工人起义军最终驱逐了军阀队伍，迎接北伐军进入上海。<sup>⑥</sup>

在第三次武装起义成功进行之时，商务印书馆的工人在战斗中起了主导作用。此种行动主义反映了这些在上海最大出版行业工作的、受过教育的江南工匠的激进倾向。早在五卅运动时期，商务印书馆的雇员中就有大约170名共产党员，主要集中在编译所。<sup>⑦</sup>其中著名人物如陈云（后来成为人民共和国的经济主管）和左翼作家茅盾，此时在商务印书馆成立工会和发动罢工中表现积极。<sup>⑧</sup>到1926年10月，商务印书馆的共产党员和共青团员增至约400人，约占该馆雇员的10%。站在第三次武装起义最前线的大约100多名纠察队员都来自商务印书馆。全市工人纠察队的队部即设在商务印书馆的俱乐部内。<sup>⑨</sup>该馆工人的战斗性无疑与他们的文化背景和世界观有关。正如有位老工人回忆的那样：“我们商务印书馆是个教育程度高的地方，我们当中有不少知识分子，其中很多人能说英语……我们的有些同志与外国人联系，而另外一些人则组织纠察队。”<sup>⑩</sup>

在规模和能量上仅次于商务印书馆纠察队的是上海邮政局纠察队，这是另一个集中了受过较好教育、待遇较高的工人的部门。此处的激进主义传统也是根深蒂固。一位前邮政纠察队负责人回忆道：“我曾参加过辛亥革命，懂得一些军事知识。看到其他工人没什么作战经验，我就教他们列队。”<sup>⑪</sup>



机械工人也为这次成功的起义做出了很大贡献。杨培生便是其中的一个典型。杨是一位很有技术的铜匠，他出生于上海市郊川沙的一个乡绅家庭，他在1914年进入祥生铁厂之前曾在上海铁工厂做过多年学徒。五年后，五四运动爆发，他协助建立机匠工会。杨培生尽管政治上很激进，但由于技术过硬，在1921年 86  
被提拔为装配车间的监工。工人们都称他“杨师傅”。他于1923年加入宁波同乡会，两年后加入共产党。1927年2月，穿着中式上装、戴着缎帽，一副名流打扮的杨培生主持了上海金属总工会的成立大会。在接下来的一个月里，他主要依靠金属工人的支持，负责领导浦东地区的工人纠察队。随着第三次武装起义的胜利，杨培生被选为上海总工会副委员长。次月他又当选为委员长。<sup>②</sup>

和印刷工人一样，邮政工人和机器工人也对第三次武装起义的成功做出了重大贡献，因为总罢工需要各行业广大工人的参加。事实再次表明，共产党在团结整个工人阶级的过程中，帮会的合作是一个重要因素。第一次武装起义前夕，汪寿华（当时的上海总工会委员长）从上海商界首领虞洽卿那里得知，“法界华捕‘麻皮金荣’（即青帮大亨黄金荣）与其他主要帮会头目之间的谈判已经完成，他们都很愿意合作。”就在第三次武装起义爆发前两天，中共上海区党委召开了一次秘密会议，汪寿华向周恩来报告说：“（帮会大亨和鸦片大王）杜月笙请求我们予以帮助……他要求我们不要提出鸦片问题。同时，他希望将所有青红帮重新组织起来，交由我们指挥。”<sup>③</sup>黄金荣和杜月笙提供了有效的帮助；中共方面可靠的资料证实，帮会向中共支持的工会提供资金，为释放被关押的工人奔走活动，传递军阀当局行动的消息，为在租界外面活动的中共干部提供保护。<sup>④</sup>

共产党人能够领导这次暴动，在两天之内控制了这座全国



最大的城市，部分地要感谢来自帮会方面的这种帮助，至3月22日，5000名工人纠察队员——其中数百人是有武装的——占领了警察局、铁路局、江南制造局，以及法院和监狱。在很多情况下，军阀部队只是弃械逃跑，但在闸北区发生了激烈战斗，约有200名工人牺牲。一个星期后，新的市政府成立，其成员包括共产党、国民党、青帮及商界人物。<sup>87</sup>正如五卅运动时期的排外主义将激进派和保守派溶入一个强有力的合作关系（尽管还存在冲突、派别）一样，北伐时期的反军阀主义又将这些原本互相对立的派别重新组合起来。政治危机——无论是由国家存亡的因素引起，还是由要求国家统一而引起——有助于使陌生的同盟者走到一起。\*

所以，对年轻的中国共产党来说，从五卅运动到北伐的“激进主义的”全盛期，他们并没有取得绝对胜利。虽说工人阶级中的世界主义已经萌生，但他们仍然采取传统的团结方式。只有通过艰苦的工作——往往要取得他们不喜欢的中间人的同意——共产党人才能将工人的战斗性纳入到自己的轨道中来。尽管可以用革命的阶级斗争之类的言辞来标榜，但要将工人组织起来，就必须依靠“封建”组织的协助。虽然行会之类组织在共产党的工作中提供了最初和最可靠的帮助，但是大规模地发动工人还必须依靠国民党和帮会的合作。这个时期，中共取得的成功令人激动，但他的每一步胜利都离不开一些臭名昭著且朝三暮四的

---

\*当然，三次武装起义时期，排外倾向并未消失。一个纱厂工人在回忆中曾提到了一件排外逸闻：第三次武装起义时他和工友们抓获了一名留胡子的年轻人，把他当成是日本人。在遭到一顿痛打之后，这位被抓者最终被证明是个中国人，工人们斥问道：“既然你真的是中国人，你就不该学日本人的样子留胡子。”这位倒霉蛋回答说：“实际上，我是模仿孙中山的样子。”参见“吴顺林访谈录”，1958年5月5日，上海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工人运动档案。

盟友的参与。这种联合是多么的不可靠，以至第三次武装起义胜利后不过数星期，悲剧便出现了。\*后来的事实证明，帮会大亨黄金荣和杜月笙找到了一个更可靠的为其违法的鸦片买卖撑腰的支持者。

#### 注 释

① 关于这一事件的经典研究，仍然要推周策纵 (Chow Tse-tung): *The May Fourth Movement* (Cambridge, Mass., 1960).

② Joseph Chen, *The May Fourth Movement in Shanghai* (Leiden, 1971).

③ 《五四爱国运动资料》，北京，1979年，第461页、第463~464页、第466页、第475~476页、第487页、第514页；《五四运动在上海史料选辑》，北京，1980年，第328页、第356~357页；《新闻报》1919年6月7日。

④ 《申报》1919年6月9日；《新闻报》1919年7月11日。

⑤ 《五四爱国运动资料》，第494页。

⑥ 同上，第496页、第514~515页、第531页。

⑦ 《五四运动在上海史料选辑》，第372页。

⑧ 《时事新报》1919年6月11日。

⑨ 同上，1919年6月13日。

⑩ 李立三：《中国职工运动概论》，1919年，转引自王建初、孙茂生：《中国工人运动史》，沈阳，1987年，第53页。

⑪ James E. Cronin, "Labor Insurgency and Class Formation," *Social Science History* 4 (1980): 126.

⑫ 见《民国日报》1919年10月12日，其中的讨论将欧洲和中国的工人斗争的潜在原因归于战时通货膨胀。

⑬ 《时报》1919年10月20日、21日。

⑭ 《新闻报》1920年1月3—4日、6日、10日、19日。

\* 1927年4月，总工会委员长汪寿华被杜月笙派人暗杀一事表明，帮会会随时背叛其盟友。



⑮ 参见 Arif Dirlik, *The Origins of Chinese Communism* (New York, 1989), 其中, 讨论了关于五四运动对于知识分子和工人之重要联合的决定性作用。

⑯ 调查报告发表在《新青年》第7期(1920年5月), 第1143~1245页。关于马克思主义研究会, 参见《上海共产主义小组》, 上海, 1988年, 第6~12页。

⑰ 《上海共产主义小组》, 上海, 1988年, 第101页; Dirlik, *The Origins of Chinese Communism*, p. 101. 关于浙江旅沪学会参加五四运动的情况, 可参见《五四爱国运动资料》, 第459~460页。

⑱ 邵维正:《建党前后的上海工人运动》, 载《党史资料》1983年第3期, 第76~80页。俞秀松, 一位马克思主义研究会的成员, 也来自浙江——在1920年4月的一封信里说, 他刚离开北京来到上海, 在一家机器厂干活。见俞秀松信函, 1920年4月4日, 存上海中共一大纪念馆档案室。

⑲ 《劳动界》第9期和第19期;《上海机器工会开发起会纪略》, 转引自《中国工人运动史参考资料》, 北京, 1980年, 第1卷, 第43~47页; 该宣言还宣称摆脱资本家、政客或同乡会的控制, 因而不同于传统的公所组织。

⑳ 陈独秀:《上海社会》, 载《新青年》第8卷第1~4期(1920年), 转引自《上海共产主义小组》, 第67~71页。

㉑ 《中共中央关于工人运动文件选编》(上), 北京, 1985年, 第1页。

㉒ 《包惠僧回忆录》, 北京, 1983年, 第67页。

㉓ 同上; 包惠僧:《二七回忆录》, 载《二七大罢工资料选编》, 北京, 1983年, 第605~623页; Chang Kuo-t' ao, *The Rise of the Chinese Communist Party* (Lawrence, Kan., 1971); 蔡少卿, *Secret Societies and Labor Organizations in the Early History of the Chinese Communist Party, in Working Papers in Asian/Pacific Studies* (Durham, N. C., 1986), p. 11.

㉔ 姜沛南等:《上海招牌工会的兴旺》, 载《近代史研究》, 1986年第6期, 第46~47页。其中对这类工会中比较重要的几个进行了叙述。

㉕ 《民国日报》1919年6月16日、30日, 7月7日、14日, 8月4日、11日、18日, 9月8日、29日。

㉖ 同上, 1919年9月15日;《申报》1919年10月16日。

⑳《民国日报》1919年8月5日、8日、21日、9月16日；马超俊：《中国劳工运动史》，台北，1959年，第1卷，第139页。

㉑《新闻报》1920年3月6日、4月3日；马超俊：《中国劳工运动史》第1卷，第139页。

㉒《新闻报》1920年4月5日。

㉓史兵：《中国工人运动史话》，北京，1985年，第1册，第68页。

㉔陈卫民：《1921年上海罢工运动的兴起》，《史林》1986年第1~2期合刊，第126~135页；Jean Chesneaux, *The Chinese Labor Movement, 1919—1927* (Stanford, Calif., 1968), chap. 8.

㉕《民国日报》1922年10—11月。

㉖邓中夏：《中国职工运动简史》，北京，1949年，第136页。

㉗苏启明（音）：《北伐期间工运之研究》，政治大学硕士论文，台北，1984年，第94~100页；Jean Chesneaux, *The Chinese Labor Movement, 1919—1927*, p. 225.

㉘“上海市党员调查表”，党史文献馆，台北，案卷号：435/218, 435/232。

㉙王家贵、蔡锡瑶编：《上海大学》，上海，1986年，第16页。

㉚同上，第1~20页。

㉛同上，第20~22页。

㉜《刘华》，载《上海英烈传》，上海，1987年，第45~70页；《陶静轩烈士》，载《上海党史资料通讯》1985年第5期，第39~41页。

㉝《民国日报》1925年2月6日、12日；任建树、张铨：《五卅运动简史》，上海，1985年，第37~40页。

㉞刘贯之：《关于1924—1925年上海工人运动的回忆》，《中国工运史料》1960年第1期，第34~82页。

㉟Emily Honig, *Sisters and Strangers: Women in the Shanghai Cotton Mills, 1911—1949* (Stanford, Calif., 1986), p. 98.

㊱陈卫民：《中国共产党建立初期的上海工人运动》，《史林》第4卷第11期（1988年），第78页。

㊲苏启明：《北伐期间工运之研究》，第94页；Jean Chesneaux, *The*

*Chinese Labor Movement, 1919—1927*, pp. 223 ~ 227, 252.

④《中共中央关于工人运动文件选编》(上),北京,1985年,第48~49页,54页。

⑤《中国历次全国劳动大会文献》,北京,1957年,第8~35页。

⑥王家贵、蔡锡瑶:《上海大学》,第31~36页,第54页。

⑦《民国日报》1925年5月26日。

⑧沈孟先:《关于五卅反帝宣传示威的回忆》,载《五卅运动史料》,上海,1981年,第1卷,第663页。

⑨朱邦兴等:《上海产业与上海职工》,上海,1984年,第543页;《上海工人运动历史大事记》,上海,1979年,第1册,第78~79页。

⑩《民国日报》1925年8月6日、7日。

⑪姜维新:《从二月罢工到五卅运动》,《文史资料选辑》1980年第3辑,第48~49页;张维桢:《张维桢同志谈上海五卅运动》,《党史研究资料》(四川),1982年第1期,第304~312页。李立三与帮会打交道的情况可以追溯到1922年安源煤矿工人罢工的时候,当时他与洪帮建立了密切联系。参见 Cai Shaoqing, "Secret Societies," p. 11 ~ 13.

⑫ *Politics Daily Report*, Aug. 3, 1925, Shanghai Municipal Archives, no. 1-1-1147.

⑬五卅运动时李立三依靠青帮力量的情况,可参见朱学范:《上海工人运动与帮会二三事》,载《旧上海的帮会》,上海,1986年,第1页。

⑭《五卅运动史料》,上海,1986年,第2卷,第70页。

⑮ *Politics Daily Report*, July-August 1925.

⑯张维桢:《1928年以前上海工运的一些情况》,载《革命史资料》1980年第1期,第47页;张维桢:《张维桢同志……》,第304~312页; *Politics Daily Report*, July 9, 1925.

⑰ *Politics Daily Report*, July 16, 28, 1925; 《民国日报》1925年9月1日。

⑱ *Politics Daily Report*, Aug. 23, 25, 1925; 刘贯之:《关于1924—1925年……》,第71页。

⑲ *Politics Daily Report*, July 29, Aug. 12, 13, 1925; 《上海罢工的真相及

其影响》，载《现代评论》第2卷第35期（1925年），第7页。

⑥① “朱连科访谈录”，1958年5月6日，上海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工人运动档案。

⑥② Jean Chesneaux, *Chinese Labor Movement*, p. 282.

⑥③ 王建初、孙茂生：《中国工人运动史》，第124页。

⑥④ Jean Chesneaux, *Chinese Labor Movement*, p. 284.

⑥⑤ 《上海工人三次武装起义研究》，上海，1987年，第61~72页；《上海工人第三次武装起义的组织领导结构概况》，《文史资料》1985年第3期，第73~76页；黄逸峰：《上海工人第三次武装起义的前前后后》，《文史资料选辑》1978年第1期，第1~5页；王建初、孙茂生：《中国工人运动史》，第136~137页。

⑥⑥ “徐洪生（音）访谈录”，1957年4月27日；“蒋仲林（音）访谈录”，1957年5月2日，上海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工人运动档案。

⑥⑦ 马超俊等：《中国劳工运动史》第2卷，第622页。

⑥⑧ 任其祥等：《追记商务纠察队的斗争》，《上海工运史料》1987年第2期，第10页；马超俊等：《中国劳工运动史》第2卷，第643~645页。

⑥⑨ “谢青斋（音）访谈录”，1925年2月25日，上海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工人运动档案。

⑦⑩ 《上海邮政职工运动史料》，上海，1986年，第1卷，第56页。

⑦⑪ 《杨培生烈士小传》，《上海工运史料》1984年第2期，第34~37页；黄河之：《杨培生》，载《上海英烈传》，上海，1987年，第21~34页。

⑦⑫ 《上海工人三次武装起义研究》，上海，1987年，第156~157页、209页。

⑦⑬ 上海市档案局编：《上海工人三次武装起义》，上海，1983年，第220页、262页、273页。当然并非所有的帮会分子都像黄和杜那样采取合作态度。有报道说，在三次武装起义期间，有些帮会成员为外国资本家所雇用，另一些人则装扮成总工会的纠察队，暗中劫掠，破坏总工会的名声。参见《一九二七年的上海商业联合会》，上海，1983年。

⑦⑭ Jean Chesneaux, *Chinese Labor Movement*, chap. 14.

## 第五章 保守主义时期,1927—1937 年

掀起 20 世纪 20 年代中期戏剧性罢工浪潮的联盟被蒋介石发动的四一二政变击得粉碎。这一重要转折点——使共产主义工人运动遭到沉重打击,迫使激进派逃离该市,转入乡村达二十年之久——就是上海帮会成就其事的。<sup>①</sup>它导致党派政治结构在工人运动中发生了显著变化。为了感谢帮会头子在关键时刻帮的忙,新执政的国民政府用政府位子和津贴予以回报。由此形成了一种保护与被保护的关系,鸦片大王们从中充当了工人阶级与高层政客之间的中间人,成为国民党统治下劳工关系的标记。

### 帮会与蒋介石的崛起

帮会作为社会力量与政府资源的承载者的作用,可以追溯到国民党政治结构的最顶层。也许,就像广泛流传的那样,蒋介石本人就曾加入过青帮,他拜的师傅是同盟会会员陈其美。<sup>②</sup>无论如何,早在 20 世纪 20 年代初,蒋介石就曾效力于上海滩上的



帮会大亨黄金荣。<sup>\*</sup>当蒋介石作为北伐军总司令于1927年3月26日返回这座城市时，最先赶来迎接他的就是老朋友“麻皮金荣”。<sup>③</sup> 89

尽管长期的私人关系在蒋介石处理帮会问题时成为一个关键因素，但他对黄金荣这类人物的依赖决不仅仅是朋友这层关系促成的。即便是共产党组织者也曾被承认，这些色彩斑斓的地方头面人物是20世纪前期上海社会的实际统治者。得不到他们的支持，就无法击败激进的或保守的党派。

虽说国民政府的青睐会给帮会中人带来前所未有的机会，但帮会涉足权力机构并非是件新鲜事。黄金荣这位上海青帮的“老头子”，1900年就来到上海。在做了几年帮会喽罗之后，他进入法租界巡捕房，当上一名便衣侦探。上海法租界巡捕房的工作需要与黑社会有一定关系，黄金荣与各色流氓均有一腿。几年后，他真正发迹的日子来了。当时一位法国主教在华北旅行时遭到绑架，黄金荣成功地将他解救出来。该主教不但同法国驻上海领事有深交，而且与法捕房总巡关系密切。黄得到的回报是当上了法捕房督察长。提升到这个强有力的位子使黄金荣这位帮会老大在上海黑社会中牢牢站稳了脚跟；在全市人口中，有多达2万人（包括蒋介石）投到他的门下。<sup>④</sup>

在那些拜黄金荣为老头子的人中，有一位就是杜月笙。杜出生在浦东的一个贫困家庭，早年成为孤儿，他先在自己叔父开的水果摊（位于上海老城的码头边）帮忙做了几年。这个孩子喜欢

<sup>\*</sup> 蒋介石是由商界头面人物虞洽卿向黄金荣引见的，后来蒋又曾求救于黄、虞二人——当他和陈果夫（陈其美的侄子）在上海交易所做投机生意失败、经济上陷于窘境时，黄、虞给的一笔钱使蒋介石得以于1921年离开上海，前往广州，并投身孙中山的革命事业。见程锡文：《我当黄金荣管家的见闻》，载《旧上海的帮会》，上海，1986年，第157页。



做的坏事之一便是将烂水果扔到坐在人力车上或穿着体面的人身上。他叔父对他讨厌至极，最终由于他偷钱去赌博，他叔父将他赶出家门。丢掉饭碗后，杜月笙结识了闻人黄金荣。黄的情妇——一位做过老鸨的女人——很快喜欢上了这位“水果月笙”（这是当时人们对他的称呼），让他在黄金荣的罪恶王国中找到了饭碗。就像此前秘密社会的头目一样，杜很快从上海有利可图的鸦片生意中名利双收。开头他在一个广东人在虹口开的鸦片窝子当帮手，不久便被派到法租界去经营黄金荣手下的一个大鸦片馆。杜月笙青出于蓝而胜于蓝，很快就设法将黄金荣在法租界的关系发展到极致。在他师傅的准许下，杜月笙开办了“三鑫公司”，按月向法租界各鸦片行收费，作为回报，鸦片商人可以公开销售鸦片，不受捕房干涉。法租界当局由于可以按月捞足油水，也就睁一眼闭一眼。<sup>⑤</sup>

很快，杜月笙的野心开始膨胀，他已不满足于将生意限在法租界之内。为了做大鸦片买卖，他与另一位帮会头子兼鸦片大王张啸林搭上了关系。张与上海警备司令（即淞沪护军使何丰林——译者注）关系密切，使他得以控制长江和黄浦江交汇处一带关键地区的鸦片贸易。1920年，张啸林正式同意与杜月笙和黄金荣合作。此后，张便依靠警备司令部将鸦片顺江运往上海老城码头。在那里，由杜的手下将货物运往法租界，由于黄与法捕房的关系，这种可赚大钱的货便可堂而皇之地销售了。黄、杜、张三人之间的密切关系——以结拜盟誓为基础——在1924年得到了进一步的巩固，当时，黄将自己在法租界拥有的部分地皮赠送给两位得力弟兄，让他们毗邻修建了两处洋房。<sup>⑥</sup>

蒋介石北伐军的矛头直指长江下游，有可能破坏那里的鸦片贸易。因此，并不是革命精神或是私人关系促使上海鸦片三巨头于1927年春向那位总司令靠拢的。维持其赚钱买卖的现状是

他们首先要考虑的。蒋介石当然也愿意制订出一个双赢计划以得到这些有势力的帮会大亨的支持。

1927年3月下旬，蒋介石的亲信陈群、杨虎和王柏龄——三人都与黑社会有关系——被派到上海，与各帮会首领取得联系。在上海，他们秘密会见了鸦片三巨头黄金荣、杜月笙和张啸林，制订出不久即将付诸实施的反共计划。<sup>⑦</sup>他们共同发起成立“共进会”，旨在反对该市的激进派力量。<sup>\*</sup>4月3日，英国警务处一则可信赖的报告称：“张啸林和其他人正在重新组织共进会，会员主要是青帮中人。目的是为了反对上海总工会和工人中的激进势力。此举是为了全力以赴地支持蒋介石。”4月5日，即蒋发动政变前的一个星期，警务处又预言即将发生的事情：“共进会正在准备突袭上海总工会，解除其人员武装。此次突袭任务主要由青帮分子担当，并由便衣军警协助进行”。<sup>⑧</sup>

\*“共进会”的名目渊源有自。1911年辛亥革命后，老同盟会员、青帮后台陈其美当上沪军都督，成立名为“共进会”的革命团体（参见本书第二章）。蒋介石是陈其美的狂热追随者，1906年他俩在日本初次相遇，1911—1912年间，陈其美当沪军都督时，蒋在他手下当团长。即便是在1916年陈其美遭袁世凯派人暗杀后，蒋仍然与陈家关系密切。后来陈其美两个侄子陈果夫和陈立夫的高升，便是蒋、陈两家关系的产物。蒋介石为发动四月政变而复兴共进会不久，陈氏兄弟即集合国民党内的保守势力，组成强有力的“CC系”。见樊崧甫：《上海帮会的内幕》，载《文史资料选辑》1980年第3期，第155页；胡绳武：《民初会党问题》，载《会党史研究》，上海，1987年，第227～230页；Hung-Mao Tien, *Government and Politics in Kuomintang China, 1927—1937* (Stanford, Calif., 1972), pp. 47～57. 辛亥革命时期，共进会组织在中国其他地方也很活跃。湖北的情形可参见 Joseph W. Esherick, *Reform and Revolution: The 1911 Revolution in Hunan and Hubei* (Berkeley, Calif., 1976), pp. 153～158, 229～231. 1920年，上海一个以帮会为基础的共进党吸纳了许多纱厂工人（参见本书第三章）。



英国警务处的先知先觉并不说明他们的情报工作如何得力。实际上,租界当局本身就直接卷入了反共行动之中。公共租界和法租界官员曾秘密与杜月笙约见,杜表示可负打击赤色分子之责,但有两个条件:第一,法租界至少提供 5000 支步枪和足够的弹药;第二,公共租界必须允许杜的武装车队通过。两个条件都得到了租界当局的回应,后者急切想清除激进派在本国所属工厂中的影响。<sup>92</sup>

4月11日晚,即致命性的攻击开始前数小时,上海鸦片三大亨与蒋介石的亲信杨虎、陈群及王柏龄在“刘关张桃园结义”图前祭天告地,喝酒结义。<sup>93</sup>4月12日凌晨2时,攻击开始。隐藏在租界里的数百名暴徒手握枪械,臂缠“工”字符号袖章,冒充工人,杀奔华界,分头强占上海总工会下属各工人纠察队据点。战斗很快结束,共进会在北伐军的支持下,很快占领各据点和总工会办事处。虽然次日即有 20 万名工人举行罢工,抗议镇压,但他们已经无法抵挡帮会与军队的联合进攻。在此次血腥事件中,有数百名工人和工运组织者献出了他们的生命。<sup>94</sup>

## 国民政府时期——工人组织由盛而衰

在粉碎共产党控制的上海总工会后,蒋介石的手下人立即将他们自己的组织框架放置于上海工人运动之中。<sup>95</sup>按照传统的合作主义的说法,其目的是要建立一个在政府指导下的、驯服的工会网络。<sup>96</sup>4月13日,杨虎、陈群主持成立“工会组织统一委员会”,该组织实为共进会改头换面而成,帮会分子充斥其中,很快,其残忍的名声便传播开来,上海工人痛斥杨虎、陈群为“狼虎成群”,视为吃人的野兽——杨虎、陈群把持的“工统会”为了把

握上海工人运动的发展方向，下面设有“护工队”，直接镇压罢工，迫害进步的工人。共产党员以及被怀疑为同情左派的人都会被关押、枪毙。<sup>⑧</sup>

“工统会”的残酷镇压引起了一些工人组织的公开反抗。其中最有声势的是金银业工会领导的斗争，该工会是一个由技术工匠组成的左倾组织。<sup>⑨</sup>然而，事实很快证明，在这种镇压工人的高压政策下，工人的反抗根本无法奏效。

对于工统会的残酷手段，连国民党中的一些人都感到厌恶。由于对工统会与工人之间的距离越来越大感到不满，国民党上海市党部农工部部长周志远指令他的一个得力干事暗中重新开展组织工会的活动。但是，这位干事的行踪很快被工统会察觉并被拷打致死。11月中旬，在周志远及国民党劳动部部长马超俊的促成下，上海各工会代表120多人成立了“上海工人总会”，以反击工统会的势力。作为国民党上海市党部支持下的“上海工人总会”，为了与军队控制下的工统会抗衡，力争该市各工会的忠诚。<sup>⑩</sup> 93

这个时期工统会与上海工人总会之间的摩擦乃是后来国民党内部无数纷争的开端，并最终削弱了国民政府的统治能力。两个各有依恃的组织在经过半年的互相残杀后，国民党中央于1928年春加以干涉，命令两者妥协，组成新的“上海工会整理委员会”（简称“工整会”）。<sup>⑪</sup>

工整会开始按照国民党中央的有关条例着手调查、整顿并登记全市各工会，但很快遇到困难。最大的问题是，在工整会9名领导成员中，互相歧见甚深。其中只有一人——来自商务印书馆——算是工人出身，但他在就职后不久被暗杀，据说是中共地下党所为。<sup>⑫</sup>其他8名成员来自不同的部门派系，包括国民党上海市党部、公安局、农工商局和淞沪卫戍司令部。各委员更多地



将自己视为各自部门的代表,而非工人利益的代言人,互相之间勾心斗角。由国民党中央在1928年夏进行的一次秘密调查表明,工整会对于被指派的工会工作任务,无寸功可言,由于它的失职放纵,共产党工人运动得以复活。<sup>94</sup>当年10月,成立仅6个月的工整会被南京政府解散。此后,上海工人运动纳入国民党上海市党部民众训练委员会和新成立的上海市政府社会局的工作范围之内。<sup>95</sup>

在此后数年,国民党劳工部门制定、颁布了一系列关于工人问题的法律法规,内容包括从工厂监督到解决罢工问题,十分全面。这些法规,虽然目的仍是宣扬劳资合作那一套,但表达了国民政府更积极地解决工人问题的立场。<sup>96</sup>这些新颁布的法律法规取代了原本作为主要统治手段的高压政策。但是无论新任命的许多主管劳工问题的官员怀有如何良好的愿望,该市复杂的行政结构注定了绝大多数改革措施都将归于失败。上海的工厂主要集中在公共租界,所以,任何把中国法律延伸进去的试图都将激怒外国当局。正如《工部局公报》(公共租界工部局之喉舌)在1928年冬天所抱怨的:

上海市政府社会局继续插手公共租界和法租界里的劳工纠纷,其无礼举动在本月更是明显……此项插手租界当局所管辖事物的政策显然与社会局和国民党上海市党部民众训练委员会联合颁布的一项命令有关,该命令要求所有劳工纠纷都由社会局调解处理。

数月后,《公报》又抱怨道:社会局意欲对公共租界里的所有工会加以登记,“又在图谋侵犯临时法院(Provisional Court, 1925年成立,即此前的会审公廨——译者注)的司法权,并试图通过政治途径加以解决。”<sup>97</sup>外国当局的抵制对中国新政府而言无疑是一种警告。1930年,社会局局长潘公展称,仅有157个工会在社会

局登记。尽管这个数字确实表明了政府对工人组织问题的兴趣，但它与抗战前活跃在上海的 500 多个工会的总数字距离甚远。潘抱怨道，他的社会局在行使有关劳工问题的职权时面临两个棘手的问题，首先是外国飞地——公共租界和法租界——的依然存在，外国居民（背后有外国势力）都由他们自己的工部局、法院、巡捕房和各类公共事务部门管辖，要进行工会登记以及行使调节劳资纠纷的职能，就需要外国当局的合作，但很少得到回应。社会局第二个难以有效开展工作的难题是“那些为自身目的煽动劳工闹事的人”。<sup>95</sup>无疑，潘在此处部分地指的是残余的中共地下党组织者试图复活其激进的工人运动。但他也有可能暗指国民党内某些人的所作所为。

国民党内意见分歧的一方是左派，尽管他们的势力在 1927 年 4 月政变时遭到严重削弱，但他们在其后数年仍然在民众动员中发挥着重要作用。<sup>96</sup>在汪精卫改组派的领导下，国民党左派成立了一个上海工人运动委员会，鼓励工人罢工，争取提高工资，并反对蒋介石南京政权的腐败。由于有数位著名的无政府主义者的积极参与，工人运动委员会发动工人进行了一系列流产的反蒋政治活动。<sup>97</sup>令南京政权苦恼不已的改组派的捣乱，在 1931 年末汪精卫当选为行政院长后很快宣告结束。

国民党内另一个持续很久的分歧来源就是协助蒋在四一二政变中登上权利顶峰的青帮。将手段残酷的工统会解散，给新的国民党统治下的以帮会势力为主的工人运动划上了句号。然而，帮会不久即以另一种形式——更巧妙并取得成功——插手工运。



## 帮会的插手

眼看着工统会陷于失败，其继任者、野心勃勃的青帮大亨杜月笙决定亲自出马做组织上海工人的工作。他把在非技术性工人中开展工作作为起点，因为绝大多数非技术性工人都在帮会把头的掌握之中。例如在码头，许许多多的包工头都曾向鸦片三大亨的这位或那位投过帖子。<sup>96</sup>杜月笙充分利用了此种关系，成功地将其势力打入上海数个轮船公司。<sup>97</sup>但是要把劳动者变为听话的雇员，仅限于与其监工把头有着师徒关系是不够的，还必须好好关心工人本身的利益。而要打进有着长期权利主义盘踞传统的非技术性行业亦非易事，码头上的把头们坚决反对任何要他们减轻对工人的盘剥的建议，甚至不惜用武力反对政府的改革措施。<sup>98</sup>如果杜月笙要争取上海工人，他就必须寻找到更进步的盟友。

中共方面的工人领导者一直在保持沉默，当时在为上海工人奔走呼号的是一批“七大工会”的领导人。这七大工会包括商务印书馆印刷厂工会、邮务工会、英美烟厂工会、南洋烟厂工会、报业工会和华商电气公司工会。所有这七大工会都在上海工人三次武装起义中发挥过骨干作用。在其中的几个工会中，隐蔽的共产党员一直在积极活动。<sup>99</sup>1928年，在改组派左派的鼓动下，七大工会“代表富有革命性之全国劳工”，发表“请中央勿停民运宣言”，反对南京政府逐渐停止对工人运动的支持。至次年，当无法指望国民党中央对工运的政策能有所改进时，泄气的改革派工会领导人只能退而求其次，即主张实行工联主义。<sup>100</sup>

在主张工联主义的人当中，上海邮局的陆京士和朱学范最



先投靠杜月笙。杜月笙对邮局职工投入他的门下，认为是一件有面子的事，因为邮局是中国政府办的，局长是外国人，邮局职工在社会上有相当地位。杜月笙也正好借此机会涉足这些有影响的工会之中。<sup>④</sup>在上海邮局职工中，有40%的人都受过较高的教育，很久以来就是各政党关注的一个行业。1925年五卅运动前夕，在上海邮局成立了第一个中共支部，包括7名党员，其中6人曾是当过教师的职工，只有一人是普通工人出身——尽管邮政工人中有60%的人是普通工人出身，既包括半技术性的分检工和信差（他们的工作也需要一定的文化水平），也包括不需要技术的厨工。<sup>⑤</sup>（相反，社会民主党上海支部——无论该党名称多么动听——与军阀当局有着密切关系，其人数是中共支部的一倍，但其成分主要是普通信差。<sup>⑥</sup>）

在统一战线的名号下，中共支部的成员也在国民党内作了登记。但两党表面上的合作被越来越深的对立所破坏。裂缝在1925年8月间的一次罢工中愈见扩大，当时国民党活动分子主张与资方谈判，而不同意中共方面提出的立即罢工的建议。虽然陆京士的怠工建议在当时流行的过激气氛中遭到拒绝，但他的谨慎在四一二政变后急剧改变的政治环境下却是一种优点。共产党与温和派之间的竞争持续了几年，到1928年年底时，陆京士及其伙伴开始占上风。<sup>⑦</sup>

杜月笙正是从驯服的邮务工会开始插手工会事务的，此举很快就证明不仅对他本人、同时也对他新结交的工会朋友都是有利可图的。在杜月笙这位鸦片大亨的扶持下，陆京士很快就当上了国民党上海市党部执行委员、上海警备司令部军法处处长。他在邮务工会里的朋友朱学范不久当上了新成立的上海市总工会主席委员，该总工会负责全面指导该市工人运动。<sup>⑧</sup>有位外国人后来得知朱学范作为中国工人代表参加了日内瓦国际劳



97 工组织时曾回忆道：“朱曾经穷困潦倒，穷得和一个中国工人没什么两样。他梦想组织工会为改善工人状况而斗争。他具有作为一个工人领袖的所有品质，但命运之神总未能降临。正好，杜月笙听说了他，收为学生，他很快就出人头地了。”<sup>97</sup>

但是真正作为一颗耀眼新星升起的是杜月笙。1933年，中国一份英文的《名流》(Who's Who)杂志曾这样描绘这位鸦片大亨：“中国杰出的金融家、银行家和实业领袖，”“很久以来在公共及市政领域作出过重要成就，在许多情况下，他为他的国家做出了许多不可估量的贡献。”在杜月笙的许多官方头衔中，有“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顾问、上海特别市政府立法会成员、上海商会监察委员会委员、中国商业轮船航海公司执行委员会主席”，后者由政府控股。<sup>98</sup>正如当时一位外国人指出的，杜“是一个阿尔·卡蓬和洛克菲勒的结合物”。<sup>99</sup>

杜月笙与其来自邮务工会的追随者之间的互利关系是建立在对工人的控制之上的。政府同意建立、由政府官员和帮会中人操纵的“黄色工会”是杜月笙及其朋友在工界发挥影响的主要工具。<sup>100</sup>

虽说黄色工会常常被视为假冒伪劣的东西，不可能给工人阶级带来任何实质利益，但当时情形是很复杂的。就像世界上其他地方的合作主义组织一样，按照政府旨意行事的组织就会得到政府的资助和表彰。<sup>101</sup>邮务工会便是一个很好的例子。四一二政变后不久，这个从前的激进主义堡垒在国民党的插手下进行了改组。中央邮政大楼第十四层被划拨给新工会作办公地点，又划拨1000元作为开办经费。这笔钱曾在五年前被同意划拨为解决罢工的部分经费，但只是在政权更替以后才最终划拨出来。工会新领导人与新政府之间的融洽关系并不能完全阻碍代表工人利益的工会行动主义。当上海邮政局局长拒绝了工会提出的信

差也要享有年终津贴的要求时，一次行动尝试开始了。虽然这一要求遭到了工会上层领导的反对（他们大部分来自南方的广东和福建两省），但工会代表很快前往南京与交通部交涉——后者同意了工会的要求，工会行动主义这些戏剧性的示威当然也包含了为工人着想的成分。当时一位工会成员回忆道：

当时挂号间有个信差叫陈鸣道，一家四口人全靠他工资收入维持生活。有一次他送完信回家，脚踏车跌入路坑，摔伤了脚，不能上班，病假已经超过六个星期，虽未被开除，但已没有工资了。我们了解到这一情况后，就去作了调查，确悉陈卧床不起，一家四口生活无着，贫病交迫，且面临失业的威胁，真是苦不堪言。回局后，……我们工会先后向信差管理处以及副邮务长数度进行交涉，……最后局方被迫将陈鸣道送仁济医院治疗，医药费全部由局方负担，工资照发全薪，以前扣发和停发的工资补发，并答允伤愈后，如果脚残不能送信，可以调动工作，改作内勤。<sup>⑥</sup>

黄色工会通过为工人争取这些具体的权益确立起在上海工人阶级中的威信。其结果是工会中的帮会人数迅速增加，至南京政府撤离之前，邮政工人中每五人就有一人投帖拜师。<sup>⑦</sup>

杜月笙开始认识到照顾工人要求的重要性。通过邮务工会领导人陆京士和朱学范的介绍，帮会的触角伸展到该市爆发的几乎每一次罢工之中。杜月笙作为罢工调停者的作用亦日渐凸显——常常代表工人的利益，涉及的行业也是多种多样，包括纱厂、印刷厂、丝织厂、珠宝业、新闻业和人力车运输业等。杜月笙不止一次拿出自己的钱来资助罢工委员会，然后在资方愿意妥



协的基础上扩大自身的利益。\*如此举动为杜月笙这位帮会闻人赢得了来自工人、雇主和公众的感激,有时还可得到许多公司的股份。正如英国警务处所说的那样:“看来,这位从前法租界的鸦片贩子正通过在各工业企业中的坑蒙拐骗来增加他在走私中的收入。”杜月笙充当调停者所得到的回报相当丰厚,但英国巡捕房对这位鸦片大亨积极充当劳资纠纷的调停者这一角色做出的一个同样重要的解释是:“他希望通过解决劳资争端来赢得公众,尤其是政府当局的信任。”<sup>99</sup>

朱学范近年曾对杜月笙通过干预罢工使自己摆脱帮会大亨的恶名、成为上海一位著名人士的情况作过回忆。杜月笙每次进行调停时,上海四家主要中文报纸(《申报》、《新闻报》、《时事新报》和《时报》)就要发布热情洋溢的消息——其中有许多记者编辑是杜月笙恒社的成员。朱学范创立的大公通讯社对各种罢工消息收罗备至,尤其不放过与其师父杜月笙有关的消息。<sup>100</sup>台湾为杜月笙写传的作者认为,这些举动与这位鸦片大亨的声誉鹊起直接有关:

无论是杜月笙还是陆京士出去平息工潮,他们的方式方法都很圆滑。数年后,杜月笙和上海市党部开始联合领导工人运动。在上海,无论是华界还是租界的资本家和工人领袖,不管是何种行业、何种职业,纷纷投入到杜门。众水汇流使杜月笙力量大增。后来他的事业做得那样红火,都是这个时期打下的基础。<sup>101</sup>

虽说杜月笙的崛起要归功于政府和大资本家的支持,但工人力

---

\* 这已成为杜月笙的一种行事模式,如1928年和1930年的法商电车公司罢工,1932年的南市电车公司罢工,1933年的南洋兄弟烟草公司罢工,1933年上海电力公司罢工,1937年上海电气公司罢工等。见 *Shanghai Municipal Police Files*, D-5310.

量也是这位帮会大亨及其走卒之权利基础的一个主要支柱。结果，帮会热衷于支持工人事业——甚至支持工人罢工——只要此种策略有利于获取更大的利益。朱学范曾向一位外国来访者夸耀他的大公通讯社道：“我们是惟一的保护上海工人免遭剥削的代言人。”<sup>⑧</sup>朱和另外几位搞工运的青帮朋友甚至还开办了一个合作印刷所，专门承印有些印刷所迫于政府压力而不敢印的罢工传单等东西。<sup>⑨</sup>

帮会操纵的罢工运动的目的各种各样。早在1927年秋，英美烟公司工会的青帮领导人曾发动一场争取提高工资的罢工，此次罢工很快就与国民党试图提高外国企业税额的行动结合起来（见本书第七章）。国民政府财政部长秘密提供罢工经费，使工人将罢工延长，直至英美烟公司接受有关条件。<sup>⑩</sup>但无论是政府还是罢工合作者，都会落入杜月笙的圈套。1932年，青帮在法商电车公司煽动罢工，抗议新任法国领事和巡捕房总巡的不友好政策——他们威胁要取消法租界的鸦片买卖和赌博业。<sup>⑪</sup>同年，杜月笙在上海邮局的门徒发动政治罢工，很快波及北平、天津和南京。尽管罢工者抱怨的是最近邮票价格的上涨没有导致工资的上涨，但罢工的真正矛头指向的是交通部。当时，该部由汪精卫改组派控制，该派与CC系势同水火，而杜月笙与后者更为接近。<sup>⑫</sup>

这些事例表明，促使杜月笙发动工潮的动机各不相同。在有些情况下，像1927年的英美烟厂罢工，杜的动机正好与国民政府的愿望相吻合。在另一些情况下，比如1932年的邮局罢工，抗议矛头直指政府部门。由于将青帮作为主要的工人组织者，这个分裂的政府实际上给自己的统治制造了一个有力的对手。其结果与眼下许多第三世界国家的情形相同——国家领导人不得不同地方强人进行合作。乔尔·米格代尔(Joel Migdal)写道：“自相



矛盾的……是，当强人开始依赖国家力量来维持其社会控制时，国家领导人也不得不依赖强人——他们手里握有一批在一定程度上敌视政府统治和国家法律的人。”<sup>99</sup>

政府、帮会、资本家、工人和洋人相互之间的关系令人目眩，而且他们的内部都是派系林立，如此复杂的线条构成了国民政府治下的上海政治的复杂图景。当国民党上海市党部训令同意上海总工会暂准备案时，社会局——与其说是一个党的机构，不如说更像一个政府部门——则因内部矛盾拒不承认。直到三年后，由于南京方面的插手，社会局才开始接受这个有来头的工会。当时，该总工会的领导核心除主席委员外，有五个常务委员，都是帮会中人。最终，社会局也被迫向帮会敞开大门。到1936年，该局四个部门中有三个负责人是杜月笙的徒弟。不消说，该局之劳资争议处及其下属的调解科都在杜月笙的控制之中。<sup>100</sup>

杜月笙并不仅仅满足于从其控制涨落的工潮中收获经济利益。他还决心赢得社会名声。1931年6月，整个上海忽然停了钟摆，都在忙于庆祝杜月笙祠堂的落成。为了纪念这一特殊时刻，101 陆京士和朱学范还特意刻了一个庆祝杜氏祠堂落成典礼的纪念邮戳。<sup>101</sup>此次盛大庆典（典礼中最热闹隆重的压轴戏是抬送杜氏祖宗牌位的彩车游行、南北京剧名角的三天连台大戏、上海市长主持的公祭典礼、每次约5000名宾客出席的宴席），反映了杜月笙想将其雄厚的经济和政治资本转化成同样能量的文化和社会资本的愿望。<sup>102</sup>有位目击者记叙道：

6月9日杜氏祠堂落成，上海成了一个有趣的地方。参加游行的人包括数千名帮会成员、商人和政府官员，从杜公馆出华格臬路，穿过整个城市，沿路由中外警察维持秩序。队伍前列者手捧蒋介石、张学良、上海市长张冲、C·T·王博士以及外交部长、柯麒麟(M. Koechlin)、法国总领事……

以及其他国民党党政要员和全国各阶层名人的贺辞。

杜氏动用了十几条火轮往返穿梭于上海和浦东码头之间，忙于运送成千上万出礼祝贺的人。宾客中有南京政府各部以及上海特别市党部和警备司令部的秘书和代表。许多高官亲临祝贺，市长张冲是蒋介石的指定代表。杜氏和中国报纸称，光是赏给属下和仆人的钱物即达7万元。<sup>⑤</sup>

杜氏祠堂落成的荣耀也是杜月笙粉饰自己寒酸家世的一个契机。为了养成一种绅士形象，杜月笙开始穿长衫，反复练习书写自己的名字以便给人签名，借此掩盖自己缺乏正规教育的事实。杜月笙寻求社会体面的一个主要动作是在1932年发起成立恒社，该社吸纳了约1500名社会各阶层有头有脸的人物，都是杜的门徒。<sup>⑥</sup>

至20世纪30年代中期时，杜月笙已成为上海滩上流社会中的闻人。平常在其法租界的豪华邸宅，每天招待宾客不下一二百人，其中许多都是高官富商。<sup>⑦</sup>甚至连当时的立法院院长在遇到恋爱纠纷时，也不得不恳请“杜月笙先生”出面，予以圆满解决。<sup>⑧</sup>

在争逐名利的过程中，杜月笙于1934年赢得了富有讽刺意义的一票——蒋介石任命他为上海市禁烟局局长。事实上，这个位子更便于杜月笙对鸦片贸易的垄断，因为中国海关受命要将所有查获的毒品贩子移交上海禁烟局，这个部门现在可是由杜某把持了。然而，表面上，杜月笙做得滴水不漏。1936年10月，当蒋夫人说当年给她丈夫的祝寿礼物最好是飞机，以便用于对日作战时，杜月笙立即行动起来。他送的一份慷慨礼物就是一架飞机，命名为“上海禁烟号”。当时的报纸不失时机地大肆



报道。\*

杜月笙名望的急速上升说明了民国时期上海帮会势力的能量是如何之大。杜月笙沉迷于社会名望,说明这位暴发户从一位卖水果的孤儿成长为声名赫赫的经纪人不是一件易事。20世纪30年代中期,成千上万的追随者投身杜门同样说明了他们对提升和名望的渴望。由于并非出身豪门富家,上海社会中这些先天不足而又野心勃勃的分子便被吸引到杜月笙的帮会网络之中,以寻求获取名利的阶梯。就像一位杜门徒弟回忆的那样,进入杜门最多的一类人是那些“在社会上有些活动能力,也有活动门路,但也有阻碍,未能为所欲为,难以贯彻个人的志愿和企图,认定杜月笙的社会地位和实力正是本人成名成利的因素”。<sup>⑨</sup>依附杜月笙便能从容面对当时那个冷酷的社会环境。

杜月笙招徒弟,虽然几乎遍及各行各业,但主要还是在半技术性工人中招收。上海邮局的信差、法商电车公司的司售人员(参见本书第九章)以及英美烟厂的卷烟工(见第七章)是黄色工会的主要成员。半技术性工人比起工匠来,工资较低,工作不稳定,而比起新来乍到的非技术性工人,他们又具有一定的城市生活经验,所以,他们很容易被工贼劝说入彀。在帮会和政府的联合作用下,上海工人阶级的中间部分具备了新的政治作用。

这股政治潮流由于半技术性工人数量的增加导致产业结构

---

\*这一讽刺对杜月笙本人并没造成什么损失。有位主张禁烟的外国人曾详细记录了她当时与这位帮会大亨会见的情况:“杜很有礼貌地看着我,‘是啊,我是中国鸦片商人的领袖,’他怏怏地承认道。我欣赏他的坦白,并告诉他,当得知蒋介石任命一位鸦片大王为上海市禁烟局局长时,整个日内瓦都在发出嘘声!杜的脸上掠过一丝笑容,很有些人情味。他本人肯定会把此项任命当作大笑话。”见 Iona Ralf Sues, *Shark's Fins and Millet* (Boston, 1944), p. 92.



的发展变化而进一步加强。南京国民政府时期，“第二次工业革命”——一次大战前后波及欧美产业界——正在广泛影响上海。缺少技术和职业训练的男工数量在华资和外资工厂里不断增加。<sup>66</sup>考虑到增加效益和节约开支的问题，工厂主们开始以成本不高的工人取代原来的雇员。英美烟厂某分厂于1934年关门歇业，有位被解雇者辛酸地诉说道：“英美烟厂上年歇业……因为老厂的工人工资比其他地方的人都要高出一二元，厂方便关门解雇老工人，以较低的工资雇用新工人……他们根本不注意我们以前为他们创造的财富；他们把我们的生命当儿戏。”<sup>67</sup>这些工人被迫改变自己的命运，当然是因为大量新的缺少技术的人手加入劳动大军的结果。

虽说政治经济形势的变化给半技术性工人在20世纪30年代的工人运动中带来了前所未有的地位，但这一时期工匠与非技术性工人的力量也不能忽视。黄色工会也致力于向这两个层面渗透。<sup>68</sup>然而，总体而言，工匠仍比较激进，非技术性工人则比较难驾驭，因而两者很难完全按照依附于政府和资本家的工贼的旨意行事。这个时期广泛引人科学的管理和技术加深了工匠对资本家的憎恨。<sup>69</sup>由于工作不稳定，妨碍了非技术性工人加入工会的热情。在南京政府十年期间，由于工会工贼的腐败行径日渐暴露，这些工人阶级中的另类越来越自行其是。

---

\* 在非技术性工人中，码头工人与帮会之间长期保持的关系，使他们经常有可能按国民党的旨意行事。在熟练工匠中，建筑业工会曾一度被工贼控制。参见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档案，#720-733；#722:4-233；#722:4-501；#722:4-502；#722:4-503；#722:4-226。



## 共产党“左派”

对国民党政权幻想的破灭乃是上海革命工人运动最终复活的主要因素，但逐渐转化为对共产党的直接支持主要在于国民政府的镇压本性。与“赤色分子”有牵连会带来危险之大震慑住了绝大多数人，但不包括那些无所畏惧者。然而，这一时期国民政府的镇压并不是工人有限度地支持共产党的惟一原因。共产党本身的行动也有许多不足。

尽管正统的共产党史学由于政治原因而夸大了这一时期的错误，但当时占统治地位的政策在恐怖环境中强调冒险的工人行动主义却是不争的事实。\*在后来被称作中共历史上第一次“左倾机会主义”错误时期，即1927年11月，中共中央政治局召开秘密会议，声言对国民党扶持的黄色工会展开公开斗争并继续强调进行城市武装暴动。<sup>⑧</sup>当月底，中共在上海发动了流产的第四次工人武装起义，国民党的残酷镇压给许多共产党人留下了难以磨灭的印象，明白了坚持“瞿秋白‘左’倾盲动主义”将会带来什么恶果，在1928年7月召开的中共六大上，“左”倾路线遭到了严厉批评。

\* 参见 Lawrence R. Sullivan, "Reconstruction and Rectification of the Communist Party in the Shanghai Underground, 1931—1934," *China Quarterly*, 1985, no. 105, pp. 78—97, 该文探讨了中共为营救那些20世纪30年代初从俄国回国的学生干部所作的努力，后者控制了江苏省委并采取左倾盲动主义政策。正如苏利文(Sullivan)在仔细翻阅了《列宁生活》这本杂志后所指出的，当时江苏省委所宣扬的政策比后来党史中所说的要温和得多。然而，嘴上说的一套与行动上做的一套往往不一致。参见沈以行：《工运史鸣辨录》，上海，1987年，第136—144、第156—165页，该书在这两处详细探讨了20世纪30年代上海工人运动中左倾盲动主义泛滥的情况。

可是，次年，在共产国际的指示下，中共中央又发布文件，要求抛弃与任何黄色工会的合作，建立独立的在中共直接控制之下的赤色工会。冒险的飞行集会也被鼓励举行。一份英国警务报告对此种劳而无功的策略作了描述：“一群中国人，大约有100来人，飞快地集中在北四川路和吴淞路交叉的拐角，一声爆竹声响，他们开始高呼共产党的口号，向空中抛撒传单……11名大陆人和一名台湾人被捕，大量‘赤色’出版物被缴获。”<sup>65</sup>至1930年春，上海中共党员的人数比上年下降了大约60%，即大约还有500人左右，其中只有35%是工厂工人，只有区区3%的人是妇女。<sup>66</sup>

然而，此种冒险的行动方式还在继续。英国警务报告记载道：

1930年7月16日早晨，南京路上发生示威，当时约有300名学生和工人集中在南京路和西藏路相交的拐角处。在高呼口号、抛撒传单后，游行队伍沿着南京路向东行进，旋被警察阻拦。几分钟后，同样的事情发生在南京路和福建路相交之处，此队人马约有200人，在向东行进时，他们向一辆正在行驶的有轨电车和一辆私家汽车扔石头，砸破了电车的两块窗玻璃和小汽车的一扇车窗，在驱散这两次示威集会的过程中，警察一共逮捕了33人。<sup>67</sup>

105

两个月后，即1930年9月，中共中央召开中共六大三次会议，李立三的错误即“第二次‘左’倾机会主义”遭到批评，中央决定停止疏远广大工人阶级的政治罢工和工人暴动的策略。但是，在实际工作中仍然有不少人公开主张用进攻策略消灭黄色工会，此种策略与1931年1月在中共六大四次会议上出台的王明路线有关，王明路线后来被中共定为“第三次‘左’倾机会主义”。<sup>68</sup>1933年5月1日的一份英国警务报告称：“最近查获的文件表明，中共地下党组织曾打算在新年即春节到来时采取行动，以

纪念中日冲突（即一·二八事变——译者注）一周年为借口，举行公开游行、制造骚乱、发动罢工。可是除了1月24日和28日分别举行的两次徒劳无功的飞行集会外（警察当时没费什么力气就驱散了游行），所有计划均未实施（原文如此——作者注）。<sup>⑧</sup>

在好几年的时间里，中共行动的钟摆一直未能走向比较温和的位子。最近出版的一本中国工运史著作对这一时期概括道：“从大革命失败到1936年，白区工运转向正确轨道之前，在长达八九年的时间里，它一直处于‘左’倾错误支配之下，这是白区工运惨遭失败的主要原因。”<sup>⑨</sup>

在整个30年代前期，上海残余的共产党人不断采取斗争行动，旨在削弱国民党统治。这种行动主义的结果是导致其党员源源不断地被捕。结果，中共领导的工人运动损失惨重：1930年，属于中共领导下的上海赤色工会的工人有2000人，到1932年时下降到500人，到1934年时，已所剩无几。<sup>⑩</sup>许多被关押者都是从普通工人迅速提升上来的高级干部。<sup>⑪</sup>更为不幸的是，在此革命遭遇挫折的关头，这些人中有不少人背叛——包括党的总书记、江苏省委书记、省委组织部长、上海工人第三次武装起义时的工人纠察队总指挥等，投入国民党的怀抱。<sup>⑫</sup>

## 结 语

106

南京国民政府十年时期，工贼取代激进派，成为上海地区工人运动中党派政治的主要角色。青帮大亨杜月笙的迅速崛起，乃是秘密帮会之重要性在新的国民政府统治下得以戏剧性体现的明证。正如战略情报局（Office of Strategic Service）的一份关于国民党的机密报告所说：“国民党起于一个秘密会党，在另一个秘

密帮会的帮助下步入权力顶峰(前者指洪门,后者指青帮——译者注),认为有必要在反对内外敌人的双重目标下组织其他形式的秘密帮会,以支撑蒋介石领导下的统治局面。”<sup>⑥</sup>

从概念上来说,国民党人开始选择的道路是合作主义的。\* 其目标是促进经济发展,免遭阶级冲突的不利影响。结果,政府不得不以这种方式而非固守狭隘的宗派主义立场来保持国家发展和维持社会秩序。<sup>⑦</sup>菲利普·施密特(Philippe Schmitter)将合作主义定义为:“一种利益代理体系,身在其中的各集团被组合成为一些单一的、义务性的、没有竞争面等级分明的和功能各异的门类,被政府承认或许可并被授予一种在其本门类中享有的谨慎的代理特权,用以换取他们服从选举出来的领袖的旨意以及在必要时所应给予的支持。”<sup>⑧</sup>施密特指出,他的定义是“理想式的描述”,与现实模式相距甚远。\* \*

\* 参见 Joseph Fewsmith, *Party, State and Local Elites in Republican China: Merchant Organizations and Politics in China, 1890—1930* (Honolulu, 1985), pp. 164—166, 作者分析了国民党人的国家合作主义问题。菲沃史密斯(Fewsmith)认为,这种策略削弱了党的权威(有利于政府权力),有益于上海的大商人(牺牲了中间商人阶层)。结果,他说,便是“工人运动的被破坏”(第139页)。国民党人显然在追求合作主义的目标,但我认为,这种努力并不导致工人运动的终结。

\* \* 例如墨西哥尽管被看作是拉丁美洲最完美的实施合作主义的国家之一,但在城市工人居住区,其具体情况据说与施密特的标准也相差甚远。见 Alfred Stepan, *The State and Society: Peru in Comparative Perspective* (Princeton, N. J., 1978), p. 68. 如同戴维(David)和卢斯·科利尔(Ruth Collier)所说,不要把合作主义视为“可有可无”,而是一种“系列特征,在不同程度上,可以具有,也可以阙如”。(“Who Does What, to Whom, and How: Toward a Comparative Analysis of Latin American Corporatism,” in *Authoritarianism and Corporatism in Latin America*, ed. James M. Malloy (Pittsburgh, Pa., 1977, pp. 489—512.) 显然,众所周知,由于严重依赖帮会,国民党努力建立一个服从严格的中央控制的有序体系的图谋从未实现过。

107 国民党以帮会为基础的政权并非是中国上层阶级中仅见的雇佣集团，<sup>②</sup>它也不完全是一个“从不向其政权以外的集团和组织说明情况的”“自治性实体”。<sup>③</sup>在中国问题研究中，有关国民党政权特征的争论反映了许多理论家中存在的更多的关于这个政府之性质的争论。当马克思主义学术传统将这个现代政府视为“资产阶级的执行委员会”时，坚持韦伯观点者则把这个政府看作是一个根据其自行制定的规则行事的“理性”实体，针对这两大派有关国家与社会关系的争论，有人提出了挑战——正如查尔斯·布莱特(Charles Bright)和苏珊·哈定(Susan Harding)概括的：“政府的概念是不偏不倚，独立于社会力量之外。”<sup>④</sup>但什么是我们应该考虑的相关的社会力量呢？也许可用“发达的资本主义社会”来做个参照——国内资产阶级乃是创建政府的过程中必不可少的社会力量。但这种说法是否能套到中华民国身上呢？须知其工业仍在摇篮时期。

南京国民政府十年时期，中国仍是一个分裂的社会，没有哪一个阶级能独占上风。如果我们从马克思主义传统观点入手，与中国社会合拍的不是《资本论》——它分析的是发达的资本主义，而是《路易·波拿巴的雾月十八日》，文中将路易·波拿巴的上台掌权说成是为了反对将处于分裂的痛苦之中的法国从农业经济转入工业经济。马克思对拿破仑的概括同样适用于蒋介石：“这个人所面临的自相矛盾的任务也说明了其政府的自相矛盾，他那些混乱的措施现在看起来倒是奏效了，现在先羞辱了一个阶级，然后又要羞辱另一个。”<sup>⑤</sup>

国民党人不但要对付新的老的地主资产阶级，还要对付新出现的政治化的工人阶级。那些会很好利用这一有价值的资源的人，比如杜月笙，都从这个令人满意的政府那里得到了丰厚回报。反之，在政府的支持下，帮会分子也得以为统治网络吸纳更

多的人手。来自华北的半技术性移民(如同我们将在本书第三部分所见到的)尤其与此种动员相呼应。与此剧情相近的是19世纪纽约威廉·特维德老板(Boss William Tweed)和20世纪初芝加哥民主机器(Democratic machine)的崛起：“以家庭和种族为主体的新人口急速涌入，当时工作机会成倍增长，工资名单不断增多，为政党机器的成长提供了理想的土壤。”<sup>①</sup>庇护政治，无论是在纽约、芝加哥，还是在上海，都能给工人、帮会分子以及政府官员带来显而易见的利益。但是，最重要的是，正是这一体制的运作，也有助于工人的政治化并使他们最终摆脱这一庇护纽带。

#### 注 释

① Harald R. Issacs, *The Tragedy of the Chinese Revolution*, rev. ed. (Stanford, Calif., 1951), 该书目前仍是此次事件最完善的英语著述。

② 樊崧甫：《上海帮会的内幕》，《文史资料选辑》1980年第3辑，第156页。

③ 《四一二事变的前前后后》，载《上海工人运动历史资料》第4辑（1953年），第1页。

④ 薛畊莘：《近代上海的流氓》，《文史资料选辑》1980年第3期，第162～163页；程锡文：《我当黄金荣管家的见闻》，载《旧上海的帮会》，上海，1986年，第144～148页。

⑤ *Shanghai Municipal Police Files*, D-9319；上海社会科学院编：《大流氓杜月笙》，上海，1965年，第1～7页；黄国栋：《杜门话旧》，载《旧上海的帮会》，第248页。

⑥ 朱剑良、许维之：《张啸林的一生》，载《旧上海的帮会》，第343～344页。

⑦ 乡波：《黄金荣事略》，载《旧上海的帮会》，第134页；《四一二事变的前前后后》，第1～5页。

⑧ *Police Daily Report*, Apr. 3, 1927, 转引自《上海工人三次武装起义研

究》，上海，1987年，第294页。

⑨ 苏智良：《上海流氓势力与四一二政变》，《近代史研究》1988年第2期，第217~220页。有人说，共进会得到了上海资产阶级或蒋介石本人的资助，这种看法可能是不正确的。更有可能的是，如杜月笙等历来所宣称的那样，他们各自是为了“国家”而自己拿出钱来的。见同上，第221页；以及章君谷：《杜月笙传》，台北，1968年，第2册，第32页。

⑩ 乡波：《黄金荣事略》，《旧上海的帮会》，第134页。

⑪ 《四一二事变的前前后后》，第12~35页；王建初、孙茂生：《中国工人运动史》，沈阳，1987年，第138页。

⑫ 对国民政府时期上海工人运动所做的有益研究可参见 Edward Hammond, *Organized Labor in Shanghai, 1927—1937* (Ph. D. dissertation,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Berkeley, 1978).

⑬ 关于合作主义，可参见 Suzanne Berger, ed., *Organizing Interests in Western Europe: Pluralism, Corporatism and the Transformation of Politics* (Cambridge, 1981); Philippe C. Schmitter, *Corporatism and Public Policy in Authoritarian Portugal* (London, 1975); Schmitter, *Trends Toward Corporatist Intermediation* (London, 1979); and Alfred Stepan, *The State and Society: Peru in Comparative Perspective* (Princeton, N. J., 1978).

⑭ 马超俊等：《中国劳工运动史》，台北，1959年，第2卷，第658~660页；王建初、孙茂生：《中国工人运动史》，第146页。

⑮ 《上海总工会罢工报告》，载《中国历次全国劳动大会文献》，北京，1927年，第188页。

⑯ 马超俊等：《中国劳工运动史》，台北，1959年，第2册，第734~736页。

⑰ 同上，第3册，第807~810页。

⑱ 同上，第3册，第810~811页。

⑲ 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档案，# 722:4-506。

⑳ *Shanghai Municipal Gazette*, Nov. 23, 1928.

㉑ 这些法规包括《劳资争议处理法》(1928年6月)、《工会法》(1928年10月)、《工厂法》、《工厂法施行条例》(1929年12月)、《工厂检查法》



(1931年2月)、《工会法施行法》(1932年)等,参见王建初、孙茂生:《中国工人运动史》,第147页。

② *Shanghai Municipal Gazette*, Dec. 12, 1928, Mar. 22, 1929.

③ 潘公展:《上海特别市社会局之组织及工作》,载《青年进步》1930年第133期,第34~41页。

④ 参见 Bradley Kent Geisert, "From Conflict to Quiescence: The Kuomintang, Party Factionalism and Local Elites in Jiangsu, 1927—1931," *China Quarterly*, 1986, no. 108, pp. 681~692. 其中论述了关于国民党左派这一时期在江苏农村活动的情况,关于国民党左派的总的情况,可参见(日)山田哲夫(Yamada Tetsuo):《中国国民党左派的研究》,东京,1980年。

⑤ 姜豪:《国民党改组派在上海的活动》,载《上海地方史资料》1982年第1期,第197~205页;姜豪:《青帮的源流及其演变》,载《旧上海的帮会》,第65页。

⑥ 陈港:《上海港码头的变迁》,上海,1966年,第46页。

⑦ 黄永言:《杜月笙打进大达轮船公司经过》,载《旧上海的帮会》,第284~292页。

⑧ 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档案,#720-733。

⑨ 例如,陈云就一直活动于商务印书馆印刷所工会中,同样,在英美烟厂工会、邮政工会、报业工会都有零星的共产党在活动。见沈以行:《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的上海工人运动》,载《上海工运史研究资料》1981年第2期,第10页。

⑩ 王建初、孙茂生:《中国工人运动史》,第157~158页;《上海工人运动》,南京,1935年,第313页;《中国劳工运动的现状》,北京,1930年,第101~105页。

⑪ 章君谷:《杜月笙传》,第2册,第151~155页;朱学范:《上海工人运动与帮会二三事》,载《旧上海的帮会》,第5页。

⑫ 王振亚:《第一个中共上海邮局支部》,载《上海邮政职工运动史料》,上海,1986年,第13~14页。

⑬ 王若枯:《忆“五卅”斗争》,载《上海邮政职工运动史料》,第33页。

⑭ 《上海 邮务工会的建立》,《上海工运史料》1984年第1期,第2~

15 页；《抗日战争以前上海邮政职工的斗争情况》，载《上海工人运动历史资料》，1954 年第 4 期，第 4 ~ 19 页。

⑳ 朱学范：《上海工人运动与帮会二三事》，《旧上海的帮会》，第 6 ~ 9 页。

㉑ Iona Ralf Sues, *Shark's Fins and Millet* (Boston, 1944), p. 78.

㉒ George F. Nellist, ed., *Men of Shanghai and North China* (Shanghai, 1933), p. 110.

㉓ Sues, *Shark's Fins and Millet*, p. 68.

㉔ Walter E. Gourlay, "'Yellow Unionism' in Shanghai: A Study of Kuomintang Technique in Labor Control, 1927—1937," *Papers on China* 7 (1953): 104.

㉕ 对合作主义政治内部之复杂性的研究，可参见 Howard J. Wiarda, *Corporatism and Development: The Portuguese Experience* (Amherst, Mass., 1977).

㉖ 沈天生：《回忆一九二七到三二年的上海邮务工会》，载《上海邮政职工运动史料》，第 77 ~ 82 页。

㉗ 饶景英：《关于“上海邮务工会”——中国黄色工会的一个剖析》，载《史林》1988 年第 2 期，第 117 页。

㉘ *Shanghai Municipal Police Files*, D-9319.

㉙ 朱学范：《上海工人运动与帮会二三事》，载《旧上海的帮会》，第 6 ~ 7 页。

㉚ 章君谷：《杜月笙传》，第 2 册，第 155 页。

㉛ Sues, *Shark's Fins and Millet*, p. 75.

㉜ 朱学范：《上海工人运动与帮会二三事》，载《旧上海的帮会》，第 7 页。

㉝ 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档案，#1:2-746。

㉞ 朱邦兴等：《上海产业与上海职工》，上海，1984 年，第 359 页；薛畊莘：《我与旧上海法租界》，载《文史资料选辑》1976 年第 6 期，第 157 ~ 158 页；Brian G. Martin, "Tu Yueh-sheng and Labour Control in Shanghai: The Case of the French Tramways Union, 1928—1932," *Papers on Far Eastern*

*History* 32(1985):133 ~ 135.

⑤⑩ 《抗日战争以前上海邮政职工的斗争情况》，第1~30页；沈天生：《回忆1927—1932年上海邮务工会情况》，载《上海工运史研究资料》1981年第6期，第29页。

⑤⑪ Joel S. Migdal, *Strong Societies and Weak States* (Princeton, N. J., 1988), p. 141.

⑤⑫ 《大流氓杜月笙》，第50~51页；朱学范：《上海工人运动与帮会二三事》，载《旧上海的帮会》，第8页。

⑤⑬ 《上海工人运动与帮会二三事》，载《旧上海的帮会》，第5页。

⑤⑭ 范绍增：《关于杜月笙》，载《旧上海的帮会》，第221~229页。

⑤⑮ Harold R. Issacs, *Five Years of Kuomintang Reaction* (Shanghai, 1932), p. 97.

⑤⑯ 郭兰馨：《杜月笙与恒社》，载《旧上海的帮会》，第300~320页；范绍增：《关于杜月笙》，载《旧上海的帮会》，第206页；朱学范：《上海工人运动与帮会二三事》，载《旧上海的帮会》，第6页；《恒社社员录》，载《旧上海的帮会》，第369~382页；《恒社秋季联欢大会特刊》，上海，1934年。

⑤⑰ 黄国栋：《杜门话旧》，载《旧上海的帮会》，第253页。

⑤⑱ *Shanghai Municipal Police Files*, D-9319.

⑤⑲ 郭兰馨：《杜月笙与恒社》，载《旧上海的帮会》，第306~307页。

⑥① 对这一进程给上海各产业部门带来不同影响的个案研究，特别参见朱邦兴等：《上海产业与上海职工》。

⑥② 骆耕漠：《目下劳工生活汇谈》，载《中国经济论文集》，上海，1934年，第2辑，第309页。

⑥③ 1931年，当商务印书馆试图引进科学管理方法时遭到了印刷工人们的强烈反对。参见《商务印书馆纠纷案解决》，载《工商半月刊》第3卷第4期（1931年），第27~28页；张心宜等：《商务印书馆重建党组织以后》，载《上海工运史研究资料》1983年第1期，第5~6页。

⑥④ 中共地下党干部希望在纺织业中发动的大规模罢工将引起城市武装起义，并得到农民的广泛支持。参见《江苏农民运动档案史料选编》，北京，1983年，第31~51页。

④ *Shanghai Municipal Police Files*, D-4820.

⑤ James Pinckney Harrison, *The Long March to Power: A History of the Chinese Communist Party, 1921—1972* (New York, 1972), pp. 1161 ~ 1162; 《沪潮》1930年5月8日,第14期。

⑥ *Shanghai Municipal Police Files*, D-4820.

⑦ 王建初、孙茂生:《中国工人运动史》,第161~176页; S. Bernard Thomas, *Labor and the Chinese Revolution* (Ann Arbor, Mich., 1983), chap. 2. 这一时期,老资格的工运领袖刘少奇继续主张更温和地与黄色工会开展合作。刘少奇在1933年底至1934年初写的几篇论文中,严厉批评了当时的冒险政策。见《刘少奇论工人运动》,北京,1988年,第50、61、68~69、88~93页。

⑧ *Shanghai Municipal Police Files*, #D-4820.

⑨ 王建初、孙茂生:《中国工人运动史》,第176页。

⑩ 沈以行:《工运史鸣辨录》,上海,1987年,第143页、162页。

⑪ 张维桢:《一九二八年以前上海工运的一些情况》,载《革命史资料》1980年第1期,第60~61页。

⑫ 他们的供词都载于“转变”(1933年)之中,现存“调查局档案”,台湾,#245-3/841。

⑬ 战略情报局 (Office of Strategic Service): “中国秘密帮会的政治影响”,存 Department of State Decimal File on China, #097. 3, Z1092, 2254/45.

⑭ 与世界其他地方有关情况的比较研究,可参见 James M. Malloy, “Authoritarianism, Corporatism and Mobilization in Peru,” in *The New Corporatism: Social-Political Structures in the Iberian World*, ed. Frederick B. Pike and Thomas Stritch (Notre Dame, Ind., 1974), pp. 52 ~ 84.

⑮ Philippe Schmitter, “Still the Century of Corporatism?” 同上, pp. 93 ~ 94.

⑯ 对作为地主资产阶级代表的国民党所作的诠释,可参见 Robert W. Barnett, *Economic Shanghai: Hostage to Politics* (New York, 1940), p. 12; Isaacs, *Tragedy of the Chinese Revolution*, p. 182. Barrington Moore, Jr., *The Social Origins of Dictatorship and Democracy* (Boston, 1966), p. 196; 以及《毛

泽东选集》，北京，1966年，第1卷，第55页。不赞同国民党此种地位的意见，特别参见 Parks Coble, *The Shanghai Capitalists and the Nationalist Government* (Cambridge, Mass., 1980).

⑦⑦ 关于自治的观点可参见 Lloyd Eastman, "New Insights into the Nature of the Nationalist Regime", *Republican China* 9, no. 2 (1984): 11. 还可参见其 *The Abortive Revolution* (Cambridge, Mass., 1974).

⑦⑧ Charles Bright and Susan Harding, eds., *Statemaking and Social Movements* (Ann Arbor, Mich., 1984), p. 4.

⑦⑨ Karl Marx, *The Eighteenth Brumaire of Louis Bonaparte*, in *Selected Works* (New York, 1977), p. 178.

⑦⑩ James C. Scott, *Comparative Political Corruption* (Englewood Cliffs, N. J., 1972), p. 114.

## 第六章 激进派的复活,1937—1949年

工贼操纵的工会活动在政府的卵翼下蓬勃发展,政府西撤后便迅速衰落。抗战时期的上海,帮会势力的衰落和激进的工人运动取代工贼操纵的工会活动,与国民党政权走下坡路的命运是息息相关的。1937年夏,日本人的侵人和国民党的西撤,使帮会失去了保护伞,为共产党革命者提供了一个重建工人阶级根据地的机会。<sup>①</sup>

国家正值多事之秋,激进派充分利用了这个时机,再次步入工运领域,试图赢得上海工人的忠诚。在失去官僚统治政权的支持后,帮会大亨们很快倾向于和共产党人开展“爱国”合作,因此,这些行动是有利于扩大革命的社会基础的。共产党赢得支持的一个同样重要的原因是中共本身采取了新政策。共产党在抗战时期改变策略,与工人阶级中那些将再次被证明是共产党最可靠盟友的分子重新建立了联系。

### 抗日战争与工人民族主义

1937年日本对上海发起攻击,开始了以后对中国的数年侵略。从1931年9月进攻东北开始,日本图谋占领中国的野心越来越暴露出来。许多上海工人,坚持五四运动和五卅运动的爱国

传统，很快投身到抵抗日本侵略者的行动中去。<sup>②</sup>早在1931年10月1日，一个由一名邮务工会会员率领的代表团就曾赶赴南京，要求政府更坚决地反对日本人。次月，在邮务工会和公用事业工会的领导下，上海70多个工会又派出一个代表团前往南京，重申他们的要求。当日军在1932年初将枪口直接指向上海时，30多个日商纺织厂的工人举行罢工。此次罢工得到了新老两个上海总工会分别发表的宣言的支持——老的总工会当时由一些幸存的中共地下党员领导，新的总工会即以青帮工人领袖朱学范为首的上海总工会。<sup>\*</sup> 110

1936年8月，当日本侵略的威胁进一步逼近的时候，为了响应广大工人反对日本帝国主义侵略的呼声，救国会成立。三个月后，这一新组织显示了它的威力，当时它在该市另一场重要的日商纱厂罢工中扮演了领导角色。只是在青帮闻人杜月笙及朱学范插手干预后，罢工才被平息下去，其结果是工人工资略有提高。<sup>③</sup>尽管当时物价飞涨，工人所得无几，但此次罢工在通行的中共史书中却被说成是工人运动的转折点。当时，毛泽东把它说成是“中国革命新阶段发生的重大事件”。近来，中国的史学家更把它说成是“大革命失败后上海工人发动的规模最大并取得成

---

\* 《九一八一一·二八上海军民抗日运动史料》，上海，1986年，第104-109页、第288-296页。当时正在上海的刘少奇协助筹集罢工资金，建立流动粥厂，以支持日商纱厂从1932年1月开始的罢工。但是刘的这些举措被康生说成是“只知在米袋子里兜圈子”，甚至污蔑为“右倾机会主义”，将他从中央职工部部长的位子撤职下放。直到1936年春，刘少奇被指派主持北方局的工作，他才重新获得指导白区工人运动的权力。在此后的两年里，他在新的工作岗位上写了一系列论文，提出要关注工人的经济要求，实际上与其以前的主张是相吻合的。参见沈以行：《工运史鸣辨录》，上海，1987年，第174-175页。

功的一次大罢工”。<sup>④</sup>

在1936年11月日商纱厂罢工中，尽管共产党的影响甚微，但在共产党人的回顾中，它仍被视为中共反对“左”倾工人政策的成果。<sup>⑤</sup>中共制定的新路线，在1936年4月刘少奇撰写的《关于白区职工运动的提纲》中有很好的表述：

111 目前还不是革命与反革命决定斗争胜负的时候，……我们同志和革命的工人均应加入黄色工会，并参加黄色工会中的各种工作和活动。……在没有黄色工会组织的工厂和企业中我们应该利用各种公开的与灰色的形式，……如同乡会、互助会、劝戒烟酒会（在理会）以及其他旧式的新式的团体。……我们应该暂时放弃独立组织赤色工会的任务，过去的那些秘密的赤色工会即行取消。……我们要……鼓励与推动黄色工会去参加抗日救国的团体和运动，号召全国各党各派联合一致抗日救国。<sup>⑥</sup>

刘少奇的《提纲》受到了在敌后冒着困难和危险开展工人运动的中共地下党的欢迎，因为它使得他们在处理工作中的复杂问题时有了很大回旋余地。随着1937年8月13日日本侵略上海开始，此项自由政策被广泛采用——而且往往很成功。

在上海工人运动中具体负责实施这一转变性策略的是一位外来干部，名叫刘长胜。从1937年秋至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的初期，刘一直在这个国家最大的工业城市中负责执行共产党的工运政策。刘是一位北方人，原籍山东，是个手艺娴熟的皮革匠兼制鞋匠。他的这种混合身份在上海工界是不多见的，使他在工作中既能吸引江南工匠，又能吸引较缺技术的北方人。

虽说刘长胜广开门路，但他成功的关键在于他特别注重在经验丰富和受过良好教育的工人中开展工作。刘本人是“职工委员会”的负责人——“职委”完全由一批收入高、地位优越的工人



党员组成。在刘的领导下，共产党吸收党员的主要渠道是熟练工匠、技工、工程师及其他白领阶层的职员。<sup>⑦</sup>此种策略效果明显。在珍珠港事变前夕，与刘关系密切的一位工友说，上海党员骨干“主要由久经考验的熟练工人组成”。<sup>⑧</sup>

抗战时期上海党组织工作的首选目标是救国会，因为它的劳工网络主要由上海工人中的上层控制，救国会对共产党表示欢迎。<sup>⑨</sup>救国会网络中特别活跃的是“蚁社”，其成员主要是一些白领工人，从1928年2月建立伊始，便从事爱国活动，直到十年后被下令解散。<sup>⑩</sup>蚁社还是“益友社”的一个主要集团成员，后者是在共产党支持下成立的一个互助组织，其成员包括印刷工人、药店店员、银行职员、百货店店员和其他类似较有地位的工人。112  
在它存在的12年中，益友社共吸收了500多名新党员。<sup>⑪</sup>

后来，中共干部还通过其他渠道吸收党员。在日本侵略上海时，大约有5000多家华商企业遭到破坏，使成千上万的工人变成了战争难民，幸好由于几位青帮首领提供经费和场地，先后办了四五十所难民收容所。<sup>⑫</sup>中共地下党干部——其中许多人也失去了工作——积极充当志愿者。不久，中共党员开了不少避难所性质的小茶馆，其中多数都成为难民唱歌、说书、读报和谈论时事的场所。中共从这些地方吸收了大量党员；那些原籍北方的人往往返回家乡，与新四军接上关系，江南人则留下来继续开展工人运动。1938年初，当公开的反日组织遭到查禁后，中共工运组织者便帮助将小茶馆和救国会各团体改头换面为各种俱乐部和类似以前江南工人的行会公所性质的互助社。<sup>⑬</sup>

民族主义当然是共产党在抗战时期吸引追随者的主要旗帜，但不是惟一的旗帜。物价上涨也是上海工人当时面临的主要问题。如表3所示，他们的生活费用直线飙升。上涨的物价中，最重要的莫过于米价。虽说周边都是中国盛产大米的地区，可是从

1937年以后,上海却要依赖从国外进口大米。日军占领江南地区后,不仅要把当地的大米供自己使用,还要运回日本,上海大米不足,便强迫上海从西贡购买,而当时货币正在大幅贬值。因而引发了普遍的抢米暴动,光是在1939年12月,上海就发生了75起。上海工部局负责社会与产业事务的埃利诺·辛德尔(Eleano Hinder)对这一危机曾作过描述:

高物价带来的令人沮丧的后果之一便是“扫米”,米价不断上涨,“扫米”成为街头常见的一景(确实,“扫米”之外,还抢夺其他商品如原棉)。当运米车驶入交通拥挤的十字路口时,便有一群衣衫褴褛者,有大人,有小孩,不知从什么地方冒了出来,行动如闪电一般。一眨眼间,几个米包便被用刀子戳穿。珍贵的大米就顺路洒下,有的用手捧,有的用扫帚扫,大米夹着灰尘,装入备好的袋子。警察赶来之前,“扫米者”早已溜之大吉。

生活状况的恶化还可从最令人恐怖的统计数字——上海街头弃尸收集的数字中看出。抗战前不久,上海每年平均收集5500具,1937年上升为20746具,1938年为101047具,1939年为110173具。<sup>⑭</sup>

113

表3 1936—1945年间的上海工人生活指数

年份	指数	年份	指数
1936	100	1941	827
1937	119	1942	1994
1938	151	1943	7226
1939	198	1944	47750
1940	428	1945	6058103

资料来源:《解放前的上海物价》,上海,1961年,第330页。

这场战争对于生活在生存边缘上的人来说是灾难性的。相反，那些有一定保障的人则开始反击。看到这种现实，共产党决定摆脱这些年来的束缚，不失时机地介入。

上海工人中的特权阶层对于共产主义的发展壮大来说，继续有着重大的吸引力，商务印书馆就是一个例子，刘长胜把它作为一个发展党员的好地方，因为这里的工人受过较好的教育，有着革命的优良传统。1938年4月，根据刘长胜的指示，在该馆下属的印刷厂重建了中共支部。党员们通过开展各种各样符合受过教育的工人口味的文化活动来发展队伍：在职员中开展读书活动，阅览室有大约3000册书；发行一份登载标题新闻和爱国评论的内部报纸；组织时事讨论，激发更大的民族主义感情；组织体育队、歌舞队等。在这些活动中，共产党最大的兴趣是在发行所开展工作，这里的白领工人都受过良好教育，长期抵制帮会主导的黄色工会的侵入。1939年，通货膨胀形势激发了工人们对待遇的不满，发行所的工人们决定发起一场静坐罢工，以引起人们对其生活状况的关注。尽管该馆黄色工会对此次罢工予以抵制，罢工仍按期举行，当时正好是学校开学前夕，急需大量教科书。虽说商务印书馆发行所的门仍开着，但职员们却拒绝销售。罢工者经过14天的罢工，赢得了胜利，削弱了黄色工会的权威，并为共产党进一步开展工作扫清了道路。至珍珠港事件发生时，商务印书馆已有中共党员30多人。<sup>15</sup>

114

虽说在日本侵人上海后不久，许多负责工人事务的国民党官员逃之夭夭，共产党人要轻松介入上海工人之中也并非易事。新来的日本军阀不仅拥有强大的谍报网络和军事机构，足以发现并镇压其对手，他们还野心勃勃，力图驾驭上海工人，使之为自己的政治代言人服务。他们从工人运动中寻找潜在的盟友，特别是那些对南京政府十年统治表示不满的人。很快，一批形形

色色的合作者,从帮会喽罗到国民党改组派分子,到托洛茨基分子和其他从前的共产党人,都开始集中在“中华民国工人联盟”的旗号之下。在日本海军陆战队特别情报部的卵翼下,工人联盟开始煽动工人在非日资企业闹事。\*

115 珍珠港事件之后,日本人占领了其他国家的在华租界,工人联盟的活动宣告结束。在接下来的几年里,上海工人运动陷于沉寂,其中既受到新的政治形势的压制,又受到该市许多工厂面临经济灾难的影响。<sup>⑥</sup>在这种险恶的条件下,共产党被迫采取坚决收缩和坚决退却的方针。尽可能减少有组织的活动,增加与职工的个别往来。其方式主要是通过交朋友、认同乡、结把兄弟、认姐妹,组织钱会和戒烟酒会等,以便在群众的掩护下保存组织,度过黑暗。在斗争方式上,则尽量采取表面上自发的,无人领导的、无组织形式的、无群众声势的所谓“三无”斗争。<sup>⑦</sup>

\* 这些工人罢工中,最著名的是发生在英资中国印刷设备公司为期6个月的罢工。罢工结果是工人增加工资20%。特别情报部内的保守分子坚持认为工人联盟受到了共产党的腐蚀,最终以中国工人福利会取而代之,头头是位与日本人关系密切的台湾人。福利会吸收的都是不那么“左”倾的成员,但仍在非日资企业(尤其是在英资、美资和瑞士企业)发动代价昂贵的罢工。福利会在活动了大约一年之后解散,代之而起的是新成立的上海总工会,由汪精卫傀儡政权控制。在成立典礼后的几个星期里,该总工会就控制了下属54个工会,包括211482名工人。1940年秋,这个受人保护的总工会在公共租界和法租界发动了一场跛足的运输业和市政工人的罢工。参见 Robert W. Barnett, *Economic Shanghai: Hostage to Politics, 1937—1941* (New York, 1941), pp. 65—69; 《上海特别市总工会概况》,上海,1941年,第121—125页;马纯占:《上海工运的现状报告》,延安,1941年,第14—21页;王建初和孙茂生:《中国工人运动史》,沈阳,1987年,第234—235页;《“孤岛”时期汉奸工会形形色色》,载《上海工运史料》1986年第3期,第21—25页。英国警务处认为,1939—1941年间,日本人煽动工人罢工所取得的成功令人惊奇;大多数罢工显然都是以满足工人的利益为结局的。参见 *Shanghai Municipal Police Files*, D-6499 及 D-9601(c)。

这一时期，共产党的这种低调活动方式有助于他们在上海工人阶级中赢得朋友，某种程度上还可得到帮会的帮助。虽说许多帮会头目都铁着心肠跟着傀儡政权，\*但还是有不少人响应共产党的爱国号召。有几个青帮头目曾向共产党提供了极其有用的有关日本人和汪伪政权的情报。另一个帮会头目则利用他在码头上的关系，为共产党传递宣传品。<sup>⑧</sup>帮会关系使共产党得以扩大自身影响，但在整个抗战时期，对共产党最关键的支持来自工人阶级中比较有保障的阶层。新党员中有些最积极的分子甚至来自高级管理层。上海保险职工会会长胡咏骐即是一例。胡是浙江农村一个织绸匠的儿子，曾在宁波一所教会学校念书。后来他在教会奖学金的资助下，前往哥伦比亚大学攻读人寿保险和商业管理学。在纽约一家保险公司完成实习后，他回到上海。1931年，他发起创办上海宁绍人寿保险公司，担任总经理。就像许多受过教育的年轻中国人一样，他对日本人的入侵义愤填膺。由于积极参加上海各界救国会的活动，他的事迹被埃德加·斯诺的《西行漫记》和其他许多报道中国革命的书报所介绍。1938年，这位年轻的实业家申请加入中国共产党。因为他的社会地位很高，他的申请最后要经过在延安的党中央的批准。次年，他的申请被批准。<sup>⑨</sup>

中共在扩张其上海保险业职工中的影响的过程中，胡咏骐通过在上海保险业中建立业余联谊会（简称“保联”）发挥了关 116

\* 一个臭名昭着的例子便是帮会头目常玉清组织的黄道会。常玉清体重 315 磅，以前是澡堂老板，他带领的 700 名黄道会徒众不但对付共产党，也对付国民党。其老窝在虹口区，专搞敲诈勒索、绑票和暗杀的卑劣勾当。在日本人的指使下，黄道会还在英资企业中煽动罢工。参见《“孤岛”时期汉奸工会形形色色》，载《上海工运史料》1986 年第 3 期，第 21 页；Shanghai Municipal Police Files, D-8458.



键作用。该组织在共产党支持下，在保险业职工中积极开展文化、教育和福利活动。联谊会成立大会是1938年7月1日在宁波同乡会召开的，有400多名保险业职工参加。保险业联谊会开展的活动与共产党人在商务印书馆开展的活动密切呼应。在读书热潮中，职工捐款设立了读书室；出版了一份由胡咏骐题写刊头的刊物，名为《保联会刊》；由思想进步的职工举行系列时事演讲；组成了评弹组、国乐组、口琴组、舞蹈组；还举行体育竞赛。联谊会里最有生气的是话剧组。剧组成立于1938年秋，开始时约20多人，不久便增加到80多人，后来，其中的许多人都加入了共产党。1938年12月，剧组在宁波同乡会的首场演出反映平平，但在接下来的一年中，剧团吸引了大量观众。大多数演出都由胡咏骐安排，积累的演出收入则直接转送给新四军。<sup>29</sup>为了共产主义事业，联谊会不仅捐钱，而且出人；上海保险业职工中约有60人被吸收参加共产党。<sup>30</sup>

就白领工人对战时共产党信息的普遍接受而言，保险业职工的行动具有代表性，而百货业职工的表现则更进一步。例如，永安百货公司的职工们曾将毛泽东的几篇讲话抄在小本上秘密流传。这些小本总名之曰“小草”，内容还包括职工们自己创作的短故事、诗歌、漫画和歌曲。许多职工充分发挥聪明才智，将写作的内容与共产党的宣传思想相吻合。1944年4月的“小草”上，就曾出现过这样一篇短文，其中写道：“大自然给人带来了冷和暖，可是人类自己创造了阶级社会——幸运儿独占了温暖，留给不幸者的只是寒冷……为什么人类不能消灭阶级差别呢？”<sup>31</sup>这些小本子当然引起了共产党干部的注意。依靠救国会中的各种关系，共产党从百货业职工中吸收了很多党员。<sup>32</sup>

虽然在白领工人中发展新党员投身革命事业是一条主要途  
117 径，但共产党并没有忽视他们更为熟悉的工厂工匠。共产党组织

在船厂和机器厂重建时，吸收了大量机械工人和木匠参加。日本人在珍珠港事件后占领了这些工厂，他们指派本国侨民为监工，监视这些难驾驭的工厂工匠。随着战争延长，许多日本工头被派到其他地方，熟练的中国工人便被指派填补空缺。不少新工头都是中共党员。这些干部身处要位，使共产党在1942—1944年间得以在重要的工业企业中发动一系列成功的罢工。<sup>98</sup>

抗战时期，中共上海党组织发展迅速。1937年11月时，仅有党员130人，到1945年8月日本人投降时已猛增至2000多人。<sup>99</sup>

## 内战与共产党工匠

随着日本的投降，上海和其他日占区一样立即成为国共两党争夺的对象。最初，共产党希望在工人的支持下控制这座中国最大的工业城市。在战争结束前一年，预计到将来国共两党不可避免的互相残杀，中共中央指示创建上海工人地下军。接受这项艰巨的建军任务后，上海党的干部遵循老路子，首先将眼光放到帮会分子身上。一批帮会强人——其中一些人在20年前曾积极参加五卅运动——成了地下军的最初成员。然而，为了拢住这批惟利是图者的人心，就要拿出不少钱来。党组织不可能有那么些钱，只能转而吸收更可靠的成员：技术工人，尤其是江南籍的机器工人。<sup>100</sup>

1945年8月23日，7000多名地下军战士——其中许多人是中共党员——齐集信义机器厂，准备发动武装起义，占领附近的警察局，缴获武器，然后进军市中心，配合新四军解放上海。然而，就在同一天下午，党中央命令取消暴动。原来，三天前，中共

中央接到苏联方面的电报,要求中共与国民党和平共处,以应合苏联和国民政府新签订的一份条约。几天后,地下军解散,暴露身份者被转移到北方,去山东参加了新四军。<sup>②</sup>

118 地下军命运不济,说明了中共上海地下党组织被迫在危机时刻寻找他们在上海工人阶级中最忠诚的盟友的努力。虽说帮会分子在武装行动中可以利用,但最终只有技术工人被证明是愿意为更高的政治目标献身的。对共产党来说,幸运的是,这个群体的工人在战后有了实质性增长。日本投降后,数千名铜匠、铁匠和机械工人从内地回到上海。<sup>③</sup>此外,还有3万多中国工人被从日本遣回,其中大部分都是来自江南的受过教育的熟练工人。<sup>④</sup>

共产党对这类工人的关注表现在中国技术协会的建立(上海,1946年)。协会成员都是受过良好教育的工程师和技师,其行业从机械制造到纺织业均有,成立之初,成员有400人,1949年时,发展至约3000人。协会中有100多人加入了共产党,国共政权交替之际,他们积极组织护厂队。<sup>⑤</sup>

持续的经济危机维系了人们对共产党的支持。上海工人的生活指数从1946年的406476点上涨到次年的3015699点。<sup>⑥</sup>这一次对生活水平恶化的抗议,再次证明了境遇较好的工人的首倡精神。1946—1947年,上海百货业职工在共产党影响下发动了一系列怠工。首先在四大百货公司发起“懒工运动”,职工个人以疲劳为借口,说自己无法上柜台接待顾客。每个柜台上都放着一块牌子,说由于上头不发年度津贴,身体吃不消;顾客要买东西,请到别处购买。不久,杂货业店员不甘落后,发起“勤工运动”——店员们揩柜台擦地板,“忙”得不可开交,无法接待顾客。紧接着,另一家上海的百货商店遭到职工开展的“愁工运动”的困扰——顾客买东西时,售货员要么紧锁眉头,一脸愁容,要么抱



怨物价飞涨，上头又不发津贴，如此光景，哪里还能做得成生意呢！<sup>②</sup>

刘长胜在抗战时期将工作重点放在技术工人和白领工人身上的策略，在战后继续运用，并得到了丰厚的回报。内战时期，中共上海工委劳工部的干部们就对工人阶级中这一特权阶层发生了特别的兴趣。印刷工毛齐华被指派在印刷行业中组织工友，同时负责为工人运动印刷宣传材料。他还负责一些医院、影剧院及其他娱乐场所的工作。工委书记张祺是位熟练的丝织工，被指派负责铁路、航运、纺织部门的工作（尤其是其中的技工）。陈公琦（音）是上海电力公司的工人，负责水电企业和机器厂的工作。王中一是法商电车公司的职员，除本公司外，他还要负责丝织业和一些公共汽车公司的工作。<sup>③</sup> 119

刘长胜的战后工作计划要求进一步转变党的工作重点，就是从无产阶级力量高度集中的纺织业转移到公用事业中来。<sup>④</sup> 1945年11月成立了共产党领导下的“六大公用事业工会联谊会”，包括了六大公用事业系统：上海电力公司、上海电话公司、法商电车公司、英商电车公司、煤气公司和自来水厂。<sup>⑤</sup> 可想而知，公用事业乃城市的动脉，一旦瘫痪，不但对普通居民的生活，同时也会对工厂生产立即产生严重的影响。而且，由于公用事业部门雇用了数量相当大的受过教育的技工和工程师，这些部门的工人更倾向于投身革命工作。正如当时的一份警方报告所称，共产党动员公用事业部门工人的方法是建立在他们所熟知的工匠组织的基础之上的。有100多名工人加入了关帝会，他们定期聚餐，讨论劳工问题。此外，共产党支持下的佛教高会每月初一和十五聚集吃斋，同时商议其行动计划。<sup>⑥</sup>

上海电力公司更成为共产党动员工作的一块坚实基础。该

公司的工人多为年纪大、收入高、懂技术的技工，很多都参加过五卅运动，具有非凡的战斗精神。即便是南京政府十年时期，帮会工会盛行，电力公司的职工仍不愿随波逐流。1934年的一份英国警方报告称，大多数上电公司的工人都拒绝向黄色工会缴费，因为在上一年度的罢工中，黄色工会并未给他们谋到实际的好处，“许多工人受了共产党分子的影响，组织起来，打算推翻国民党支持的黄色工会。”<sup>⑧</sup>直到内战时期，工人们的愿望才最终实现。1946年1月，上电公司的工人为增加年度津贴而举行罢工。在新成立的公用事业工会联谊会的支持下，他们取得了胜利。后来，上电公司工会（当时其中已有一个12人组成的执行委员会，包括4名党员和4名中共同情者）在组织工人举行反对国民党的公开示威活动中起了领导作用。该工会还出版了自己的刊物《电工月报》，刊登由工人自己撰写的进步文章。<sup>⑨</sup>

对共产党越来越多的支持主要在于战后国民党统治的内伤发作。由于灾难性的通货膨胀和严重的派系斗争，国民党的统治陷于瘫痪，无法重新取得在其全盛期时曾经拥有的对工人运动的控制。随着国民党人衰败步伐而进的是共产党人进步的步伐。上海的共产党人数在日本投降时为2000人，到1949年4月，这个数字增加了4倍。<sup>⑩</sup>

## 国民党内的派系斗争

国民党当然没有低估上海工人的重要性。许多老面孔——蒋介石四一二政变后曾积极推动黄色工会体系建立的人——在战后又重新被派到重要的职位上。最著名的回归者是陆京士，这

位从前的邮政工人由于投靠在杜月笙的门下，在国民政府中获得了好些个耀眼的位子。日本人占领上海后，陆京士随国民政府西撤至陪都重庆。他在重庆与国民党特务头子戴笠建立了密切关系。1945年，当他被派回上海去从共产党手里夺回工人运动的控制权时，他与特务机构的关系发挥了巨大作用。戴笠提供的大批武器使陆京士得以武装起一批工人中的信徒。

陆京士的人马被委任为“上海市工人忠义救国军”后，便开始对可疑的共产党据点发起袭击，并单方面插手劳工纠纷，其所作所为与20年前帮会控制的“工统会”毫无二致。值得讽刺的是，这位曾经一度有过改良思想的邮务工会领导人现在耍起了赤裸裸的工贼手段。由于成功地利用了工会与青帮的双重关系，从而获取政府高位并取得暴力操纵者如戴笠等人的信任，陆京士现在将工人运动纯粹视为一种工具。为了对付共产党敌人，报效国民党政权，就必须最大限度地利用工人的潜力。虽然国民党政权在上海重新确立后，忠义救国军遭到解散，但陆京士随即成立了“工人福利会”，下设“护工队”，后者继续采用特务手段活动，并设立训练营，在工人中培养武装干部，为打击共产党做好准备。\*

121

虽说陆京士在战后劳工事务中出尽风头，但是他的权力并非没有受到挑战。而且这种挑战不仅来自中共上海地下党。虽然

\* 毛齐华：《略谈解放战争时期工人运动的一些情况》，载《上海工运史研究资料》1982年第2期，第2~3页；邵新石（音）等编：《上海劳工年鉴》，上海，1948年，第117~118页。作为国民党政权重建后的最高劳工问题专家，陆京士将许多心腹置于驾控工人运动的要害部门。曾是上海邮务工会职员的水祥云，跟随陆京士起家，此时被任命为上海总工会理事长。其他亲信则安插在有影响的烟业工会和电话工会。在社会局里，陆的朋友也占据着专管劳工事务的关键位子。

陆京士公然宣称他与共产党不共戴天，但他所面临的麻烦更多地来自国民党内的对手。抗战时期，戴笠蓝衣社控制的军统和陈立夫、陈果夫控制的中统之间，明争暗斗不断。<sup>⑧</sup>这两个平行的情报机构，明里是针对日本人和共产党的威胁，但在抗战结束的时候，将他们的敌人放到一边，更多的是窝里斗。由于铁杆一根地跟着戴笠，陆京士现在发现自己陷于国民党内部的派系斗争之中。例如，中统在沪东各纺织厂及码头工会中建立的“劳工协进社”，就公开与陆的“工人福利会”发生冲突。陆京士以前共事过的国民党内有名的劳工领袖如杨虎、马超俊和朱学范等，现在都在培植自己的劳工组织和信徒，削弱了陆京士的控制力。<sup>⑨</sup>

因此，抗战后的几年里，虽然正式登记的工会如雨后春笋——从1945年底的295个工会（包括227949名工人）增加到1947年初的453个工会（拥有527499名工人）\*——但这些团体决不构成一个支持政府的稳固基础。<sup>⑩</sup>形形色色的工会对明争暗斗的官员来说是有利可图的，对他们来说，与劳工的联系只是挖对手墙脚的一种工具。在工会运动中，共产党的影响当然是一个重要因素，但国民党官员之间的互相竞争——尤其是考虑到

122

---

\* 王建初和孙茂生在其所著《中国工人运动史》第291页估计，到1946年底，在上海，共产党领导下的“合法”工会已达324个，会员28万多人。据他们说，还有未经批准承认的工会100多个。尽管这些数字可能夸大了共产党的影响，但共产党重新成为上海工人运动中的一支主要力量却是不争事实。报道不断的工会腐败和暴力冲突，证明许多工会只是争名夺利的工具。其典型事例便是1947年6月开始发生的中国纺织公司长期纠纷——起因于该公司工会头头竭力想重新雇用一位女工头，此人恰恰就是他的情妇。参见 *Shanghai Municipal Archives*, #20-1-122. 这一时期有几起纠纷导致数名工人死在政府代理人的手里。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档案，#2: 2-1993。

1947—1948年间的“国大”选举——显然是这一时期劳工组织蓬勃发展的主要推动力。

曾与青帮大亨杜月笙及其徒弟陆京士密切合作过的CC系，现在也翻脸不认人，公开向杜、陆在上海政治中的地位挑战。两者最富戏剧性的对抗发生在曾是杜月笙徒弟的吴绍澍身上，吴在抗战时期与陈立夫挂上了钩，战后他担任了国民党上海市党部主任委员兼该名副市长、社会局局长。吴公开与杜断绝关系，向杜要回门生帖子，不再承认他这个老师。他还在自己主办的报纸上大肆攻击杜，发表影射性文章。这是上海报纸30年来第一次这样骂神通广大的杜月笙。虽然陆京士在自己办的一份报纸上为杜粉饰，但杜的名声已经无法挽回了。这位鸦片大亨不受舆论攻击的时代已经一去不复返。<sup>⑥</sup>更有甚者，这场冲突不仅仅限于笔战。当陆京士想活动当国民党六大代表时，吴绍澍予以封杀。稍后，这场羞辱被戴笠手下报以一场未遂暗杀；虽说吴的防弹轿车抗住了7颗子弹，救了他一命，但双方的裂痕已无法弥合。<sup>⑦</sup>

吴绍澍的权力基地在国民党和三青团方面，抗战刚结束，他就开始担任上海市党部主任委员和三青团上海市团部主任，但为了控制上海政治，他还想在工人中插上一脚。虽说吴是上海市社会局局长，也曾把几个亲信放在工运岗位上，\*但很显然，陆京士的武装护工队占了上风。陆京士最拿手的一招便是煽动心怀

123

\* CC系成员葛克信与吴绍澍关系密切，被任命为社会局主管工运的副局长——陆京士曾觊觎此位。陈立夫的堂弟被吴任命为市党部书记长。吴还任命了几位朋友到上海市总工会和国民党上海市党部工人运动指导委员会担任职务。参见姜梦麟、毛子佩：《抗战胜利后上海国民党内部的派系斗争》，载《文史资料选辑》（上海）1979年第5期，第180-181页。



不满的工人直接向社会局和市党部示威,用以羞辱局、党头子吴绍澍。此种策略终于奏效:1946年初,吴被解除社会局局长职务;当年晚些时候,他又失去了党内职务。<sup>66</sup>在连连丢官的羞辱下,吴绍澍决心在他仅剩的三青团位子上搏一把。1946年夏,三青团接受指示向上海工人运动渗透。在接下来的一年中,吴的三青团与社会局(现在的局长是杜月笙的徒弟、与陆京士关系密切的吴开先)之间的矛盾势同水火。吴开先、陆京士对三青团插手工运之事十分恼火,向国民党中央诉苦,要三青团专搞学运,不搞工运。国民党中央当时正为上海学潮头疼,认为三青团应专注学运。但矛盾并未解决。上海市长吴国桢鉴于双方斗争不已,规模越来越大,发展下去,势必影响全市治安,乃遵照中央指示,于同年7月邀请双方调解,达成所谓“七月君子协定”,此后三青团即停止插手工运,转而专心于学运。\*

## 积极反共

124 国民党内部的休战虽然短暂,却能腾出手来对付共产党。陆京士知道共产党把精力集中在公用事业各部门,遂指示工人福利会加强对这些部门的监视。<sup>67</sup>几乎在同时,中统上海分部查获一起秘密印刷共产党传单事件,源头在富通印刷厂。几天后,一

\* 范锡品:《上海舞潮案亲历记》,载《文史资料选辑》(上海)1979年第5辑,第193~194页。此时,由军、政、党干部参加的“治安联合会”成立,陆京士负责此会的工作,吴绍澍则任副主任。驻上海的中统一直在和社会局争夺工会的领导权,此时同意限制自己的活动,专注于情报工作,并在每周向社会局官员通报。见《上海工潮与工运》,1947年,存调查局档案室,台北, #556.89/7432。这份资料性文献由驻上海中统人员写成,比较可信。

群特务袭击了该印刷厂，搜获一批敏感的文件，逮捕了6名上海电力公司的共产党员，当时他们正在现场看管其工会刊物《电工月报》的印刷。不久当局又抓获另外21名工会积极分子。<sup>48</sup>当局现在才真正知道左派工人运动的“心脏”所在，立即查封了上电公司工会、法电公司工会和百货业工会——它们都在共产党的领导下。<sup>49</sup>

就当时情形看，国民党可能给了共产党致命的一击。但好景不常，几天后，英商电车公司、法商电车公司和不少丝织厂、机器厂的工人开始罢工，抗议“富通事件”。

抗议富通事件的罢工由共产党发起，参加者都是共产党根基牢固的企业中的熟练工人。然而，数月后，上海工人中的其他部分也开始对国民党统治发泄不满。1948年1月31日，5000多名舞女到社会局抗议政府关闭该市299家舞厅的决定。当社会局局长吴开先拒绝接见示威者时，他们冲进了办公大楼。一时间，门窗家具和文件都被砸烂撕毁。当警察赶来加以制止时，一场战斗接着发生，结果留下了70多名伤员。

对这场妨碍政府公务的大破坏，吴开先暴跳如雷，下令对这场他怀疑为共产党挑动的事件进行彻底调查。几个月里，调查人员徒劳无功，没有找到共产党插足的证据。当时主要精力集中在一个所谓的“红衣女郎”身上，据记者们描述，她曾在舞女冲击社会局之前奔前奔后地指挥。可是，在对被抓的700来名舞女排查后，并没找到这样一个人。许多被捕者虽经严刑拷问，却都否认与激进派有任何联系。惟一有关系的外来党派是三青团，因为它的工作对象之一便是舞厅业工会。<sup>50</sup>

舞潮案后不过两天，另一场由妇女唱主角的冲突引起了该市当局的关注。1948年1月30日，一场大罢工在申新九厂爆发，尽管共产党与此次罢工有些关系，但罢工主要还是自发的。 125

正如一位工人积极分子回忆的：“即使没有共产党来领导这场斗争，我们自己也能起来战斗。”<sup>⑨</sup>有限的共产党领导确实存在，但主要集中在机器厂的男性技工身上（参见本书第八章）。可是当局确信，这些以妇女为主的罢工者是按共产党的指示行事的。2月2日早上，国民党派出军警特务1000多人进厂，用武力驱散工人。在接下来的激烈冲突中，有3名女工牺牲，100多人受伤。当局再次将此次事件与舞潮案联系起来，下大力气追查据说是指导工人反抗的“红衣女郎”，其结果当然是一无所获。<sup>\*</sup>

由于在非技术性工人发动的罢工中查找共产党之事陷于窘境，当局转而从技术工人中寻找突破。此招果然有效。3月，在运输业中做组织工作的共产党干部王中一被捕。特务在王的屋里搜获一份名单，导致数百名中共党员被捕，其中绝大多数人是技工。<sup>\*\*</sup>

## 国民党势力的瓦解

当国民党当局忙于在工人运动中消除共产党的影响时，其

---

\* 此次事件中，属于共产党方面的“红衣女郎”可能实有其人。有位回忆者称，共产党员齐槐琼（音）在与军警搏斗时就穿着一件红色羊毛外套，后来其他工人帮她换了衣服，躲过了追查。参见张祺：《回忆申九二二斗争》，《上海工运史料》1986年第1期，第26页。可是其他资料则称穿红衣服的嫌疑人实际是个男人。见高一仁：《申新九厂二二斗争纪要》，《文史资料选辑》1979年第3辑，第22页。

\*\* 上海总工会：《上海工人战斗在第二条战线》，未刊稿，1984年，第32~33页。陆京士本人很清楚共产党都集中在什么地方。1947年9月，他在工人福利会中成立了一个特别小组，专门从事反共活动。该小组集中注意力于公用事业部门，尤其是上海电力公司和法商电车公司，其次是机器业。



内部麻烦却进一步升级了。\*许多在南京国民政府十年时期效过犬马之劳的人物发现自己已经与国民党政权越来越离心离德。陆京士的老师杜月笙在抗战后返回上海时，曾希望当上上海市市长，可是蒋介石怕别人联想到自己的流氓出身，最终发表钱大钧为上海市市长。\*\*数月后，当上海市参议会成立时，杜月笙又想搞个议长当当。不料CC系又把前社会局局长潘公展推了出来。但最令杜月笙伤心的事发生在1948年秋，他的儿子被蒋介石的儿子蒋经国以违法进行股票交易的罪名逮捕。看到自己儿子戴着手铐的照片登在《中央日报》的头版，杜月笙差点气死过去，一连好多天都起不了床，以后便以养病为名，一个多月不出门，也不见客。可能正是由于这件事促使杜月笙在共产党占领上海之前去了香港，而不是去台湾。<sup>④</sup>

有些帮会闻人干脆不挪窝，转而与新政权合作。吴绍澍在失去了国民党党政职务后即开始与共产党搭上关系，解放后有了一个较好的出路和归宿。吴的骨灰后来葬在八宝山革命公墓。<sup>⑤</sup>人力车大王、青帮头子顾竹轩，同意与其侄子、一位共产党人合作，为其打通上海帮会方面的关系。中共上海地下党帮会工作委员会的会议最初都是在天蟾舞台二楼顾竹轩的经理室召开的。顾竹轩得到的回报是，1949年8月，上海市召开第一次各界人

\* 即便是陆京士麾下的工人福利会和护工队——前者人数膨胀至2000名干部，后者则包括了1万名武装工人——也是矛盾重重。以陆京士及其多年密友吴开先为首的“上海帮”和以社会部训练班出身的“南京帮”之间勾心斗角。此外还有一帮忠于朱学范，还有一帮“骑墙派”，后者对陆京士则完全三心二意。见《上海工潮与工运》。

\*\* 蒋介石疏远杜月笙的原因还不完全清楚。可能是产业结构的变化削弱了杜月笙作为劳工调停人的作用。日本人一投降，国民政府接管了该市许多工厂，政府代理人直接插手管理事务。关于不断增加的对产业部门的控制，可参见威廉·柯比(William Kirby)即将出版的关于全国资源委员会的著作。



民代表会议,他作为特邀代表参加会议。<sup>53</sup>

127 上海劳工领袖兼帮会闻人中投靠共产党的最著名一员,便是从前的邮务工会领导人朱学范。他是1936年7月参加国际劳工组织的中国代表,中共代表曾在日内瓦与他会晤过。在他们的邀请和安排下,朱于日内瓦大会后即秘密访问莫斯科,受到当时中共驻共产国际和工人党情报局代表李立三、康生的接见。此次会见使这位上海劳工领袖确信,在反对日本侵略方面,应与中共保持一致。回国后,朱充分利用第二次国共合作的机会,经常与八路军代表会晤。他建议要利用新成立的中国劳动协会——由国民党发起成立的全国性劳工组织——登记和武装全国工人,使之投入到反对日本侵略的斗争中去。1938年4月,朱被选为在延安召开的陕甘宁边区第一次劳动大会执行委员会名誉委员。\*朱学范在担任国民党旗下的中国劳动协会负责人后,宣布陕甘宁边区的总工会为中国劳动协会的集团成员。中国劳动协会还在上海、天津和香港等地吸收了数千名工人,在敌后开展抗日工作。<sup>54</sup>

儒雅的朱学范还利用他国际劳工组织代表的身份多次出国,为国内抗战筹措资金。他工作最有成效的地方是在美国,美国劳工联盟(American Labor Federation)答应从1943年开始,每年提供66.6万美元的支持。中国劳动协会的钱袋子突然鼓了起

---

\*周恩来在大会上讲话指出,在国统区有两种类型的劳工组织。一种是以朱学范为首的中国劳动协会,是爱国的、进步的;另一种是由国民党官员如陆京士之流控制的工会,实际是国民党的特务组织,是专门对付共产党的。周恩来的评论,尽管在时间上并不精确,但却有预见性。实际上,陆当时是中国劳动协会的负责人。1939年年底,陆被迫离任,由朱学范接任。朱指称,因为政府已批准该组织为国际劳工组织的合法代表,据国际劳工组织的规定,陆是政府官员,不宜担任此职务。见陆象贤:《中国劳动协会简史》,上海,1987年,第5~18页。

来,引起其他国民党官员的艳羡。1945年,朱被迫向马超俊和陈立夫发起反击,后者企图另立一个劳工组织,也指望从国外捞些美元。一波方平,一波又起。1946年9月,前中国劳动协会负责人陆京士出面,要求中国劳动协会驱逐共产党解放区的工会。当朱拒绝这一要求时,他的敌手便向国民党中央报告,说朱一直在秘密购置武器,准备发动叛变。<sup>⑤</sup>

朱对重庆高等法院发出的传票不予理睬,而是于11月12日逃往香港。<sup>128</sup> \*他的逃离招致美国方面对中国工人运动的慷慨支持宣告结束。也许是对这笔美国财富的失去感到愤怒,所以国民党有关方面在朱学范抵达香港后不过两周便企图加以暗杀。无论如何,共产党充分利用了此次事件团结这位受伤的劳工领袖。周恩来派刘宁一——五卅运动的参加者,多年来一直是共产党领导工人工作的干部——前往朱在香港所住的医院看望,向他转达中共祝他早日康复的问候。1947年7月1日,完全康复的朱学范与刘宁一道前往布拉格参加世界工会联合会大会。在后来的纽约和日内瓦的旅行之后,朱与刘再次在巴黎相遇。在刘的敦促下,朱同意回国访问解放区。1948年初,两人一道从莫斯科飞抵哈尔滨,在机场受到李立三的欢迎。李邀请朱参加当时仍在筹备中的劳动代表大会。在到达哈尔滨的次日,朱致电毛泽东和周恩来,对他们领导的革命表示衷心拥护。之后他着手协助

\* 据陆京士自己说,他极力劝说朱忠于党国。在朱逃离的前一晚,他还前往恳求:“我们中国人有中国人的主义。其他人可以背叛国民党,你和我却使不得。”见《五十年来中华民国邮工运动》,台北,1980年,第58页。一份中华人民共和国的资料表明,陆京士一直在给朱留在上海的家属支付生活费,直至解放。朱学范抵达香港后不久即写信给陆京士称,他还是不明白国民党为什么对他那样不客气。见“李建华(音)访谈录”,1962年9月8日,存上海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工人运动档案。



筹备即将召开的劳动大会。1948年8月1日，第六次全国劳动大会在哈尔滨召开，此次大会由解放区职工联合会筹备委员会和朱学范的中国劳动协会联合发起。大会决定恢复成立中华全国总工会。前商务印书馆职工陈云当选为新的全总主席，朱学范、刘宁一和李立三当选为副主席。<sup>⑥</sup>尽管中国劳动协会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不久即正式解散，但他的领袖并没有被忘记。朱学范，这位前帮会中人及邮务工会领导人，成为新中国政府的首任邮电部部长。

## 结 语

129

共产党在控制上海工人的过程中，变节帮会分子的合作具有很大的帮助作用。作为不可靠的盟友，帮会首领在国共两党权力更替之际选择了接近共产党。在这些黄色工会领导人的帮助下，共产党得以扩大在上海工人中特别是在那些较缺乏技术的工人中的影响。当然，地位较高的工人、尤其是白领职员和工厂工匠在革命的工人运动中仍是主干力量。

这些受过教育、待遇较好的工人幸运儿，按照佩里·林克(Perry Link)富有创见的说法，可归于“小市民”阶层。然而，据林克称，20世纪初的上海小市民，思想都很保守。相反，叶文心(Yeh Wen-hsin)则指出，许多共产党革命者都出身于这个小市民阶层。这两种显然矛盾的观点——对于上海小市民，一者强调其保守性，另一者强调其革命性——也许可以通过这样的观点加以解决，即激进的行动主义在动机上往往是保守的。正如汤普森(E. P. Thompson)在研究英国的情况时所发现的，坚持传统价值观的工匠往往是富有战斗性工人的前卫力量。<sup>⑦</sup>

这部分工人在最热情地投身于上海共产党工人运动中的人中占了很不相称的比例，就像本书第三部分将要详细论述的那样。内战时期国民党策略的改变及其随之而来的垮台，使共产党组织者更容易在上海工人的同情者中找到共同点。然而，强调共产党与熟练工匠的联盟，并不能解释革命最终取得胜利的原因。革命胜利的原因更多地存在于农村，而不是上海工人运动。<sup>①</sup>但是，革命者与工匠之间的合作关系并非无关痛痒。正如国民党深受他们与帮会领导的半技术性工人之间的关系的影响一样，建立在工匠而非无产者支持的基础之上的中共领导的工人运动（与人们以前的解释不同），对后来的中国共产主义特征产生了深远的影响。<sup>②</sup>

#### 注 释

① 对这一时期国民党权力衰落情况的分析，特别参见 Lloyd Eastman, *Seeds of Destruction* (Stanford, Calif., 1984)。关于共产主义工人运动重建的情况，参见齐武：《抗日战争时期中国工人运动史稿》，北京，1986年。

② 工人的反应是更为广阔的民族主义联合战线——其中学生、商人和其他社会集团发挥了关键作用——的一部分。关于学生情况，可参见 Jeffrey Wasserstrom, *Student Protest in Twentieth Century China: The View from Shanghai* (Stanford, Calif., 1991)；关于商人，可参见 Parks Coble, *The Shanghai Capitalists and the Nationalist Government, 1927—1937* (Cambridge, Mass., 1980)。

③ 《一二·九以后上海救国会史料选辑》，上海，1987年，第108～115页、第268～311页、第424～429页。

④ 《抗日战争时期上海工人运动》，载《上海工运史料》1988年第1期，第3页。

⑤ 张维桢、韩念龙和周林：《1936年上海反日大罢工回忆》，载《抗日风云录》，上海，1985年，第57页。对共产党在此次罢工中影响有限的分析，可

参见 Matthew H. Sommer, "Strikes in Shanghai Cotton Mills During the Nanjing Decade: A Case Study of the November 1936 Anti-Japanese Strike Wave," unpublished University of Washington seminar paper (1988).

⑥ 刘少奇:《关于白区职工运动工作的提纲》,1936年。引自《上海工运史研究资料》1980年第1期,第1~8页。(该文收入《刘少奇选集》时名为《关于白区职工运动的提纲》——译者注)

⑦ 张承宗:《刘长胜同志和上海局》,载《上海工运史料》1987年第1期,第8~9页。

⑧ 马纯古:《上海工运的现状报告》,延安,1941年,第62页。

⑨ 江柯林等:《上海工人运动简介》,载《上海工运史料》1986年第2期,第17~23页。

⑩ 许德良:《蚁社历史的回顾》,载《上海工运史研究资料》1981年第4期,第1~39页。

⑪ 《抗日战争时期上海工人运动》,载《上海工运史料》1988年第1期,第32~33页;《记益友社》,载《上海党史资料通讯》,1988年第10期,第25页。

⑫ 吴成芳:《在革命工作中运用帮会关系的片段资料》,载《旧上海的帮会》,上海,1986年,第25页。

⑬ 《抗日战争时期上海工人运动》,第6~14页;王建初、孙茂生:《中国工人运动史》,第209页;马纯古:《上海工运的现状报告》,延安,1942年,第62页;上海社会科学院编:《八一三抗战史料选编》,上海,1983年,第309页。

⑭ Eleano Hinder, *Social and Industrial Problems of Shanghai* (New York, 1942), pp. 49~51.

⑮ 张心宜:《商务印书馆重建党组织以后》,载《上海工运史研究资料》1983年第1期,第1~26页。

⑯ 1941年12月,公共租界有214家工厂关门,使2.2万名工人失业。这一衰变趋势延续至1942年、1943年,参见齐武:《抗日战争时期中国工人运动史稿》,第184~186页。

⑰ 王建初、孙茂生:《中国工人运动史》,第236~237页。共产党领导下

“表面上自发的”著名罢工是1942年和1944年发生在上海电力公司的“无头斗争”。参见《上电工人的“无头斗争”》，载《上海工运史研究资料》1982年第1期，第42~46页。

⑱ 这些与中共合作的帮会头目主要来自湖北、湖南和安徽。有几位并自夸曾跟随孙中山干过革命。见吴成芳：《在革命工作中运用帮会关系片段资料》，载《旧上海的帮会》，第24~26页。

⑲ 林震峰、杜伯儒：《怀念胡咏骐同志》，载《上海市保险业职工运动史料》，上海，1987年，第146~150页。

⑳ 上海市保险业党史资料征集组：《上海市保险业业余联谊会简史》，同上，第5~22页；施哲明、王亦洲：《“保联”歌咏组和口琴组活动片段》，同上，第125页。

㉑ 上海市保险业党史资料征集组：《中共上海保险业地下党组织的建立和发展》，同上，第31~53页。

㉒ 杨青：《“小草”成长史》，载《上海工运史研究资料》，1981年增刊，第1~5页。

㉓ 《有关上海百货业职工运动史料的几个问题》，载《上海工运史研究资料》1982年第3期，第1~17页。

㉔ 《上海船舶工业工运资料汇编》，上海，1986年，第73~185页。

㉕ 翁三新：《抗日战争时期上海党组织概况》，载《上海党史资料通讯》1988年第10期，第30~34页。

㉖ 在地下军已知的96人中，只有两人来自苏北，6人来自山东，其余均为江南人。见《上海工运史料》1988年第2~3期合刊，第52~54页。

㉗ 《综述上海工人地下军》，同上，第1~7页；张承宗：《组织地下军，准备武装起义》，同上，第8~12页；张祺：《回忆上海工人地下军》，同上，第13~18页。《解放日报》1945年8月23日，以及《新华日报》1945年8月28日，其标题为“50000上海工人暴动”。

㉘ 这些回归者的名单见于 *Shanghai Municipal Archives*, #12-1-52.

㉙ 还包括八路军俘虏，在被送回国内之前，这些人中的大部分都在北海道做了几年苦力。见同上，#11-1, 11-9。

㉚ 《中国技术协会八年》，上海，1987年。

- ⑳ 《解放前的上海物价》，上海，1961年，第330页。
- ㉑ 《上海百货业职工运动史料》，上海，1986年，第86~87页。在一些更传统的手工行业中，如酿造业，共产党更是直接与商店的管理人员打交道。见《上海酱醃业职工斗争情况》，载《上海工人运动历史资料》1954年第4期，第31~59页。
- ㉒ 毛齐华：《略谈解放战争时期上海工人运动的一些情况》，载《上海工运史研究资料》1982年第2期，第1页。
- ㉓ 齐武：《抗日战争时期中国工人运动史稿》，第188页。
- ㉔ 上海工人运动史料委员会：《关于上海六大公用事业工会的一些情况》，《中国工运史料》1980年第2期，第164~171页。
- ㉕ *Shanghai Municipal Archives*, #1-7-48.
- ㉖ *Shanghai Municipal Archives*, #D-5310-1.
- ㉗ 上海工人运动史料委员会：《上海电力公司工运历史记事》，《中国工运史料》（北京）1984年第2期，第174~208页。
- ㉘ 张先培：《解放战争时期中共上海市委组织概况》，载《上海党史资料通讯》1988年第12期，第30~34页。
- ㉙ 军统在抗战时期的活动情况，可参见 Yeh Wen-hsin, "Dai Li and the Liu Geqing Affair: Heroism in the Chinese Secret Service During the War of Resistance," *Journal of Asian Studies* 48 (1989): 545~562.
- ㉚ 毛齐华：《略谈解放战争时期上海工人运动的一些情况》，《上海工运史研究资料》1982年第2期，第3~5页。
- ㉛ 水祥云：《上海市两年来的工运》，载《市政评论》第11卷第1~2期合刊（1949年），第8页；邵新石（音）等编：《上海劳工年鉴》，上海，1948年，第38页。
- ㉜ 范绍增：《关于杜月笙》，载《旧上海的帮会》，第241页。
- ㉝ 郭兰馨：《杜月笙与恒社》，载《旧上海的帮会》，第316页。
- ㉞ 姜梦麟、毛子佩：《抗战胜利后上海国民党内部的派系斗争》，载《文史资料选辑》1979年第5期，第182~184页。
- ㉟ 《关于上海六大公用事业工会联谊会的一些情况》，《中国工运史料》1980年第2期，第167~168页。



④⑦ 《值得记取的一些教训》，《上海工运史料》1986年第2期，第29～32页；梁诚：《上电工人在“富通事件”中》，《上海工运史料》1987年第5期，第9～14页。

④⑧ 张祺：《回忆申九二二斗争》，《上海工运史料》1986年第1期，第20页。

④⑨ 金淦：《上海舞潮案》，《文史资料选辑》1981年第1辑，第152～160页；范锡品：《上海舞潮案亲历记》，《文史资料选辑》1979年第5辑，第190～199页；《上海舞潮案内幕》，上海，无出版日期，第4～22页。

⑤⑩ 转引自张祺：《回忆申九二二斗争》，《上海工运史料》1986年第1期，第28页。

⑤⑪ 范绍增：《关于杜月笙》，《旧上海的帮会》，第239～242页。据杜本人说，他曾与未来的上海市和中央人民政府的领导有着联系。见黄国栋：《杜门话旧》，载《旧上海的帮会》，第265～267页。

⑤⑫ 姜梦麟、毛子佩：《抗战胜利后上海国民党内部的派系斗争》，载《文史资料选辑》1979年第5期，第184页。

⑤⑬ 顾叔平：《我利用顾竹轩的掩护进行革命活动》，《旧上海的帮会》，第363～366页；另一个著名帮会分子转变立场的例子是向海潜，他是上海地区洪帮的主要首领，曾参加过辛亥革命。见《革命史资料》1981年第5期。

⑤⑭ 陆象贤：《中国劳动协会简史》，上海，1987年，第20～22页、第39页。

⑤⑮ 同上，第35～36页，第102页。

⑤⑯ 陆象贤：《中国劳动协会简史》，第103～121页；朱学范：《两岸工会合作，共同振兴中华》，载《人民日报》1988年8月25日。

⑤⑰ E. Perry Link, Jr., *Mandarin Ducks and Butterflies: Popular Fiction in Early Twentieth-Century Chinese Cities* (Berkeley, Calif., 1981), p. 5; Yeh Wen-hsin, "Shanghai's Petty Urbanites: Cultural Mobilization in Republican China," paper presented at the International Symposium on Modern Shanghai, 1988, p. 2; E. P. Thompson, *The Making of the English Working Class* (London, 1966).

⑤⑱ 关于农村的共产主义运动，特别参见 Ch' en Yung-fa, *Making Revo-*

*lution: The Communist Revolution in Eastern and Central China, 1937--1945* (Brekley, Calif., 1986).

⑤ 对这一问题的初步探讨，可参见裴宜理：*Labor Divided: Sources of State Formation in Modern China*，即将发表于乔尔·米格代尔（Joel Migdal）等人主编的一本书中。本书第二卷将继续对这一问题展开讨论。

### 第三部分 产业政治

对中国工人而言，导向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的三十年是个重要时期。然而，那个时期的事件，并非完全不可预料。先前的罢工经历使工人阶级内部的不同组成部分对现代各政党之挑战的反应颇不相同。

我们如何解释上海工人政治倾向的多样化呢？一方面，这种差异是因为祖籍地缘不同，来自全国不同地区的工人是带着不同的经历和期望来到这座城市的；另一方面，这种多样化是因为互相竞争的政党之计划不同，共产党和国民党深入工人之途径不同，相应地，工人们的反应也各异。但是，地缘政治和党派政治并非是对上海工人运动发生作用的仅有因素。生产过程本身也有助于工人阶级分裂成为不同的政治成分。在本书第一部分和第二部分，我们探讨了前两种因素，接下来讨论第三种。我们的目标仍然不是要孤立地描绘被讨论对象的变数，而是要讨论它们之间的相互关系。只有对文化、社会、经济和政治之间的相互关系加以认真的梳理，我们才能对中国工人运动有个全面的了解。

第三部分主要对上海三大产业——烟草业（第七章）、纺织业（第八章）和运输业（第九章）——中的工人骚乱进行个案研究。这三大产业之被选择，是因为它们对该市经济的重要影响，是因为其中的关键变数很能说明问题（如外资企业对华商企业、

工人中的性别构成和技术差异),以及因为相关资料比较丰富。我认为每种产业内部工人状况的不同导致了斗争方式的不同。在作出这一论断时,我参考了学术界将劳动过程与工人政治联系起来加以研究的成果。<sup>①</sup>正如这些研究所揭示的,市场地位和工作经历既能导致工人的团结,也能导致他们之间的竞争。<sup>②</sup>因此,要确定不同生产岗位上的工人为什么、如何实施不同的政治策略,对特定的产业和工厂进行深入考察是很有必要的。\*

正如我们在讨论地缘政治和党派政治时所说,技术熟练程度是解释工人阶级内部分层的一个关键变数。在此我们将对该问题作进一步的讨论,追究技术性工人、非技术性工人和半技术性工人在其政治取向和行动中之具体分界线。特定的工厂和行业在技术上往往有着特定的分层。就英美烟公司而言,我们可以看到非技术性的烟叶抽梗工和包装工、半技术性的卷烟工和熟练技工之区别。在丝织业,非技术性的摇线工和熟练的织工之间、甚至在不同企业的织工之间都有着清楚的界线。在运输业中,有技术的电车技工所占有的政治空间与半技术性的司售人员所占有的政治空间,其差异之大,就和半技术性的司售人员与无技术的人力车夫和码头苦力之间的情况是一样的。

技术程度并不是工作差异的惟一原因。性别对工作差异更有影响。男女工人在不同车间分别干活的情形往往使统一的集体行动难以收效。在许多行业,女工们最初比她们的男性同胞更容易发动罢工。在民国时期,随着罢工越来越趋向政治化,技术性和半技术性的男工开始更多地回应政党组织者发起的工会运

---

\* 正如查尔斯·蒂利(Charles Tilly)所说:“技术、工人组织、罢工能量和罢工成功之可能性之间的相互关系取决于公司、产业和劳动市场所表现出来的特征。”见蒂利:“Solidary Logics: Conclusion”, *Theory and Society*, no. 17 (1988):455.

动。\*对这种现象的解释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外来干部,他们当中绝大多数都是男性,他们很少能理解女工的重要性,也不知道在动员女工时采取适当的策略。\*\* 133

当非技术性女工真的参加党派计划时,她们的媒介常常是一批或者共产党或者国民党的妇女工作者。即便如此,她们的政治热情通常是短暂的。

女工往往倾向于停留在政党领导的工人运动之外,一个重要的例外是在丝织业。在该行业,由于美亚绸厂的改革,女工被欢迎进入技术性行列。许多来自浙江的女织工——都曾读过书——受雇工资都很高。其中不少人成了共产党员。换句话说,如果不是被迫处于生产等级中的较底层的话,妇女在对等的地位上会和男人一样积极参加政治活动的。

地缘政治(被南方文化和北方文化分割开来)和党派政治(限于国共两党的对立)可能是中国特有的情况——至少初看起

---

\*海迪·哈特曼(Heidi Hartmann)认为,男性工会会员往往不关心女工问题。见哈特曼: *Capitalism, Patriarchy, and Job Segregation by Sex*, in *Women and the Workplace*, ed. Martha Blaxall and Barbara Reagan (Chicago, 1976), pp. 137-169. 哈特曼坚持认为,男性工人倾向于支持雇主永远实施男女有别的措施,因为女人拿低工资,便只好被迫在工作中和家庭中处于附属地位。所以,据哈特曼说,男性占多数的工会往往对女工抱有敌意。然而,正如卢斯·密尔克曼(Ruth Milkman)的研究观点所认为的,男性工人对女工的同情和排斥主要取决于工作环境。在美国汽车行业——雇有少量女工——男工和雇主共谋,反对妇女捍卫其战时工作权利。可是,在电器制造业,男工支持消除女工工资上的歧视,以减少女工取代男工的可能性。见密尔克曼: *Gender at Work* (Urbana, Ill., 1987)。

\*\*将工人与男性等同起来,不仅流行于中国政治圈中,在西方也是一样。这种将工人与男性等同的典型看法,正如琼·司各特(Joan Scott)所指出的,不仅歪曲了工人政治,也歪曲了工人历史。参见 Scott, *Gender and the Politics of History* (New York, 1988), chaps. 3 and 4.

来是这样。相反,产业政治(区分为技术工人和比较缺乏技术的工人)对全世界研究工人问题的学者来说,一眼就可看出。在接下来的个案研究中,我试图揭示,众所周知的技术工人中的差异,既与民间文化(或地缘)、又和政治忠诚(或党派)有着密切的联系。尽管有些特殊的内容是中国独一无二的——确切来说是上海独一无二的——但我相信,其中的一般关系带有普遍性。

---

① Michael Burawoy, *Manufacturing Consent* (Chicago, 1979); Richard Edwards, *Contested Terrain* (London, 1979); Charles F. Sabel, *Work and Politics: The Division of Labor in Industry* (New York, 1982); Michael Hanagan and Charles Stephenson, eds., *Confrontation, Class Consciousness, and the Labor Process: Studies in Proletarian Class Formation* (New York, 1986); P. K. Edwards, *Conflict at Work* (Oxford, 1986).

② 对这一问题的考察,见 Michael Hanagan, "Solidary Logics, Introduction," *Theory and Society*, no. 17 (1988): 309 ~ 312.

## 第七章 烟草业

虽然卷烟生产在 20 世纪才进入中国产业行列,但很快成为国民经济的重要支柱。到 20 世纪中期,卷烟成为中国轻工业中的第三大产业,拥有 8 万多名工人。它在税收上可谓首屈一指,几乎占了工业生产所有税收的一半。<sup>①</sup>

卷烟生产于 1902 年被英美烟公司输入中国。烟草本身对中国人来说并不是什么新鲜事:从明朝末年开始,农民就把烟草当作一种经济作物广泛种植。但英美烟公司输进的大规模机器生产,加上灵活的广告战,带来了人们对卷烟前所未有的需求。眼看着人家财源滚滚,华商烟厂依照英美烟公司的模式,纷纷出现。英美烟公司登陆上海不过三个月,一家华商公司便建立起来,投入卷烟生产。次年,又一家华商工厂开工,但它无论是在质量上还是在数量上,都无法与英美烟公司抗衡,很快倒闭。<sup>②</sup>

直到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战争使西方商业利益受损——大批国内卷烟工厂才纷纷出现。1917 年,华商南洋兄弟烟草公司的一家工厂在上海开工。尽管有来自英美烟公司的残酷竞争,但南洋公司设法逐渐扩大市场份额。南洋的成功在五卅运动时期达到顶点,当时对洋货的抵制和外资企业的罢工如火如荼,南洋公司还为罢工基金大笔捐钱。然而,正如谢尔曼·科克兰(Sherman Cochran)所指出的,(后来的)国民党对华商卷烟企业的政策很不善良。国民党政权尽管打着民族主义的旗号(也

曾接受过南洋公司各厂主的捐献),却制订出一套有损于国内企业竞争力的税收政策。国民政府不是从长远目标来推动国内企业的发展,而是受最大限度地榨取税收的动机的驱使,所作所为损害华商企业的利益,因而有利于保持英美烟公司的繁荣。<sup>③</sup>

许多研究将经济繁荣与罢工活动联系起来。<sup>④</sup>所以,也不奇怪,英美烟公司在经济上获得巨大成功的同时,也伴随着非同寻常的工人骚乱。出于这个理由(以及可供进一步探讨的有关该公司的丰富档案资料的留存),我对上海烟草业反抗问题的探讨主要集中在英美烟公司身上。

在中国,没有哪家公司比英美烟公司更容易发生罢工了。在1918—1940年的22年间,该公司在上海的工厂共发生56起罢工。该公司罢工数量如此之大,既不是因为其规模,也不是因为它是外资公司,因为英美烟公司的工人比起罢工数量占第二的日本内外棉公司来说,人数不及其一半。<sup>⑤</sup>英美烟公司是在1902年由杜克美国烟草公司和英国帝国烟公司合并组建的,该公司容易爆发罢工,肯定与其经济上的成功有关。不管战争影响和政治混乱的状况如何,该公司的生产数据深刻揭示了其发展和恢复的能力(参见表4)。

英美烟公司最初的罢工,一般称为“摇班”,都是叶子间和包装间女工发动的短期行为。可是,在20世纪20年代初,中共在上海的第一位工运领袖李启汉,将技工作为其动员工作的主要目标。作为回应,青帮领袖随即在卷烟间的男性工人中组织起工会。尽管在几次全公司大规模的罢工中有过联合,但英美烟公司工人中的这些基本分裂仍存在了几十年。



表 4 英美烟公司在华各厂历年卷烟总产量

137

(单位:5 万支装箱)

年 份	产 量	年 份	产 量
1912 年	102700	1925 年	489160
1913 年	114460	1931 年	661081
1914 年	77620	1932 年	560687
1915 年	92100	1936 年	895756
1916 年	109260	1937 年	1124554
1917 年	115020	1938 年	858523
1918 年	153720	1939 年	857297
1919 年	240440	1940 年	869165
1920 年	267320	1941 年	819853
1921 年	277940	1946 年	77524
1922 年	307880	1947 年	302392
1923 年	399880	1948 年	246108
1924 年	557640	1949 年	178919

资料来源:《英美烟公司在华企业资料汇编》,北京,1983年,第212页。

## 劳动状况

要理解各车间工人分裂的根源,就必须搞清楚生产结构中工人及其工作场所的有关背景。如同大多数卷烟工厂一样,英美烟公司的生产也包括三个主要部门:烟叶部、卷烟部和包装部。烟叶部主要由叶子间的女工(负责手工抽梗、理好烟叶)构成。烟叶部也有一些男工分布在其他车间,从事烟叶的熏蒸、切割、烘

干和添加香料。卷烟部主要由男工构成,负责将叶子间送来的烟丝用机器生产成烟卷。包装部从事生产工厂中最简单的一道工序,就是把香烟装盒装箱。这一工作由锡包间的女工完成,虽然该部也有一些男工,他们用机器生产包装用品。此外,还有一个机器间,有技术的男性技工(一般都称为“铜匠”)负责修理全厂机器设备。<sup>⑤</sup>

每个部以及部里的每个车间,其工人的数量、技术水平、工资、性别和社会背景各不相同。虽然雇用工人的数量每年都有波动,但是基本分界线还是比较稳定的。卷烟厂的女工一直都是超过男工的,一般都超过10%左右。<sup>⑥</sup>这些女工几乎都在包装部工作(该部工人数量占全厂的68%),或者是在烟叶部的叶子间(占全厂工人的15%)。男工主要操作切割机器(占6%)或卷烟机器(占11%)。<sup>⑦</sup>另外,机器间还有350名男性技术工匠。<sup>⑧</sup>

138 不同部门的工人之间的相互影响,既要受到生产环节又要受到工厂规章制度的制约。一位前英美烟公司的工人曾回忆道:“我们工人不能四处走动。如果你在一个车间工作,走到另一个车间,要是被监工看见,就要挨打……厂里有几道门供男女分别进出。如果有人走错了门,就要挨打。”<sup>⑨</sup>

至少在五卅运动前,英美烟公司各车间工人之间的联系是很少的。<sup>⑩</sup>当五卅运动和上海工人三次武装起义的激动人心让位于国民党的镇压时,权力部门再次勒紧了缰绳。1932年,公司开始发放上厕所牌子,一个车间两块,目的就是要限制工人工休时的相互交往。<sup>⑪</sup>厂方又规定不同车间的工人必须穿不同的制服(由工人自己掏钱):烟叶部的女工穿蓝上衣和蓝围裙,包装部的女工穿蓝上衣和白围裙。<sup>⑫</sup>

所以,生产的性质和工厂规章制度的约束共同限制了工人团结的可能性。但是工厂招工方式本身可能是工人分裂的更深

层的原因。就像上海绝大多数其他企业一样，英美烟公司的工人主要由车间工头或拿摩温负责招收。招工程序大致是：想进厂的人通过一位朋友、有时是亲戚（几乎都是老乡），被介绍给拿摩温。新工人要给拿摩温一笔数量可观的介绍费，或是在上海一家大饭店宴请拿摩温一次之后，他或她才能上班。工人在与工头之间的长期私人关系中，被雇用仅仅是开始了第一步。要保住饭碗，工人就必须定期给拿摩温送钱送物，以表孝敬之心。<sup>④</sup>有位英美烟公司烟叶部的工人回忆道：“管我们的那位拿摩温有位阿哥，开了一家大饼店。他要我们都买他阿哥店里的大饼。可是呢，这些大饼都是当天早上卖剩下来的，又冷又硬，我们就不想买。但是一旦发现哪个不买，他立即就让人家丢了饭碗。”<sup>⑤</sup>车间内部关系的封建方面因为父母将饭碗传给子女（事先当然要经过拿摩温的同意）而得到进一步的加强，此种制度名为“顶替”，与当今中国一些工厂采取的顶替并没有什么两样。<sup>⑥</sup>

在一定程度上，车间是个半独立的领地，上级部门对它的控制是很有限的。在1932年的报告中，英美烟公司经理里迪克（I. G. Riddick）对缺乏统一管理大叹苦经，他说，不同的车间都有自己的记工、加工资、处罚等行为标准，而且往往都是互相矛盾的。在有些情况下，工人在一个车间以不胜任为理由被解雇，但立即就被另一个车间雇用。<sup>⑦</sup>然而，虽然许多高层领导者对这种多样性抱怨有加，但他们也无意于修改这种用工制度，因为它在其他方面还颇有效。中国的拿摩温在其部门拥有雇用和解雇工人的权力，使英方主管者在许多方面省了不少心事，但这是以厂内各个车间形同独立王国为代价的。

全厂可能没有哪个部门的劳动条件比烟叶部更令人窒息了。就像一位工人所回忆的：“烟叶部的生活就像童养媳一样。我们只许和拿摩温讲话。平时连大气都不敢出一声。”<sup>⑧</sup>烟叶部的室



内温度很高,为了保证烟叶不破损,还要保持很大的湿度。冬天,室内室外的温度相差达 80 摄氏度,许多工人都患有慢性支气管炎。当烟叶被抽梗、被撕成小片时,空气中充满了尘粒。黄色的蒸汽弥漫在车间里,使得工人们汗和痰都现出一种浅黄色。不少工人因为要与湿热的烟叶长时间接触,他们的衣服往往湿透,手上起泡。<sup>⑨</sup>烟叶部的工人——他们主要来自苏北和浦东——把自己在这种杂乱、肮脏的环境下的劳动称之为“垃圾生活”。<sup>⑩</sup>

烟叶部的劳动环境为工人反抗创造了成熟的条件。正如一个工人回忆的那样:“我们车间特别容易起来斗争,因为车间里到处灰尘弥漫,眼睛都睁不开。外国监工从来不踏进一步,中国工头要戴着面纱才能进来。”<sup>⑪</sup>确实,英美烟公司的不少罢工都是从烟叶部发动起来的——烟叶部女工的计件工资比厂里其他车间女工的还要低一些。<sup>⑫</sup>

140 卷烟部——通常被视为“厂里最重要的车间”——与烟叶部的情况形成了鲜明的对比。绝大多数卷烟工在被允准操作机器前都有十年以上的工作经历,因为他们的技术水平在很大程度上决定了公司产品的质量。卷烟部主要由半技术性男工构成,辅以年少学徒,该部工人拿的是计日工资,而不是计件工资。<sup>⑬</sup>由于他们的工作培训都是在厂里进行的,卷烟工比起其他工人来对管理层要忠诚得多。卷烟机操作工常常通过虚拟的亲缘关系和帮会徒弟的身份与工头有着密切的关系。<sup>\*</sup>和烟叶部一样,大多

\* 在英美烟公司通北路厂,卷烟部的工头在其所管工人中不但成立了关帝会,还成立了拳社。见《英美烟公司在华企业资料汇编》,北京,1983年,第1116页。在该公司的花旗厂,拿摩温是个帮会分子,与青帮劳工领袖陆京士以及浦东土匪关系密切。他手下的卷烟工都拜他为“继爷”,他把他们孝敬的礼金投入一家赌场和皇后剧院。“访谈录”,1963年7月18日,上海社会科学院经济研究所。

数卷烟部工人都来自苏北(尤其是扬州和南通)和浦东。<sup>9</sup>

包装部大部分由女工构成,她们负责用锡箔包好香烟,再装人烟盒、纸板箱和金属听。许多工人都是从绍兴招来——通过他们同乡的某个拿摩温的介绍。<sup>10</sup>这些在包装部的南方女工的工作没有她们在烟叶部工作的苏北同胞那样繁重,但工资却比她们要高一些,也许是她们的祖籍地缘的市场价值有高下之分吧。\*

与烟厂三大部相分离的是机器间,这里雇用了绝大多数技术工人,从事工厂机器设备的维护。此处有超过四分之一的人是钳工;其余则是铁匠、木工和泥水匠等匠人。他们都训练有素,能看懂图纸。据我们所知,他们的技术水平比全市绝大多数机器厂的工匠的水平要高不少。<sup>11</sup>所以他们的工作有很大的市场需求。\*\*

正是从英美烟公司来自江南的工匠身上,共产党工运领导者发现,他们最容易接受并坚信共产主义。机器间在厂内所处的位置理所当然地成为工人罢工的催化场所。在英美烟公司浦东厂区,机器间就坐落在最后面,技工们举行罢工时,从厂里走出来,要路过各个车间。<sup>12</sup>

工人阶级的分裂还反映在他们的工资收入上。在 20 世纪 20 年代中期,英美烟公司的工人成功地举行了一系列的罢工,厂方不断让步,以致人们把在该公司工作称为“金饭碗”,因为工

141

\*对英美烟公司包装部的工人工资较高与祖籍地缘有关系的怀疑从南洋兄弟烟草公司的工资统计中得到了证实。参见《南洋兄弟烟草公司史料》,上海,1958年,第301页。

\*\*当南洋兄弟烟草公司在1925年开办新厂时,厂方想聘用英美烟公司的技工。为了留住自己的熟练技工,英美烟公司被迫给他们加薪50%。参见“英美烟公司浦东新厂技工访谈录”,1963年11月21日,上海社会科学院经济研究所档案。



人的工资高、待遇好——尤其是与该市其他产业工人相比的话。<sup>8</sup>有份共产党的报告在评价英美烟公司工人令人羡慕的工作环境时，很是失望地说：“一到放假，这些工人就进城寻快活，或是待在家里搓麻将。只有部分工人有正当消遣。”<sup>9</sup>不管这种总体而言的舒适环境如何，该公司不同部门工人的劳动条件是相差很大的。1926年，机器间技工的平均月工资为30元以上，卷烟部操作工是20元以上，而包装部的女工平均是13元，烟叶部的女工则平均每月只有10元多一点。据厂方估计，在上海，以一家五口为标准，一个技工的工资能抵上一家开销的125%，半技术性的卷烟工能抵92%，而普通女工仅能抵57%。<sup>10</sup>这种工资差异因为女工是计件工资（烟叶部以烟梗重量的多少来计算，包装部以装盒装箱的数量来计）、男工是计日工资而显得更加明显。还有，在待遇上也是女不如男。男工一星期有50~100支香烟的补贴，而女工一年才区区50支。<sup>11</sup>

## 地缘性分裂

上海卷烟业的工资反映了技术水平、性别和地缘祖籍的差别，后者反映了该产业部门的资本源泉。民国时期，上海出现了许许多多的小烟厂，绝大部分都由来自浙江的小商人创建，很自然地，他们喜欢雇用本省人当工人。所以，上海卷烟业工人有45%来自宁波绍兴地区。南洋兄弟烟草公司是上海第二大卷烟生产企业，由广东人创办经营，也是从家乡招收工人。上海卷烟工人中有5%来自广州地区。英美烟公司至1925年时雇用的工人，占了该市卷烟工人的1/4多，其资本占了英国在沪资本的70%多。该公司的许多工人来自浙江（如“绍兴帮”），但更多的人

来自江苏——以上海卷烟工人的总数而言，浦东人占 25%，苏北人占 15%，无锡、常州人占 5%。<sup>⑧</sup>

地缘祖籍的影子还反映在行为举止上：

烟厂里的工友，江南人占多数，衣服比较入时和清洁，因此在表面上看起来，都觉得烟厂工人的生活比较惬意。烟厂里，一班落后的工人，往往看不起穿破衣的工友，所以，有些工人没有钱，就是向别人借点钱，也要做两件衣服穿穿，特别是在过年过节，或是哪一位工友结婚的时候，为了要应付朋友，竟至用很大的利息去借钱……有好多工人，家里实在很穷，但是因为害怕别人讥笑他，在表面上也不得不假装好汉。<sup>⑨</sup>

关注外表表明了一种个人荣誉感，由此或许也可说明卷烟工人非凡的反抗水平。此种行动主义与地缘祖籍之关系十分密切。

因为来自同一地区的工人往往集中于特定的车间，地域文化和工作经历相互作用，产生了一股强有力的工人行动主义的力量。共有的生活方式、方言和娱乐活动导致了工人行动亚群体的产生。厂方不是不知道来自同一地区的工人集中在同一部门工作的危险性。可是打破这种关系可能更成问题。一位前南洋兄弟烟草公司的工人曾回忆道：

南洋公司绝大多数工人都来自宁波或广州，他们都有很强的地域观念。如果卷烟部的工人被某个广州人踩了一脚，就免不了打斗。宁波人打广州人，显然违反了厂规。所以广州籍工人便要求开除打人的宁波人。但我们宁波人坚决不答应。吃饭时我们就用饭碗砸广州人的头。弄得生活也做不成了。当时卷烟部的工头是宁波人，而工厂总经理是广州人。所以各帮工人都有保护伞。最后，我们工人就分成了两帮。<sup>⑩</sup>



烟厂(以及上海绝大多数其他工厂)这种将工人以地缘关系分割开来的状况,有助于解释早期工人运动规模小而分散的特征。\*

143

上海卷烟业历史上的第一次有记录的罢工发生在英美烟公司,时间是1906年,中国当局逮捕了为首者,罢工很快被镇压下去。这场最早的罢工失败的阴影沉重地压在工人们的心头,在隔了将近十年后,他们才重新采取了类似行动。但是当公司从经济萧条走向复苏时,正值第一次世界大战时期,因而也遭遇到了新的工人斗争形势。1915年初,烟叶部的女工突然罢工,要求增加工资,这一次,她们很快接受了厂方的条件,回厂上班。一年后,该公司约100多名临时工举行罢工,抗议削减他们的工资。<sup>⑤</sup>

英美烟公司接下来的罢工可没那么好解决了。1917年夏,包装部的工人起来抗议厂方削减她们的记件工资。1000多名罢工者破坏生产设备,强行阻止其他工人进厂上班,用雨伞之类的东西攻击警察。罢工持续了三周,最终以厂方妥协告终。次年春天,包装部女工再次罢工,但这次只有装箱间女工参与。她们抗议厂方以削减装箱间女工的记件工资来拉平整个包装部工资的计划。锡包间的女工——工资一向很低——显然未曾参与。<sup>⑥</sup>

几个月后,包装部的学徒工300多人突然罢工,抗议新任总经理作出的延长工时的决定。这些少年聚集在附近的一座庙里庄严宣誓:要求得不到满足决不复工。可是,一个星期后,包装部的工头雇了两个帮会分子来捣乱。这两人在包装部有不少徒弟,破坏这次罢工可谓轻车熟路,罢工者马上复工。总经理对两人能

---

\* 南洋公司的第一个工会是在总经理和总监工的促成下建立的,两人都是广州人。在由21名工人组成的指导委员会中,有19人是广州人。见 *Shanghai Municipal Police Files*, I. O. -4831.



迅速解决麻烦印象深刻，立即将他们收到公司里，开给他们薪水，以便在关键的包装部将来再出麻烦时派上用场。<sup>⑧</sup>

1919年10月，烟叶部的女工——约有500多人——因对公司加夜班的决定不满而发动罢工。<sup>⑨</sup>次月，烟叶部的女工再次拒绝上班。这一次，厂方满足了他们加工资的要求。几天后，该部男工也拒绝上班，直到厂方同意相应提高工资。<sup>⑩</sup>

1920年春，包装部的女工突然罢工，抗议厂方的重组计划，但在厂方对新计划的好处做了解释之后，工人们恢复上班。次年，烟叶部的女工又发动罢工，对厂方改变记件方法表示不满。包装部的女工被调来取而代之。三个月后，还是在烟叶部，女工们又发动了一次罢工，要求增加工资，结果仍然没有成功。之所以失败，是因为几个女工头被调换了。<sup>⑪</sup> 144

虽然这些早期罢工留存下来的资料过于简单，无法做进一步的分析，但总体情况是清楚的。在这十年中，英美烟公司各厂发生了12次罢工，一半是在共产党干部进入之前发生的，有10次是由女工发动的。另两次由学徒工和男工发动的罢工是在其本部门的女工罢工之后发动的。

烟厂女工的行动主义与有些学者在其他地方的研究结果相符。在对19—20世纪之交的俄罗斯工厂女工进行研究的报告里，罗丝·格里克曼(Rose Glickman)注意到：“烟厂女工特别容易激动、战斗和坚持。”她解释说，这种行动主义——超越了其他产业部门女工的行动主义——很可能是“更多的城市生活经历、受过教育和更长的工作经历，以及同在一个屋檐下的优越感，这些因素综合起来的结果”。<sup>⑫</sup>路易斯·蒂利(Louise Tilly)在米歇尔·佩罗(Michelle Perrot)研究的基础上也指出，法国烟厂女工的罢工水平达到了令人吃惊的程度。她说：“比起绝大多数其他女工来，她们的工作环境要好，工资要高。有学徒期、子女可以顶



替父母的岗位、一生都有固定工作，这些因素综合起来，为烟厂女工团结并组织起来提供了机会。”<sup>145</sup>

格里克曼和蒂利对烟厂女工和其他行业的女工做了很好的比较，但他们没有对同厂的男工和女工进行比较。要是英美烟公司的早期罢工有迹可寻的话，对公司内部的情况进行比较，一定会为烟厂女工之行动主义带来令人惊奇的发现。然而，有意思的是，这些早期罢工在动机上都是防御性的。无论她们的雇主多么富有，英美烟公司的女工们总是要遭到削减工资的威胁，此时她们便容易起来抗议生活状况的恶化。英美烟公司的案例还有助于提醒人们，仅就代表女工利益的行动主义而言，将其视为男女平等的萌芽是不可取的。在同一个工厂的不同部门，女工们不会联合罢工，偶尔还会在其他部门举行罢工时搞破坏。即便是在同一部门里，女工们还因工种的关系互相区别开来。

## 共产党的介入

如果说妇女行动主义——被生产部门分割——是英美烟公司早期罢工的主要形式的话，那么，1921年夏共产党组织者的出现，就使事情变得复杂起来了。当年夏天，英美烟公司的技工聚集一道，抱怨新任机器间英籍监工的所作所为。这位新监工比其前任要严厉得多。当看到机器间有人违犯纪律，他十分愤怒，将每位技工的工资扣去五分钱，同时对继续偷烟偷吸者处以罚款。对新监工打破习惯的行为，技工们宣布以罢工相抵制。<sup>146</sup>

英美烟公司的技术性机器工人发起的抗议（不像几个月前非技术性女工发动的罢工），吸引了年轻的共产党人的注意——这个新成立的党以开展战斗性的工人运动为宗旨。将机器工人

视为有发展前途的支持力量预示着早期共产党人的行动动机。该市第一个共产主义工会就是上海机器工会。因此,很自然的,英美烟公司技工们发动的罢工(可能是在刚成立的上海机器工会的鼓动之下,也可能是受了一个月前广州机器工人成功举行罢工的影响)引起了共产党的注意。两天后,年轻的共产党工运组织者李启汉被派到英美烟公司罢工者聚集的一个寺庙里。李捐了一些钱,尽管很少,却使工人们得以在寺庙附近租了一间办公室,作为动员全公司工人罢工的指挥部。在李的指导下,工人们推举代表,起草罢工要求,这些内容在寺庙举行的工人大会上获得通过。他们的标语显示了党派色彩:“劳工神圣!”“还我血汗!”“争还工人人格!”<sup>66</sup>

当罢工进行两周时,厂方决定用金钱收买工头王凤山(青帮小头目)来破坏罢工。对王的背叛,罢工者决定狠狠揍他一顿,李劝工人要克制。结果,这一斗争过程令人高兴的是,王凤山的立场转变过来。对于这种转变,李启汉在《劳动周刊》发表文章加以赞扬——该周刊是共产党控制的中国劳动组合书记部(当时在上海)的刊物。在这篇经常被人引用的文章中,李启汉表达了对工厂工头所处境地的同情,指出,他们工作时间长,收入低,许多工头都是青帮头目,与许多普通工人中的帮会分子关系密切。他呼吁这些“工头先生们”以王凤山为榜样,与工人并肩走在一起。<sup>67</sup>

幸亏由于能发挥作用的下层工头的“返回”,以及罢工者坚持不妥协,罢工最终在8月10日取得了胜利——从开始到结束有二十多天——厂方同意了罢工者提出的所有条件。当月晚些时候,李启汉帮助工人进一步巩固其胜利成果,在当地寺庙举行的另一次工人大会上,宣布成立英美烟公司工会。在李的建议下,这个新成立的工会办事处设在中国劳动组合书记部。<sup>68</sup>

李启汉领导英美烟公司罢工所取得的成功，并不完全归功于他对马克思主义的热情。他的青帮身份也很重要——在1921年之前他就加入了青帮。也许，李的帮会身份使他比较容易劝说烟厂工头和青帮头目王凤山站到罢工工人一边。但是当英美烟公司工会成立时，李启汉不允许帮会工头参加。正如张国焘——时任中国劳动组合书记部主任（李启汉是书记部干事）——在回忆中所说：

浦东卷烟工人的胜利使共产党人深受鼓舞，这个胜利无疑使劳动组合书记部很快为自己的工作确定了方向。给李启汉的印象尤其深刻……他以前就认为有必要以调解的方式来青帮“老头子”的工作，他加入秘密帮会也正是出于这种考虑……然而，从一开始我们就不同意这种做法，必须用一种新的斗争策略来反对“老头子”。可是，李宣布，在将来，我们要坚持这一新政策。<sup>①</sup>

李启汉为自己的一意孤行付出了高昂代价。1922年6月，李启汉被与帮会有联系的警察逮捕。英美烟公司工会被勒令停止活动。虽然该工会不久就在浦东纺织工会内以“卷烟工人俱乐部”的名义恢复活动，但在9月，纺织工会也被迫停止活动。<sup>②</sup>上海一份发行量最大的英文报纸在分析当局采取反对工会的行动时说：“（工会的）煽动不仅仅限于它是引起工人骚乱的普通原因，有时它还与一些阴谋集团有关，这一点是确凿无疑的。也许，人们关于劳工们被政客为了自己的目的而利用之类的话说得太多了，可是沟通两者之间的组织在我们周围随处可见。”<sup>③</sup>

## 帮会因素

对政治化工会的害怕，并没有阻止英国人寻求帮会控制的劳工组织的帮助，就像他们在1922年11月所做的那样——当时英美烟公司正在举行一场在共产党援助下的抗议，要求恢复纺织工会，承认工人俱乐部的活动。面对可能发生的又一场伤脑筋的罢工，英美烟公司将当地歹徒邵炳生及其新成立的产业道德协进会（青帮在浦东的一个组织）拉拢过来。邵提出条件，只要是他的徒弟，就能获得比共产党支持的工会之谈判结果更好的待遇，他招收了300多名卷烟工做徒弟，并怂恿他们越过警戒线，回厂上班。<sup>⑨</sup>

由于怀疑公司买办汪薇舟是邵的幕后策划者，数百名工人冲入汪的住宅，撕毁床单衣物，打碎碗盏家具。工人的暴力更加激怒了公司方面，即刻解雇了数百名罢工者——几乎全部是机器间的工人。次日，工人全部复工。虽然罢工未能达到最初的要求，但厂方却不得不考虑对最早复工的300名工人加以补偿。据产业道德协进会声称，他们的忠心应该得到补偿，在厂方没有满足其条件的情况下，他们自己举行了为期两天的静坐抗议。在厂方答应补偿其在罢工期间的工资后，他们才开动机器。<sup>⑩</sup>

如同我们所见，即将成为工人组织者的共产党与青帮两个阵营之间令人担心的关系在20世纪20年代初就已十分明显了。年轻的共产党人在完全不熟悉的领域开展活动，发现有必要加入青帮，向工厂里的帮会分子摇动橄榄枝，寻找在上海工人运动中的立足点。但此时又轮到帮会中人模仿共产党的组织方式了。共产党人成功地组织工会的方式，促使帮会头目组织起他们

自己的协进会之类的团体。这种平行策略伴随着共产党—帮会后来的活动长达二十多年。两者互相取长补短,在处理上海工人事务中越来越高明。但从英美烟公司的情况来看,无论是就共产党还是就帮会方面来看,同样的策略在工人中不会起到同样的反应。共产党发动者最成功地开展工作的对象是来自江南的熟练技工,而青帮头目集中力量于卷烟工身上,这类男工比较缺乏技术,工资较低,绝大多数都来自不那么发达的地区。卷烟工们的工作相对没有保障,所以不大愿意向现状发起挑战。就像一位卷烟工人回忆的那样:“那个时候,我们还没有呐喊的觉悟。”<sup>⑨</sup>

半技术性工人和非技术性工人尽管不可能自行发动一场政治性抗议,但在任何大规模工人运动中,他们都是基本的参加者。为了将这些参加普通斗争的工人与进行更激进斗争的工匠联合起来,在20世纪20年代的上海,帮会和共产党人之间往往联合行事。这种联合在一定程度上影响到了1925年7月爆发的席卷全市、规模大、时间长、令人吃惊的五卅运动。

## 五卅罢工

英美烟公司的工人在1925年的五卅运动时期罢工四个月,其时间之长,在上海工人运动史上独一无二。由恢复活动的工会管理的一个基金会,每周发放罢工补贴,使工人们在一个相当长的时间里保持了团结。在厂方答应增加工资、改善劳动条件、没有正当理由不得开除工人的条件后,罢工才宣告结束。

这场罢工很令人感兴趣的特征之一便是包装部女工的突出作用。罢工开始于6月4日,当天,公司所属第三烟厂(在黄浦江西面)的几位男性技工过江到浦东,告诉工友们市区里发生的戏

剧性事件。送信者到达浦东厂区时正值中午，他们跳上凳子，向正聚集在厂房外吃午饭的工人大声宣布其消息。首先表示出兴趣的是第二烟厂包装部的女工，她们立即宣布罢工。罢工旋即蔓延到机车间，然后蔓延至公司里的所有工人——总数约 1.5 万人。<sup>⑤</sup>

包装部女工不仅是首先宣布罢工的，而且在该公司的宣传队中特别活跃——穿行于市区和周围农村地区，激发人们对罢工的认识，为坚持罢工募捐钱物。包装部女工发起罢工已经非同寻常，她们积极参与政治性大于经济性的全厂大罢工更是一种新现象。这一成果应该归功于新成立的上海总工会领导成员之一的杨之华。杨之华二十五年前出生于浙江省一个破落的地主家庭，1923 年进上海大学社会学系读书前在家乡小学教过两年书。在上海大学，她结识并嫁给了瞿秋白（瞿当时是社会学系的主任），还加入了共产党，开始从事女工工作。正如上海大学一位学生回忆的那样：“因我与秋白、张太雷都是同乡，我常到秋白家玩。有一次见到杨之华，她一身纺织女工打扮……杨之华在女工中开展工作是很出色的，深得女工的信任和尊敬，这是由于她深入女工，关心女工的生活、婚姻、孩子、住房等问题，做许多细致的工作，才能与工人打成一片。”<sup>⑥</sup>杨之华把关注女工的日常生活当作动员她们参加革命的一种工具。为了掩盖其激进主义，她和其他工会分子经常在玉佛寺召开会议。这些妇女穿着简朴，很容易逃过当局的侦查。当时有些男干部开玩笑说，杨之华本人就是一个信徒，到所有的庙里都烧过香。她反驳道：“做个叛教者不是一件好事吗？”<sup>⑦</sup>

尽管杨之华努力工作，但她在 1925 年 4 月的一份报告里指出，她与英美烟公司的“骨干分子”未能建立联系。为了便于她开展工作，共产党干部将他介绍给浦东祥生船厂工会的负责人。该

船厂是上海最老的造船厂之一，离英美烟厂不远。该厂的熟练技工主要来自浙江，其工会负责人的妻子与英美烟厂的许多工人都是老朋友。因此，她就把杨之华介绍给她在包装部的两个同省人。杨与这两个女工结拜姊妹，得到了进入烟厂工人中的机会。<sup>⑤</sup>这位年轻的女干部——人们都称之为“杨大姐”——发展了包装部的几位女工为罢工积极工作。其中一位回忆道：

150 当杨之华来厂里演讲男女平等时，我才真正意识到，光是在我家里，就存在不平等现象。我们姐妹三人都要做工，以供我们的一个弟弟读书。当男女学生来到我们厂里时，我由于害怕人家闲言碎语，不敢和男生讲话。我想：“这些学生都出身于有钱人家——特别是那些女学生，肯定都出身大富之家才能读得起书。可她们为什么又那么善良呢？”<sup>⑥</sup>

在杨之华利他精神的感召下，包装部的许多女工开始投身于五卅运动。这些女工十几个人一队，走向农村，唤起人们对罢工的同情和支持。女工们在大街上募捐，在她们的劝说下，不少店员和学生纷纷将硬币投入她们的募捐篮子。然而，在农村，女工们就没有遇到那么多的同情了。就像有位工人回忆的：“杨之华组织我们包装部的女工到农村去，宣传‘五卅’的意义。我们拿着竹篮，站在凳子上，向村民们演讲。那些农民见到这种情形，就骂我



们,还喊道:“你们少啰嗦。你们吃饱了,没事找事,是吧!”\*

农民与烟厂女工——从她们的时髦穿着上就可知道她们都是浙江人——的隔阂显而易见。还有,籍贯背景也使这些烟厂女工相对容易接受来自浙江的年轻知识分子的领导。英美烟厂包装部的女工通过地缘纽带和结拜姊妹的关系与杨之华连在了一起,所以,她们愿意全身心地投入到“五卅”大潮中去。

这些妇女并不是出于对共产主义事业的觉悟来参加这场罢工的看法,还可从1958年对朱泉发的访谈中看出来。朱是包装部的工人,曾是五卅运动时期罢工委员会中的工人代表。他对来访者提出的有关共产党卷入这场罢工的问题感到非常惊奇,他说:“你提到了,我这才认识到是共产党领导我们闹罢工的。……我们当时之所以那么做,是因为我们认为做得对。”<sup>⑥</sup>朱在包装部的一位工友的认识更为模糊:“我对罢工没什么认识……人们上街游行,我就跟在后头……在四个月的罢工中,我们得了不少罢工补贴。我们想:‘不上班也能拿钱,真是大好事。’我们根本没有其他认识。当工厂复工后,大家又回去上班了。”<sup>⑦</sup>

151

罢工补贴对有些工人来说,很有诱惑力,但对另一些工人尤其是要靠工资养家糊口的人来说,这点钱就远远不够了。\*\*另一位罢工者回忆道:“来自苏北的女工,手牵着她们饥饿的孩子,

\* “赵笙英和赵银英访谈录”,1957年2月21日,上海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工人运动档案。此次罢工基金的最大份额来自中国厂商,他们当然欢迎其对手的罢工。渴望从英美烟公司窘境中获利的南洋兄弟烟草公司向总罢工基金捐款10万元。这笔钱占了全部捐款中的20%。见 Sherman Cochran, *Big Business in China* (Cambridge, Mass., 1980), p. 178.

\*\* 绝大多数资料都说,罢工工人每周可领到罢工补贴2元。这是烟叶部女工常规工资的80%。这样的话,这笔钱就只占到一个五口之家生活开支的约40%。参见《英美烟公司在华企业资料汇编》,北京,1983年,第1043、1173页。



来问工人代表,罢工最晚到什么时候才能结束。”<sup>60</sup>即便是工人代表朱泉发的罢工热情也很快消退。正如她在解释她为什么要退出工人运动时所说的:“我结婚后,负担很重,越来越缺乏勇气。因为我有小孩,开销很大,就没法参加斗争了。”<sup>61</sup>虽然共产党干部在上海这场历史性的五卅运动中无疑起着领导作用,但是,我们同样要看到,传统的地缘关系、虚拟血缘关系和帮会关系在动员过程中仍然发挥着巨大作用。人们熟悉的实用主义内容比起新兴的意识形态热情更能解释许多工人投身罢工的原因。

无论绝大多数罢工者的意愿是如何温和,英美烟公司的工人在“五卅”大罢工中还是获益匪浅的。工资增加了,工作环境改善了,还补发了罢工期间的工资。英美烟公司意识到,长时期的罢工将使其竞争者在日益增长的卷烟市场占据更大的份额,必须迅速恢复元气。在复工几个星期后,这个跨国公司再次宣布自己占据了市场的主要份额。<sup>62</sup>

五卅运动结束后,在英美烟厂,工人们为了反抗工头的压迫,为了增加工资,经常举行小规模罢工。但这些举动影响不大,通常在一两天里就可解决。<sup>63</sup>直到1926—1927年间上海工人三次武装起义爆发之时,英美烟厂才又掀起了罢工风暴。

### 三次武装起义

152 上海三次工人武装起义时,英美烟厂的工人又站到了斗争的前列。比五卅运动更有意义的是,各车间工人的行动协调一致。<sup>64</sup>在第三次武装起义前几天,烟厂工人接到指示,要将装在一具棺材里的一批武器用舢板在夜深人静之时运过黄浦江。3月21日中午,烟叶部、卷烟部和包装部的机器同时停工。在大约70

名事先指定的负责人（其中许多人是共产党员）的带领下，工人们涌出厂外，准备参加武装斗争。<sup>⑤</sup>工人们用斧头、棍棒、刀子、手枪、手榴弹以及爆竹武装起来（爆竹放在煤油桶里点燃，以增加战斗气氛）。他们很快融入浦东其他各厂的工人队伍之中，向当地警察局进发，将驻守的警察打败，缴获了储藏的武器。关于当时那历史性的一幕，一位烟厂工人回忆道：

在第三次武装起义的前一夜，开了一次会，会上宣布，将在次日下午两点钟行动。第二天下午一点四十五分，我们关了机器。不久，来自日华纺织厂、祥生铁厂和小南洋烟厂的工人冲到我们车间喊道：“同志们，有徽章的，就请亮出来！”我们的徽章是一块白布，有豆腐干那么大，上面写着几个字，其他人则是红色的。这些徽章一两个月前就发下来了，发的时候叫大家藏好，不要让人家看见，连家里人也不要让知道。保存这些徽章就像生死大事一样，它们都被放在各人在厂里替换衣服的箱子里，而不是放在家里。现在，我把徽章拿出来，别在身上，跟随大家冲了出去。在大门口与涌来的男工会会合，我们来到第三区警察署。警察们惊恐至极，乖乖地把枪交给我们。然后我们行进到第四区警察署，发现当官的都逃跑了，武器扔了一地。用武器把我们自己武装起来后，我们列队前进——就像士兵一样。我们轮流站岗，维持公共秩序。<sup>⑥</sup>

军阀部队被起义工人吓破了胆，很快逃离，浦东落到了工人的手中。第三次武装起义的胜利极大地鼓舞了人心。在赶走孙传芳的军队，控制整个城市之后，工人们开始准备迎接北伐军的到来。一位前英美烟厂的工人回忆道：“我们兴奋异常，因为军阀部队被打败了。革命胜利了。我们再也不会受帝国主义的压迫了。有人甚至说物价也要下降了。”<sup>⑦</sup>

153 工人代表朱泉发回忆道：“我晓得国民党(北伐军)正在路上,我梦想他们来了,我们工人就有救了。”<sup>⑧</sup>3月22日,有1000多名英美烟厂的工人参加了上海临时市政府的成立大会。为了进行自治,英美烟厂的工人成立了以李长贵为首的工会。李是一位共产党员,也与青帮有关系。具有讽刺意味的是,新工会就设在买办汪薇舟从前的公馆里。汪公馆在1922年罢工时遭到工人袭击,那以后,汪就搬到公共租界去住了。工会之外,还成立了由数百名工人组成的“工人纠察队”,负责维持浦东厂区一带的秩序。<sup>⑨</sup>

## 国民党政权统治下的英美烟公司

工人的世界好景不常。在那场哈罗德·艾萨克(Harold Isaacs)称之为“中国革命的悲剧”里,国民党撕碎了他们与共产党、帮会和工人结成的共同反对军阀政权的统一战线。<sup>⑩</sup>在那场大屠杀中幸存下来的共产党人绝大多数都逃到了农村,从而将中国革命从无产阶级的斗争转变成为农民的斗争。但是,激进派组织者的成群退出并不意味着上海工人运动的终结。对许多工厂来说——还是以英美烟公司为首——南京国民政府十年时期仍然是一个充满激烈冲突的阶段。

由于罢工不断,工会遗产得以留存下来。在令人激动的五卅运动和三次工人武装起义时期,共产党人匆忙间成立了许多工会,这些组织在四一二政变的白色恐怖中并未完全瓦解。英美烟厂工会是在四一二政变前的一个月成立的,6月5日在国民党训令——“以三民主义为指导,改进工人生活条件,发展卷烟产业,推动国民革命”——下重新组成。<sup>⑪</sup>李长贵仍为工会主任,但

在常务委员会中增加了两个青帮分子：顾若峰\*和陈培德。

在国民党统治下，环境发生了变化，这个恢复起来的工会发现了许多行动的机会。正如帕克斯·科布尔 (Parks Coble) 和谢尔曼·科克兰 (Sherman Cochran) 的研究显示的，上海资产阶级和国民党之间的早期关系并不像以前学者们所说的那样融洽。<sup>②</sup>新政权严重依赖上海的资本家，从他们那里获取财政支持，以维持其统治。光是在卷烟业，据 1927 年 7 月公布，新的烟草税增加了 50% 的幅度。

已经习惯于前军阀政权时期优惠税收条款的英美烟公司，154拒绝缴纳新定税额，于 7 月 26 日将其位于浦东的一家烟厂关门歇业，导致 8000 名工人失业。公司解释道，由于经济环境不适宜，不得不关门。其用意显然是针对新税额的。公司的合作工会立即作出反应，谋取南京方面的支持，宣布对英美烟公司的产品加以抵制。由于害怕自己继续遭到抵制而面临严重的经济危机，公司决定在 8 月 15 日重新开工。而且，它还表示愿意与工会进行谈判，同时补发歇业工人两天的工资。<sup>③</sup>

然而，烟税问题并未解决。其重要性在 9 月 30 日爆发的一场罢工中显露出来。当时烟叶部工人要求增加工资，实行八小时工作制。黄色工会加以调停，但罢工继续迅速扩大。一个星期里，该公司其他部门工人纷纷卷入，罢工人数超过 9000 人。

虽然 9 月罢工是因工人的实际利益而发动起来的，但接下来的谈判却是在国民党官员和英美烟公司工会的顾若峰、陈培德之间进行的，工会吁请公司纳税。以宣传税收问题为交换，工会领导得到了政府财政上的支持。一位研究埃及工人的学者指出：“决定工人政治方向或组织形态的不仅仅是生产过程或政府

\* 由于史料记载不同，顾若峰也作顾若凤。——译者注

对作为一个种类的‘工人’的态度。更重要的是取决于政府对特定产业的导向。”<sup>⑧</sup>国民党政权对英美烟公司的敌意,在该公司延续将近四个月的罢工中发挥了关键作用——此次罢工在南京国民政府十年时期为时最久。

为了挖这个跨国烟草巨头的墙脚,国民政府找了几种方法来从经济上支持罢工者。首先,动员中国卷烟企业——最著名的是南洋和华成——向英美烟公司罢工基金捐款。上海社会局负责工人事务的处长张廷灏在回忆自己卷人这一策略中的情况时说:

155

我去见上海国民党农工部的头头周至远,商谈我与一些华商卷烟厂接触,鼓励他们向英美烟厂罢工工人捐款的计划。由于英美烟厂罢工,华商企业就能多出产品,最终占领英美烟厂的市场。华商企业赚得多,就能向罢工基金捐得多,就能让英美烟厂无法开工。如此,他们就能拖垮英美烟厂。<sup>⑨</sup>

张的计划很快付诸实施。据英国警方报告说,南洋公司向英美烟厂罢工基金捐了2万元,华成烟厂捐了1万元。<sup>⑩</sup>这些慷慨捐献并非仅仅是张廷灏劝说的结果。政府制订了一个补助这两个华商公司的特别计划,推动它们积极支持罢工。南洋和华成被允许以票面70%的价格购买印花税,然后再以15%的折扣处理(给小厂商)。这项计划所产生效益的2/3被划拨给英美烟厂工会。<sup>⑪</sup>

国民党对罢工的支持还不仅限于这种间接的支持。“工统会”在10月初宣布,它将向一系列工会活动提供经济支持,包括印刷1.5万份传单和海报。<sup>⑫</sup>国民党劳工部部长马超俊在一份机密备忘录中透露,他私人向罢工基金捐款2000元,王晓籁捐了8000元(王是青帮闻人,还负责上海市卷烟处的事情)。在得知英美烟厂工会还缺钱向工人发放补贴时,马超俊指示财政部划

拨2万元给英美烟厂工会。马超俊指出,英美烟公司一年要交数百万的烟税,单是出于这个原因,就值得支持工人罢工,以迫使公司遵守新税则。就像马超俊所指出的:“英美烟厂压迫工人是小事,但它拒绝向国家纳税却是大事。”<sup>⑧</sup>

国民政府的倾力支持使英美烟厂工会深受鼓舞,针对公司的宣传攻势一浪高过一浪。宣言、声明不断发表,旋即又被各大报刊登载。工会在一份声明中宣称:“我们要把经济斗争转向政治斗争,把劳资纠纷变为国际争端。我们受够了国际资本主义的残酷压迫,现在要成为与它斗争的先锋。”<sup>⑨</sup>当英国派海军进驻该厂时,工会声称中国领土主权遭到了侵犯,将罢工定为“外交事件”,目的在于保卫中国主权、抵制洋货、发展国货、声援工人。<sup>⑩</sup>

在罢工目标中,工人的福利要求被降到了最末一位,这与极富政治野心的工会头头陈培德和顾若峰的想法是相符合的,他们就是要急于拍新上台的国民政府的马屁。甚至作为工会主要领导人的李长贵也准备接受国民党予以支持的条件。一位老工人回忆道:“原来李长贵是我们中的一员,但后来被他们拉了过去。他们向他按月付钱。”<sup>⑪</sup>

156

然而,不管表面上如何叛卖,李长贵继续强调工人要求的重要性。为了让李彻底闭嘴,陈和顾指控他与共产党有关系。11月30日,一队警察直奔李家,搜获了四袋共产党的小册子。这位年轻的工会领导人立即被捕,旋被判处两年监禁。<sup>\*</sup>

随着李长贵在画面上的消失,陈培德和顾若峰得以随心所

\*《上烟一厂工厂史》,无日期,上海社会科学院经济研究所。李长贵的政治立场问题还是悬案。据他自称,他在四一二政变前不久加入共产党,一直在执行上面的指示。见“李长贵访谈录”,1958年8月12日,上海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工人运动档案。但是采访他的人发现,他的谈话“有不少疑点”,并得出结论说,“这个人的政治立场尚不清楚。”



欲地推动工会与国民党订立同盟。但是，一场由政府出钱支持的罢工，也可以由政府发布命令加以制止。1928年初，温文尔雅的财政部部长宋子文与英美烟公司之间的谈判有了结果。最终协议是在上海豪华的宋公馆里举行的一次午餐会上签订的，公司答应向国民政府支付300万元，政府减轻公司税额，同时公司必须承认工会，改善工人生活状况。<sup>⑧</sup>为了安抚工会，公司在缴税后，按月拨一笔钱给工会。<sup>⑨</sup>每个工人也发了十元钱作为罢工期间的补助，至1月18日，工厂复工。

顾若峰和陈培德现在开始着手巩固自己的地位了。正如一位老工人所回忆的：“陈和顾勾结起来，让李长贵坐牢。此后两人就无法相容，开始各自培植党羽。”<sup>⑩</sup>顾若峰的势力主要在第二烟厂，因为他以前在那里做过小职员。陈培德以前在公司仓库干过，拉拢的支持者绝大部分都在第一烟厂。工会选举前，两人各自大摆宴席，发放毛巾等礼品，作为拉选票的手段。<sup>⑪</sup>顾若峰和陈培德两人之间的竞争反映了他们各自所拜的青帮老头子——杜月笙和黄金荣——之间的分歧。尽管这两位青帮大亨在四一二政变时曾携手合作，但国民党政权确立后，新的机遇出现，刺激了杜月笙的野心。为了扩张势力，杜甚至打算挖其从前的师傅黄金荣的墙脚。因此，杜的门生陆京士，当时是淞沪警备司令部军法处长，把英美烟厂工会主席陈培德（黄金荣的徒弟）抓了起来，说他有共产党嫌疑。后经黄金荣亲自出马，向司令杨虎直接说



情，陆才将陈放出。\*黄金荣在后来谈到此事时仍是愤愤不已：

我因受苏州同乡陈世昌的推荐，在法租界开办的烟赌事业中，起用了杜月笙。这是大家所晓得的。开始时，他叫我黄老伯。北伐军胜利到上海，四一二清党前不久，蒋介石来上海，在龙华机场上，我亲自把杜月笙介绍给蒋介石……清党后，我的徒弟陈培德，杜的徒弟陆京士、周学湘等，成为上海工会的头子，但陈的办事能力远不及陆等……杜的声望远胜于我。从此以后，杜在电话里，不叫我黄老伯，而改口为金荣哥了，我感到真不是味道！<sup>⑥</sup>

虽然黄金荣渐渐失去对青帮的控制，但他仍有能力通过上海国民党权力部门的朋友关系来救他的门生陈培德。

地方当局愿意、甚至是鼓动青帮内部派系分立。在英美烟公司，这种对立情形很快就演化为正式的受资助结构。据英美烟公司总经理里迪克(I. G. Riddick)在一份秘密备忘录中说，上海国民党当局从每月烟税中可得到1750元，除留下550元自用外，其余的给英美烟公司工会分作三份：500元给陈培德那一帮，

\* 黄振世：《我所知道的黄金荣》，载《旧上海的帮会》，上海，1986年，第177页；程锡文：《我当黄金荣管家的经过》，同上，第164页。此事具体时间不明。布赖安·马丁(Brian Martin)和爱德华·哈蒙德(Edward Hammond)根据台湾方面的史料，认为此事发生在1927年末，但没有提及陆京士卷人的情况。见Brian Martin, "Tu Yueh-sheng and Labour Control in Shanghai," *Papers on Far Eastern History*, no. 32 (1985): 99-137; Edward Hammond, "Organized Labor in Shanghai" (Ph. D. dissertation,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1978)。可是，中国方面出版的回忆资料，确切说明军法处长陆京士在其中起到了关键作用。由于陆在1932年才担任此职，故这一事件应发生在那前后。见《大流氓杜月笙》，北京，1965年，第56页。次年，黄与杜之间在解决南洋兄弟烟草公司的劳资纠纷事件上又斗得难分难解。见 *Shanghai Municipal Police Files*, D-4611。

158 500元给顾若峰的“绍兴帮”，200元给第三个小帮派。这种地方政客与工会头子共生的现象，使里迪克联想到了“坦慕尼厅”。<sup>⑧</sup>

有政府做后台，工会头头们就有胆量向英美烟公司上层发起挑战。陈培德在第一烟厂的一系列罢工中特别具有煽动性。由于在卷烟部有一批忠实的追随者，陈培德搞罢工就从那个车间着手。正如毗邻的包装部一位女工回忆的那样：

那些日子发生了多次罢工，但是我搞不明白。我所知道的就是跟着第二车间（卷烟部）干。从我们的车间可以听到他们车间机器的声音。他们要罢工，声音自然停了。然后他们就向我们喊：“我们已经关机了。想加工资的就赶快加入进来。”我们就停止工作，罢工很快蔓延到其他车间。我们锡包间的女工，猛敲锡罐头，吵闹着要加工资。<sup>⑨</sup>

陈培德卷入这些抗议激怒了公司。1931年初，公司试图以迫使工人罢工的名义将他解雇。但经上海市政府社会局和公安局调查，发现指控陈培德的罪名不能成立。<sup>⑩</sup>

无论陈培德与其他工会头头的关系如何，地方当局对英美烟公司工人运动的发展并不完全放心。1931年底，李长贵被从监狱里释放出来，又开始在英美烟厂工人中开展组织工作。有一次，李率领100名工人，手拿铁棍，占领工会。《北华捷报》将此次事件描绘成为“共产党试图控制当地工人的直接结果”。李长贵再次被捕，二进监狱。<sup>⑪</sup>

由于在工会选举时烟叶部和包装部的工人之间发生了一系列严重争端，当局再次对英美烟公司工会事务进行了干涉。选举被国民党上海市党部勒令停止，同时命令公安局严防工会中的“反革命活动”（实为防止共产党插手的一种借口）。<sup>⑫</sup>不久，公安局就逮捕了在英美烟公司通北路厂做技工的四名共产党员。这四人曾带领100多名追随者袭击当地警察署，但失败了，他们意

在抢获武器后发动工人起义。<sup>⑨</sup>

由于害怕共产党影响在英美烟厂的复活，国民党当局便有意加强与烟厂工会领导人的联系。可是，对厂方而言，国民党走狗煽动的罢工几乎与共产党领导的罢工一样可恶。为了根除来自任何一方的隐患，英美烟厂决定下一帖猛药。1934年5月12日早上，在第一烟厂的大门口竖立起一块牌子，宣布第一烟厂将永久关门。厂方的借口是，该厂厂房和设备已经老化，无法继续使用。但实际原因是，第一烟厂既是1925—1927年间共产党发动罢工的“中心”，最近又成了陈培德的据点。一位老工人一语道破天机：“浦东老厂的工人富有战斗性，有一年发生的怠工和罢工高达83次。因此，洋人才下决心关闭工厂。”\*

陈培德和顾若峰认为厂方的目的就是要压垮工会，两人暂时联合起来，在第二烟厂发起一场同情罢工。5月21日，全厂工人同时罢工。这一次，南京政府又秘密拨款为罢工工人发放补贴。<sup>⑩</sup>这次罢工到7月4日才结束，为时6个星期，虽然公司方面答应给失业工人发放解雇费，但工人们未能达到要求重开第一烟厂的目的。只是在陈培德接受了公司很大一笔钱以后，工会才草草收场。<sup>⑪</sup>

1934年的争端是陈培德工会组织事业走下坡路的标志。陈一向把劳资纠纷视为一个升迁的台阶，最终从杜月笙徒弟朱学范手中夺过总工会的头把交椅，结果却是竹篮打水一场空。现在呢，他发现自己已然失宠于国民党上海市党部，那里也已充斥着杜门中人。10月28日工会选举时，陈培德及其苏北追随者占了

\* “马殊兰访谈录”，1963年7月18日，上海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工人运动档案。1927年6月18日的 *The Shanghai Times* 报道说，该厂关门是因为无利可图。1927年5月28日的 *The China Press* 则报道称：“据说工人桀骜不驯。”

压倒优势。这个结果却被地方党部宣布为非法。两个月后,在国民党上海市党部的主持下,重开选举,陈培德在工会里干了七年的职务被解除。\*

## 共产党的收获

160 从工会与厂方打交道的有限成功中醒悟过来,并对工会日益严重的宗派主义和贪污腐败深恶痛绝,有些工人开始另谋出路。\*1934年,包装部的一些女工在浦东女青年会夜校学习后,思想变得激进起来。在年轻的共产党老师(其中包括江青,当时叫蓝苹,她每周在浦东女青年会夜校教两次歌)的影响下,有两位包装部的女工加入了共青团。\*\*但其中一位很快离开英美烟厂,去参加了新四军;不久,浦东女青年会夜校的老师大部分都被逮捕(包括蓝苹),罪名是从事破坏活动。

共产党的动员工作在包装部陷于困境,在机车间却收到了

---

\* 英美烟公司失业工人在寄给南京国民党中央的一封信中,指控工会贪污政府向失业工人发放的补贴。据写信人说,工会头头们从1828年初宋子文同意划拨钱款用作工人福利之事开始,就一直有计划地中饱私囊。见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 #722: 4-232。

\*\* 《战斗的五十年》,第109~113页; Roxane Witke, *Comrade Chiang Ch'ing* (Boston, 1977), p. 84; “徐佩玲(音)访谈录”, 1958年9月3日,上海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工人运动档案。当年,上海十家卷烟厂的女工组成一个抗日会。当时一份共产党的报告说:“可惜的是,当时参加的全是女工,连一个男工也没有。当然,这不能说是男工比女工更落后。”见朱邦兴等编:《上海产业与上海职工》,第597页。1941年3月,英美烟公司有6名工人因为进行地下抗日活动而被开除。尽管我手头的资料没有说明他们的性别,但其中一名来自烟叶部,另外五名来自包装部。据此,他们大多——如果不是全部的话——都是女工。见《英美烟公司在华企业资料汇编》,第1071页。

成效。一位名叫山根宝的技工经他一位做邮务工人的邻居的介绍参加了救国会。不久山根宝在英美烟厂组织了一个读报会,激发工友们的爱国主义感情。1938年夏,山加入共产党,此后的一年里,他又发展了两个技工工友入党。1940年初,烟厂党支部成立,山任书记。这个新成立的支部组织了一个储金会,机车间有60多名工人参加(占该车间工人总数的20%)。<sup>⑧</sup>

珍珠港事件之后,英美烟公司落入日本人的魔掌。公司机车间是上海最早的机器厂之一,日本人试图将它变为军工生产企业。山根宝发动工人怠工,以延迟其过程。次年秋天,机车间工人的行动主义又如箭在弦上,这次工人是为了要求以大米配给抵消飞涨的物价。在包装部女工的推动下,罢工很快蔓延到了其他车间。最晚响应的是卷烟部。一位前卷烟工说:“我记得很清楚,当第三车间(包装部)的女工来的时候,我们还在机器旁工作。他们关了机器,我们才停止工作。”<sup>⑨</sup>经过四天罢工,日方经理终于答应实行大米配给。<sup>⑩</sup>

161

然而,总体上来说,在日本人统治下,工人罢工受到了严重限制。军事镇压和经济制裁像一把双刃剑,抑制了英美烟厂工人战斗精神的发挥。只是到战争结束后,该公司工人才重新恢复了倔强好斗的名声。

## 内战时期的斗争

1945年夏日本人投降后,山根宝及其同志们决定恢复建立左派工会。他们的第一次筹备会议是在一位机器工人的家里举行的。当时机车间的共产党活动受到了极大限制,<sup>⑪</sup>相反,卷烟部由青帮分子兼国民党党员洪梅全控制,洪在十年前与顾若峰和



陈培德关系密切。他是一个老卷烟工，在卷烟部有一个有势力的结拜组织。抗战胜利后，由于顾和陈被指定负责上海总工会筹备委员会的工作，洪的名声很快响了起来。洪穿着一身光鲜的西服和亮闪闪的皮鞋，出入于最高档的舞厅。在被引见给青帮工人领袖陆京士之后，洪加入了陆的工人福利会，经陆同意，他又被任命为 1946 年成立、经政府批准的英美烟公司工会主任。工会常务委员会的另外三人中，有两人是共产党或是同情共产党的机器工人。\*

对共产党来说，急迫的是如何解决其活动在工人中受限制的问题。正如一份关于英美烟公司情况的中共党内报告所说：“我们所有的基础都在铜匠间，与其他车间没有足够的联系。尽管我们有些人在其他部门工作，但我们无法在那里大批发动群众。”1946 年底英美烟公司中共党员的情况如表 5 所示。这些人

162

表 5 1946 年年底时的英美烟公司共产党员情况

工作部门	中共党员数量
铜匠间	12
烟叶部	5
卷烟部	4
办公室	1
印刷间	1
学校(教师)	2
总计	25

资料来源：调查局档案(台北)，#556.282/810。

\*《战斗的五十年》，第 165 ~ 175 页；调查局档案，台北，#556.282/810。抗战岁月并未消弭陈培德和顾若峰之间的矛盾，两人的关系仍像以前那样紧张。但在目前，顾由于与陆京士结盟，在比拼中渐占上风。洪梅全显然是顾-陆阵营中人。

中没有一个是妇女。<sup>⑧</sup>

可以肯定,技工是个活跃的群体。1946年夏,山根宝带了二十多名技工参加反内战示威游行。次年春天,他又组织他们参加反冻结生活指数的游行。然而,这些活动过分显眼,技工们受到了越来越严密的监视。要使英美烟厂的工人继续保持战斗性,就必须将活动基地转移到一个较少受到监视的车间。<sup>⑨</sup>

1947年夏,当要求发放星期日工资的气氛弥漫于英美烟厂工人之中的时候,山根宝及其他共产党组织者做出了一个大胆的决定,把斗争的领导权让给一些信得过的卷烟部的工友。一位罢工领导者回忆道:“当时反动工会正在密切注视着铜匠间。因为铜匠们已经很‘红’。我们卷烟工被指派发动这次罢工。我是黄色工会头头洪梅全的结拜弟兄。卷烟部的工头也是洪的结拜弟兄,所以洪某对我们车间没起疑心,没有将我们车间的工人列入黑名单。”<sup>⑩</sup>

这次罢工的成功,以及当年晚些时候发生的一次争取季度奖金的斗争,一步步地削弱了洪梅全的力量。在后面的那次斗争中,由于总经理拒绝工人发放季度奖金的要求,一批铜匠包围了他的办公室。公司所有高级管理人员都被堵在里面,过了好长时间才被国民党军队解救出来。<sup>⑪</sup>工人们虽然显示了很强的战斗性,但仍然没有达到自己的目的。当工会头头洪梅全在顾若峰——当时已是社会局劳工纠纷调解处处长——的陪伴下,从社会局的一个会议上回到厂里的时候,两人的脸上泛着红光,说明两人刚刚吃饱喝足。这两人含糊其辞,把厂方不妥协的立场复述了一遍。聚集起来的工人都很懊丧,他们原本希望在阴历新年放假之前能听到好消息。<sup>⑫</sup>

无论国民党工运头头如何丢尽面子,但对革命者而言,从这时到新中国成立的一段时间也不是一帆风顺的。1948年春,随

着山根宝被国民党秘密特务抓获，共产党组织者遭遇了一系列挫折。<sup>⑧</sup>第二年另有十名工人被捕——六名来自机车间及其下属的修理间，两名来自卷烟部，两名来自烟叶部。<sup>⑨</sup>这一时期为数不多的、由共产党领导的罢工发生在包装部，组织者是两位十五年前就加入共青团的妇女（其中一位刚从新四军回到英美烟厂）。<sup>⑩</sup>

直到1949年春国民党逃离上海之后，共产党才彻底控制了英美烟厂的工人运动。山根宝从监狱释放出来，担任了该厂一个新成立的工会的主席。他的敌手洪梅全虽然接受了厂方补贴，允许其无限期休假，但是，他最终还是回到上海，与新的工会领导人达成和解。他在公安局的朋友保护了他一阵子，但他最后还是在1951年4月30日被捕，当时正值镇反运动。<sup>⑪</sup>

## 结 语

在英美烟公司落入共产党的掌握之后，该公司工人编成一部给人以深刻印象的工运史，跨度将近半个世纪。当然，毫不奇怪，中国的工运史学者十分关注英美烟公司的工人，把他们称之为模范的无产阶级战士。尽管从性质上来说，英美烟公司工人的抗议模式与上海其他卷烟厂的情况没什么不同，但它的表现更为显著。为了解释这个跨国公司突出的斗争水平，中国学者特别指出了它的外资企业的属性，认为帝国主义的剥削激起了爱国工人的激烈反抗。谢尔曼·科克兰从同样的角度分析了英美烟公司的工人反抗与其对手华商企业的工人反抗之间的差异：“卷烟业工人投身于……经济民族主义，在罢工中的反映就是：英美烟公司比南洋公司更容易发生罢工，尽管前者的工资要高，比起



西方公司也不算低。”但我要指出的是，英美烟公司的高工资实际上恰恰是引发更大罢工倾向的导火线。高工资——反映了企业的繁荣——一般都与更高的罢工频率联系在一起。1925年，在两大烟草公司竞争的高峰时期，在华英美烟公司的实收资本高达9938.5万美元，而南洋兄弟烟草公司只有491.6万美元。<sup>④</sup>这些数字表明，英美烟公司比它的中国对手富得多，它们各自的罢工比率（1918—1940年间，英美烟公司发生了56次，南洋公司发生了8次）有不协调之处。公司的繁荣程度比起外资企业性质更能说明这种不协调。\*

重要的是要认识到，英美烟公司的案例主要并不是一部爱国的、革命的工人阶级为了他们自己的利益在斗争中联合起来的历史。相反，它是一部外来党派——帮会、政府当局以及年轻的共产党知识分子——通过种种重要的竞争途径而形成的一部历史。最重要的是，这是一部揭示工人自身复杂性的历史。英美烟公司的工人虽然有时会采取联合行动，但他们本身却被技术程度、性别和地缘祖籍等因素区别开来。这种区别使得工人运动复杂化，有些参加者成了共产主义革命的热情拥护者，有些则追随国民党及其青帮走狗，有些则自行其是。

在这方面，英美烟公司并非独一无二，将它与华商南洋兄弟

---

\* 外资企业之富裕容易导致罢工倾向。而且，就1927年英美烟公司的罢工情况来说，由于事关“民族主义”税收，外资属性意味着罢工工人可以得到来自南洋公司和国民党政府两方面的重要的财政支持。然而，工人访谈录中从来没有提到民族主义是英美烟公司绝大多数罢工的促动因素。对利润分配不公的怨恨比起外资企业的属性来说要重要得多。只是在“五卅”、“五四”和三年内战时期高度政治化的罢工浪潮中，民族主义在工人动员中才发挥了主要作用。

烟草公司的情况比较一下就可明了。一位前南洋公司工人曾这样回忆他们厂里的情形：

165 卷烟部分为两部分：“新车间”——工人主要来自上海，和“老车间”——工人都是广东人。1922年，厂里成立工会，我们要求发放补贴和增加工资。但是谈判刚刚开始，资方给了每位工人代表300元，装在香烟罐头里。接到这笔贿赂后，来自老车间的广东籍代表便停止代表工人说话。所以，我们决定成立一个新工会，以铜匠唐远为工会主任，取代邝公耀（国民党党员）。\*

两年后，另一位铜匠挺身而出，发动了南洋公司历史上代价最大的罢工。1924年9月，铜匠姚宝富对新颁布的工厂规则表示不满，同时要求收回解雇两位女工的成命。当厂方拒绝了这些要求时，全厂——有5000余人——举行罢工。尽管罢工没有成功，但却得到了来自共产党方面的强有力的支持，后者利用南洋公司的这场罢工作为发泄对国民党右派厌恶情绪的一个机会。\*\*

---

\* “黎琳访谈录”，1958年4月17日上海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工人运动档案。在1924年的南洋公司罢工期间，唐远被开除并被捕，判处监禁六个月。释放后，他当了江南船厂的一名技工，不久便被提升为机器间工头。他因工伤事故而早逝，实在是工会行动主义的损失。

\*\* 《南洋兄弟烟草公司史料》，上海，1960年，第328~347页；Cochran, *Big Business in China*, pp. 172~176. 在偶像化传记的叙述中，共产党干部向警子据认为代表中共领导了此次罢工。见李明：《悼向警子同志》，载《烈士传》，南京，1949年，第231页。尽管向警子领导烟厂工人罢工（以及同年领导缫丝业工人罢工）的确切性质尚不清楚，但公众对中共与罢工之间关系的关注是不可否认的。可参见以下各期《向导》：第83期，1924年9月17日；第84期，1924年9月24日；第85期，1924年10月1日；第96期，1924年12月24日。

如果说技工是“激进”罢工的煽动者的话，卷烟机操作工就是青帮工运头头的动员对象。这种情况不仅英美公司如此，南洋公司及其他卷烟厂的情况也是如此。虽然青帮卵翼下的卷烟工人们有时会自发举行罢工，反对资本家，但他们通常是在心怀不满的青帮工头指使下行事的。\*这些工人贵族与国民党之间的密切关系使得半技术性工人成为支持国民党的重要后备源。

非技术性女工，虽然最初是站在卷烟业罢工最前列的，但她门一般都不愿意卷入持久的政治使命之中，部分是因为非技术性工作的不稳定，部分是家庭的压力，部分是因为外来干部对她们的疏忽或感觉迟钝。当工人组织者（如五卅运动时期的杨之华）真正能给予她们关心时，女工们并非不愿意接受领导。可是，这些事例极少，绝大部分烟叶部和包装部的女工仍然游离于共产党和国民党的控制之外。

就地缘祖籍、性别比例和技术水平的混合情况来说，各厂有各厂的样，但总的轮廓是清楚的。就同一家工厂不同车间的工人来说，文化背景和工作经历的相互作用，造成了有明显差异的政治倾向。而且，这些差异不仅局限于一厂一地，而具有跨行业的共同特征。与本厂的烟叶部和包装部那些非技术性工人比较而言，英美烟公司的铜匠在许多方面与技术性丝织工人有更多的类似之处。然而，企业内部的分裂并不会让中国工人阶级裹足不前，相反，这种情况奠定了各种不同的、有时是充满激烈竞争的工人政治模式的基础。

\* 1933--1934 年间南洋公司发生的劳资纠纷即是一例，见 *Shanghai Municipal Police Files*, D-4611, 1935 年福新烟草公司的情况也是如此，见同书，D-7107。



## 注 释

① 《中国近代工业史资料》，北京，1957—1961年，第4卷第1册，第455页。

② 同上，第446页；Sherman Cochran, *Big Business in China* (Cambridge, Mass., 1980), chaps. 2 ~ 3.

③ Cochran, *Big Business in China*, pp. 176 ~ 185, pp. 188 ~ 195; 《中国近代工业史资料》，第4卷第1册，第447页。

④ 参见本书第二部分前言第二段。

⑤ *Shanghai Strike Statistics, 1918—1940*.

⑥ 《上海卷烟工业概况》，上海，1950年，第35~42页；《烟与烟叶》，上海，1934年，第49页；“郝立祥访谈录”，1958年6月10日。上海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工人运动档案。

⑦ 英美烟公司浦东档案，#75/33、#60/8，上海社会科学院经济研究所。

⑧ 同上，#214c。

⑨ 同上，#75/33、#60/8；《英美烟公司在华企业资料汇编》，北京，1983年，第223~224页。

⑩ “李新宝访谈录”，1958年8月11日，上海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工人运动档案。

⑪ “陆大修访谈录”，1958年8月24日，同上。

⑫ 《上海工人运动历史资料》第9期（1956年），第6~8页。在工人的抗议声中——小便小在烟叶上，大便大在痰盂里——这一规定被取消。

⑬ 英美烟公司通北路厂档案，1938年7月6日，上海社会科学院经济研究所。

⑭ “陆大修访谈录”，1958年8月8日；“范子钧访谈录”，1958年9月2日；“张永生访谈录”，1958年8月17日。同上。纺织厂中的类似情况，可参见 Emily Honig, *Sisters and Strangers: Women in the Shanghai Cotton Mills, 1911—1949* (Stanford, Calif., 1986), pp. 65 ~ 66, pp. 79 ~ 87.

- ⑮ “郝立祥访谈录”，1958年7月10日。
- ⑯ 《战斗的五十年》，上海，1960年，第8页。
- ⑰ 英美烟公司档案，Riddik report，1932年4月。
- ⑱ 《上烟二厂民主团结运动材料》，上海，1957年，第1957页。
- ⑲ 朱邦兴等编：《上海产业与上海职工》，上海，1984年，第582页。
- ⑳ 《英美烟公司在华企业资料汇编》，第1051～1052页。
- ㉑ “陆大修访谈录”，1958年8月8日。
- ㉒ 《民国日报》1921年7月28日。
- ㉓ 英美烟公司浦东档案，#155/24。
- ㉔ 《英美烟公司在华企业资料汇编》，第1028页；“赵琪璋访谈录”，1958年10月28日，“黄志浩访谈录”，1963年7月23日，“张永生访谈录”，均见上海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工人运动档案。
- ㉕ 《英美烟公司在华企业资料汇编》，第1027页。
- ㉖ “叶士林访谈录”，1963年8月13日，上海社会科学院经济研究所；《英美烟公司在华企业资料汇编》，第225页。
- ㉗ “山根宝访谈录”，1958年9月2日，上海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工人运动档案。
- ㉘ 《上海工人运动历史资料》第9期（1956年），第6～8页；朱邦兴等：《上海产业与上海职工》第587～588页；骆传华：《今日中国劳工问题》，上海，1933年，第105页；Cochran, *Big Business in China*, pp. 137ff.
- ㉙ 调查局档案，台北，#556. 282/810。
- ㉚ 《英美烟公司在华企业资料汇编》，第1042页。此项估计作于1924年。
- ㉛ 朱邦兴等编：《上海产业与上海职工》，第582、587页；英美烟公司浦东档案，#52/24，#2/19；英美烟公司通北路档案，#758。
- ㉜ 朱邦兴等编：《上海产业与上海职工》，第575、577页。
- ㉝ 朱邦兴等编：《上海产业与上海职工》，第589页。
- ㉞ “陈清标访谈录”，1958年4月29日，上海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工人运动档案。
- ㉟ 《时报》1906年6月13日，1915年2月2日，1916年3月3日。

⑳ 《民国日报》1917年7月21日、24日、25日，8月2日、10日，1918年5月2日。

㉑ 《战斗的五十年》，第16~17页；《民国日报》1918年8月4日，《时报》1918年8月5日、6日、9日；“张永生访谈录”，1958年8月7日，上海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工人运动档案。

㉒ 《时报》1919年10月8日。

㉓ 《民国日报》1919年11月10日、14日。

㉔ 同上，1920年6月23日，1921年3月7日、18日，6月25日、28日、29日。

㉕ Rose Glichman, *Russian Factory Women: Workplace and Society, 1880—1914* (Berkeley, Calif., 1984), pp. 162, 165.

㉖ Louise Tilly, “Paths of Proletarianization: Organization of Production, Sexual Division of Labor, and Women’s Collective Action,” in *Women’s Work*, ed. Eleanor Leacock and Helen I. Safa (South Hadley, Mass., 1986), p. 37. Michelle Perrot, *Les ouvrières en grève*, 2 vols. (Paris, 1974); Patricia A. Cooper, *Once a Cigar Maker: Men, Women and Work Culture in American Cigar Factory, 1900—1919* (Urbana, Ill., 1987).

㉗ 《申报》1921年7月21日、24日；《民国日报》1921年7月21日；《战斗的五十年》，第19~20页。

㉘ 《战斗的五十年》，第20~22页；《中国工运资料》第1期（1958年），第58~59页、第70~72页；《民国日报》1921年8月2日。

㉙ 李启汉：《欢迎王凤山君的返回》，载《劳动周刊》1921年第12期。[王凤山转变的这一情节，在沈以行等主编的《上海工人运动史》上卷（辽宁人民出版社，1991年）有关章节中，只是描写了工人们与之冲突斗争的情况，对王的转变根本不提一字。其他地方对工头与工人之间关系的论述，也是从对立面来写的。]

㉚ 司秉文：《李启汉》，载《中国工人运动的先驱》（北京，1983年），第2卷，第156~168页。

㉛ Chang Kuo-t'ao, *The Rise of the Chinese Communist Party* (Lawrence, Kan., 1971), 1: 174~175.

- ④⑧ 《战斗的五十年》，第 31 页。
- ④⑨ *North China Herald*, Sept. 2, 1922.
- ⑤⑩ 《战斗的五十年》，第 32 ~ 37 页；《民国日报》1922 年 5 月 3 日、5 日、24 日；《上烟一厂工厂史》，无日期，未刊稿，存上海社会科学院经济研究所。
- ⑤⑪ 《民国日报》1922 年 11 月 9 日；Cochran, *Big Business in China*, p. 139；《战斗的五十年》，第 38 页。
- ⑤⑫ “张永生访谈录”，1958 年 8 月 9 日，上海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工人运动档案。
- ⑤⑬ 《战斗的五十年》，第 43 ~ 45 页；“范子钧访谈录”，1958 年 9 月 2 日，上海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工人运动档案。正如谢尔曼·科克兰 (Sherman Cochran) 指出的，五卅运动时期，英美烟公司的罢工者占了全上海罢工者总数 (16 万人) 的将近 10%。见科克兰： *Big Business in China*, p. 177.
- ⑤⑭ 王家贵、蔡锡瑶编：《上海大学》(上海，1986 年)，第 96 页。
- ⑤⑮ 马纯古、章蕴：《一生坎坷，一片丹心》，载《回忆杨之华》，合肥，1983 年，第 28 页。
- ⑤⑯ 同上，第 1 ~ 28 页；《上海民族机器工业》，北京，1979 年，第 58 页。
- ⑤⑰ “杨龙英访谈录”，1958 年 4 月 11 日，上海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工人运动档案。
- ⑤⑱ “朱泉发访谈录”，1958 年 6 月 10 日，同上。
- ⑤⑲ “李新宝访谈录”，1958 年 8 月 11 日，同上。
- ⑥⑰ “杨龙英访谈录”，1958 年 4 月 11 日。
- ⑥⑱ “朱泉发访谈录”，1958 年 6 月 10 日。
- ⑥⑲ Cochran, *Big Business in China*, p. 184.
- ⑥⑳ 《英美烟公司在华企业资料汇编》，第 1176 页； *Shanghai Strike Statistics*, 1918—1940.
- ⑥㉑ “郝立祥访谈录”，1958 年 6 月 10 日。
- ⑥㉒ 《战斗的五十年》，第 69 ~ 84 页。
- ⑥㉓ “陆大修访谈录”，1958 年 8 月 24 日。

⑥ 同上。

⑦ “朱泉发访谈录”，1958年6月10日。

⑧ 《上烟一厂工厂史》；“张瑞林访谈录”，1958年9月4日，上海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工人运动档案。

⑨ Harold Isaacs, *The Tragedy of the Chinese Revolution* (New York, 1966), chaps. 10 ~ 11.

⑩ 骆传华：《今日中国劳工问题》，第97~102页。

⑪ Sherman Cochran, *Big Business in China*, pp. 188 ~ 195; Parks M. Cobl, *The Shanghai Capitalists and the Nationalist Government, 1927—1937* (Cambridge, Mass., 1980).

⑫ 《申报》1927年7月27日，8月16日。

⑬ Ellis Godberg, *Tinker, Tailor and Textile Worker: Class and Politics in Egypt, 1930—1952* (Berkeley, Calif., 1986), p. 177.

⑭ “张廷灏访谈录”，无日期，上海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工人运动档案。

⑮ 《上烟一厂工厂史》。

⑯ 英美烟公司浦东档案，#35:42~13。

⑰ 《民国日报》1927年10月8日。

⑱ 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档案，#1:2-746。

⑲ 《申报》1927年10月25日。

⑳ *North China Daily News*, Oct. 14, 1927; *North China Herald*, Aug. 6, 1927;《新闻报》1927年10月15日，1928年1月11日。英美烟公司方面也说：“根据在中国报纸上近日来出现的评论，似乎这并不是我们的工人与我们之间的斗争，倒不如说是一场中国与帝国主义国家之间的斗争，在这些国家中我们被选为首位代表。”见《英美烟公司在华企业资料汇编》，第1205页。

㉑ “陆大修访谈录”，1958年8月24日。

㉒ *North China Daily News*, Jan. 18, 1928;《上烟一厂工厂史》。

㉓ “张廷灏访谈录”，无日期。

㉔ “张瑞林访谈录”，1958年8月7日，上海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工



人运动档案。

⑧⑥ “张永生访谈录”，1958年8月7日；“陆大修访谈录”，1958年8月24日。

⑧⑦ 薛畊莘：《我接触过的上海帮会人物》，载《旧上海的帮会》，上海，1986年，第92页。

⑧⑧ 英美烟公司浦东档案，里迪克报告，1933年8月。“坦慕尼厅”（Tammany Hall）是坦慕尼协会所在地，该协会是纽约市有实力的民主党组织，以政治腐蚀和党魁操纵而闻名——译者注。

⑧⑨ “李新宝访谈录”，1958年8月11日。

⑧⑩ 英美烟公司浦东档案，#24:8-9。

⑧⑪ *North China Herald*, Dec. 22, 1958.

⑧⑫ 《劳工月刊》1933年5月1日，第2卷第5期，第95页。

⑧⑬ 《新闻报》1933年5月20日；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档案，#9:8093。被捕者中有一位强雷，是英美烟厂的一位铜匠，时任共产党沪东支部书记。见《中国现代政治史资料汇编》，第2卷第44册，第5414号文件。

⑧⑭ 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档案，#722:4-225。

⑧⑮ 《上烟一厂工厂史》。

⑧⑯ *Shanghai Municipal Police Files*, D-5844.

⑧⑰ 《战斗的五十年》，第114~126页；“姚海根（音）访谈录”，1958年10月28日，上海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工人运动档案。

⑧⑱ “洪本宽访谈录”，1958年10月24日，上海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工人运动档案。

⑧⑲ 《战斗的五十年》，第136~144页。

⑧⑳ 《战斗的五十年》，第165页；“山根宝访谈录”，1958年9月2日。

⑧㉑ 调查局档案，台北，#556.282/810。

⑧㉒ 《战斗的五十年》，第169~184页。

⑧㉓ “黄志浩（音）访谈录”，1958年9月2日，上海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工人运动档案。

⑧㉔ 同上；《战斗的五十年》，第195~198页。

⑧㉕ 《上海工人运动历史资料》1956年第9期，第62~65页。

- ⑩ 《战斗的五十年》，第 202 页。
- ⑪ 《英美烟公司在华企业资料汇编》，第 1278 页。
- ⑫ 《战斗的五十年》，第 207 ~ 208 页。
- ⑬ 《英美烟公司在华企业资料汇编》，第 1119 ~ 1121 页；“黄志浩（音）访谈录”，1958 年 9 月 12 日。
- ⑭ Cochran, *Big Business in China*, pp. 207 ~ 208, 232.

## 第八章 纺织业

从19世纪末开始,纺织业便是上海产业的主要支柱。1861年,一个英国人创建了该市第一家机器缫丝厂。此次尝试虽然失败了,但却刺激了法国和美国商人几年后的接踵仿效。不久,中国商人加入该行列,并且取得了更大的成功。至19世纪与20世纪之交,上海缫丝业欣欣向荣,对海外织工的需求持续增长。然而,作为奢侈品的丝绸,市场有限;最终纺织业成为上海的主要产业。当然,丝织业仍是该市经济的重要组成部分。而且,与主要由日本人和英国人投资的纺织业不同,丝织厂至世纪之交时已几乎完全由华商投资运作。这种情况到1915年机器被运用于丝织业时仍然如此。缫丝厂(以低价雇用非技术性女工)和丝织厂(以较高的工资雇用男工和女工)几乎全部掌握在中国资本家的手里。<sup>①</sup>

由于人们常常把众所周知的上海纺织工人之行动主义归因于他们对外国业主的怨恨,因而有必要对棉纺织厂与土生土长的丝织业的工人反抗类型进行一番比较、研究。由社会局编纂的上海罢工统计资料显示,从1918年至1940年,纺织工人的罢工确实要较丝织工人频繁。但是当把罢工频率与各自行业的工人人数作比较的话(以22年计),就可看出,纺织工人的罢工倾向要小得多。反之,技术水平高、收入高的丝织工人人均罢工次数

最多。纺织行业——技术含量低，收入也低——的人均罢工次数要低得多。\*

缫丝工人——技术含量最低，工资最少——的罢工比率甚至更低(见表6)。

168

表6 1918—1940年间上海纺织工人罢工情况

行业	每小时工资收入 (1932年)	工人数量	罢工次数	每1000工人中 参与罢工的人数
丝织业	0.112元	12000	249	20.8人
棉纺业	0.044元	135000	370	2.7人
缫丝业	0.034元	52000	102	2.0人

资料来源: *Shanghai Strikes Statistics, 1918—1940*; 朱邦兴等编:《上海产业与上海职工》

## 缫 丝 业

如表7所示,上海缫丝业在19世纪末发展缓慢,到20世纪二三十年代有了可观的增长,其后迅速衰落,抗战时全面崩溃。绝大多数缫丝厂每张机子雇用2到4人,每个大缫丝厂拥有的工人数在500至1000人之间。妇女和童工占了被雇用者的95%。绝大多数都来自贫困家庭,丈夫的工资不足以养家糊口。缫丝工人的劳动条件十分恶劣。他们不仅工资低,工时长,经常

\* 因为上海的纺织工人为数巨大,他们的罢工往往是大规模的。纺织业罢工平均每次有2286名参加者,而丝织业罢工平均每次仅有212名参加者。然而,当把两个行业的工人人数进行比较的话(棉纺工人有13.5万人,丝织工人为1.2万人),丝织工人参加罢工的频率更高一些。许多丝织厂规模甚小,雇用的工人仅有几十人,所以,该行业工人参加罢工的比率给人以深刻的印象。

挨打受骂，还要受到季节性失业的威胁，所以，缫丝工是妇女最不愿意做的工作之一。缫丝厂厂主大多为江南籍资本家，他们对工人——大多来自苏北——的苦难往往不闻不问。由于对改善劳动环境几乎不抱什么希望，缫丝工人只要有一线希望就会毫不犹豫地另寻工作。所以，该行业工人的转换比率奇高。而且，总是有源源不断的年轻妇女来填补空缺。<sup>②</sup> 169

表 7 上海缫丝业发展状况

年 份	丝厂数量	机 车 数
1890 年	5	—
1901 年	28	—
1911 年	48	13737
1915 年	56	—
1916 年	61	—
1917 年	70	18386
1918 年	68	18800
1919 年	65	18306
1920 年	63	18146
1921 年	58	15770
1922 年	65	17260
1923 年	74	18546
1924 年	72	17774
1925 年	75	18298
1926 年	81	18664



续表

年 份	丝厂数量	机 车 数
1927 年	93	22168
1928 年	95	23534
1929 年	104	23582
1930 年	105	25066
1931 年	105	25394
1932 年	112	25300
1934 年	20	—
1935 年	24	5000
1937 年	2	—

资料来源：《上海之丝业》，载《社会半月刊》，第1卷第19期（1935年），第46～48页；Elcanor Hinder, *Social and Industrial Problems of Shanghai* (New York, 1942), p. 18; Robert Y. Fung, *Economic Imperialism in China: Silk Production and Exports, 1861—1932* (Berkeley, Calif., 1986), p. 45.

170 与卷烟业、纺织业或丝织业相比，缫丝厂不把机器间作为常设车间。相反，此项工作一般都包给熟练技工（俗称“老鬼”），他们再自雇助手，自购大部分所需设备，同意按月拿钱，抽出足够的时间管理机子。<sup>③</sup>由于缺乏熟练技工，共产党要动员缫丝工人势必会遇到许多麻烦。

缫丝工作共有八道工序：烘茧、剥茧、选茧、煮茧、缫丝、扬返、检验、包装。成年女工做比较复杂的工作，而童工则做又脏又累的打茧活，这种生活（称为“打盆”）是在近乎煮开的水盆中进行的，童工们的手在其中进进出出，境况十分痛苦。童工们遭受的非人道待遇引起了外国人的注意。他们针对没有外资介入的缫丝业情况的道德说教无疑很是动人。正如一位外国观察者在

其一篇关于上海缫丝业情况的报告中所说：“小孩子站着干活，一天达十一个小时，他们的手一直浸在冒着蒸汽的水里，手指根根发白，瘦弱的身体站立不稳，在他们旁边还站着一个人面目凶狠的监工，哪个稍稍走神，他马上就会冲上去揍一顿。”<sup>④</sup>

## 早期罢工及其组织

很自然的，在缫丝业中，只要有机会，工人就会逃离那可怕的环境。罢工——成群的工人涌出厂门，在街上和公园里自由地行走——正是逃离的一个机会。缫丝工人举行罢工时很少占据他们自己所在的工厂。他们的罢工还容易引起连锁反应——邻近厂里的女工和童工虽然不自行罢工，但都会涌出来“看热闹”——也许最能说明他们逃离那可恨环境的愿望。\*缫丝厂罢工的成功率不高。在1895—1913年间，在现有资料记载的24次罢工中，只有4次取得了胜利。<sup>⑤</sup>后来，成功率有所增加，在1918—1940年间共发生罢工102次，其中有37次取得了胜利。<sup>⑥</sup>但这个比率仍然相对较低。

许多缫丝业罢工的热闹气氛更容易使人联想到乡村集市，而不是一场有计划争取权益的战略，因而很难把丝业工人的斗争融入政治组织者的计划中去。当然，我们不是说外来组织者在动员丝业工人中缺乏努力。作为该市产业工人中最大的群体

171

\*同样地，米歇尔·佩罗 (Michelle Perrot) 把早期的法国工厂描绘成为“工业充军地”，在那里，“囚犯们”在“士兵”的监视下劳动。因此，罢工就像越狱一样，“大批的人逃向开阔地、村庄、街道和社区”。见 *The French Working Class, in Working-Class Formation*, ed. Ira Katznelson and Aristide R. Zolberg (Princeton, N. J., 1986), p. 18.



之一（其人数仅次于纺织业），丝业工人吸引了外来干部的广泛注意。他们每每有所收获。可是，这类组织的成员极不稳定，也很难胜任指派的任务。

上海缫丝工人第一个有影响的工会成立于1912年5月，当时正值辛亥革命之后的政治化时期。这一名为“上海丝业女工慈善会”的组织，宣称要开办训练所，提高其成员的技术。据该组织成立宣言说，提高工人的技术，就能使他们在恶劣的环境中少受处罚，因而也就可以减弱他们的罢工倾向。然而，训练所从来没办过，丝业工人继续以发动热热闹闹的罢工来抗议业主的虐待。江南籍丝业业主们极有权势的丝茧公所指控该组织威胁实业发展，向江苏省政府提出抗议，要求加以取缔。对慈善会之生存威胁更大的是其成员不肯交纳会费。该会成立不过几个月，即宣告瓦解。<sup>⑦</sup>

## 帮会的介入

当善意的共和派未能在丝业工人中建立起一个长久的立足点时，帮会分子却找到了进门之处。至20世纪20年代初，有报道说，青红帮无论是在纺织业还是在丝织业的女工中都已拥有相当实力。<sup>⑧</sup>1922年夏，一场全市丝厂同盟罢工爆发，领导者是新成立的、与帮会有联系的上海女子工业进德会，该会会长是一位丝厂女工兼帮会成员穆志英，她代表罢工者向江苏省政府请愿，要求协助缩短工时，禁止虐待工人。由于这是上海丝业历史上第一次组织良好的罢工，引起了公众舆论的关注。报纸广泛报道了罢工者手里拿着的旗子，上面写有：“共和世界”，“增进道德”，“男女平等”，“保证人权”。<sup>⑨</sup>



真相不久便揭开了,进德会并非丝厂工人的自发组织。有三位来自苏北的装配工,希望改善自己受歧视的地位,鼓动成立了这个丝厂工人组织。有利可图的缫丝业几乎都掌握在江南籍业主手里,成立一个工人组织可望给苏北人注入一些力量,从其富裕的江南对手中分得一些油水。其中一位装配工名叫吴彝伯,是盐城人,他在1922年7月到上海作了一次特别旅行,从当地找人协助其进行此项冒险计划。结果他与帮会成员穆志英(也是盐城人)及另两位苏北人取得了联系,由吴出钱,三位女工租了一间办公室,开始印刷传单,宣传其新组织的宗旨。<sup>⑧</sup> 172

进德会成立不过几个星期,就有女工上门来寻求帮助。尽管车间里的温度令人窒息,但她们一天也得不到休息。进德会头头们答应与丝茧公所交涉,要求在热天减少工时。当她们的要求被拒绝时,罢工开始了。冲突开始两天后,穆志英对报纸发表谈话称,虽然削减工时是罢工中提出的要求,但真正的问题是丝茧公所拒绝承认其进德会。她的谈话具有预见性:次日,穆志英及其进德会的五名成员被保安司令部根据丝茧公所的旨意逮捕。由于其头头在监狱里仍旧操纵其事,因而进德会遭到禁止,罢工戛然打住。<sup>\*</sup>

\*《民国日报》1922年8月7日、9日、10日、15日,1923年5月1日。此次罢工的一个重要特征便是来自苏北盐城和泰兴两县女工的合作。人们往往把来自这两县的妇女分别叫做“大脚”和“小脚”——根据她们家乡裹脚与不裹脚的习俗而定。她们以往都是合不来的,可是这一次,她们克服了互相之间的反感。这种情况可能与罢工领导人融合了不同地方人物的现象有关。穆志英是盐城人,但至少另一位领导罢工的妇女领袖可能来自泰兴(史料里常常简单地称为“江北人”,即苏北人)。我们知道,1920年7月被捕的两位妇女领袖分别来自盐城和泰兴,我们还知道,参加1920年罢工的人曾积极推动1922年进德会的成立。《民国日报》,1920年7月14日,1922年7月24日,8月8日、16日。



然而，一旦罢工结束，丝茧公所即着手活动，敦促释放穆志英。缫丝业业主们说她是个“年幼无辜的女子，定是外人蛊惑欺骗所致”。请求将穆释放，严加看管即可。第二天，这位帮会女工就被释放了。业主们还进一步采取安抚手段，同意在夏季缩短工作时间。原来是早上五点上班，现在改为六点；原来是下午六点半下班，现在改为五点半。<sup>173</sup>

业主和工人之间的冲突——以地缘关系截然划分开来——继续折磨着缫丝业。1924年1月，苏北妇女成立了上海丝棉女工联合会，由声名远播的穆志英任会长。由于害怕此种势态会引发另一波罢工浪潮，宝康缫丝厂（业主是江南无锡县人）决定解雇该厂所有苏北籍工人，用上海人取而代之。<sup>174</sup>其他厂的工人不久即举行罢工。到6月，一场危机已在酝酿之中。来自14家缫丝厂的1.4万多名工人举行罢工，要求增加工资、缩短工时、恢复工会。<sup>\*</sup>

在这种紧张形势下，无论是穆志英还是丝茧公所，都在寻找

---

\*《民国日报》1924年3月27日、6月18日、20日、21日、25日；《论上海丝厂罢工风潮》，载《妇女杂志》第10卷第7期（1924年），第1064页。共产党对丝厂工人的罢工表示同情，并试图参与领导。当时，陈独秀写道：“我们承认此次女工罢工所要求的都狠（很）正当；我们希望一般社会，尤其是主张改良劳动者之生活状况的国民党，对于这些穷苦无告的女工们，公开地出来加以援助。”见《上海丝厂女工大罢工》，载《向导》第71期，1924年6月16日。共产党工运领导人向警予，当时还是国民党妇女部部长兼农工部领导成员，向罢工工人伸出援助之手。但是，我们还不清楚，这些努力是否对罢工起到实际作用。参见李明：《悼向警予同志》，载《烈士传》，南京，1949年，第231页；邓中夏：《中国职工运动简史》，北京，1949年，第136页；《上海工人运动历史大事记》，上海，1979年，第1册，第81-82页。在一部偶像化传记中（显然带有夸张成分），作者说向警予成功地将“共产党领导”引入此次罢工之中。见戴绪恭等编：《向警予传》，北京，1981年，第74-94页。

机会达成妥协。也许是对一年半前促成自己被释放心存感激,穆志英开始与丝茧公所谈判,以期成立一个被认可的工会。6月初,吴彝伯(穆志英的盐城老乡)与陈仁侯(音,代表江南业主一方)之间最终达成协议,允许成立一个附属于丝茧公所的工会,丝茧公所每月给予300元的补贴。作为对这笔丰厚补贴的回报,工会答应保证不在本行业举行罢工。<sup>⑩</sup>

新协议几乎立即生效。穆志英用她每月所得到的补贴雇用了48名失业女工,专门监视各缫丝厂的情况。任何骚乱迹象都首先报告给车间工头,然后转告工会头头穆志英,她就立即出面干预,防止事态发展。有时,只要简单的劝说就足以让心怀不满的工人重新回到岗位上;有时,就要适当增加些工资。无论出现哪种情况,业主们都感到十分满意——生产不至于被代价昂贵的罢工所打断。<sup>⑪</sup>

穆志英精心培育她与缫丝厂女工头之间的关系,乃是她对广大普通缫丝女工进行控制的关键。\*这一体系得以排除共产党领导下的更具革命倾向的工会对这一为数甚巨的工人群体的影响。正如曾经成功地组织烟厂女工罢工的共产党干部杨之华在回忆她走访丝业工会的情形时说的:

有一次,我到几个参加罢工的女工家里去,她们把我带到“公会”办公室去了。那个地方很讲究,大门外挂着“上海丝厂同业公会”的醒目招牌,会客室里的长桌上,铺着白桌布,摆着很漂亮的茶壶茶碗。见到这种排场,我就疑惑起来,我们的工会怎么会如此阔气呢?这时,一个胖胖的约莫四十岁左右的女人,怪模怪样地走了进来。她穿着一身绸衣服,

\*穆志英的工会给了女工头们在车间里代表工人说话的权利,也就是说,女工头们有责任“教育”其下属,防止她们出乱子。见《民国日报》1925年9月13日。

与面前的工人姐妹的褴褛模样恰恰成为鲜明的对照。女工见了她，都小心翼翼地站了起来，称呼她“穆会长”。原来，这个会长叫穆子英（穆志英之“志”，各种资料中有作“子”、“之”者——译者注），是上海滩上的女流氓，是资本家雇用的工贼。这个“公会”，根本不是工人自己的组织。……我觉得当前首要的问题是工人应该有自己的组织。……警予同志接着说：“目前我们在女工中还缺少工作基础，女工的觉悟还比较低，我们只好先用社会上惯用的结拜姐妹、交朋友的方式进行工作，然后逐步建立工会组织。”\*

175 五卅运动期间，当全市绝大多数工厂都宣布参加总罢工时，惟有缫丝业是个惹眼的例外。穆志英的工会通过向全市各缫丝厂派出 100 名代表，并组织缫丝厂女工头“演讲队”，得以成功地防止缫丝工人加入到罢工的洪流中去。 \*\*

## 共产党的收获

不论穆志英工会在“五卅”时期施展的本领如何高强，在普通缫丝工人中仍渐渐产生裂缝。有几位在 1922 年罢工时曾与穆

---

\* 杨之华：《回忆秋白》，北京，1984 年，第 8～9 页。同时，向警予公开谴责穆志英的工会：“它的办事机关就设在丝茧公所；它已经成为资本家的幕后宾客。”见《上海丝茧女工会是工人的还是资本家的？》，载《妇女周报》，第 71 期（1925 年），引自戴绪恭等编：《向警予文集》，长沙，1985 年，第 193 页。

\*\* 五卅运动时期，丝茧公所给穆志英工会以额外的经济资助，以便利其监视和宣传活动。见上海社会科学院经济研究所丝茧公所档案，案卷号：#516，丝茧业业主当然愿意看到罢工对其他行业而不是对自己的行业产生影响；公所还向各成员厂募集捐款，按每张桃子募集，收齐后捐给总罢工基金。见同上，案卷号：#1191。

志英密切合作过的女工——其中最著名的一位叫朱英如——于1925年1月被赶出工会。尽管她们被驱逐的原因尚不清楚，但有可能起因于她们对穆志英专横领导风格的不满。无论如何，一旦摆脱穆志英的阴影，她们很自然地倒向了共产党一边。<sup>⑩</sup>虽然这种趋向在五卅运动时期尚不明显，但那以后不久便变得重要起来了。1925年8月，虹口区爆发了自穆志英工会成立以来的第一次缫丝工人罢工。此次罢工的领导权掌握在早些时被穆志英排斥的朱英如及其他几位女工手里。<sup>⑪</sup>穆志英和丝茧公所同意作些让步，使罢工尽快结束。从此举不难看出穆的霸主地位已开始动摇。<sup>⑫</sup>

1926年6月，虹口和闸北两区的46家丝厂发动大罢工，目标直指穆志英及其工会。此次形势之急转直下是由于穆志英要求女工从其每日工资中拿出两分（占工资数的5%）作为工会活动费用。穆志英声称，过去几年中，工人工资稳步增长都是工会的功劳，现在，工会扣些钱，乃是对工会无私贡献的些许回报。自然，工人们不这样看，当丝厂推迟发工资时，工人们害怕厂主会扣住不发，直到穆志英拿到她要的那部分。一场罢工迅速展开，工人们要求穆志英卸职并关闭其工会。尽管穆志英试图采取“五卅”时期阻止工人卷人的老一套，但此时的形势已经不可逆转：176

穆志英穿了白华丝葛的衣服，手里拿着皮包，坐了汽车，雇用女工头往各女工区域“劝告”女工们无条件地上工。女工们见了她很惊奇，以为她是厂家太太。后来听到穆志英要找罢工中之代表及很凶厉的语气，才知道她是工贼；女工齐口回答：“我们都是代表，打倒工贼！”<sup>⑬</sup>

穆志英因大权旁落而感到十分窘迫，遂致信丝茧公所，提出辞职。但在公所召开的紧急会议上——当时有一百多位缫丝厂厂主和经理参加——大家认为穆在五卅运动期间功劳甚著，故

予以挽留。<sup>19</sup>当穆志英遭到围攻之时,共产党领导的上海总工会乘机卷入冲突之中。\*上海总工会提出以解散穆志英的工会作为复工的条件,上海警备司令害怕如果不满足这一条件将导致更大的灾难,遂发布告示,宣布取缔穆志英的工会。\*\*当局派出六百多名宪兵来恢复秩序,并对穆志英及其主要对手朱英如加以拘留审问。<sup>20</sup>两人不久即被释放,并立即着手组织效忠自己的工会——此举是违反保安条例的。也许是意识到朱英如有共产党这一层背景,在此历史关头不失为一张好牌,装配工人吴彝伯潜回上海,秘密会晤朱英如,表示支持新成立的、在她领导下的丝业工人工会。<sup>21</sup>

## 缫丝工人之有限的激进主义

即便有了吴彝伯的支持,朱英如发现,要组织起许多缫丝工人也不是一件容易的事。举例来说,家庭压力往往妨碍持久的行动主义。正如共产党干部杨之华在谈到1926年6月罢工时所说:

勇敢而热烈的青年女工因要努力维持罢工,固然能脱

---

\*中共刊物《向导》对“各丝厂女工之兴起”甚表欢迎,认为:“在上海的无产阶级运动里,增加了一支生力军。自来各丝厂女工,受资本家和官厅双方的压迫,又受工贼穆志英等的欺骗,生活在十八层地狱里。困苦万状,在去年五卅运动时也未能积极参加,而这一次才勇敢奋起,开始提出自己的要求了。她们战斗的英勇,秩序的良好,尤可称赞。”见《上海最近的罢工潮》,载《向导》第159期,1926年6月23日。

\*\*丝茧公所档案,#520。为了替自己辩护,穆志英写信给丝茧公所,说自己这些年来是如何的忠心耿耿。同时她将最近出现的麻烦不仅归于工人,还怪到资本家的身上,当然,她说外来的煽动者直接导致了最近的动乱。

离家庭的束缚,勇往直前。但是她们始终是要回家的。听说工潮后她们回家去的时候,即被父母兄嫂打骂和羞辱,甚至于饭都没有给她们吃,简直要她们饿死。其兄嫂父母说:几天不回去,一定在外边轧饼头,这样的女子可以去死了。有一位女子的父亲给她一条绳、一把刀,要她自己去选择。<sup>②</sup>

除了家庭束缚外,即将步入行动主义者行列的工人还要受到来自厂主和工头的多重压力。结果,朱英如不得不谨慎行事。在缫丝女工中组织起一个姊妹会准备参加第三次工人武装起义之后,朱英如在即将发生的罢工之前通知了丝茧公所,以减低其经济损失。然而,结果表明,她动员参加第三次武装起义的工人不过200来号人(当时该行业工人约有75000人);工厂生产并未真正中断。<sup>③</sup>

4月1日,即第三次武装起义之后不久,中共上海区委召开全体会议,会上有秘密报告说,丝厂工人中的组织工作“无起色”。虽然派了一位女干部前往协助,但“朱英如又与之不和。目前他们的工作完全不能开展。真是令人担心”。<sup>④</sup>

尽管四一二政变击垮了上海地区大部分的共产党工人运动,但朱英如仍然锲而不舍。当年5月,她要求丝茧公所通知全市各丝厂停工一天,允许工人参加她新组成的、经工人统一委员会批准的工会成立大会。可是,丝茧公所并未照办,而且还致信工统会,要求关闭朱英如的工会,逮捕其本人。信中说,朱英如很久以来就一直从事破坏活动。五年前,她因行为不端而被丝厂解雇后,即与穆志英一道组织工会。后来,她与共产党人杨之华取得联系,成立了一个在中共控制下的工会。丝茧公所在信中还认为,朱英如系共产党漏网分子,随时可能发动罢工,要求立即制止其任何行动。<sup>⑤</sup>

一连串丝厂罢工真的接踵而至,虽然朱英如在其中发挥 178

的具体作用如何尚不清楚。也许丝厂相对良好的发展势头激发了工人们要求增加工资的愿望。无论如何，工统会总是闻风而动，参与调停，以保证罢工的丝厂工人能增加一些工资。\*

当年11月，一场悲剧引起了政治气候的戏剧性变化。当数千名丝厂工人聚集在闸北的一家茶馆商谈新一轮罢工时，茶馆因经受不住重量而轰然倒塌。事故中，有100多名女工死亡。在紧接其后的追查起诉中，朱英如被捕。<sup>⑧</sup>在以后的几个月里，各丝厂一潭死水。1928年3月，有四名男性技工被一家有自备机器间的丝厂解雇。这几位男工拒绝接受厂方决定，继续留在厂里，直到一队警察赶来强行驱逐。其中有位来自绍兴的男工姜阿兴，因在冲突中受伤，几天后不治身亡。眼看着自己的事业中又增添了新的烈士，上海丝厂工人中长久被压抑的感情激烈地爆发出来。在接下来的几个月里，因姜阿兴之死而引发了一系列总罢工，使得各丝厂几近瘫痪。至年底，各丝厂工人因罢工而失去了150多万个工作日，创造了非凡的年度罢工记录，除了1925年的纺织业外，此前此后无一行业的罢工可以与之媲美。<sup>⑨</sup>针对丝厂罢工浪潮，七大工会发表宣言（见第五章），对丝厂工人的工会化要求予以支持。<sup>⑩</sup>

然而，丝厂工人参加工会的热情事实上是有限的。丝厂女工发出的抱怨表明，工会往往更多地被视为只知晓其困难的原因，而无法解决其困难。<sup>⑪</sup>很少有工人会急于卷入无论是共产党还是国民党为主导的工会政治。可以肯定，双方组织丝厂工人的图谋

---

\*《民国日报》1927年4月29日、30日，7月1日、7日、8日。也许工统会也被丝厂工人的勇敢行为震慑住了。有一次，罢工女工从工统会派出的护工队手里夺取手枪，冲突中，一名工人和一名护工队队员受伤。



仍在继续。\*1930年夏,一份被收缴的、在该市数个丝厂散发的共产党传单称:“革命高潮就在前头:第四次工人武装起义即将爆发。帝国主义、国民党和资本家在其即将灭亡的命运前发抖。总工会号召全体上海丝厂工人和其他上海工人一道,举行总罢工。”<sup>⑩</sup>

然而,革命梦想遭遇到了不幸,这些未来组织者的激烈情绪并未得到坚定的工人阶级的支持。1930年7月,刚从莫斯科中国共产主义劳动者大学结业的陈修良奉调回上海,被派去做丝厂工作。她回忆当时的情形说:

我到过好多家工厂去实地调查,丝厂里面并无党员或团员,那么工会会员有多少呢?这就很难说清楚了。……我很坦率地问过她们(指党的干部阿金介绍陈去接洽的几个女工——译者注):“是否参加过工会?”她们说“参加的”,但仔细一问,原来她们指的是国民党包办的黄色工会,并非我们所说的赤色工会。至于赤色工会到底有没有成立过呢?根据丝厂情况看,恐怕未必有过,只不过是停留在干部的计划中,工人群众的心目中并不知道有赤色工会。我曾试探过几个女工,问她们知道不知道赤色工会的章程?她们都说不知道。我说赤色工会的章程上规定实行八小时工作制,女工产前产后休息一个月,她们说:“好是好,只是办不到。”

就像陈修良所看到的,丝厂工人倾向于独立罢工,其行动很难纳入外来组织者的计划之中:

(我们)布置了那些有朋友关系的女工带头发动罢工,

---

\*例如,有位女工头在1930年被捕前的几年里,被指控不但与资本家勾结,还串通共产党,在虹口组织工人的行动取得了一些成功。见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档案,#722;4-233;《中国现代政治史资料汇编》第2卷,第43册,第5409号文件。

然后带领一批女工，冲到各个丝厂门外去大喊大叫：“关车！”有的丝厂的女工听到外面喊声，真的关上了车，拥出厂门外看热闹，这样连锁反应，常常有好几个丝厂同时罢工，这就叫做“总罢工”。这样的罢工方式，据说是丝厂工人的创新，……有一天的早晨，我走到一个丝厂的门口，果然看到了这个厂已经罢工了，女工们正在拥向其他的丝厂，在大呼“关车”，我想“总罢工”真的实现了。正在暗自高兴的时候，忽然有一个女工模样的老女人抓住我，高喊“共产党来捣乱了”！四周埋伏的包探就不由分说把我同一些罢工的女工押上警车，关进虹口密勒路捕房，随后又送到看守所。

尽管陈修良认为“在丝的出口情况较好的时节，这样做（指罢工），资方有时也只好让点步”。<sup>④</sup>但是，1930年的夏天，正是世界市场萧条的时候，资本家的日子不好过，经济形势越来越坏，许多工厂关门歇业。\*激进的组织者原本指望丝业工人能投身革命事业，但现实却让他们失望。正如一份关于丝厂情况的报告所说：“绝大多数丝厂工人都来自农村，还有农村亲属可以依靠。值此丝业萧条之际，许多人回到其家乡。那些无依无靠者只好另寻出路，其薪水则下降了百分之二十。”<sup>⑤</sup>丝厂工人转向农村求生存的事实使得他们持久地卷入无产阶级政治之中几乎是不可能的。无论如何，该问题悬而不决，只是因为中日战争的爆发，才改变了上海丝厂的面貌。<sup>⑥</sup>

尽管丝厂女工是上海产业工人中最容易罢工之群体的一分

\*至当年9月初，有70多家丝厂关门，2.8万多名工人失业。见《民国日报》1930年9月28日。到11月，几乎所有丝厂均停工歇业，使得10万多人流落街头。见《申报》1930年11月15日。虽然各厂于次年开工（具体情况参见表7），但为时甚短。

子——在该市 1895—1913 年间发生的 51 次罢工中，丝厂工人的罢工占了 24 次，<sup>④</sup>但是他们的斗争并没有为后来的动员铺平道路。由于非技术性工人与土地的联系比起与工厂的联系更紧密，丝厂工人对于外来组织者——无论是共产党还是国民党——的青睐往往若即若离。

## 丝 织 业

上海丝织工人的情况就完全不同了。这些幸运者占据着技术岗位，薪水高，人们往往称之为“贵族工人”。在 20 世纪 20 年代席卷该市绝大多数工厂的大规模罢工中，几乎见不到丝织工人的踪影。然而，在接下来的二十年里，丝织工人成为工人阶级中最具爆炸性、最有政治影响力的因子。

中国的近代丝织业起步甚晚。第一次世界大战前，丝织业一直是一种手工产业，主要集中于江南的杭州、湖州和苏州的各市镇上。小型的丝织机坊，每每拥有两到五张机子，由机坊主监督生产过程，并在茶会期间将产品卖给中间商。虽然生产规模小，但该行业却有势力甚大的公所。这些组织不仅站在商人的立场，而且站在工匠的立场说话，以公所为基础的丝织工人罢工可以追溯到 17 世纪。<sup>⑤</sup>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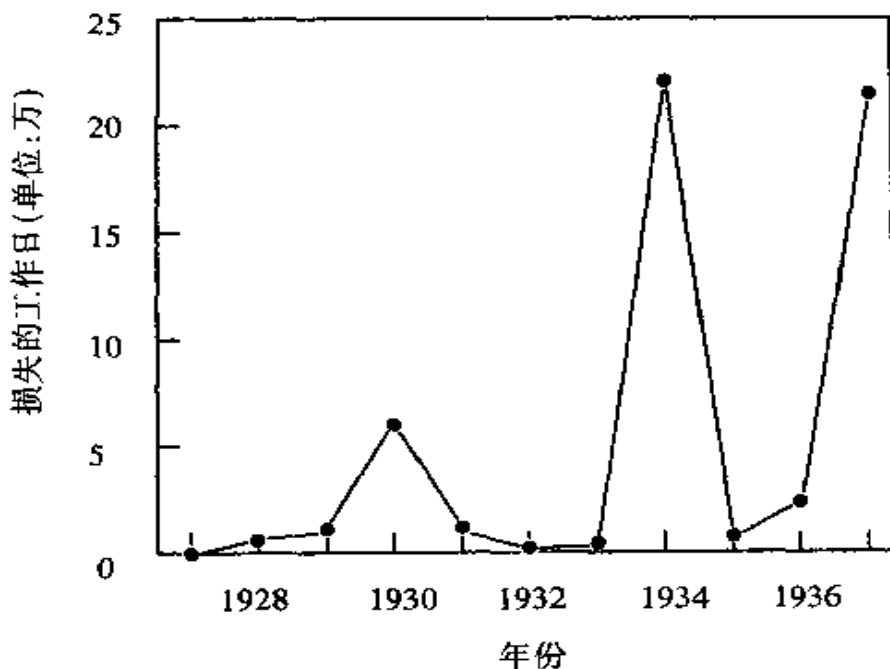
第一次世界大战给中国工商业带来了一片繁荣景象，也给古老的丝织业带来了转机——一些企业家开始投资于大规模的机器工厂。1916 年，物华绸厂在上海开工，拥有 100 多张织机（仿照日本模式），数百名工人。四年后，美亚绸厂建成投产，不久便成为“丝织界的霸王”。20 世纪 20 年代是丝织业发展的黄金时期。成批的机坊主从风云莫测的乡村来到沪上，开设小厂，从

获利甚丰的机器丝织业中抢饭吃。

然而,在这十年的末期,情况发生了变化。由于生产高档商品的业主都把眼光瞄准国际市场,丝织工人特别容易受到世界经济波动的影响。20世纪20年代,世界经济给丝织业带来了繁荣,但是几年后,1929年爆发的世界经济恐慌,1931年全国的大水灾,九一八事变导致东北的沦陷,1932年中日之间在上海发生的冲突,丝织业在这连续不断的惊涛骇浪中受到了很大的打击,前景暗淡。大部分的小厂确实经不起这许多袭击而关门了,成千上万的熟练织工被迫失业。<sup>⑤</sup>

丝织业的困境明显地反映在丝织工人的罢工上。正如图表2所示,上海丝织工人的大规模罢工浪潮发生在1930年、1934年和1937年。这一模式与该市整体罢工模式很不相同。对该市

181



图表2, 1927—1937年间上海织工罢工情况, 引自 *Shanghai Strike Statistics, 1918—1940*。

绝大部分行业的工人来说, 1925—1927 年间是罢工的高潮时期。在上海的多数工厂里, 罢工活动在 1930 年和 1934 年已经大大减少, 尽管 1937 年的罢工数量增加了, 但丝织工人中的罢工较该市一般行业的工人罢工多得多。<sup>⑥</sup>

乍看起来, 丝织工人罢工的增长与 20 世纪 30 年代前期该行业的不景气有关。如表 8 所示, 南京国民政府时期, 丝织品的出口逐年下降。但经济困难与罢工之间并不一定如初看时那样成正比。大萧条时期, 丝织业不仅没有彻底垮掉, 而是做了基本调整。许多小厂确实遭到了破产兼并的下场, 但也有一些大厂继续扩张。罢工活动主要就发生在这些相对繁荣的企业里。

表 8 中国丝织品出口额

182

年 份	价值(中国货币单位:元)
1927 年	28223472 元
1928 年	25987270 元
1929 年	20484285 元
1930 年	17827441 元
1931 年	17695349 元
1932 年	14754601 元
1933 年	15648269 元
1934 年	11289794 元
1935 年	6987582 元
1936 年	6217958 元

资料来源: D. K. Lieu, *The Silk Industry of China* (Shanghai, 1940), pp. 256 - 257

## 贵族工人的觉醒

大萧条年代最幸运的留存者便是美亚绸厂,该厂是1920年由买办资本建立的一个小厂,当时资本仅万元,织机12台,工人三四十人。次年,厂主的女婿蔡声白被任命为该厂的总经理后,生产迅速发展。当时蔡声白刚从美国留学归来不久,他将从美国学到的管理知识应用于生产中,并进口新式织机,招聘受过教育的工人操作。蔡的两个助手都是浙东人,他们常常前往嵊县和东阳县招聘聪慧的年轻男女进厂做丝织学徒。当然他们得先过严格的测试关。

多亏其青年工人有朝气,懂技术,至1927年,美亚已经发展成为全中国最大的丝织企业,拥有408张织机,1300多名雇员,其中一半多的人都经过四到五年的学徒期。为了鼓励青年人提高产量,厂方提倡生产竞赛,增加薪水,同时还提供一系列福利待遇:宿舍、餐厅、诊所、图书室、夜校、俱乐部、竞技队,等等。在这些有远见的举动的刺激下,在十年时间里,美亚便发展成为拥有10个分厂、1000多张织机的企业集团——其织机数量占到上海织机总数的将近1/4。当时该市绝大多数丝织作坊都不超过10张机子。<sup>⑧</sup>

比起其他丝织企业来,美亚的原料来源和产品销路都有多种渠道,使之在大萧条的冲击下能处于更为有利的位置。当许多倒霉的竞争者身处绝境时,美亚的利润却继续滚滚而来。至1934年,美亚的1000张织机占到整个上海仍在运作中的织机的一半。<sup>⑨</sup>

但是,对美亚来说,成功中也孕育着危机。技术熟练、生产能

力强的年轻雇员知道厂里财力雄厚，便开始要求增加额外补贴。1927年初，部分美亚工人在一位来自浙东的马克思主义者何大同的鼓动下开始罢工，要求增加工资，加强工作保障，承认工会。虽然总经理蔡声白开始时对这些要求不予理睬，但当何大同握着手枪闯进经理室后，蔡改变了态度。厂方同意增加40%的工资，补发罢工期间的工资，今后没有正当理由不得随意解雇工人，向工会发放津贴。1927年3月21日，美亚工会成立。然而，此后不久，四一二政变发生，何大同处于国民党当局的监视之下。在一次秘密会议期间，警察突然来临，何大同逃到街上，不慎踩在一块西瓜皮上摔倒，被警察抓住，不久便被枪决，时年24岁。<sup>④</sup>

随着何大同之死和相伴而来的工会被解散，美亚不但打算在新招收的工人中加强纪律，还拒绝兑现先前的诺言。1930年，一名工人以难以胜任其岗位而被解雇，其余工人则被要求签定雇佣合同——早先的权利被大打折扣。对此，美亚8个分厂的工人（1229名男工和女工）罢工两周，以示抗议。结果，劳资双方都只取得了部分胜利：从理论上来说，1927年厂方同意的条件应该得到尊重，但工人们仍然必须签订雇佣合同。织工们对此结果并不满意，两个月后，即1930年夏，他们再次发动罢工。此次罢工持续了35天，在上海市社会局——他们更倾向于工人一方——的调停下，双方达成协议：实现1927年协议，给工人发放补贴，给予新近招收的临时工以永久性岗位。<sup>⑤</sup>

184

1933年的工人骚动是后来一系列美亚工人制造的麻烦的开端。数年后，丝织品价格大滑坡（1933—1934年间跌落了约50%），诱发了另一场更具戏剧性的冲突。因为街上到处都游荡着失业的织工，贪图利润的美亚经理们认为这是一个削减劳动成本的天赐良机。1933年，厂方削减工人工资10%。次年，厂方

宣布再次降低工资，降幅平均达 15%。可是这一次工人们不依了。1934 年春，美亚所属 10 个厂的工人——4500 名男工、女工和童工——全体罢工。

罢工者指出，美亚各厂在 1933 年创造了最高销售纪录，他们要求恢复 1933 年前的工资水平。在 50 多天狂热且充满暴力的日子里，罢工者不断地向厂方、党政官员和警察施加压力，并扩大舆论影响。同时，他们又与外来的盟友取得联系，其中最著名者即共青团。这些联系使他们付出了高昂的代价——至罢工结束时，有 143 名工人因被指控与赤色分子有联系而被解雇。尽管政府心存怀疑，但此次罢工并不能简单地归于外来的共产党煽动的结果。其严密的组织，强有力的要求，均来自美亚各厂的工匠；美亚织工之政治自成风格，他们为自己赢得了“贵族工人”的名誉。然而，1934 年罢工的失败，标志着这一特殊形式的抗议的终结。在后来的年月里，由于织工们失去了许多特权，外来党派开始在其政治活动中发挥更大的作用。

185 当上海整个纺织业在 1936—1937 年间复苏时，数十家小丝织厂重新开工生产。\*经官方批准成立的工会稳步地吸收最近重新上岗的雇员。1937 年的罢工浪潮——涉及到全市 200 多家丝织厂——乃是新成立的工会大肆活动的明证。幸亏有政府（以及帮会）的关系，工会发动的罢工取得了一定成功，但工人的独立性也随之衰减。至 1937 年夏日本发动侵华战争时，织工们看起来失去了许多贵族工人的明显特征：自信、自控和自治。厂方的多方盘剥和政治干预的增加，使这些曾经幸运的工人陷于不

---

\* 朱邦兴等编：《上海产业与上海职工》，第 135 页。1937 年，上海的丝织厂达 500 余家，共有织机 7000 多台，丝织工人总数共计约 4 万人左右。



怎么好过的境地。

然而,在抗日战争及随之而来的内战时期,工人行动主义无论是在频率还是在政治影响上都有所增加。由于有南京国民政府时期的经历,以及从农村返回的共产党革命者不断的鼓动,丝织工人——尤其是那些规模大、效益好的企业里的丝织工人——政治性日强,在上海复活的激进工人运动中扮演了主要角色。

## 社会构成与大众文化

这些织工是些什么人?他们是如何成为如此有影响力的政治势力的?上海丝织工人的数字各时期有着戏剧性的差异:在大萧条时期,被雇用的织工不足1万人,但随着1936—1937年间的恢复,其人数已达4万多人。<sup>④</sup>这一数量大、变化快的工人力量包含两种不同类型的织工。其中工作最稳定、最具威胁的织工主要来自浙江东部的嵊县和东阳县。这些工人都是受过教育的年轻男女,他们都从美亚以及其他大型机器丝织厂开始其丝织生涯。<sup>⑤</sup>对他们来说,来到上海乃是升迁的机遇。从现存美亚绸厂2500多份工作申请表的情况来看,绝大多数新工人均来自农民家庭。而且,这些年轻的织工——他们进厂时多为二十来岁——并非出身于普通农民家庭,因为他们几乎都曾受过初等教育。<sup>⑥</sup>

第二种人来自杭州、湖州和苏州等传统手工业地区,他们大多来自世代相传的小型丝织作坊,年纪较大,受教育较少,由于农村手工业的衰落,他们被迫离开家乡,来到城市。对他们来说,来到上海,就等于步入无产化过程,失去了许多原先作为传统手工业生产者的自由、自主特征。这些织工通常工作于工资较低且

186

不稳定的小厂，与其工作于大型机器丝织厂的工人兄弟形成了鲜明对照。<sup>⑤</sup>

两种类型的织工之差别还从其文化程度上体现出来。1938年对上海织工情况的调查表明，来自浙江东部的织工的文化程度之高令人称奇：高小程度的男工有30%，初小程度的有40%，稍识字的有25%。至于来自浙江东部的女工，有一定文化的占35%。很重要的一个原因，这些织工较高的文化水平是与美亚早期的招工政策分不开的。相反，来自杭州、湖州和苏州的织工——他们构成了小型丝织厂织工的绝大多数，其文化程度低下：男工中有百分之七八十是不识字的，女工文化程度更低。<sup>⑥</sup>

上海丝织业中，约有一半是女工。在小厂，女工一般都在准备部干活，而男工大多在机织部工作，从事技术性的机器操作。这种以性别划分工种的情况一直存在于浙江农村，丝织工作本身常常由男性担任，他们负责织机的操作、保养和修理。妇女则认为在复杂的织机上爬上爬下是不体面的。在美亚绸厂，蔡声白引进了新式管理方法，打破了传统的工种划分。当发现女性织工的工作能力并不比男工差时，美亚雇用了大批女性织工（一般资料称为“绸工”——译者注），而工资只及男工的80%至90%。厂方的目的显然是为了降低成本，造就一支更为驯服的工人力量，因为一般看法都是，女工比起男工来，没那么多的要求。美亚的织工——无论是男工还是女工——都不必担负机器修理的责任，修理之事都由杭州技术学校毕业出来的技工担任。<sup>⑦</sup>

来自不同的地区，教育水平高低不等，工作环境各有天地，造成了上海丝织工人中这两类集团各具特色的大众文化。来自浙江东部的大多是青年，接受现代都市文明较为容易。在手头有187 钱的日子，衣食住行都带些小资产阶级色彩，有的西装革履，出门就坐车，看电影，吃西餐。<sup>⑧</sup>正如一位商务印书馆的职员回忆他

在与一家大型丝织厂的雇员相遇的情况时所说：“有一次人家要求我前往协助调停附近的物华绸厂为期已两周的罢工。我是第一次进该厂，我穿着旧衣服，发现织工们拒绝在白天见我。次日，我换上一套新衣服，披着一件新外套，来到厂里，谈判得以顺利进行。”<sup>⑧</sup>这些赶时髦的年轻人没有什么信仰，人家相信关公兄弟会那一套传统的秘密结社或歃血结拜，他们则相信友谊互助会。男女婚姻很少由家长做主和回到乡下办喜事；相反，男女工多为自由恋爱，不经过什么麻烦仪式，直接实行同居的很多。这一点，他们是从上海的学生中学来的。<sup>⑨</sup>

当然，其浙东习俗并非一概弃而不用。许多织工天生就有一副唱绍兴戏（即越剧）的好嗓子，他们还常常在当地茶馆里客串演出。\*在美亚绸厂，织工们组织起一个越剧团，该剧团成为1927年罢工的组织核心。<sup>⑩</sup>据说，因为有较丰富的舞台经历和对越剧的执著爱好，许多年轻织工都能在广大群众中演说；1934年美亚绸厂的罢工自然便是他们充分发挥鼓动能力的明证。因此，以地缘划分人群在这些“摩登的”贵族工人中仍然十分盛行。共产党早期在美亚的网络实际上便是以地缘划分的。<sup>⑪</sup>

来自杭州、湖州和苏州的织工，他们被迫离家，大多没什么文化，旧习惯、旧传统根深蒂固。他们的服装，多着蓝布褂裤，扎起裤脚。他们往往集体住宿，一间小房子，挤了許多人，很是肮脏。不少的人信佛，信命运，也有人相信耶稣和天主，因此常常迁

---

\* 越剧据说在1906年起源于浙江东部的嵊县。1917年传到上海，最初并不是一个流传广泛的剧种，且经常被喜欢昆曲（即苏州戏）的人看不起——后者起源于江南更书卷气的地区。但在改进绍兴戏唱腔和融会京剧动作后，越剧在20世纪20年代的上海赢得了广大听众。见吴贵芳：《上海风物志》，上海，1985年，第315～316页。

188 就现实,比较缺乏远大眼光——这是1938年一份共产党调查报告得出的结论。他们对婚丧的礼节比较看重,终是尚习旧俗而已,届时,少不了大吃大喝,此一情节有助于加强同乡感情。这些织工中还保持着浓重的血缘关系,有些人甚至是全家一同进厂做工。这些没什么文化的人来到上海,不是像上述浙江人那样以学生为榜样,而是效法帮会中人行事。结拜兄弟,结拜姊妹,加入帮会,使这些形同无根浮萍的工人找到了某种社会认同感。<sup>⑧</sup>正如一位女工回忆的那样:

我们大成丝织厂准备部的十位女工结拜成姊妹。大姐二姐都来自杭州,老五老六也是。在某个休息天,我们相聚在公园亭子里,当中有一人会写字,把我们大家的名字写在一张红纸上。她还将我们的誓词写在红纸上:“有福同享,有难同当。”这纸誓词由大姐保管。结拜之后,我们到一家娱乐中心痛痛快快地玩了一场。

这类结拜团体虽然是非正式组织,但在厂内拥有相当势力。上面那位回忆者还提到,有一次,她躲过了监工一次重罚,原因就在于另外九位姐妹向监工发出威胁,如果不收回成命,她们将停工不做。<sup>⑨</sup>

背景和文化的差异也反映在政治活动上。简单说来,来自浙江、受过教育、已经城市化了的工人(他们是1930年和1934年罢工的主力军)往往希望罢工有良好的组织,明确的要求,甚至提出新的权力和要求。相反,来自传统丝织业地区的织工(他们在1936—1937年罢工中担当主角)更倾向于进行简单的罢工,其要求很少超越他们失去的利益范围。然而,尽管存在差异(常常是模糊不清的),但上海丝织工人之间的鸿沟并非不可逾越。与上海许多产业部门的情形不同,来自不同地区的丝织工人很少发生械斗,除非工会组织者故意挑动其事。织工们对自己的

工作都有一种荣誉感,容易团结起来,为了一个共同的目标而斗争。1934年,当美亚绸厂受过教育的织工站在动员的最前方时,小厂工人很快伸出了支援的手臂。

## 1934年美亚绸厂罢工

1934年美亚绸厂的罢工可能是南京国民政府时期最具影响的劳资纠纷。由于罢工者都具有较高的文化水平,他们的要求赢得了广泛的听众。同时由于共产党干部和国民党当局的介入,此次罢工深受这一时期政治斗争的影响。

导致此次美亚绸厂著名罢工事件发生的导火线是厂方宣布 189  
削减工资——因为当时的生产受到了世界市场的影响。1928—1931年,印度和东南亚的购买量占到美亚绸厂总销售量的一半以上。可是,在后来的几年中,日本竞争者在两地的销量占了上风;至1934年,美亚的出口额只占其总销量的28%。尽管1933年对美亚来说是个丰产年(当年销量达到创记录的600多万元),但总经理蔡声白担心,销量主要转向国内市场,前景令人担忧。<sup>⑤</sup>因此,他决定通过降低生产成本来预防生产滑坡。从绸厂保存的数据来看,美亚的工资支出占了生产成本的相当比例,占其销售额的18%。所以,蔡声白希望通过大幅度降低工资来防止利润滑坡。<sup>⑥</sup>

3月2日,当工人们结束新年假期回厂上班时,厂方宣布了降低工资的决定。工人的情绪立刻愤怒起来。次日早上,第六分厂——拥有美亚的试验所和技术水平最高的工匠——的织工们在上工钟声响过后,“都庄严肃静地站在厂门口,拒绝上工。”<sup>⑦</sup>

抗议本身对六厂织工们来说不是什么未曾经历过的事。几



个月前，该厂十名技术最娴熟的工匠——从事特殊织物的五台织机工人——便发动怠工，要求增加工资。他们很快就得到厂里其他工人的支持：先前厂里由极少数人组成的读书会，发展为人数较多的友谊会（四五十人），集中力量予以援助。经过将近一个月的斗争，终于获得胜利。这样就激发了工人斗争的情绪和对自身集体力量的自信，不久，全美亚工人友谊会运动开展起来，十个分厂都有了友谊会。<sup>⑤</sup>

友谊会的背后，有一批政治化了的工人在操纵。例如在美亚四厂，在国民党统治初期，有十到十五人参加了中共地下党。<sup>⑥</sup>在六厂，有十名织工加入了共青团。其中有几人在1934年新年假期决定留在厂里，准备应付估计会出现的新一轮削减工资。<sup>⑦</sup>

190 所以，当六厂罢工者派出代表前往各厂联络、寻求支援时，一张组织良好的网络早已铺就。\*几天里，其余工人，除了学徒工（约500来号人）外，都参加了罢工。<sup>⑧</sup>罢工后各厂都选出罢工委员，组织罢工委员会，在罢工委员会之下，分成若干小组，并产生组长委员会。十个分厂的罢委会各选派代表二人或三人，组成总罢委会，设在六厂，由该厂一名共青团员主持其事。总罢委之

---

\*这里，我不赞同爱德华·哈蒙德(Edward Hammond)的观点。他认为：“罢工的组织工作相当缓慢，原因有几方面，最重要的是缺乏事前准备工作。”见 Edward Hammond, *Organized Labor in Shanghai, 1927—1937* (Ph. D. dissertation,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1978), p. 222. 该问题研究的主要资料——朱邦兴等编《上海产业与上海职工》，the *Shanghai Municipal Police Files*，老工人访谈录，政府及工厂档案——提供了一个更全面且完全不同的工人组织画面。所有这些资料都没有被哈蒙德利用。然而，哈蒙德指出，在1934年罢工中，工会几乎没有发挥什么作用，这一点无疑是正确的。尽管美亚六厂的几名共产党员在罢工前试图建立一个赤色工会，但加入者寥寥无几，未能形成气候。参见“张祺访谈录”，1982年3月10日，存上海第四丝织厂档案室。

组织如下：总务、组织、宣传、交际、纠察，共计五部。总务下分文书、会计两科；组织分登记、调查、编制三项；宣传由另一名来自六厂的共青团员负责，下设宣传、募捐二队，另设编辑部，负责出版罢工日报；交际负责谈判及与外界保持联系；纠察则负责维持秩序，保护谈判代表，收集情报，保护工厂机器，供应伙食，等等。<sup>⑤</sup>

这些组织的迅速建立，乃是工人中原先存在的非正式网络的反映。例如，在美亚六厂，负责保卫工作的纠察队中，有个十二人互助会，早在罢工前五年就有了。<sup>⑥</sup>地缘关系也在组织工人中发挥出作用。张祺是来自浙江浦江县的六厂工人，她很快在七厂发动起同乡女工参加罢工。<sup>⑦</sup>也许正因为有这些长期而广泛的联系，罢工者都能听从罢工领导者的命令。正如一位参加者所回忆的：“罢工期间，工人很有纪律性。每天都来到工厂接受指令。每当进厂时，我们都要向孙中山的画像三鞠躬。然后，我们就听从安排，有些人负责站岗，另一些人则被派出去募捐。”<sup>⑧</sup>

凭借其行之有效的组织机构，罢工者开始发出怨愤之声。罢工开始后一周，他们发表了一份表达其立场的宣言，深深刻印着他们的道德信念：“只要我们能够生存，只要厂里能够维持我们的生存，我们很愿意忍受苦难和压迫……我们所要的只是生存……现今再次削减工资，我们已无法维持生存。为什么我们必须继续一天天熬下去？如此重压之下，我们别无选择，只有拿起最后的武器：罢工！”<sup>⑨</sup>

与其他行业的工人相比，丝织工人的境遇并不像美亚宣言中描绘的那么凄楚。1934年，丝织工人是上海工人中收入最高的群体之一，仅次于造船工人、印刷工人和机械工人。比如，与非技术性的丝厂工人相比，他们每小时的工资是后者的三倍。而且，即使是在丝织工人中，美亚工人也是特别幸运的。他们的工

资比本市一般小型丝织厂的工人要多一倍。<sup>⑧</sup>蔡声白削减工资的举动是想把美亚的工资与本行业其他企业的工资拉平，以便增强其产品的竞争力。<sup>⑨</sup>

美亚织工的工资不是绝对的下降，而是突然之间的相对下降，后者导致了工人的抗议。正如表 9 所示，1934 年，上海丝织业的工资达到了五年来的最低点。与 1932 年的最高工资和 1933 年的次高工资相比，1934 年工资的下降幅度十分明显。

191

表 9 上海丝织业工人工资情况，1930—1934 年  
(每小时工资，单位：元)

工种	1930 年	1931 年	1932 年	1933 年	1935 年
丝织	0.096 元	0.091 元	0.112 元	0.104 元	0.087 元
缫丝	0.044 元	0.041 元	0.034 元	0.038 元	0.029 元

资料来源：Wage Rates in Shanghai (Shanghai, 1935), p. 54.

192

美亚的织工希望通过唤起厂方的同情来停止削减工资，他们说，关键在于，工资是个是否能维持一个工人家庭体面生活的“道德经济”问题，而不是一个工资支出是否在生产成本中所占比例太高的“分配问题”。<sup>⑩</sup>罢工者从以往的经历中知道，作为调解劳资纠纷的社会局往往软弱无能，他们从一开始就决定直接与厂方谈判。因此，总罢委会以公函通知蔡声白，约定 3 月 11 日下午 2 时在法租界马浪路总厂当面对谈。

届时，工人代表 40 余人准时到达谈判地点，并为预防起见，特派 200 余名纠察队员前往保护。然而，总经理拒不见面，且要求工人派代表赴英租界山东路美亚缫厂发行所谈判。工人代表因赴该处有失保障之虞，一致要求经理赴厂谈判。不多时，法捕房开来大批巡捕包探，试图驱散人群——当时已聚集达 3000



人，为了将代表与成千的支持者隔开，厂方在厂门施放电流，阻止代表出门，企图加以监禁并送捕房。一场战斗随之在捕房及其调来的装备铁甲车机关枪的安南兵和手握石头的工人之间展开。在两个小时的对抗中，一名妇女死亡，工人重伤者十余人，轻伤百余人。厂方见事态扩大，不得已将代表全数放出。此时，工人即整队退至西门体育场，召开临时群众大会，愤怒的代表们相继发表演说，强烈谴责厂方的背信弃义，并决定改变策略，向市政府社会局请愿。<sup>⑩</sup>

惨案发生后，工人情绪更加高涨。因为直接交涉之路已断，于是决定走由政府机关调解的路子，并正式向社会局发动请愿。3月13日，1000多名工人向市政府进发，提出以下要求：支付受伤者的治疗费用，抚恤死难者家属，补发罢工期间的工资，恢复以前的工资水平；惩办法租界肇事主犯，赔偿损失，在报纸上公开道歉，保证以后不再发生此类事件。社会局只是答应予以适当考虑。<sup>⑪</sup>

为了尽可能地传播罢工信息，充分发挥他们的文化水平，美亚总罢委会向上海市民发出公开信。此信很快在各大报纸上刊登，信中强烈谴责美亚总经理蔡声白勾结军警，袭击工人，导致一人死亡、数十人重伤的严重后果，并说他已没有资格与美亚工人共存共荣：

美亚丝绸公司乃上海丝织业巨头，生意兴旺，每年获利甚丰。去年总销量达六百多万元之数，超过先前任何一年。但总经理蔡声白对劳资合作之意义懵然不知；他关心的只是如何增加公司利润。他用尽各种手段盘剥工人。近日他又设计进一步削减工人已经低得可怜的工资，使工人无以为生，不得不举行罢工。令人惊讶的是，蔡声白不仅不妥善处理，反而动用武力加以镇压……这一借洋人之手谋杀我同

193

胞的行径与五卅悲剧有什么两样。工人们决心坚持斗争。不消灭暴力、不打倒资本家走狗蔡声白、不废除不合理的工资待遇、不为死伤的工人同胞报仇，我们决不罢休。所有活着的人们、所有有正义感的人们，都会为这场屠杀感到愤怒。我们希望你们发挥良知，和我们一致呼吁惩罚罪犯。再有，我们希望你们为处于困境中的工人提供精神上和物质上的援助。<sup>②</sup>

随着这封公开信的发表，罢工者将自己与厂方之间划出一道深深的鸿沟。中国的贵族工人将不再采取私下谈判以求得雇主施恩的方法。现在战斗已经公开，无论是政府还是普通公民都被吸引加入。正是在这一阶段，外来的共产党组织者被这个曾经孤芳自赏的工人群体的阶级觉悟所吸引，更加积极地插手丝织工人的罢工。

美亚各厂附近的茶馆是工人们聚谈罢工进程的地方，自然而然地成为共产党开展动员工作的舞台。年轻的共产党活动分子以找朋友或找亲戚为借口，先从富有同情心的茶馆顾客人手，然后与罢工者逐步取得联系。<sup>③</sup>在接下来的几个星期里，来自共产党几个方面——中共沪西区委、共青团江苏省委，甚至包括远在江西的中共中央——的声音都在催促工人们采取更加激进的手段。<sup>④</sup>共青团刊物曾发表一系列文章，强调共青团江苏省委有必要掌握美亚的斗争。<sup>⑤</sup>可是，虽然共产党人全身心投入，他们执牛耳的企图却未能实现。一份4月初被英国巡捕搜获的共产党内部报告承认：“尽管美亚罢工者的态度是好的，但我们的活动仍然停留在斗争的外围。”报告还叹称缺乏“坚强的组织”，指责工人罢工委员会不懂得区分它自己与共青团之间的责任。<sup>⑥</sup>这种“混乱”显然是罢委会自主行事、不受外界干扰的结果。

共产党人虽然未能有效地取得罢工的领导权，但他们的努

力却一直在产生多方面的重要影响。由于害怕共产党插手,美亚厂方一直在坚持自己的立场,政府也倾向于不支持工人。3月15日,厂方发布最后通牒:在两天内工人必须复工,违者以自动解雇处理,另雇新工人取而代之。次日,罢工代表被召到社会局与党政官员会谈。当局态度坚决地要求工人立即复工,其他事情由党政方面协调解决。<sup>⑦</sup>

3月17日,厂方规定的最后期限到了,但很显然,政府规劝罢工者复工以瓦解其战斗性的图谋落空了。因此,当局决定采取更强硬的措施。大批便衣警察被派到美亚各厂,试图绑架有嫌疑的罢工领导人。在六厂,当一位姓施的领导人被包探抓住时,一位女纠察队员奋不顾身,一口咬住包探的手,施某得以乘机逃脱。但在五厂,因纠察队员一时疏忽,一个名叫刘金水的罢委被骗绑进当地公安局。<sup>⑧</sup>

第二天,400多工人及支持者围住西门公安局,要求释放刘金水。公安局头头答称,自己无权处理此事,因为捕刘是奉南京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之命行事的。包围的人群不满意于这一解释,拒不解散。相反,抗议者整夜静坐,公安局大门前和周围街道都挤满了人,交通完全堵塞。其间,法界及南市一带的数百名绸厂工友纷纷组织慰劳团,携带大批食品前往援助,并帮助包围。西门一带的商店也纷纷捐送食物,并举行会议,准备以罢市来援助。震旦、大同等大学也派代表来慰问声援。次日早上,远离市区的工人也成批地赶来支援。<sup>⑨</sup>上午10点,上海市公安局局长眼见工人情绪不断高涨,各界纷纷支援,不得不发布命令,释放被捕工人。 195

听到这一消息,工人群众欢呼起来,鞭炮声不绝于耳。在胜利的刺激下,罢工者很快向上海当局提出新的、更高的要求。除了恢复1933年前的工资水平外,工人们还要求全额补发罢工期

间的工资，没有正当理由不得随意开除工人，取消罚扣工资，男女同工同酬。<sup>⑩</sup>

要求的最后一条反映了丝织女工在此次抗议中所发挥的作用。美亚原本想通过多招收女工来养成一支驯服的队伍，结果打错了算盘。3月11日事件中女工的受伤，女纠察队员的英勇，一名女工的被关押，所有这一切，无不表明了女工高昂的战斗精神。<sup>⑪</sup>

刘金水的被释放大大鼓舞了织工们的情绪，但对他们来说，不幸的是，当局并未继续让步。公安局加强监视并开始逮捕工人中的积极分子。3月27日，一个国民党代表从南京带来的一份秘密报告说，共党分子已经渗入到此次运动，他要求采取更严厉的措施。<sup>⑫</sup>在接下来的几个星期里，有十几名罢工者因为散发罢工刊物和进行募捐被抓（其中有好几个被处以拘留）。<sup>⑬</sup>

然而，警方的行径再次壮大了罢工者的支持队伍。为了抗议警方滥抓滥捕，500名美亚学徒于4月5日开始罢工。厂方对此感到十分惊讶，因为在习惯上，学徒因其地位的原因，往往是安分守己的。他们在三到五年的学徒期里，要向厂里交30到50元的保险金，如果在学徒期满之前离开，这笔钱就要被没收。<sup>⑭</sup>虽说学徒是美亚厂里最穷的，因为他们在学徒期里基本没什么收入，所以他们看起来不可能加入反对削减工资的抗议浪潮，但是，当这群工人加入斗争时，罢工者也开始修改其原先提出的要求，增加了要求厂方废除学徒交保证金的规矩，工头不得欺压学徒，向每个训练期满后的学徒（无论男女）提供一台织机。<sup>⑮</sup>

196 随着全体工人加入罢工，美亚罢工的影响迅速扩大，上海其他各机工厂的怠工、罢工、总罢工和请愿示威，很快汹涌澎湃起来。上海橡胶厂的工人派代表到美亚，要求罢委会给以组织上的帮助，药业、阳伞业也联合罢工与请愿，此外尚有烟厂丝厂等斗争。即使是在内地，在传统的丝织业中心湖州和杭州，织工们也

步其都市兄弟的后尘发起罢工,要求增加工资,改善劳动条件。美亚罢工不仅受到了其他易于罢工的工人的欢迎,甚至也受到了某些雇主的欢迎。其他丝织企业自然都从美亚罢工中获利,这种现象使美亚工人募得了不少捐款,充实了力量。<sup>⑥</sup>

眼见市场渐被竞争者占领,厂内则连学徒工都不干活了,厂方决定施以报复。第一步就是试图停止膳食,先从局部开始实行,其步骤是将工人平时吃的菜蔬一律取消荤菜,只供给很坏的几碗素菜。此举立刻引起了工人的反抗,向各厂厂长要求恢复原样。在九厂,有200名女工还举行了绝食斗争。<sup>⑦</sup>四厂的织工——在该厂中共地下党支部书记的领导下——将厂长住处包围起来。试图翻越路障解救厂长的警察,在遭遇到工人从屋顶兜头浇下来的粪便以后,仓皇撤退。该厂长在被包围两昼夜后,被迫签字保证改善膳食,并拿出100元作为临时菜蔬补充费,才得以恢复自由。<sup>⑧</sup>

由于劳资双方的关系日趋紧张,社会局决定更积极地介入调停。青帮头子杜月笙被请来当说客,但他要求工人放弃斗争的努力未能奏效。杜在美亚工人中没什么徒弟,所以说话也不管用。4月8日,蒋介石电令迅速解决此次工潮,迫于压力,社会局组成一个正式的调解委员会,计划在4月10日作最后的调解。<sup>⑨</sup>

在约定的4月10日上午10时之前,数百名工人聚集到市政府社会局外面。他们两人一排行进,手举孙中山画像,并派人散发写有“劳工神圣”等内容的传单。在社会局外面聚集起来后,织工们唱起了罢工主题歌:“多么悲伤,多么悲伤,多么可怕的悲伤;美亚工人的薪水减了许多……”然后是齐声高呼:“我们要工作!我们要吃饭!”可是,令工人大感惊愕的是,调解又泡汤了——美亚厂方根本就没有露面。厂方声称,将长期停工关厂,故无调解之必要。因为事情悬而不决,调解也就无从谈起。厂方为

197



了证明其决定不是空穴来风,关闭了所有工人食堂的大门,使得罢工者陷于无饭可吃的境地。<sup>⑨</sup>

同时,罢工者仍按照原定计划前往社会局,要求迅速解决劳资纠纷,反对厂方停止膳宿。至午后五六点钟,全美亚工人 4000 余人均已先后赶到,将社会局、教育局、卫生局统统包围起来,不论局长职员以至茶役,一律不许出入。当时局中职员正值办公完毕回家之时,均受阻不能返家。一场冷雨袭来,数千工人干脆静坐以待。当晚一名女工甚至带了婴儿,坚持坐在阴冷的空地上。<sup>⑩</sup>

此时,美亚罢工者已占领上海市政府的心脏部位,大批警察和保安队被调来,准备镇压。次日早上,数百名警察和保安队以及六辆救火车到达现场,将工人团团围住。场面陷于混乱时,上海市市长吴铁城来上班,当他想挤出一条路进入他的办公室时,工人们将他围住,要他将问题解决。受这一场面的刺激,警方决定向工人发起攻击。一时间,棍棒乱舞,水龙头对准工人喷射。最终,许多人受伤,抗议者被驱散。<sup>⑪</sup>

4月11日事件成为美亚罢工的转折点。\*虽然警察袭击导致人们对罢工的极大支持(4月11日事件发生后不久,沪南沪西的100多家小丝织厂即发动同情罢工),但是当局却再不同情工人方面了。在经历了罢工带来的冲击后,上海的官员们开始倾向于站在美亚厂方一边了。

美亚总经理实行的新策略也推动了资方与政府的合作。在

---

\*近年,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学者在评价美亚罢工时认为,4月11日的抗议是当时极“左”工运政策产生的灾难性后果之一。据此,美亚罢工委员会被说成是执行了王明“盲动冒险”的路线,如果采取谈判策略,效果就会好多了。美亚罢工最终失败的原因,是执行了当时党的错误政策。见沈以行:《工运史鸣辨录》,上海,1987年,第140—142页。尽管大家都知道4月11日事件是当时形势逐步升级的结果,但事情的发生是否与执行共产党“左”倾工运政策有关还不清楚。

罢工过程中，蔡声白将全世界成功地镇压纺织业罢工的新闻报道剪了一大堆。<sup>⑧</sup>蔡声白也许从这些材料中得到了启示，他决定采取更坚决的措施来结束罢工。他以同乡关系为名，积极拉拢社会局头头及其三个下属，当然大笔金钱是少不了的。同时请他们帮忙迅速结束罢工。<sup>⑨</sup>

政府的严厉态度也在不断出动大批警力以削弱罢工势力中得到了体现：在上海宣布临时戒严，禁止一切集会结社；把警察派到美亚各厂，逮捕活动分子。在四厂，有 11 名罢工领导人遭到逮捕并被送往淞沪警备司令部拘押，其中包括共产党支部书记。<sup>⑩</sup>4 月 13 日，南京的国民党中央党部——蔡声白在那里也有关系——致电上海市党部，下令竭尽全力立即制止罢工。中央党部害怕有“不良分子”（即共产党的同义语）插手其间。次日，在美亚各厂的逮捕数字便上升到了 40 人。<sup>⑪</sup>

在政府严厉措施的鼓动下，美亚厂方闻风而动。工厂宿舍被关闭，工人们被迫投靠亲友，或者流浪街头，许多工人甚至不得不寄宿在郊外的五卅公墓。由于无家可归，群龙无首，丝织工人的战斗精神日渐消失。

由于失去了许多关键人物，总罢工委员会发现已经很难维持对工人的领导。美亚的学徒，在厂方答应向他们提供自己的织机的引诱下，最先开始复工。此时，织工们向罢工委员会提出取消罢工，如果不答应，就自行复工。为了挽救危局，总罢委会决定召集群众大会以便冲破或减少白色恐怖的威胁，决定在 4 月 21 日再次向市党部发起请愿。届时，有 1000 多疲惫的工人来到现场，要求当局释放被捕工友，立即恢复膳宿。所提要求很有限度（根本就提工作问题），表明此次运动已经日薄西山。国民党当局相信自己此时已占上风，答称：先复工后调解，被捕者待工人复工后释放，膳宿由市党部下令厂方即日供给。由于疲惫不堪，元

气大伤,织工们次日即回厂复工,结束了他们为期51天的罢工。

罢工工人回到厂里,发现情况发生了变化。资本家宣称工厂已经改组,复工工人必须重新登记。登记之事很快变得明朗,就是对罢工工人加以留难和检查。结果,有罢工积极分子143人被开除。<sup>⑧</sup>

4月27日,应蔡声白的直接请求,南京方面下令上海当局严厉处置美亚罢工中的“反动分子”。<sup>⑨</sup>三天后,40名先前被捕的工人被龙华警备司令部判处徒刑30天或45天不等,并移送漕河泾监狱执行。四厂的共产党书记,因同案中人的出卖,被判处5年有期徒刑。<sup>⑩</sup>这一法律裁决,正式宣告了美亚罢工的结束。

从此次持久的、最终失败的工人政治中,有什么教训可以吸取呢?对美亚罢工者来说,他们痛苦地认识到,自身的力量是有限的。他们的罢工是一场典型的“贵族式”罢工:其组织基于小型的、先已存在的友谊网络,所提要求十分温和,且以道德语言来引起公众注意;外来的援助受到欢迎,但领导权仍掌握在职工自己的手中。<sup>⑪</sup>而且很显然,这种针对雇主的抗议形式是无法奏效的——蔡声白原本曾经有过的对手下技术工人的尊重及道德义务,在面临追求利润的时候黯然失色。

有位积极参加1934年罢工的女工,认为那次罢工是她人生的转折点,最终导致她加入了共产党,她回忆道:“我参加美亚罢工时还很年轻,也很天真,但是经过这场罢工,我懂得了阶级斗争的残酷性,认识到工人必须斗争,必须罢工。这就是那场罢工带给我的深刻教训。”<sup>⑫</sup>

工人可能还希冀厂方能恢复劳资双方先前的良好关系,但现实很快带给他们的是幻灭。蔡声白——他曾声称:“此次纷争不仅是给我们个人或我们一个厂留下了伤疤,也给整个民族工业留下了伤疤”——很快就采取了报复措施。在这场罢工结束后



的几个里，美亚工人工资被削减 30%，关闭了所有的工人宿舍，工厂食堂饭菜提价。<sup>⑤</sup>

使工人们雪上加霜的是，厂方开始实行租机制，也就是将织机包租给工人。美亚可以坐收年租，这样既可保证财源，又可卸去直接管理工人的麻烦。虽说厂方仍要负责原材料和产品销售问题，但工人的雇用、训练和工资等问题则完全由租机者负责。如此，管理费用下降了大约 15%。蔡声白在与包租者保持良好关系的同时，又将自己与普通工人隔开了一定距离。对工人来说，租机制进一步加剧了同乡地缘关系的分立，因为包工头显然偏爱与同乡人打交道。<sup>⑥</sup>

罢工之后，曾经引以自豪的美亚“贵族工人”失去了许多原本将他们区别于本市境遇不佳的纺织工人的特权。同时，上海其他的大型丝织厂，迫于行业萧条的压力，也与美亚一样，开始压缩管理规模，实行租机制。<sup>⑦</sup>这一步无疑是产业组织方式的倒退，缩小了原本薪水较高、劳动条件较好的大厂织工与待遇较差的小厂织工的差别。

上海丝织工人的政治潜力一向不被人注意，美亚工人 1934 年的罢工令人耳目一新。早期的工运组织者，无论是共产党还是国民党，都忽视了这一技术程度高、工资收入高的工人群体。因此，美亚工人的罢工，引起了各党派的极大兴趣。如同所见，共产党人试图掌握罢工的领导权——尽管未能大获成功，他们的尝试引起了其他党派的连锁反应。国民党方面曾派人（以大公报社记者名义）深入罢工者之中，试图劝说工人修改请愿内容，转移斗争目标。官方工会也对罢工发生兴趣，尽管当时只有美亚二厂有它的组织。到包围市政府的“四一一事件”之后，该官方工会就渐渐活跃起来，它利用在二厂的工会关系，开始分化二厂及五厂脱离总罢工委员会。<sup>⑧</sup>

201 在美亚大罢工的尘埃渐渐落定,即罢工之后二三年,一种新型的丝织工人政治开始显露出来——官方工会在其中唱起了主角。织工们与官方建立了密切关系,但同时也失去了他们的独立性和完整性。

## 1936—1937 年的全市罢工

在美亚罢工之后的一段时期里,上海丝织工人陷于沉寂。由于其“贵族工人”兄弟罢工的失败,以及经济压迫的沉重,该市织工已经无意于再发动另一场罢工。当然,罢工并未绝迹,只是规模很小,目标有限。1935年,织工的罢工每次平均为55人,与前一年平均为近1000人形成了鲜明的对照。由于该行业正处于严重萧条时期,1935年的罢工,无论是反对削减工资,还是反对开除工人,普遍都未取得成功。<sup>⑩</sup>

然而,到1936年下半年,随着丝织业渐渐恢复元气,罢工的频率和成功率都有所增长。该行业形势的转变可归因于从日本大量走私进口人造丝。走私人造丝既便宜,数量又大,只要有一小笔资本,就可以建立一个小型丝织厂。到当年年底,上海约有480家丝织厂开工,绝大多数都只是拥有几台织机的小工场。<sup>⑪</sup>当年,丝织工人总共发动了29次罢工,比此前任何一年都多。这些罢工时间不长(平均为8天),目标温和,但收效却很大。这些罢工多系新近建立的小厂的织工所为,其规模声势难望两年前美亚罢工之项背。此时的罢工,没有提到1934年大罢工时提出的男女平等、改善学徒待遇等问题。1936年的罢工也没有女工的广泛加入,绝大多数都是纯男性参加的、只提出有限的工资要求的罢工。<sup>⑫</sup>这类罢工中明显的保守主义和性别歧视,反应了这

些小型丝织企业的社会结构和工作情况。(这一时期罢工的一个特例便是美亚二厂工人举行的又一次罢工,此次罢工发生在1936年夏,为期两个星期,有150名女工和100名男工参加,工人们要求削减包工头的权力,废除工资等级,改善劳动条件。)<sup>⑧</sup>

丝织工人罢工的全面复苏引起了上海当局尤其是国民党市党部和社会局的注意。这两个部门的高层官员,正陷于派系之间的争权夺利,便把日渐活跃的丝织工人视为满足其私心私欲的潜在的社会基础。因此,两个对立的派系竞相建立官方工会,力图将丝织工人纳入自己的麾下。

12月,第一个新型织工工会成立,大约有600人参加了成立大会,包括国民党代表、社会局代表和亲国民党的上海市总工会代表。这个名为四区工会的新组织很快就声称拥有3000会员,覆盖120个厂。四区工会有社会局的背景,因为有个该局调解处的职员任某插足其间,当时有沪东织工领袖何某、邹某系任某同乡。至1936年11月间,这几人已将沪东各厂积极分子百余人结成调帖兄弟,进行筹备四区丝织产业工会工作。四区工会组织严密(与美亚的罢工委员会有异曲同工之妙),下设总务、宣传、调解、监察、组织和交际等六股。区工会之下有13个分工会,分别控制着100多个厂干事会。各厂干事会下设小组,总数约600来个,每组为5人,设组长一人,纠察一人。<sup>⑨</sup>

虽然其组织严密,四区工会之行事并非一帆风顺。据警方报告,至少有两个分工会积极图谋篡夺区工会的领导权。华德路分工会(拥有40个厂的约800名工人)与四区烟业工人工会关系密切,后者是上海总工会之下由青帮控制的一个工会,它很想与其社会局对手争夺对丝织工人的控制权。另一个分工会(拥有大约350名职工,多半为美丰厂的工人)则对其上级工会的专制行为不满,转与美丰资方关系密切。<sup>⑩</sup>

203 上海的其他各区工会也纷纷建立起来,其政治情况之复杂,并不比四区工会逊色。1937年1月,三区织工工会在沪西成立。始作俑者系国民党上海市党部农工部的王豪,他曾在1936年下半年派去解决一场五厂联合罢工。王豪不仅是青帮领袖陆京士和朱学范的徒弟,还是国民党准军事组织蓝衣社的成员。由于沪西不少织工都曾经在蓝衣社受过训练,所以王豪很容易在这批工人中发展关系。在上海市党部的支持下,他以令抗议者满意的结果解决了五厂罢工。因此,他以该五厂为基础成立了三区工会,成立大会很是热闹,朱学范也亲自赶来参加。<sup>⑮</sup>

人们也许没想到帮会中人能在江南工匠中取得成功,但是可想而知,小厂中缺乏文化的织工,在其陌生的城市环境中生活不稳定,与缺少技术的工人有很多相同之处。对他们来说,帮会发起的工会为其不稳定的生活提供了一定保障。

王豪组织工人的行动与其后台老板陆京士和朱学范在工人中发展势力、为即将到来的国大代表选举的计划是一致的。<sup>⑯</sup>当时,尤其是陆京士,正卷入与社会局局长(潘公展)、国民党上海市党部负责人(吴开先)及上海市代理市长(俞鸿钧)的激烈的派系斗争中。<sup>⑰</sup>这些人都想插足上海工人运动,借以扩大自己的势力。

工人们为了改善处境,欢迎建立工会。正如一位织工所回忆的:

我们工人当时不知道工会是国民党为国大选举拉选票计划的组成部分。我们所知道的只是组织起来会给我们以力量。王某此人,我认识,他是蓝衣社的人。但他有一副“左派”面孔——吃的是面条,骑着自行车,住的普通房子——确实受到了工人的信任。<sup>⑱</sup>

或者,就像另一位织工所说:“当王豪来的时候,因为有人代表工人说话,我们都很高兴。”<sup>⑲</sup>

当局各派系对丝织工人的青睐，甚至也引起了不那么顺从的工人的反应。2月，南市久华厂潘某等发起成立一区丝织产业工会，南市有美亚的六个厂，经再三动员，一向超然物外的美亚各厂先后加入。1934年斗争时起发动机作用的美亚六厂，在各厂中最后一个加入。<sup>⑧</sup>

因为在全市大部分丝织厂建立工会之事比较顺利，王豪遂打算建立一个统一的“上海丝织工人待遇改良委员会”。随即，要求增加工资的呼声迅速在丝织工人中流传开来。3月27日，在王豪等人的组织下，全上海丝织工人大会在曹家渡白利南路临近圣约翰大学的空地上召开，到会2000余人。大会提出增加工资、缩短工时、改善待遇等要求，正式通过组织待遇改良委员会。织工认为，丝织业正从萧条中复苏，可以为工人增加工资。在经过多次争论后，资方同意为每日收入低于五角者增加15%的工资，超过五角者则不予考虑。由于这部分最低收入者在丝织工人中只占很小的比例，工人们拒绝了资方的意见，决定发动一场全市范围的罢工。<sup>⑨</sup>

当全市各丝织厂接到警方保护的命令时（面子上是为了保护工会免遭仍在干活的工人的恐吓），形势顿时紧张起来。3月29日，锦新厂150名罢工者因警方阻拦他们找资方对话而冲砸工厂，并与警察发生冲突。同日，大约500多名工会会员开到元林（音）丝织厂要求该厂工人组织工会。有3名工人与驻扎于该厂的英国巡捕发生激烈冲突，其中一人用石头砸一名警士的头，并冲上前想抓住他。但正像一份英文报纸所说：“警士罗威尔（Lovell）曾经代表警察参加1935年的运动会，他不费什么力气就跑掉了。”几天后，3名积极分子被抓去审问，头上还缠着绷带。<sup>⑩</sup>

警方阻碍工会之举更坚定了工会领导人的决心。3月30日半夜，220家工厂（总数为354家）的11944名工人（总数为

23000人)发起联合罢工<sup>⑩</sup>——为当年规模最大的工人运动——领导者便是王豪的待遇改良委员会。如表10所见,罢工遍及全市各区。

在王豪“冲厂”策略——经过蓝衣社训练的工人纠察队员冲入那些工人不愿罢工的工厂砸毁机器——的煽动下,此次罢工急速蔓延。<sup>⑪</sup>近年有些回忆录揭示,当时中共地下党反对在丝织行业开展总罢工,主张因地制宜,以比较“开明的”手段与资本家打交道。<sup>⑫</sup>尽管共产党在四区工会有些势力,但整个丝织业的罢工领导权却掌握在王豪手里。

王豪的策略不仅遭到中共地下党的批评,同时也遭到他在社会局里的对手的指责。社会局对该市关键的产业部门之一发生如此大规模的罢工感到恐慌,同时为了削弱王豪及其后台老板的权力基础,遂发布紧急训令,以裁决办法来解决丝织业工潮。训令内容包括:工人全面增加工资一成,等经、等纬给津贴,

205

表10 上海丝织工人罢工的地区分布,1937年3月

地 区	罢工次数	工厂卷人数
公共租界		
东 区	4000	169
西 区	576	7
其 它	838	6
法租界	1560	20
南 市	3000	10
闸 北	2000	8
总 计	11974	220

资料来源: *Shanghai Evening Post and Mercury*, Mar. 31, 1937.

租机制改承揽制（厂方须负雇佣关系之责任），女工生产有四星期休假工资照给。这些条件比较宽大，足以消弭工人继续罢工的热情；至4月初，绝大多数织工已回厂上班。<sup>⑨</sup>

社会局在促使工人方面结束罢工取得了效果，但资本家并不那么好说话，他们中的绝大多数都拒绝执行给工人增加10%的工资等决定。罢工期间，美亚总经理蔡声白——当时正主持丝织业同业公会——牵头成立了应付工潮委员会。各厂均服从其节制，每台织机每月缴纳两元为应委会经费，应委会则设法对抗社会局提出的裁决训令。<sup>⑩</sup>

4月中旬，蔡声白把当时冲突情况反映到南京国民党中央党部，断言上海地方官员建立工会的企图乃是造成该市工人大罢工的主要原因。<sup>⑪</sup>

延至5月初，当时正在上海医病的蒋介石见丝织业劳资纠纷迁延不决，各大报纸对罢工情况仍在大肆渲染，遂申斥党政机关负责人员，飭令迅予解决。作为回应，5月14日傍晚，公共租界的大批探捕对四区工会采取突然袭击，借口是工会妨碍锦新厂工人张某的自由（张实系资本家走狗），将工会印信文件及入会工人之名册全部劫去，有20多名工人被抓去拘押在捕房。<sup>\*</sup> 206

几天后，四区工会代表（包括工会理事，一位国民党上海市党部职员）前往上海市政府社会局请愿，要求立即派员交涉送回工会印信、文件、名册，释放被拘押的工会理事及工人。工会领导人希望社会局能立即答复，以防止东区愤怒的织工继续发动罢

<sup>\*</sup> 朱邦兴等编：《上海产业与上海职工》，第177页；Shanghai Municipal Police Files, D-7744；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档案，#2:2-1054。那位曾向警方告密的张某抱怨道，自己被工会关了4个小时，被迫跪在地上，身上挂了一块牌子，上面写着“锦新厂的走狗”。锦新厂的干事会还将其丑态拍了照片。

工。<sup>⑨</sup>

此时社会局方面也感到手足无措，是倾向于他们曾倾力帮助建立起来的工会呢，还是迫于中央党部的指令行事？资方的毫不妥协打乱了社会局利用上海工人的工会化来为自己的政治目的服务的图谋。南京方面，与公共租界一样，害怕丝织、纺织和烟草等业工人的高度工会化将共同控制该市的经济，国民党的合作主义梦想将变为一场共产主义噩梦。就像当地一份报纸所说：“令当局深深烦恼的形势并不是孤立的，很有可能发展为一场工会联合的潮流，并且在将来的劳工关系中发挥决定性作用。”在南京官员的脑子里，共产主义的幽灵攫取高度组织化的工人运动的控制权已经为期不远。正如一份亲国民党的报纸在该市丝织工人罢工高潮时发出的惊叹那样：“也许，人们只是看到莫斯科妖魔经常被害怕工人的资本家放出来耍威风，但上层官员的手里确有证据表明，当前工人运动的发动与来自克里姆林宫的经济的和意识形态的支持是有牵连的……现在已经不是一个应不应该增加工资的问题，而是一个领导权掌握在谁手里的问题。”<sup>⑩</sup>

实际上，克里姆林宫对此次丝织业春季罢工的影响微乎其微。最积极的共产主义组织——被其上海地下党的主要对手称为“托派”——以锦新厂为基地。该厂工人在“托派”煽动下拒绝接受社会局的调解方案，继续开展长期罢工，要求增加工资30%。<sup>⑪</sup>无疑，此种激进举动导致了5月14日警方袭击四区工会事件的发生，因为锦新厂的罢工者一直在用工会房屋煮大锅饭。而且，其工会的负责人是从前锦新厂一个有共产主义倾向的工人。<sup>⑫</sup>但从总体上来说，在丝织工人的罢工中，共产党的影响不是主要因素。

然而，即使没有许多共产党人的参与，这次斗争仍然极具政



治性,即上海当局各派系都在力争占上风。当政府代表企图掌握工人领导权时,丝织工人中先前被掩盖的矛盾露出了水面。5月24日,美亚十厂500多加入工会的工人突然爆发帮口之争(溧阳帮与杂帮之间)。一帮同籍工人想复工,另一帮同籍工人则坚持要罢工,以取得更好的工作条件。从当晚11时至次早6时,两帮人在厂门口大打出手,以至血流遍地。<sup>⑥</sup>

社会局方面认识到他们已经失去对局势的控制,遂认定丝织工人之工会必须加以除去。6月3日,社会局下令关闭一区、三区和四区工会。新的工会,只要不在工人中煽动闹事,便被允许存在。\*6月22日,王豪在其被取缔的三区工会办事处被捕。他在被关了一个月后释放,受到了沪西织工旗帜和鞭炮的迎接。<sup>⑦</sup>

在日本人发动侵略前的一个月里,国民党官员快马加鞭成立新的丝织工人工会。同乡关系被各路工会组织者利用起来。由于形形色色的工会领袖争权夺势,挑拨离间,至1937年夏,在丝织工人中已形成四分五裂、不相统一的局面。<sup>⑧</sup>到当年8月日本人侵人并控制了上海的丝织业时,他们发现,曾经值得骄傲的“贵族工人”已陷于一片混乱。

\* *Shanghai Times*, June 3, 1937; 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档案, #722:4-520, 社会局的最后一招便是在工会请愿时将皮球直接踢到中央党部。有位织工曾回忆道:“大家都想到南京去请愿。虽然大家都看穿了上海当局的面目,知道它根本不会替工人说话,但我们对蒋介石都还存有幻想。”见“竺伯清(音)访谈录”,1961年8月22日,上海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工人运动档案。王豪也因为卷入请愿而遭到逮捕。见“何振声访谈录”,1961年5月25—26日,同前。

## 共产党的复活

208 南京国民政府时期的织工罢工与其他时期、其他地方、处于相同的社会经济环境下的工匠罢工有某些共同特征。就像伯纳德·莫斯(Bernard Moss)在解释19世纪中期巴黎工人的斗争时所说：“工业化步伐对工人来说已经够快了，商业竞争已使熟练工匠的安全、完整和相对价值受到威胁，足以引起他们的抵制和反抗，但完全的机械化还不能排除其技术，也无法消除其抵制的能量。”<sup>⑧</sup>即便如此，工人运动不仅仅是工业结构或市场条件的产物。更大的政治背景也是导致工人反抗的关键因素。正如爱德华·肖特(Edward Shorter)和查尔斯·蒂利(Charles Tilly)所说：“我们期望随着有组织的工人罢工的增加能导致国家政治的变化。而且，我们希望罢工的政治性能随着时间的推移而扩大，即工人运动国家化。”<sup>⑨</sup>

上海织工也不例外。在南京国民政府末期，外来的组织者将丝织工人的罢工越来越经常地、越来越紧密地与地方性和全国性政治斗争结合起来。在不长的时间里，帮派工会将织工斗争的自身特征——行业自尊、自治和道德主义——削去了不少。但从长远来看，南京国民政府时期的政治化经历为上海丝织工人今后开展更重大的斗争打下了基础。

在日本发动侵略战争后的一年里，在仅存的美亚两个厂里，共产党重新建立了支部。在美亚四厂，有十名工人加入了共产党。在九厂，建立了一个三人支部。<sup>⑩</sup>在1938年负责恢复上海工

人运动的四个共产党干部中,有两人曾是丝织工人。\*

可以肯定,战争期间,激进分子不是没有遇到对手。蓝衣社成员王豪——1936—1937年罢工的煽动者——投入了日伪怀抱。一些当初怂恿织工罢工的托派分子也不例外。<sup>⑧</sup>然而,很显然,共产党占了上风。1937年8月13日,即日本人对上海发动攻击的当天,年轻织工在共产党号召下建立起救国会。该组织成为共产党吸收新成员——尤其是从那些年纪轻、受过良好教育的织工中——的重要工具。<sup>⑨</sup>

珍珠港事件之后,即便是外国租界中的抗日活动也已无法立足,共产党采取了更隐蔽、最终也更有成效的动员方法。变化了的主要策略之一便是采取“传统的”工人联合的方法,最典型的就是结拜姊妹和结拜兄弟。这些人们所熟知的结合形式依照性别、车间和同乡关系划分,工人们很能适应。这些组织驾轻就熟,经常举行宴会,借以巩固团体纽带。在宴会热闹轻松的气氛中,共产党组织者便借机行事——阅读鲁迅的短篇小说,选读埃德加·斯诺的《西行漫记》,以此来提高众人的政治觉悟。在抗战后期,这些以互助为基础的兄弟姐妹结拜团体成为许多怠工和静坐罢工的组织核心。<sup>⑩</sup>

日本投降后,丝织工人在内战时期困扰国民党政权的社会动乱中继续扮演了主要角色。开始,丝织工人罢工的组织动力主要来自战后不久重建的工会。<sup>⑪</sup>在四个区的工会中,有三个由国民党党员重新开办,但其中有两个工会的执委会是在中共地下党的实际掌握之中。而且,三区工会——包括大成的三个大厂以

---

\*“何振声访谈录”,1982年7月,上海第四丝织厂档案室。皮革工人刘长胜任中共上海职工工委书记,刘宁一任副书记,织工张祺任组织部长,织工何振声任总务部长。

及美亚的两个厂——直接掌握在共产党人陶云山的手中。陶原是美亚工人，因为参加共产党活动而被开除，他在工友中长期开展歃血结拜活动，后来以此为基础建立了工会。他在国民党政府里做事的一个亲戚帮他活动，使其行动合法化。至1946年初，三区工会号称已在115家工厂中拥有3000多名成员。虽然也面临来自国民党和残余的托派分子的竞争，但陶云山的工会仍然在战后多次以丝织工人为主力发动的罢工斗争中扮演着主角。<sup>⑩</sup>

1946年3月，上海约300家丝织厂的1.2万多名工人发起了一场长达将近三个月的罢工。由于朱学范的介入，工人们最终赢得了增加工资的胜利，大大降低了美亚总经理蔡声白的影响。抗战时期，蔡声白把美亚仅剩的两个厂交给意大利人和德国人管理，从而避免了日本人的直接接管。尽管这一决定在经济上有利，但在政治上却背上了间接与敌寇合作的骂名。通过威胁要公布蔡声白的通敌丑行，三区工会得以战胜这个曾经霸道的资本家。<sup>⑪</sup>

210 织工之行动主义在1946年推选潘月英为国大代表一事上进一步显露出来。潘是一位美亚厂的熟练织工，也是一名中共地下党员，在当年初为了庆祝国际妇女节，曾组织上海5万名女工大游行。<sup>⑫</sup>潘月英（以及其他熟练女织工，尤其是美亚厂的工人）之行动主义不禁让人想到1934年的罢工，女工在当时也是唱主角的。1936—1937年间，帮派盛行，女工们一度沉寂，到了内战时期，这些女战士又在斗争中发出了呐喊。

1947年，织工们又站在了上海罢工的前线。国民党工运领袖陆京士曾建议建立团体，促进上海丝织业劳资双方的合作，但遭到了工人们的坚决拒绝。<sup>⑬</sup>不仅如此，1947年5月8日，四个区工会动员了1万多名织工从外滩向市政府进发，要求解冻生活指数，以便与通货膨胀的速度保持一致（为了控制当时脱缰野

马似的通货膨胀速度，绝望之中，国民党当局冻结了生活指数，也就是工资不再随着物价的上涨而增加。游行的织工散发了将近 3000 张传单，上面写着：“物价走起来像飞机，指数走起来像蚂蚁。”到市政府后，他们递交了一份言辞激烈的请愿书，开头就写着：“我们要活命！我们要呼吸！我们要继续为民族的利益而工作！”<sup>⑧</sup>此次织工团结行动的公开展示，激发了其他行业工人发起同样目的的抗议，当局不得不改变其政策。

取得解冻生活指数斗争的成功，与一出揭露通货膨胀罪恶的戏剧的上演是分不开的。该剧由女织工们分别扮演工资、物价和镣铐等角色，生动泼辣，向人们作了广泛的宣传动员。该剧作者王文华是名织工，也是地下党员，据他自己回忆，他是在读了斯诺的《西行漫记》以后走上革命道路的。<sup>⑨</sup>

至 1947 年末，在上海织工中，已经活跃着数百名像王文华这样的共产党员。然而，当年 11 月，革命者遭受到一次重大挫折。当特务袭击富通印刷所时，现场被捕的共产党人中有三区丝织业工会负责人陶云山，他当时去印刷所赶印共产党方面编辑的期刊《织工简报》。对织工运动极为不幸的是，陶向特务供述了一切，暴露了许多同志。<sup>⑩</sup>工会被国民党接管（在军统的保护下），直到变节者陶云山被确信已经改过自新，才让他重新担任主任一职。<sup>⑪</sup>由于三区工会变色，共产党组织者失去了在丝织业的一个重要基地。

漏网的共产党人不久就受到国民党另一次进攻的威胁。1948 年 3 月，共产党工运干部王中一被捕，并在其住处搜出了一份中共地下党名单。丝织业曾是王中一最早负责的一块，被搜去的名单上写着丝织行业剩余的中共地下党员的姓名和住址。有 32 人立即遭到逮捕，7 人自首，另有 43 人逃离上海，去参加了新四军。<sup>⑫</sup>尽管当局大肆逮捕杀戮，丝织业的激进主义并未被

斩尽杀绝。<sup>④</sup>到1949年共产党取得胜利时,中共地下党工委书记张祺成为仅存的一个前美亚工人(曾是美亚六厂的熟练工匠)——曾领导过1934年的罢工。<sup>⑤</sup>

织工们在激进工人运动中所起到的关键作用取决于他们在南京国民政府时期的经历。在那段艰苦时期,织工们失去了许多“贵族式”特权,但增强了与其他行业工人的团结。正如米歇尔·汉纳根(Michael Hanagan)在谈到其他地方的此种情况时所说:“无产阶级本身的增长并不意味着会导致大罢工……相反,无产阶级的增长,同时伴随着大批生活受到威胁的工匠的出现——他们扮演了工人反抗的催化剂——才导致大规模工人罢工的出现。”<sup>⑥</sup>

国民党统治时期的发展有助于上海丝织工人成为“大批生活受到威胁的工匠”,他们在中国工人运动中发挥着“催化剂”的作用。就像最近对英国“贵族工人”的研究所揭示的,工厂工匠与其他工人的区别不仅在于其较高的薪水,而且在于其强调互助和倾向工会化的团结精神。<sup>⑦</sup>贵族工人往往采取集体行动来维持其特权地位。虽然这类活动只是代表部分工人,只是一种基本的保守主义,<sup>⑧</sup>但在一定的经济和政治条件下,维护既有特权的行动才能向激进主义转化。<sup>⑨</sup>对上海丝织工人来说,国民政府时期正好带来了这种经济的和政治的条件。

开始是在1933年,接下来更富戏剧性的是在1934年,丝织业中享有特权的阶层领导的斗争,主要集中在比较繁荣的美亚绸厂。这些早期罢工与世界其他地方典型的工匠罢工有很多共同特征。法国里昂织工在1831年和1834年的大规模反抗与一个世纪后上海丝织工人发动的罢工很是相像。按照罗伯特·贝祖查(Robert Bezucha)的记叙,里昂丝织工人的教育程度较高(约70%的男工都识字),收入较好,拥有比较鲜明的大众文化

背景。以互助团体为基础的里昂织工罢工“不是混乱的佐证，而是其集体组织努力的结果。他们根本不是游荡的、‘危险的阶层’，只是在其命运遭到威胁时才奋起反抗”<sup>⑨</sup>。

20世纪30年代初，上海丝织工人所面临的威胁主要是纺织品销售在国际市场严重滑坡带来的。但全球经济的不景气并非惟一因素。上海丝织业本身的变化是另一个关键因素。当高度机械化的美亚绸厂在曾经充满剧烈竞争的领域占据上风后，为了保证利润（当然是害怕世界性萧条的继续会使情况更加恶化），资方开始降低工人福利水平。熟练工人遂开始考虑采取自卫行动。

美亚工人罢工的完全失败导致了上海丝织业系统的进一步变化。最显著的是，租机制降低了工匠的自治性，缩小了美亚“贵族工人”和该市其他丝织厂织工的差别。由于这些因素，雄心勃勃的当局在1936—1937年间发起了工会化运动。结果与当局的愿望适得其反，工人斗争更加政治化——尽管失去了早期反抗中“道德经济”的意味，但有助于为抗战及战后与共产主义革命联合开辟道路。在那些导致国民党政权被推翻的岁月里，丝织工人发出了激扬的呼声——常常是站在革命事业的角度上。

## 结 语

以国内资本为主导的上海丝织业，为我们提供了一个富有启迪意义的行业案例——其罢工起因不完全是出于对洋人的愤怒，关键变数在于该行业自身的发展。 213

通过归纳几种不同的丝织工人——非技术性的缫丝工人，小工场里“传统”的织工，大工厂里都市化的织工——本章致力

于阐明纺织业中一个单一部门的劳动状况和反抗形式。缫丝工人,由于家庭责任的原因而与乡村有着密切的联系,在厂里则受到拿摩温的严格控制,所以他们在政治舞台上发挥的作用相对较小。为了逃避车间里枯燥的工作而举行的连锁罢工,当然是在可能的情况下才发生的,但是,他们举行持久的政治性罢工却不多见。对织工来说,他们的生产技术使自己拥有比较稳固的都市职业以及发起范围和影响都比较大的抗议的能力,所以更有可能在他们中间开展政治行动。但即便是在织工中,仍然存在着重大的差异。年纪大的工人,因为在乡村从事过较长的丝织业,他们最近背井离乡来到城市,是因为农村经济形势的凋敝,并受到城市劳动组成方式的吸引——其中帮会所起的作用往往十分显著。相反,在美亚和其他大型工厂里,年纪较轻、受过较好教育的工人倾向于更为激进的政治方式。终于,这些织工成为支持上海共产主义工人运动的重要力量。

如果说国内资本控制的企业如丝织业中的工人之间的差异泾渭分明的话,上海纺织业的其他部门——如棉纺厂——是否也是如此呢?或者,更多外国资本的卷人是否会使纱厂工人更加团结呢?棉纺厂虽然在纺纱工人和纺织工人中没有极为明显的技术上的差异,但仍然包含着行业内部的重大差异。纺织业的工人绝大多数都是非技术性和半技术性女工,另有一小部分男性技术性工匠,他们薪水最高,工作最有保障。我们不难发现,这一享有特权的工人群体往往站在纺织业共产主义活动的最前沿。例如,1925—1927年间,在浦东日华纱厂,由共产党领导的影响极大的纺织工会,其领导人就是一位木工。<sup>②</sup>同时期,规模很大的恒丰纱厂的中共党员主要都是从下层职员和机车间的铜匠中吸收进来的。<sup>③</sup>大康纱厂的中共支部成立于1938年,支部书记从前曾在该厂做过技工。<sup>④</sup>



1948年2月2日，发生著名的申新九厂罢工——人们常常将此次罢工视为革命斗争中非技术性女工行动主义的典范——共产党组织的领导权掌握在一名从事机器工作的男工手里，罢工指挥部就设在厂内机器间。共产党把申新九厂视为革命活动的一个可靠据点，正是因为该厂拥有比其他绝大多数纺纱厂高出许多的男工比例。罢工过程中，由于身为中共党员的男工攻击女工首领，男女工人之间发生冲突，大大削弱了罢工的力量。男工们指责这位女工首领享受资方和国民党提供的优厚待遇，他们把她关进一间黑屋子里，卡住她的喉咙，给人看起来就像在发生一起强奸事件。尽管这位女工被其他女工救了出来，但她的喉咙严重受伤，好多天都难以发出声音来。<sup>④</sup> 214

男女性别是纺织工人分裂的一个重要原因。女工多为非技术性劳动者，男工则大多占据着较为优越的技术性工种。由于纺织业男工比其女工同伴有着较多特权（无论是在工作条件上，还是在地缘上和受教育水平上），他们比毗邻车间的女工更容易与共产党的学生-干部打成一片（他们绝大多数都与男工们来自同一地区）。

共产党干部无法在缫丝厂开展工作，无疑与这些厂里技工的缺乏有关（在上海，技工基本上都是来自江南的男性）。缫丝女工与乡村关系割舍不断，更使她们无法附着于某个党派的事业。帮会分子穆志英所做的组织工作——开始是以来自苏北的装配工人作后盾，后来则干脆依附于缫丝厂老板，依赖于与工厂女工头的合作。即便如此，她们的每次行动都是短命的。共产党在缫丝女工中开展的工作也不那么顺手。

然而，单从性别上并不能说明问题，美亚绸厂织工及其他机器厂的情况给我们的是另一种印象。在那些厂里，受过教育的年轻江南妇女已经与农村一刀两断，她们也像其男性同伴一样积

极从事党派活动。可是许多小型丝织厂的情形就不一样了,那里的妇女仍然从事着技术含量较少的工作。在那些厂里,被迫离开农村的织工成为1936—1937年间帮会—国民党所建立工会的主要成分。他们的罢工,与美亚罢工不一样,妇女参加者不多,也很少提男女平等的要求。

215 因此,纺织工人中不同群体的政治倾向,产生了一种有规则的(尽管从来不是自动的)导致工人阶级生活分裂化的联系。并非性别、地缘或职业等事项本身导致了特定的政治分野,而是这些事项与特殊的社会关系结合(如姊妹结拜、兄弟结拜、互助会、行会、帮会等),这些关系又与共产党、国民党和独立的运动交相发生作用,才使特定的政治分野显露出来。正因为如此,阶级内部的分裂并没有使上海工人陷于无所作为,相反,他们能很好地组织起来,发起富有特色的斗争——虽然其内部仍常常充满冲突。

#### 注 释

① Robert Y. Eng, *Economic Imperialism in China: Silk Production and Exports, 1861—1932* (Berkeley, Calif., 1986), pp. 38, 56; 《上海之丝业》,载《社会半月刊》第1卷第19期(1935年),第45—46页; Lillian Li, *China's Silk Trade: Traditional Industry in the Modern World* (Cambridge, Mass., 1981), pp. 33, 164—171, 204; 刘大军(音):《上海工业化研究》,上海,1940年,第23—24页; Emily Honig, *Sisters and Strangers: Women in the Shanghai Cotton Mill, 1911—1949* (Stanford, Calif., 1986), chap. 1.

② 朱邦兴等:《上海产业与上海职工》,上海,1984年,第186—189页; 李次山:《上海劳动状况》,载《新青年》第7卷第6期(1920年),第30—31页。

③ D. K. Lieu, *The Silk Reeling Industry in Shanghai* (Shanghai, 1933), p. 69.

④ Eleanor Hinder, *Social and Industrial Problem of Shanghai* (New York, 1942), p. 18. 早在 20 年前,上海工部局就曾对丝织业中虐待童工的情况进行过指责。见 *Municipal Gazette*, July, 1924. 对上海缫丝业中非人道待遇的进一步讨论,可参见 Mary Ninde Gamewell, *The Gateway to China: Pictures of Shanghai* (London, 1916), pp. 230 ~ 233.

⑤ 《中国近代工业史资料》,北京,1957—1961 年,第 2 卷,第 1299 ~ 1301 页。

⑥ *Shanghai Strike Statistics, 1918—1940.*

⑦ 《时报》1912 年 4 月 21 日;《民立报》1913 年 1 月 4 日;《新闻报》1913 年 1 月 12 日;马超俊:《中国劳工运动史》,台北,1959 年,第 1 卷,第 80 ~ 81 页。

⑧ 《时报》1921 年 4 月 24 日。1920 年夏发生的一场要求增加工资的缫丝工人罢工就是由帮会领导的。见《民国日报》1920 年 7 月 17 日。

⑨ 健孟:《从丝厂女工罢工中得来的教训》,载《妇女杂志》第 8 卷第 10 期(1922 年),第 17 页;弥弼:《上海丝厂女工的同盟罢工》,同上,第 63 ~ 65 页;次常:《女子工业进德会与妇女劳动组合问题》,同上,第 11 期,第 46 页。

⑩ 《新闻报》1922 年 8 月 22 日。

⑪ 《民国日报》1923 年 5 月 1 日。

⑫ 同上,1924 年 1 月 16 日,2 月 28 日、29 日,3 月 4 日、5 日。

⑬ 同上,1924 年 7 月 1 日、2 日、3 日、8 日。

⑭ 同上,1924 年 8 月 7 日、12 日、25 日。

⑮ “朱英如访谈录”,1957 年 3 月 14 日,上海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工人运动档案。

⑯ 丝茧公所档案,案卷号:#516。后来,穆志英和丝茧公所指称此次罢工系由一位名叫孙宗昉的人煽动而起,孙是一位共产党员,到上海来就是为了建立一个对立的工会。然而,上海警方难以确定孙的角色。见丝茧公所档案,案卷号:#516、517。

⑰ 《民国日报》1925 年 8 月 7 日。

⑱ 杨之华:《1926 年上海丝厂女工罢工运动中之感想》,载《回忆杨之

华》，合肥，1983年，第247页；该文1927年发表于《赤女杂志》。

⑲《民国日报》1926年6月10日、11日、12日、16日、19日、28日、29日、30日；丝茧公所档案，案卷号：#520。

⑳《民国日报》1926年7月1日。

㉑丝茧公所档案，#523；《民国日报》1926年7月16日、9月22日；《新闻报》1926年8月23日。

㉒杨之华：《1926年上海丝厂女工罢工运动中之感想》，……第248页。

㉓“朱英如访谈录”，1957年3月14日；沈依洪：《母亲朱英如战斗的一生》，载《妇运史资料》1981年第1期，第56~57页；《战斗在三次武装起义中的上海女工》，同上，第47页。

㉔《中共上海区委有关上海工人三次武装起义的文献七篇》，载《档案与历史》，1987年第1期，第11页。

㉕丝茧公所档案，#528。

㉖《民国日报》1927年11月6日，沈依洪：《母亲朱英如战斗的一生》，第57~58页。

㉗《上海罢工统计资料，1918—1940》；《申报》1928年3月10日、6月10日、15日、23日、7月5日、14日、10月7日；《民国日报》1928年6月25日、28日、7月1日、4日、8月3日、21日。

㉘《申报》1928年6月22日。

㉙对虹口工会的指责尤多。参见丝茧公所档案，#48。

㉚同上，#72-1。

㉛陈修良：《立三路线与行动委员会》，载《文史资料选辑》1981年第1期，第14~16页。

㉜《商业月报》1937年第7期。

㉝Robert W. Barnett, *Economic Shanghai: Hostage to Politics, 1937—1941* (New York, 1941), pp. 96~97.

㉞《中国近代工业史资料》，第2卷，第1299~1301页。

㉟杨绍英：《中国工人的罢工斗争》，南京，1957年，“序言”。苏州工匠以公所为后盾，在1693年、1701年、1715年、1720年、1730年和1756年发

动了大规模罢工。

③⑥ 朱邦兴等编:《上海产业与上海职工》,第 132~134 页。

③⑦ *Shanghai Strikes Statistics, 1918—1940*.

③⑧ 《上海之机织工业》,上海,1933 年,第 175 页;朱邦兴等编:《上海产业与上海职工》,第 133 页;骆耕漠:《美亚工潮始末》,载《中国经济论文集》,上海,1936 年,第 227 页;D. K. Lieu, *The Silk Industry of China (Shanghai, 1936)*, p. 191;《近代江南丝织工业史》,北京,1988 年;《美亚期刊》,1933 年 11 月 16 日(该刊物存上海市档案馆, #199-48-258, 以及 #199-48-259)。

③⑨ 《美亚期刊》1934 年 8 月 16 日,第 2 页。

④⑩ 《上海丝绸工运史》,上海,1985 年,第 13~17 页。

④⑪ *Shanghai Strikes Statistics, 1918—1940*;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档案: #722:4-226。

④⑫ 《丝织业》,1982 年,手稿,存上海第四丝织厂档案室。

④⑬ 朱邦兴等编:《上海产业与上海职工》,第 142 页。

④⑭ 上海市档案馆档案, #199-48:1~6。

④⑮ 朱邦兴等编:《上海产业与上海职工》,第 146 页。

④⑯ 朱邦兴等编:《上海产业与上海职工》,第 143 页。

④⑰ “许锡娟(音)访谈录”,1987 年 6 月 2 日于上海第九丝织厂;《丝织业》;阿英:《绸厂的女工》,载《生活知识》,1946 年第 39 期,第 4 页。

④⑱ 朱邦兴等编:《上海产业与上海职工》,第 142 页。

④⑲ “谢青斋(音)访谈录”,1957 年 2 月 25 日,上海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工人运动档案。

④⑳ 朱邦兴等编:《上海产业与上海职工》,第 142 页。

④㉑ “李树发(音)访谈录”,1969 年 12 月 24 日;“沈荣庆(音)访谈录”,无日期,上海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工人运动档案。

④㉒ “周志新访谈录”,1982 年 6 月 5 日,同上。

④㉓ 朱邦兴等编:《上海产业与上海职工》,第 141~143 页。

④㉔ “万文华(音)访谈录”,1982 年 6 月 5 日,存上海第四丝织厂档案室。

⑤ 《近代江南丝织工业史》；一苇：《美亚绸厂罢工的严重性》，载《女神》第2卷第2期（1934年），第2页。

⑥ 《美亚期刊》1934年8月16日。

⑦ 朱邦兴等编：《上海产业与上海职工》，第151页。

⑧ 同上，第162页。

⑨ “周志新访谈录”，1982年6月5日，存上海第四丝织厂档案室。

⑩ “张祺访谈录”，1987年6月16日于上海总工会。

⑪ 朱邦兴等编：《上海产业与上海职工》，第152页。

⑫ 同上（按，该资料中说总罢委会之下另有交通一部——译者）；

*Shanghai Municipal Police Files, D-5802.*

⑬ “俞林访谈录”，1982年5月8日，存上海第四丝织厂档案室。

⑭ “张祺访谈录”，1987年6月16日。

⑮ “葛素兰访谈录”，1982年7月17日，存上海第四丝织厂档案室。

⑯ 骆耕漠：《美亚工潮始末》，第229～231页。

⑰ 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档案，#722:4-224。

⑱ 骆耕漠：《美亚工潮始末》，第228～229页。

⑲ 同上，第230～231页。

⑳ 朱邦兴等编：《上海产业与上海职工》，第153～154页；*Shanghai Municipal Police Files, D-5802.*

㉑ *Shanghai Municipal Police Files, D-5802.*

㉒ 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档案，#722:4-224。

㉓ *Shanghai Municipal Police Files, D-5802*；朱邦兴等编：《上海产业与上海职工》，第165页。

㉔ *Shanghai Municipal Police Files, D-5802*；《红色中华》，江西，第162期、169期、171期、178期、180期，1934年3～4月；《斗争》，上海，1934年4月19日。

㉕ 《团的建设》，上海，第13期，1934年3月12日；第15期，1934年4月13日；第16期，1934年4月27日；《群众的团》，上海，第3期，1934年4月6日。

㉖ *Shanghai Municipal Police Files, D-5802.*

- ⑦ 同上;《美亚期刊》,1934年8月16日,第3~7页。
- ⑧ 骆耕漠:《美亚工潮始末》,第234页; *Shanghai Municipal Police Files*, D-5802;朱邦兴等编:《上海产业与上海职工》,第155页。
- ⑨ *Shanghai Municipal Police Files*, D-5802;朱邦兴等编:《上海产业与上海职工》,第155~156页;骆耕漠:《美亚工潮始末》,第234页。
- ⑩ *Shanghai Municipal Police Files*, D-5802;朱邦兴等编:《上海产业与上海职工》,第153页。
- ⑪ 白石:《在美亚罢工中对于女工的认识》,载《女神》第4卷第10期(1934年),第2页。
- ⑫ 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档案, #722:4-224。
- ⑬ *Shanghai Municipal Police Files*, D-5802.
- ⑭ Lieu, *Silk Industry of China*, p. 222;朱邦兴等编:《上海产业上海职工》,第140页;马超俊主编:《中国劳工运动史》,台北,1954年,第1190页。
- ⑮ *Shanghai Municipal Police Files*, D-5802.
- ⑯ 朱邦兴等编:《上海产业与上海职工》,第156~157页。类似情况从1927年南洋兄弟烟草公司对英美烟公司罢工的支持中也可看出(参见第七章)。
- ⑰ *Shanghai Municipal Police Files*, D-5802.
- ⑱ 朱邦兴等编:《上海产业与上海职工》,第157~158页;《美亚第四织绸厂》,上海,1982年,第33页。
- ⑲ 骆耕漠:《美亚工潮始末》,第235页;《美亚第四织绸厂》,第33~34页。
- ⑳ 马超俊主编:《中国劳工运动史》,第1191页;《上海第九丝织厂工人运动斗争史》,上海,1983年,第23页,存上海第九丝织厂档案室;《美亚第四织绸厂》,第34页。
- ㉑ *Shanghai Municipal Police Files*, D-1791.
- ㉒ 同上, D-5802;朱邦兴等编:《上海产业与上海职工》,第159页。
- ㉓ *Shanghai Municipal Archives*, #199-48-207.
- ㉔ 《美亚第四织绸厂》,第28页;姜红娇(音):《自我批评》,无日期,存



上海第四丝织厂档案室。

⑤ *Shanghai Municipal Police Files*, D-1791.

⑥ 同上。

⑦ 朱邦兴等编:《上海产业与上海职工》,第160~161页。

⑧ 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档案,#722:4-224。

⑨ *Shanghai Municipal Police Files*, D-5802;“周志新访谈录”,1981年12月21日,存上海第四丝织厂档案室。

⑩ G. Grossic, *An Artisan Elite in Late Victorian Society* (London, 1980); Robert Gray, *The Aristocracy of Nineteenth-Century Britain* (London, 1981).

⑪ “董月英(音)访谈录”,1961年7月11日,上海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工人运动档案。

⑫ 《群众的团》,第8期,1934年8月24日;《美亚期刊》,1934年8月16日,第2页。

⑬ 《美亚第四织绸厂》,第19页;《上海第九丝织厂》,第31页;“傅元华(音)访谈录”,1982年12月,上海第四丝织厂档案室。

⑭ 《上海之机织工业》,上海,1933年,第175页。

⑮ 朱邦兴等编:《上海产业与上海职工》,第163~164页。

⑯ *Shanghai Strike Statistics, 1918—1940*.

⑰ 《上海丝绸工业阶段史》,第3页。

⑱ *Shanghai Municipal Police Files*, D-7506.

⑲ *Shanghai Strike Statistics, 1918—1940*; *Shanghai Municipal Police Files*, D-7506.

⑳ 朱邦兴等编:《上海产业与上海职工》,第171~172页; *Shanghai Municipal Police Files*, D-7506.

㉑ *Shanghai Municipal Police Files*, D-7744.

㉒ 《一九三七年丝织业大罢工》,1982年,存上海第四丝织厂档案室。第13~14页;“张月珍访谈录”,1981年9月23日,存上海第四丝织厂档案室;“周云卿(音)访谈录”,1982年10月4日,同前。

㉓ “张平山(音)访谈录”,1981年9月29日,存上海第四丝织厂档案室。



⑭《上海第九丝织厂》，第39页；何振声：《抗日战争时期上海纺织工业与职工的一些情况》，载《上海工运史料》1984年第4期，第14~15页。

⑮“张月珍访谈录”，1981年9月23日，存上海第四丝织厂档案室。

⑯“竺伯清访谈录”，1961年8月22日，上海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工人运动档案。

⑰朱邦兴等编：《上海产业与上海职工》，第173页。

⑱ *China Press*, Mar. 31, 1937; *Shanghai Evening Post and Mercury*, Mar. 31, 1937; 朱邦兴等编：《上海产业与上海职工》，第174~175页；《上海第九丝织厂》，第39页。

⑲ *China Press*, Mar. 29, 31, 1937.

⑳工厂数和工人数见朱邦兴等编：《上海产业与上海职工》，第135页。

㉑《一九三七年丝织业大罢工》，第5~6页。

㉒《美亚第四织绸厂》，第46页。

㉓ *Shanghai Evening Post and Mercury*, Mar. 31, 1937;《上海丝绸工业阶段史》，第20~21页。

㉔朱邦兴等编：《上海产业与上海职工》，第176页。

㉕ *Shanghai Times*, Apr. 14, 1937; 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档案，#722: 4-519。

㉖ *Shanghai Municipal Police Files*, D-7744; 朱邦兴等编：《上海产业与上海职工》，第177~178页。

㉗ *Shanghai Times*, May 19, Apr. 3, 1937.

㉘朱邦兴等编：《上海产业与上海职工》，第181页。

㉙ *Shanghai Municipal Police Files*, D-7744;《上海丝绸工运史》，第50页。

㉚ *China Press*, May 26, 1937; 朱邦兴等编：《上海产业与上海职工》，第179页。

㉛ *Shanghai Municipal Archives*, #199-48-207.

㉜朱邦兴等编：《上海产业与上海职工》，第180~181页。

㉝ Bernard H. Moss, "Workers' Ideology and French Social History," *In-*

*International Labor and Working Class History*, no. 11 (1977), p. 28.

⑬④ Edward Shorter and Charles Tilly, *Strikes in France, 1830—1968* (Cambridge, Mass., 1974), p. 10.

⑬⑤ 《上海第九丝织厂》，第 46 页。

⑬⑥ 马纯古：《上海工运的现状报告》，上海，1941 年，第 17—18 页。

⑬⑦ 《湖南青年救亡团的成立及其活动》，载《上海工运史研究资料》，1984 年第 4 期，第 13—14 页。

⑬⑧ 《上海第九丝织厂》，第 52 页；《美亚第四织绸厂》，第 55 页；《上海丝织工运史》，第 69—71 页。

⑬⑨ 工会与当局交涉的内容从女工怀孕到生活补贴，无所不有。见 *Shanghai Municipal Archives*, #1-7-50, #6-9-1625, #6-9-1633.

⑬⑩ “陆端华（音）访谈录”，1970 年 5 月 9 日，存上海第四丝织厂档案室；“吴永年（音）履历”，同前；*Shanghai Municipal Archives*, #19-17；《上海第九丝织厂》，第 69 页；《三区丝织业工会调查》，台北，调查局档案，#556. 18/803. 三区工会曾抱怨说，国民党干部和托派分子常常在中共领导的工会取得一定谈判结果时，在工人中制造分裂。

⑬⑪ 《近代江南丝织工业史》；《上海丝绸工运史》，第 94 页。

⑬⑫ 《上海丝绸工运史》，第 101—113 页；“潘月英访问记”，1982 年 11 月 21 日，上海第四丝织厂档案室。

⑬⑬ 张永勤（音）：《从政治到合作》，载《社会月刊》第 2 卷第 10 期（1947 年），第 40 页。

⑬⑭ *Shanghai Municipal Archives*, #1-7-54. 《要求解冻生活费指数》，《上海纺织工运史料》，无日期，第 3 期，第 83—84 页。

⑬⑮ “王文华访谈录”，1982 年 6 月 22 日，7 月 21 日，存上海第四丝织厂档案室；《要求解冻生活费指数》，……第 81—82 页。

⑬⑯ 《上海丝绸工运史》，第 127 页；“陆端华访谈录”，1970 年 5 月 9 日，上海第四丝织厂档案室。

⑬⑰ “黄才林（音）供述”，1968 年 7 月 15 日，上海第四丝织厂档案室。

⑬⑱ 《上海丝绸工运史》，第 132 页。

⑬⑲ 参见 *Shanghai Municipal Archives*, #6-9-1644 中有关 1948 年春夏丝

织业工运问题的资料。

⑮ 《上海丝绸工运史》，第 130 ~ 132 页。

⑯ Hanagan, *Logic of Solidarity*, p. 216.

⑰ Crossic, *Artisan Elite*; Gray, *Aristocracy of Labour*.

⑱ Eric Hobsbawm, "The Labour Aristocracy in Nineteenth-Century Britain," in *Labouring Men* (London, 1964).

⑲ E. P. Tompson, *The Making of the English Working Class* (New York, 1963).

⑳ Robert J. Bezucha, *The Lion Uprising of 1834* (Cambridge, Mass., 1974), p. 158.

㉑ “陆家龙(音)访谈录”，1958年4月17日，存上海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工人运动档案。

㉒ “江元青访谈录”，1957年9月12日，同上。

㉓ 《上海国棉十二厂工人斗争厂史资料》，载《上海工人运动历史资料》，1955年第1期，第5页。

㉔ 《申九“二二”斗争纪要》，未刊稿，1982年，存上海国棉二十二厂档案室，第10 ~ 22页。



## 第九章 运输业

很少有产业部门能像运输业那样对上海经济的良好运行起到至关重要的作用。产品和人口等量而有效的流动,是上海市工商业发展必不可少的一个因素。然而,在上海各产业部门中,也许没有比运输业更为分裂的产业了。动力火车、电车以及人力手推车、黄包车在全市来往行驶,承担了难以数计的人货运输,但他们的运输手段又很不相同。运输工人技术上的差异,伴随着成分的不同,反过来又影响到他们不同的政治取向。

与烟草业和纺织业的情况不同,在运输业这一行干活的几乎都是男性。所以,尽管地缘祖籍和技术水平同样具有重大影响,但性别却不是决定这一群体之工人政治分野的分水岭。本章将探讨上海运输工人的政治特性,尤其着重于电车和人力车这两个行当的工人。

### 电 车 业

民国时期,上海有三大电车公司,分别隶属于统治该市的三个政府。法商电车与水电公司创立于1905年(简称“法商电车公司”或“法电”),专为法租界居民提供市政服务。就像英美烟公司是上海的英资巨人一样,法电乃是该市法资企业老大;1908年,

上海电车公司创立(简称“英电”),开始是中英合资企业,但为时不久,其业务拓展到公共租界,并被英资买断股权;最后在 1912 年创立的是华商电气股份有限公司(简称“华电”),主要在华界南市一带开展业务。 217

虽然三大电车公司所属国籍不同,但其运作方式都很相似。<sup>①</sup>各公司均有一个机务部(俗称“铜匠间”)和一个车务部。各公司的大部分工人都是车务部里的售票员(称为“卖票”)或司机,小部分工人则是机务部里技术性更高的技工。两个部里均无女工做事。此外,各公司大约有 10% ~ 20% 的雇员是职员。绝大多数职员(就法电而言,多毕业于法国天主教学校;就英电而言,多毕业于英美新教学校)都在“总账房”做会计,或是在车务部里做管理人员;很少有人机在机务部里任职。

公司两大部工人的祖籍源流有明显分界。车务部雇员主要来自北方;绝大多数司机都来自苏北或湖北、河北及山东等地。机务部工人主要来自更富裕的上海和宁波地区。两部的工作条件也不相同。司机和卖票一天的大部分时间都在一群“查票”人员的监督之下,孤零零地花在各路电车上——这种状况妨碍了工人之间的团结。对查票人来说,正好利用职权对卖票敲诈勒索——他们很少能抵挡得住从卖票所得中提成的诱惑,造成并加深了矛盾和对立。\*相反,技工之间工作关系紧密。作为不容易被替代的熟练技工,他们的薪水较高,在公司里的工作年限

---

\* 车务部查票人员的腐败情形,可参见朱邦兴等编:《上海产业与上海职工》,上海,1984年,第241页。乘客付费常常高出实际票价。票款必须每天上交公司,但由于查票人员从中中饱私囊,上交款与公司实收数往往有差距。见《申报》1939年12月12日。不仅如此,查票人员还和扒手勾结行事。见 John Pal, *Shanghai Saga* (New York, 1963), pp. 191 ~ 192.

比较长。由于祖籍地缘“上档次”，工作环境较好，工作有保障，没有查票之类人员的监视而显得比较自由，这些因素造就了技工的凝聚力和战斗精神。\*

218 在上海三大电车公司中，两部——车务部和机务部——之间的分裂，同样反映在政治倾向上。技工们总是站在工会活动和政治性罢工的前沿。值得注意的是，在三大电车公司中，罢工活动都十分频繁，但外资性质显然不是主要的决定因素。在1918—1940年间发生的44次电车工人罢工中，法电为11次，华电为15次，英电为18次。\*司机和卖票受制于帮会——查票之手——在他们的监督下工作。尽管不能说司售人员是死水一潭，<sup>②</sup>但他们确实很少主动卷入到激进的抗议行动中去。

这种差异在五卅运动中表现得尤为明显，当时英电公司技工举行的同情罢工，由于车务部工人拒不参加，半途而废。<sup>③</sup>此后不久，三名技工在该公司成立了工会。他们的阻力主要来自车务部一位名叫倪天生的查票。倪原来是个澡堂修脚工，身在青帮，在原籍苏北的司售人员中有不少徒弟。为了阻挠英电公司工人加入新工会，倪天生便以留声机和麻将牌做礼物，送给那些不参加工会的人。只是倪天生在机务部被激进分子暗杀后，工会活

\* 《上海法电工人运动历史资料》，上海，1957年，第1册，第1~15页；朱邦兴等编：《上海产业与上海职工》，第241~244、265、275~277、369页。在华电，尽管机务部和车务部工人的最高工资和最低工资都是一样的，但其集中的规模仍然是两个极端。1938年的时候，77%的技工工资每月超过40元，而只有58%的司机和41%的卖票能达到这一工资水平。见朱邦兴等编：《上海产业与上海职工》，第373页。

\*\* *Shanghai Strike Statistics, 1918—1940*. 而且，这些罢工的成功率都很高，罢工者在84%的罢工中都取得了完全的或部分的胜利。法电公司罢工的成功率最高（为91%），接着是华电公司（为87%），而英电公司对罢工者是最为吝啬的（成功率为61%）。

动才迅速开展起来。<sup>④</sup>但是,两部工人之间互不相容的情形仍然继续存在。由于地缘祖籍各不相同,相互之间各有成见,两部工人的合作很难持久,1930年发动的一次为期23天的罢工未能取得完全胜利即是明证——签票陆某“做了走狗”,带进不少失业工人,在巡捕的保护下率先复工。\*十年后,因为日本人的买通,该公司车务部的卖票在一个通敌工会中起着领导核心的作用。<sup>⑤</sup> 219

在华电公司,情况也差不多。四一二政变后,华电工人分为两大派,即老派和新派,属老派的主要是机务部工人,属新派的均为车务部工人,两派时常发生摩擦、倾轧。老派依然忠于共产党领导的总工会(当时已经不存在了),新派则效忠于青帮工运领袖朱学范和陆京士。在一次颇有讽刺意味的冲突中,警方在新派工人身上搜出手枪数支和鞭炮红布等物。据说,这是新派工人准备攻击老派,在放鞭炮时杂以手枪,使秩序混乱,并将被打死者身上夹以红布,以便作为某种重大政治嫌疑之证据云云。此次图谋未能得逞,但却进一步加深了新老两派之间的矛盾。<sup>⑥</sup>

尽管类似的政治分歧在该市所有运输公司中都有,但表现最明显的是在法电。就像英美烟公司一样,法电在上海工人三次武装起义时成为共产党组织发育的温床,并在四一二政变之后成为国共两党展开竞争的舞台。又一点与英美烟公司相像的是,

\*朱邦兴等编:《上海产业与上海职工》,第267页。一份警方报告注意到,在1930年罢工的6位领头人都是机务部技工:4个是装配工,1个是车工,1个是木匠。该公司总经理拒绝与工人代表谈判,声称他们不能代表工人。相反,他拿出他认为有代表资格的18名司机的名单。见 *Shanghai Municipal Police Files*, D-1207。1937年,司售人员在工会事务中逐渐活跃,杜月笙也开始在调解英电公司的劳资纠纷中发挥决定性作用。有一次,为了平息罢工,他甚至从自己的钱柜里拿出了6000元。见同前, D-4176/1。

法电也是一个高利润的企业。\*考虑到法电在上海工人运动中所起到的重要作用,有必要对其来龙去脉好好做一番探讨。

## 法商电车公司

在我们关注法电公司在后来国共两党工运领导人的计划中所占据的显著地位的同时,有必要回顾一下它的历史。令人感兴趣的是,在外来党派插手之前,该公司很少发生工人罢工之事。除了在1919年五四运动时对全市工人大罢工略表同情之外,它的第一次罢工发生在1921年春,当时车务部的工人要求增加工资20%,资方满足了工人的要求。<sup>①</sup>在此后五年里——正好是共产党大力开展工人运动之时——法电罢工复归于沉寂。

220 共产党开始在法电发动工人的时候基本没什么起色。1923年春,党派了一名社会主义青年团团员去当卖票。但这位年轻干部性子急躁,与许多同伴合不来。过了几个月,共产党又派去一名干部,这是一位从法国留学归来的学生。但这位城市知识分子不会说上海话,无法与工人们建立密切关系。<sup>②</sup>

有好几年,共产党在法电工人中开展工作的努力未能取得成效。1926年1月,以前曾是南洋烟草公司技工的共产党员余茂怀因病住院。在医院里,余遇到了两位因交通事故受伤住院治疗的法电卖票。通过交谈,余深信,在该公司开展组织工作大有潜力。通过在英电公司当技工的朋友的介绍,余在法电机务部谋到一份临时工作。他在机务部结识了一个名叫徐阿梅的年轻技

\*爱德华·哈蒙德(Edward Hammond)估计,该公司在其前40年中,利润增长超过了初创时期的100倍。见Edward Hammond, "Organized Labor in Shanghai, 1927—1937," Ph. D. dissertation,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1978, p. 175.



工,徐不久即成为共产党在该公司开展组织工作的负责人。徐当时20岁,出生于法租界一个菜农家庭。他因自家的地界被法电公司扩建办公楼房而被征用。17岁时,在江南船厂当了四年学徒之后,徐阿梅进法电机务部做工。也许部分是出于对家产被法电征用感到不满,当三年后余茂怀进入法电机务部开展工作时,徐很快接受了余传导的激进信息。不久,徐就成为余在1926年10月在法电成立的中共支部的成员之一。同时他也是当年10月法电工会举行成立大会的关键人物之一。<sup>⑩</sup>

上海三次工人武装起义时期,在机务部技术工人的领导下,法电公司成为共产党开展活动的一个主要基地。由于在技术工人中拥有50多名共产党员,法电工人成为南市的主要战斗力量。<sup>⑪</sup>在余茂怀的领导下,法电工人纠察队与华电公司和江南兵工厂的工人一道,在打下当地警察署之后,最终占领了江南兵工厂(即高昌庙兵工厂)。<sup>⑫</sup>战斗结束后,法电工人——留下46人驻在工人纠察队指挥部待命——昂首阔步,回到厂里,当时伴随而来的是一队雇来的军乐团,他们还高擎大旗,旗子上写着:“工人革命成功了!”“打倒帝国主义!”“肃清反动派!”连法电总经理也挥舞着帽子,欢迎勇敢的工人归来。<sup>⑬</sup>可是,仅仅过了两个星期,四一二政变的白色恐怖笼罩而来,当局解除了法电46名纠察队员的武装,迫使余茂怀逃离上海,法电工会活动落入国民党的控制之下。1928年10月4日,政府承认的法电工会成立,尽管徐阿梅是工会常务委员会成员之一,但实际权力掌握在国民党分子手里。<sup>⑭</sup> 221

1928年12月,因为一名吃醉了酒的法国水兵用刺刀将司机吴同根刺死,引发了该公司一场为期24天的大罢工。由于参加罢工的工人意见不一致,罢工最终是在青帮大亨杜月笙的干预下才获得解决的。杜当时拿了9000块钱出来,分派给工人,作

为罢工工资；另外津贴工会每月办公费 200 元；至于工人代表，每人给 200 元。<sup>⑤</sup>这一结果使很多工人不满。共产党方面便借此大做文章，散发传单，揭露杜月笙与国民党控制的法电工会之间的腐败勾当。<sup>⑥</sup>徐阿梅拒绝接受“走狗”们的收买，他在机务部的同伴仍在继续支撑。“走狗”们便在资本家的指使下开始捣乱，先是借查工会账目为由，将徐阿梅等绑票，弄到一个茶馆里，强迫徐阿梅等交出工会的钱。又打伤徐的父亲，迫使徐阿梅暂时离开了工会。后来徐阿梅在其工友常去的茶馆打发时间，向工友们讲通俗小说《水浒传》和《三国演义》中的故事，并把故事内容与当时的工人斗争结合起来。<sup>⑦</sup>

过了一年半之后，在徐阿梅及其机务部同伴的领导下，法电又成功地举行了几次罢工和怠工。1930 年 5 月，机务部技工又准备发起一次怠工。这一次，杜月笙插手进来，他警告徐阿梅不要在 5 月里罢工怠工，“5 月里是不好罢工的，政府方面是禁止的，只有共产党才主张 5 月里罢工……一定要怠工或罢工的话，你们一定要吃亏的。”杜答应，要罢工等过了 5 月再说，“到那时你们罢工，我一定帮忙。”经过一番考虑，徐阿梅决定听从这位青帮大亨的建议。但这一妥协遭致中共江苏省委的极大不满——当时省委处在李立三路线的控制之下。他们指责徐阿梅向黄色工会主义屈膝投降，将徐开除出党。<sup>⑧</sup>

尽管遭到挫折，徐阿梅仍然活跃在工运第一线。次月，在他的指示下，700 名技工罢工，要求增加工资。为了反击技工们的战斗行动，车务部稽查、杜月笙的徒弟李麟书组织了一个俱乐部，参加者多为苏北、湖北和北洋各帮工人。在李麟书的指使下，

车务部的卖票、司机从一开始就抵制罢工。\*

当罢工者整队前往俱乐部、动员未参加罢工的车务部工人起来罢工时,法捕房调来大队铁甲车和武装巡捕,向手无寸铁的群众开枪扫射,致使一名路人死亡,20余名工友受伤。这一事件引起了公众对罢工的广泛同情。<sup>⑨</sup>司机、卖票、甚至职员等人都加入到罢工行列。法国人原本指望在7月14日“民主纪念节”(即法国国庆节——译者注)之前解决罢工的,因为“向例公园各处均扎各色彩灯以志庆祝”。但是由于整个公司的工人(包括电气工人)仍在继续罢工,这一重大节日只得在黑暗中度过。

罢工者想起杜月笙先前的允诺,遂请他出来帮助调解。最后,经过57天紧张的谈判——杜月笙在其中发挥了重要作用——在资方签订满足工人所有条件的协议后,罢工结束。\*\*\*

\*《上海法商电车、电灯、自来水公司工人斗争简史》,载《上海工人运动历史资料》1953年第2期,第10页。车务工人俱乐部的人从一开始就对机务部罢工工人采取了一种挑衅姿态。当机务部全体工友列队前往公共体育场开工会大会时,行经斜桥,适有法电6路一辆车开来,司机将车“开足速率”,试图冲散工人,当时撞伤工友朱光德腿部甚重,工友及路上行人异常激愤,一起用石块将车窗玻璃砸碎,击伤车上主使肇事的卖票头目。后由华警赶到排解,一场纠纷始未扩大。见朱邦兴等编:《上海产业与上海职工》,第330页。

\*\*法国人也希望杜月笙介入调停,并威胁说,如果不能解决工潮,将下令在法租界禁止一切烟赌,等到工潮平息后,再考虑重新开禁问题。见薛畊莘:《我与旧上海法租界》,载《文史资料选辑》1979年第6期,第156页;薛畊莘:《我所接触过的上海帮会人物》,载《旧上海的帮会》,上海,1986年,第92页。

\*\*\*朱邦兴等编:《上海产业与上海职工》,第316~350页;蒋阿龙:《五十七天大罢工》,载《在艰苦斗争的岁月里》,上海,1958年,第13页;姜沛南:《徐阿梅》,载《中国工人运动的先驱》,北京,1984年,第3卷,第206~213页。中共党内的“左”倾分子仍然对徐阿梅自行其是的做法深怀敌意。罢工期间,这些人大量印发传单,指责这位工人领袖一直温和对待国民党当局和杜月笙。见《黄色狗徐阿梅公开出卖法电罢工讯》,台北,调查局档案,#556.282/803。



罢工者在当地的宁波饭店举行欢庆宴会——饭店里装饰着明亮的彩灯和其他节日饰物。之后他们便复工了。<sup>⑨</sup>尽管表面上有一个温和的结局,但法电资方仍然实施了报复,开除了积极参加罢工的40名工人,虽然被开除的8名车务部工人不久重新上班,但32名技工(包括徐阿梅)是在机务部工人举行怠工、逼迫总经理答应后才重新上班的。徐阿梅被公司用车接回到厂里,工人们燃放爆竹欢迎。徐旋即又在技工中成功地发动了另一次怠工,目的是要求增加年赏。<sup>⑩</sup>

223 1930年夏,机务、车务二部工人的分裂得到了弥合,但为时不长。一年后,裂缝进一步加深。8月的一天,机务部一位工友从外滩经过,因铜元落地,俯而拾之,适有2路电车迎面驶来,差点撞上该工友。双方由口角而动武,一司机、三卖票帮同相打,致使该工友受伤。该工友即回厂报告同部工友,机务部全体工友及职员对此行径均“愤恨异常”,由工会召开会议,向资方提出了一系列要求,包括:车务部向机务部燃放鞭炮,以示道歉;行凶司机、卖票一律开除职务,稽查李麟书撤职;由公司发通告,保证以后不得再有同样事件发生;由公司通告各车不准司机、卖票殴人,同时派纠察员将行凶司机、卖票拘入机务部看守起来。经过一上午的谈判,公司答应:由厂方购100元鞭炮表示道歉;李麟书如确系为首者就撤职;由公司通告今后不得再有此类事件发生。然而,当天下午,李麟书即鼓动他在车务部的追随者闹事报复;两部工人在卢家湾厂门口发生大冲突,结果有数名工人受伤,被送进医院。<sup>⑪</sup>

车务、机务二部工人的公开对抗达到了顶点。这个时候,李麟书的后台老板杜月笙动用法国巡捕房的关系,将徐阿梅以通共、颠覆的罪名逮捕。1931年9月,徐阿梅被判处13年徒刑(实际坐牢4年余,后送感化院16个月,1937年4月出狱——译者

注)。排除了年轻技工徐阿梅这块绊脚石之后,身在青帮的工会领导人发现,对法电工会的操纵顺手多了。因此,正是在这种变化了的条件下,杜月笙于1932年夏在法电发起了一场为期7天的罢工并取得了成功,这一幕戏显然提高了他与法租界当局谈判做交易的筹码。<sup>②</sup>

然而,当1937年春徐阿梅从关押中被放出来的时候,形势又发生了变化。在恢复法电的工作之后不久,徐秘密组织了一个“十人会”,参加者都是机务部的积极分子。该组织是成功发动1939年怠工的骨干力量,此次怠工的目的是要求增加工资。由于中共在抗战时期的政策比较灵活,他们欢迎徐阿梅回到自己的战斗行列中来。但在同时,技工们卷入救国会运动,也引起了该市亲日势力的敌视;1939年12月,徐阿梅被汪精卫的人暗杀。<sup>\*</sup>此后,中共在法电的领导权转到黄福林手里。黄是一个上海籍技工,曾在沈阳兵工厂当过7年学徒。1939年,黄加入共产党,次年,中共法电支部重新建立,黄任书记。1941年,他在机务部发动了一场罢工。但是,罢工过程中,他的政治身份暴露,不得不逃离上海,加入了新四军。<sup>③</sup>徐阿梅的悲剧下场和黄福林的被迫逃离,使中共法电支部的其他领导人得到教训,现在他们意识到有必要寻找外力来掩护其活动。因此,他们与红帮老大李芳搭上了关系(李曾任汪精卫政权的驻德大使),到抗战结束,法电工人中有将近300人参加了红帮。这些帮会成员成为共产党在机务、车务二部发动斗争的基础。<sup>④</sup>

224

红帮在战后的影响虽然不那么突出,但有助于改善车务、机

<sup>\*</sup>姜沛南:《徐阿梅》,第220~222页;《上海法商电车……》,第16页。1950年,上海第三电车公司在虹桥公墓树立纪念碑,纪念徐阿梅。然而,“文化大革命”中,徐阿梅被该公司的造反派诬蔑为“叛徒”,其纪念碑也被打碎。



225

务二部工人之间的关系。在这种新型关系的基础上,法电工人建立了战后上海第一个工会。两部工人的合作在日本人投降后不久举行的一次联合罢工中得到了体现。当国民党重新掌握上海政权后,即宣布公用事业的罢工和怠工为非法。为了得到资方发放年赏的保证,法电技工想出了--种新方法来逃避法律。车务部工人很快付诸实施——司机仍然开车,卖票则停止售票。乘客们又惊又喜,不仅如此,卖票还笑脸相迎,并说:“各位请随便,今天乘车免费。”同时,技工们组织纠察队,维持秩序,在车厢上张贴标语,解释工人们要求增加补贴的理由。这种方式的抗议当时称之为“大请客”,很快在普通市民中流传开来。\*然而,对公司来说,代价昂贵。一般罢工最多是没有进账,而在“大请客”中,资方不但要支付各种成本,还要纳税。在沉重的经济压力下,资方不得不答应工人发放年赏、补发罢工期间工资的要求。很快,同样的斗争方式在全市酒菜业、沐浴业和理发业开展起来。⑤

“大请客”取得胜利的直接后果,便是法电公司的中共党员增加了3倍,即从20人增加到60人。机务、车务二部都成立了中共支部。⑥共产党力量在法电的壮大,有助于该公司的工人在战后迅速走上工运的最前线。1947年春,法电全体雇员2400人,

---

\*据中方资料显示,这种抗议策略是法电罢工者的发明。有一条史料说这一念头是中共领导人提出来的。见《法电工人的“大请客”追记》,载《上海轶事》,上海,1987年,第184页。另一条史料则把这一发明归于法电工人。见《“大请客”斗争冲破罢工禁令》,载《上海工运史料》1987年第4期,第22、28页。但是,也许更为巧合的是,前此一个月,东京地铁工人罢工,也是采取这种抗议方式——地铁在运行,却不售票。与上海乘客不同——他们很快就对“大请客”表示热烈欢迎;而在日本,“开始时,循规蹈矩的日本人对于不付费乘车感到很不自在。”见 Theodore Cohen, *Remaking Japan: The Occupation as New Deal* (New York, 1987), p. 219. 杰弗里·瓦瑟斯特龙 (Jeffrey Wasserstrom) 向我提示了这一点,我表示感谢。

向社会局请愿,表示对政府冻结生活指数的不满。\*<sup>26</sup>当年春天,法电又和英电、华电的同志们联合发动总罢工,抗议富通事件(参见本书第六章)。1948年3月,共产党负责人王中一被捕,法电的激进运动遭到严重挫折。在搜查王的住处时发现了一份名单,上面记录了法电机务部30多名党员的姓名住址,其中14人旋即遭到逮捕。然而,野火烧不尽,次年,法电共产党员的数量迅速增加到前所未有的137人。<sup>27</sup>当红色军队于1949年春天逼近上海时,法电有700多人参加纠察队,维持秩序,巡逻厂区,保护公司财产不被转移到台湾去。<sup>28</sup>共产党的统治在上海建立不过两个月,法电工人就成立了该市第一个新工会。<sup>29</sup>

就像英美烟公司一样,作为工人行动主义的范例,法电在上海工人运动史的研究中占有显著地位。确实,法电工人在30年间创造了令人瞩目的罢工和组织工会的记录。但值得注意的是,该公司的工人斗争在五四运动时始发其端。与纺织业和烟草业的情况不一样,法电缺少“无产者”工人力量,在20世纪的头20年,他们所进行的只不过是“自发的斗争”。可是,到了20世纪20—40年代,法电的技术工人和半技术工人在共产党和青帮工运领袖的影响下变得特别活跃。就像这些外来政治势力在其他企业要取得稳固的立足点一样,是否能站稳脚跟要根据工人中原本存在的界限而定。

电车工人团结斗争的方式当然是革命者所欢迎的,但他们

---

\* 蒋阿龙等:《法电工人要求解冻生活指数的斗争》,载《上海工运史研究资料》,1982年第3期,第47页。当时,警方报告说,在法电电车车窗上发现了政治性标语:“无商不好!”“无官不贪!”“腰包鼓鼓的市长为啥要冻结生活指数?”由于这些标语都是用硬物刻划而成的,警方怀疑系卖票工人用剪票夹或车门的钥匙所为。见 *Shanghai Municipal Archives*, 1-7-48.

更普通的行动方式是按照技术水平和地缘关系而定的。只有在共产党人和帮会首领达成妥协时，他们才能在内部充满矛盾并削弱其团结潜力的工人中赢得支持的基础。

## 人力车夫

如果说电车工人中有技术性和半技术性之分、地缘背景各异、政治忠诚不等的情况的话，那么，在运输业中还存在着非技术性工人。完全没有技术的人力车夫是个数量相当大的群体。1874年，一个法国人把黄包车介绍到上海后，这种交通工具很快就盛行于全市。尽管其数量随季节变化而有很大的波动，但据估计，上海黄包车夫的数量，在1920年约为3.5万人，1934年约为8万人，1938年约为10万人。<sup>④</sup>所以，无论机械化交通工具如何发达，无论政府当局如何限制其人数，黄包车夫在20世纪初期的上海仍然不是一个濒死的群体。（参见附录C）

绝大多数黄包车车夫都来自苏北的农民家庭。据1929年对100名黄包车夫的调查，有85人出身于农民家庭，其中的92%仍在老家拥有土地。<sup>⑤</sup>由于大多数黄包车公司都由苏北人开设——尤其是来自贫穷的盐城、阜宁二县的人，所以，很自然的，来自这一地区的人新来乍到，就干起了这一行。<sup>⑥</sup>就像一位上了年纪的人力车夫所说：“我62岁，来自盐城县。我家有五六亩地，靠近海边，现在已被海水浸灌了。由于苏北经常发生自然灾害，我的老婆、儿子、女儿和我都逃到上海来了。我年纪大了，没有办法寻找其他工作，只好去找同乡的车行老板帮忙。”<sup>⑦</sup>车行老板与车夫之间的关系因为这些车夫——很多都是单身来沪的（约占总数的6/10）——一般都挤住在车行条件极差的二层、三



层阁楼上而得到进一步加强。另有约占 4/10 的车夫有家眷，其中一半以上住的是自己搭的草棚。居住棚户的车夫没有自来水，只能自掘浅水井，常常遭受污染之苦。<sup>⑤</sup>

拉黄包车很难维持一个工人家庭的生计。1934 年，平均每个车夫的收入不足 9 元，而家庭支出要 16 元多。即便是单身汉，也很难以此糊口，因为每月要十元多才够花费。因此，很多车夫都深陷债务之中。<sup>⑥</sup>

考虑到上海的生存环境不佳，车夫们与家乡地区保持着密切关系也就不足为奇了。\* 正如一位中年车夫在讲述其自身情况时所说：

我三十六岁，来自盐城。两年前，由于家里遭灾，我来到上海。我有四个兄弟，我是老二。老大在电灯厂工作，老三和老五在家乡种地。老四也在上海拉黄包车。我们兄弟五人都已分家，每人有十三亩地。我来上海后，家里的地由我老婆在种。但今年家里又遭灾了，老婆和六个小孩子都被迫来到上海。现在，我家的地由我的兄弟照看着，父母也由他们照看。以后我父母过世，我再把地收回来自己种。<sup>⑦</sup>

即使是没有结婚的单身车夫也希望与苏北亲属保持密切关系。一位来自阜宁的单身车夫说：“由于太穷，我还没结婚，但我要是想结婚的话，也很容易，因为我在苏北有许多亲戚可以帮忙。我叔叔没有儿子，我就被过继给他。现在他在苏北种了 20 多亩地。如果我有余下来的钱，我就寄给他；如果我没钱，我叔叔就接济我一些。”<sup>⑧</sup>

228

\* 考虑到车夫及其家庭仍然与家乡保持联系，江淮同乡会有时也介入黄包车业的事务。这就是为什么同乡会会介入 1935 年以及 1936 年发生的两起车夫在与洋人纠纷中被害事件的原因。见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档案，#722；4-575。



许多车夫每年春天要回家乡干农活，待到秋收结束以后再返回上海。<sup>⑩</sup>这些人是真正的农民-工人，当其他农民背井离乡来到城市寻求活路时，他们在家乡的土地上还留有一腿。只要条件许可，绝大多数车夫都会返回家乡，有些一去不复返。其结果是，上海这一阶层的工人轮换率特别高。1940年的一次调查显示，能在上海干满三年的人力车夫不足30%，而只有2%的人能干满5年。<sup>⑪</sup>

尽管拉黄包车的活儿苦累至极，但对从乡村逃难的人来说，不失为一个及时饭碗。更有经验的同伴往往教给新来乍到者一些技巧：街道、界标的名称和分布，以及赚钱的门道。初学者一般被叫做“打野鸡”，为期也只不过几天时间。<sup>⑫</sup>因为苏北逃难者源源不断，上海车夫队伍来源充足。中国其他城市的每辆黄包车一般分为两段，即日班和夜班，上海则不同，劳动力大量过剩，一辆黄包车往往要租给四个人每天分段使用。

车夫之间的激烈竞争使车主得以刻意抬高租车价格。1919年，该市最大的人力车企业法商飞星公司，属下有16个大承包商，分别监管该公司2000多辆黄包车的出租事宜。每个大承包商下面，还有10~20个承包人，具体负责把车子租给车夫之事。每个大承包商从公司领租车子的价钱是每辆每天7角，再以每天9角的价钱转租给车夫（通过承包人）。<sup>⑬</sup>正如一位外国观察家所评论的：“在这个开放型的大城市里，人力车业堕落为一种连环骗局。工部局每年都要发放黄包车照会（即执照——译者注），此事由黄包车车主包揽，车主又转包给承包人，承包人再卖

<sup>⑩</sup> 雷景敷：《上海杨树浦人力车夫调查》，上海，浦江大学毕业论文，1930年。另有一部分车夫来自崇明和泰州地区，他们以种花生为副业。与盐城和阜宁籍车夫正好相反，这些农民-工人是深秋回到家乡，次年春天返回上海。

给车夫,层层盘剥。”<sup>④</sup>

由于在上海的车夫身上有油水可赚,青帮便介入进来。车主和车夫一般都加入青帮,部分地是不想让当局插手。尽管车主和承包人要向车夫收取高额租费,但各方都要面临一个共同的敌人——政府干涉。英国人、法国人和中国当局各自实行收费高昂的照会制,如随便停车或违反交通规则就要收取高额罚款。为了对付警察的监管,无论是车夫还是车主都认为有必要加入秘密帮会。顾竹轩是上海苏北人中的青帮老头子,他早年做“放黄包车”生意时,即以同乡关系拜法租界的曹幼珊为老头子。\*有人估计,约有90%的车夫加入了帮会。<sup>⑤</sup>

尽管帮会关系有助于缓解政府与人力车经营者的紧张关系,但相互间的敌意仍不时爆发。早在1897年,公共租界有5000多名小车工人罢工,原因是工部局决定从4月1日起,将小车执照捐增加到每月600文。<sup>⑥</sup>1915年12月,成千上万名车夫突然发动罢工,抗议提高捐税并限制本地区黄包车的数量。<sup>⑦</sup>1918年4月,工部局制定新的交通规则,不得在主要干道或电车轨道边拉客,激起了车夫们的反抗。他们怀疑电车公司是这一新规则的幕后指使人,愤怒的车夫们在承包人的指使下,把石头泥块扔向电车,打碎车窗玻璃。混战中,一名车夫被英国巡捕用枪打中。然而,抗议者最终占了上风,黄包车仍然被允许在该市大街上逡巡。<sup>⑧</sup>

尽管有这样一个好战的开头,但在整个民国时期,人力车夫

\*王德林:《顾竹轩在闸北发迹和开设天蟾舞台》,载《旧上海的帮会》,第357页。顾还在公共租界巡捕房做过巡捕,这一点对他后来的发迹极有帮助。由于和租界巡捕房继续保持关系,他开设的车行,租出的车子遇有不遵守交通规则,便由顾向各捕房站岗巡捕打招呼,“宽容放过。”见《旧上海的帮会》,第187页。

并未成为以发动工人运动为己任之政党的主要依靠。虽说黄包车苦力在五四运动后的上海劳资纠纷中并未退隐其身，但他们是工人阶级中最不容易罢工的分子（见表 11）。车主、承包人之对于车夫，乃是一种家长式关系，加上同乡关系，车夫反抗其雇主就受到了极大的约束。车夫就业，竞争激烈，工作时相互之间又是孤立的，所以车夫们没有就业保障，也没有较高技术含量之工种那种工作配合——可以导致更高战斗水平的产生。由于基本上都是文盲，也使他们对当时政治形势感知迟钝，缺乏参与的兴趣。上海市社会局的一份调查发现，只有 9% 的车夫能识得该市街道上所有的标志。同一份调查还发现，调查者在工作时遇到了很大困难，不仅是因为被调查者浓重的苏北口音，而且还因为这些车夫们对“生活”、“改良”和“救济”之类“抽象”词汇完全不懂。<sup>⑥</sup>虽然这份调查表明，调查者更多地是站在高人一等的角度来看待那些被认为是愚昧无知的被调查者，但从中也确实可以看到，由于缺少文化，车夫与小市民之间存在很大的距离。而且，因为黄包车苦力继续与乡村生活保持联系，阻隔了他们改善劳动状况的热情——只要有可能，他们就会回到家乡。

黄包车夫不愿开展持久的劳动组织工作，也反映出他们的工会化程度很低。1927 年，上海工人第三次武装起义胜利之后不久，成立了一个车夫工会，但它所吸收的成员不过 300 来人，

230

表 11 1918—1940 年间上海运输工人罢工情况

行 业	工人数量	罢工人数	每 1000 工人中参与罢工的人数
电 车	5800	43	7.4
码 头	50000	25	0.5
人力车夫	80000	15	0.2

资料来源：Shanghai Strike Statistics, 1918 - 1940.

而且不到六个月就解散了。1930年，上海市政府拒绝了成立新的车夫工会的请求。<sup>⑧</sup>直到三年多过去，即1933年秋，公共租界车夫何武山、徐竹林等发起组织“人力车夫互助会”，并得工部局许可成立。该会不仅得到了久欲发展外商大资本的交通企业（如电车、公共汽车）的工部局和商人的支持，也得到了中外社会改良者的支持。为了削减车行的利润，满足改良者和车夫们的要求，\*工部局同意公共租界内的黄包车日租费最高限价为8角5分。而且，车主必须把日租费中的5分钱交给互助会作福利开支。虽然车主们竭力阻挠新规则的实施，甚至在1934年8月唆使、收买“车夫败类”向公共租界里的车夫滋事（或给车胎放气，或捣毁车辆），但他们的图谋并未得逞。<sup>⑨</sup>

次年，车主们向法租界工部局新规则发动了新一轮强有力的挑战——有4万名车夫参加了罢工。法租界新规则规定，凡在法租界内的黄包车及车夫都必须登记（登记费甚高）。由于害怕此项登记是今后限制其生意的第一步，租界里的250名黄包车车主鼓动承包人和苦力们起来反对新规则。凡是领了执照开始做生意的黄包车都被帮会中人拔去气门芯，车主们同时又向工部局发动请愿，要求取消新规则。由于害怕新规则实施，同时担心抗议不会有好结果，大批车夫选择了返回苏北家乡，而不是坚持斗争。正如一位记者在评价这些人脑子里的种种想法时所说的：

对法人规则犹豫不决的人力车苦力们大约有这么几种

\* 正像批评者不久就指出的，车行老板积聚了大量财富，却不进行任何新式生产的投资。至1933年，飞星公司每天出租2072辆黄包车，每车每天租费1元。即便扣除执照、修理等费用，公司每月可从每辆车中得到10元的净收入。所有车子加起来，公司每月可得20720元的净收入，或者说，一年可净得248640元的收入。见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档案，#2:2-1061。

类型：一些人担心在执照上按手印就是让他们信天主教。另一部分人则相信这种方法就是在另一场世界大战发生时把他们送上前线。而第三部分人则误以为会夫妻分离。<sup>④</sup>

无论其动机如何，有人估计，到8月中旬，法租界有2/3的人力车夫踏上了回苏北老家的路程。为了继续对租界当局施加压力，车行老板们开始向罢工的苦力们发放食物。最后，还是杜月笙出面调解，租界方面答应将登记费从5角降到2角。尽管车主和车夫都不满意，但因无力回天，也就只能勉强接受了。<sup>⑤</sup>

232 次年又发生了一次车主-车夫罢工，这次罢工发生在公共租界，要求废除互助会，取消对车夫登记的限制。车主和车夫都认为互助会拿着收集的30多万元却不干事，所以对互助会提出的进一步减低车子日租费的建议不仅不支持，反而予以反对。批评者坚持认为，互助会不仅不要干预市场，而且应该将其财产拿出来救济车夫，然后关门歇业。不消说，工部局不会同意解散互助会，但同意在公共租界已登记的4万名车夫的基础上再增加5000人的名额。\*

人力车夫中孤立而分散的罢工在民国后来的历史上仍在继续进行着，但仍然没有什么大的起色。由于国民党和共产党的工运领导者都不对这个松散的阶层抱什么希望，人力车夫也就无法寻求政治靠山来改善其境遇。车夫们虽然是被压迫者的缩影，但同时也是落后社会令人不舒服的遗留物，所以，年轻的进步人

\*《新闻夜报》1936年4月1日；《立报》1936年4月4日；《大公报》1936年4月14日，15日。无论公众如何批评，互助会仍然没有明显改变其福利措施。正如埃利诺·辛德尔(Eleanor Hinder)1944年在谈到该组织时说：“该会是否真能为车夫解决什么问题还是个问号。车夫们在1934年时的生活水平很低，后来也没有什么改进。”见 *Life and Labour in Shanghai* (New York, 1944), p. 131.

士往往不屑一顾。<sup>⑤</sup>

可以肯定,激进派也曾作过组织人力车夫的尝试,特别是在“左”倾路线占主导地位的时候——当时上海的共产党干部希望能在该市工人阶级中受压迫最重的群体中打开局面。1930年9月,中共工运组织者在上海人力车夫中成立了一个红色工会,据说人数达12万人(可能有些夸张)。<sup>⑥</sup>第二年,国民党当局对“无知识之车夫”会被“反动分子”(指共产党)所利用表示担心。<sup>⑦</sup>1934年,一份共产党传单号召人力车夫“反抗车主”、“支持红军取得胜利”。<sup>⑧</sup>1935年法租界罢工时,共产党人又四处散发传单,号召车夫们起来打倒政府、打倒帮会、打倒车主。<sup>⑨</sup>可是,没有证据表明这些鼓动收到了效果。而且,在1946年,行政院下令,用三年时间分阶段淘汰上海全市的2万多辆人力车,此举进一步表明,人力车已行将消亡,开展长期的组织工作不啻竹篮打水。<sup>⑩</sup>

与电车工人不同——这些技术性和半技术性工人都分别积极地参加共产党和国民党领导的工人运动——上海为数庞大的人力车夫不与任何一方打交道。\*在车主和承包商的控制下,人力车夫几乎不可能起来反抗他们的雇主。而且,在这些雇主的煽惑下,车夫们倒是经常性地对当局制定的规则发起抗议。车主和承包商在这类斗争中的显著作用使得任何拉拢车夫的企图都将无果而终。

233

上海车夫的相对沉寂与北京的情形不同,戴维·斯特兰(David Strand)将1929年时的北京车夫称之为“该市政治上最为积极的群体”。这种差异肯定是因为两市车夫所处的社会经济环

\*1937年10月,“臭名昭著的车夫苦力煽动者”、国民党党员陈国梁组织车夫救亡协会。但据警方情报说,陈是单独行事,“并未得到当地工会的支持。”见 *Shanghai Municipal Police Files*, D-8144.

境不同而造成的。北京车夫包括了相当比例的市民——旗人、当过警察的人、商贩、失业匠人，与上海车夫绝大多数都来自农村的情况不同。北京匠人也不生存于包租制之下，境况要好得多，受教育程度、娱乐活动也比其上海同行好不少。故而，北京车夫“全盘具备了城市居民所拥有的集团的、公众的策略”，而上海车夫则只不过是一个在抗议方式上受到诸多限制的范本。<sup>234</sup>

上海黄包车夫受限制的行动主义与运输业中其他非技术性工人的情况相类似，后者也面临着劳动力过剩的问题。例如，板车苦力和挑米工不会团结起来，争取改善劳动状况，而是更易于为争夺装卸权利而互相械斗。<sup>235</sup>码头工人，我们已经看到（参见本书第三章），则各自追随互相对立的包工头为抢地盘而混战不已。

## 码头工人

比起运输业中其他非技术性群体来，码头工人更经常地卷入当时的政治冲突，主要是因为无论是共产党还是国民党都对他们特别注意。由于上海乃至整个中国都已与世界经济联系起来，装卸业便赫然出现在政治人物的战略计划之中。因此，国共两党的干部都竭尽全力，把关键的码头工人吸引到他们的事业中来。值得注意的是，他们的努力收效甚微。

234 最初，共产党开了一个好头——部署了几个湖北籍学生到湖北籍码头工人中开展工作。有位来自湖北的党员李子安，自告奋勇，去浦东给码头工人的孩子免费教书。他惟一的要求是孩子的家庭能管饭。通过这一途径，李子安得以在普通码头工人家庭传播激进信息。这种关系成为动员码头工人参加五卅运动的渠



道。<sup>⑥</sup>可是,可以确信,参加为期三个月罢工的约3万名码头工人中的绝大多数是在其他东西刺激下才跟随行事的。有位积极分子回忆道:“我们要找到仍在干活的人,然后和他们谈话,告诉他们,要是停止干活,每周可以领到两块钱的罢工费。”<sup>⑦</sup>

稳定的收入对许多游荡于码头附近、等待工作机会的临时工(俗称“野鸡”)来说有着很大的吸引力。另一位组织者曾回忆说:“五卅罢工时,有些固定工人想继续干活,但我们更容易劝说“野鸡”参加罢工……毕竟,罢工者及其家属每天可以收到两角钱的罢工费”。<sup>⑧</sup>虽然在五卅运动时就成立了码头工人工会,但其影响在上海工人三次武装起义之后不久就消失了。\*

正如党史学者所指出的,共产党在码头工人中开展工作受到了几个因素的制约。首先,要把占码头工人绝大多数的“野鸡”动员起来、造就一支稳定的追随者队伍特别困难。今天吸收进来的人可能明天就走了。其次,全市有250多个码头,分属不同的企业:航运公司、纱厂、烟厂、米店,等等。共同的政治行动要在这种分裂状况中产生几乎是不可能的;而且,中共以行业划分来开展工作的战略进一步削弱了将码头工人团结起来的可能。例如,英美烟公司码头与邻近的日华纱厂码头就属不同的党组织开展工作的范围。第三,码头把头严密控制着手下的工人,给外来的组织者造成了极大阻力。要想在码头上做工,就必须通过把头这一环,所以,把头自然而然地对普通工人有着极大影响。这种联系由于同乡关系、虚拟的血缘关系和帮会关系而得到进一步加

\*《上海港史话》,上海,1979年,第304~322页。该码头工人工会于1926年10月由陶静轩发起,陶是一名湖北籍党员,曾在码头上做过工,后来进入内外棉厂(见本书第四章)。在上海工人第一次武装起义失败时,陶因为领导浦东码头工人纠察队而被逮捕处死。见《陶静轩烈士》,载《上海党史资料》,1985年第5期,第39~44页。



235 强。这种关系使得码头工人惟把头马首是瞻，经常性地卷人抢地盘的残酷械斗。<sup>63</sup>

把头的权威也阻碍了国民党在码头工人中发展势力的企图。当局对把头从工人工资中抽取高额回扣大发不义之财感到不满，同时为了争取普通工人，在1928年颁发了一个所谓的“二八条例”，规定把头只能从工人薪水中扣除20%，其余80%归工人。此项条例立即激起了把头们的愤怒，他们已经习惯于依仗严密的关系网络大肆榨取工人血汗。在整个20世纪30年代，把头们动用其在政府里的帮会关系，力图说服政府取消该条例的实施。结果，“二八条例”不但没有导致在码头工人中产生一个团结而忠诚的工会，反而在互相敌对的把头的操纵下，时时诉诸武力的工会层出不穷。<sup>64</sup>

抗战时期，共产党干部卷土重来，想在码头工人中建立立足点，但是仍然事与愿违。到抗战结束时，在上海6万多名码头工人中，只发展了区区16名党员。<sup>65</sup>工人的流动性，行业内部的分裂，以及把头的权威，仍然是壮大革命势力的重大障碍。\*

---

\*1949年新政权建立后所采取的整顿上海码头的措施，反映了这些障碍依然存在，新政权决心清除。首先，在1950—1951年间，发起反把头运动（时称“反霸斗争”——译者注）。在52次总共有3万多人参加的斗争会上，约有3000多名把头被斗争、清除、镇压。其次，将全市260个码头集中管理，建立港口统一管理机构，即上海区港务管理局。最后，在1953—1954年间，将大批流动的临时工（“野鸡”）固定为海港的正式工人。参见《上海港史话》，第336~338页；陈港：《上海港码头的变迁》，上海，1966年，第66页。

## 结 语

上海运输业内部的分裂状况也是其他行业和其他城市情况的反映。徐阿梅及其技工同伴在共产党于法电开展的工人运动中所起的作用,与其在烟草业、纺织业的战友之激进主义是并行不悖的。而且,这种情况也与世界其他地方的技工行动主义产生了共鸣。正如有位记者在解释彼得格勒的技术性机器工人为什么参加俄国革命的问题时所说:

机器工人总是站在每次运动的最前头……车工、翻砂工、铁匠、机修工和技师——这些人境遇都很好,收入较丰,富有个性……这种工人富有头脑,在每一个工作环节上都必须深思熟虑……他们的谈话风格,甚至他们的语言,与我们知识分子几乎没什么区别。据我看来,他们(对革命事业)更有兴趣,因为他们的判断更敏锐,他们的信仰一旦确立,就十分坚定。<sup>⑥</sup> 236

如果说技术性工人当仁不让是政治抗议的排头兵的话,则其对立的群体总不外乎是苦力。在非技术性运输工人中组织政治运动,其难度之大,并非上海所独有。在远隔重洋的英国曼彻斯特港,要将码头工人组织起来,也会遇到同样的困难——他们往往“画地为牢,各立山头,极具排外性”。就和上海的情况一样,曼彻斯特的码头工人以人种和宗教信仰划分,在工头的主使下拉帮结派:“例如,爱尔兰人往往在爱尔兰工头的手下干活……在同一帮里,很少发现天主教徒和新教徒会在一起干活。”还有,在曼彻斯特,半数以上的码头工人都是没有固定工作的“游民”或“流浪者”。就业机会的高度偶然性,反过来又致使他们对工会



事务缺乏兴趣。<sup>⑥</sup>

处于这两类工人之间的是半技术性工人。和烟草公司的卷烟间一样，在电车公司车务部，我们发现，这一工人阶级的中间阶层，主要是来自华北和浦东的男性，与雇主有关系，缺少文化，参加过帮会。这一阶层的工人比起非技术性工人来，更习惯于城市生活，有时也会被政治号召所打动。然而，激发他们参与政治活动的原因，更多的是钱，而不是阶级觉悟。他们与熟练技工的鲜明区别可从1927年12月英电公司的一场罢工中看出，此次罢工的起因是一名司机被巡捕的子弹误伤致死。一位积极参加此次罢工的共产党干部报告说：

司机和卖票对参加罢工表现很冷漠，技工们十分气愤……再三对他们解释，眼下到公司领工资不合适，但他们根本听不进。他们想钱想得不得了，我们没法说得动他们……我们发现，那些来自江北（即苏北）的工人很难说得动。他们坚持要去拿钱，任何劝说都听不进……我们在“老部”和技工中的同志的工作就好做多了。<sup>⑦</sup>

上海运输业中因缺少女性而不存在男女差异的问题，地缘政治和产业政治便以特别明显的方式表现出来。由于地缘不同和技术水平不等而产生的裂缝表现得特别明显，无论其企业属外商还是华商。

我们有必要再度重申，地缘、工种和政治行动之间的关系是间接性的——以工人的思想和群体习惯为中介。而且，这种中介过程既受到上海劳动力市场的制约，又受到该市政党政治举动的左右。非技术性劳动力的过剩和技术性工匠的濒临消亡，两者相结合，使得工人之间的分裂尤其剧烈。但这种现象只是在政党政治意义上即外来组织者力图吸引工人阶级追随者时才表现得特别明显。他们所取得的成功当然不仅取决于对工人力量掌握

的程度,还取决于当时不断变化的政治、经济形势。

#### 注 释

① 朱邦兴等编:《上海产业与上海职工》,上海,1984年,第八、九、十章。

② 有几次早期罢工是车务部工人发动的,起因是为了抗议其司机同伴因违反交通规则而遭逮捕。见《时报》1914年8月18日;《民国日报》1917年7月2日。

③ 任建树、张铨:《五卅运动简史》,上海,1985年,第93页。

④ “张孝方访谈录”,1957年2月18日,上海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工人运动档案。

⑤ *Shanghai Municipal Police Files*, D-6449A.

⑥ 朱邦兴等编:《上海产业与上海职工》,第382~383页。

⑦ 《民国日报》1921年3月4日,7日。

⑧ 周国强:《回忆上海工人的三次武装起义》,上海,1957年,第1~2页。

⑨ 《上海法商电车、电灯、自来水公司工人斗争简史》,载《上海工人运动历史资料》1953年第2期;姜沛南:《徐阿梅》,载《中国工人运动的先驱》,北京,1984年,第3卷,第189~190页。

⑩ 《上海工人运动的一座坚强堡垒》,载刘长胜编:《中国共产党与上海工人》,上海,1953年,第13页。

⑪ 周国强:《回忆上海工人的三次武装起义》,第12~16页;《上海法商电车》,第5~6页。

⑫ 周国强:《回忆上海工人的三次武装起义》,第28页。

⑬ 姜沛南:《徐阿梅》,第199页;《上海法商电车》,第8页;周国强:《回忆上海工人的三次武装起义》,第31页。

⑭ 朱邦兴等编:《上海产业与上海职工》,第308~312页。

⑮ 参见 *Shanghai Municipal Archives*, #6-7-370, #6-7-371, #6-7-372, #6-7-373, #6-7-374, #6-7-375, #6-7-376, #6-8-069, #6-8-483, 传单号召工人反

对杜月笙和国民党控制的工会解决罢工的方法，号召工人在共产党的领导下继续进行罢工。这些传单藏在小包中药里，互相传阅，见姜沛南：《徐阿梅》，第203页。

⑩ 姜沛南：《徐阿梅》，第201页，204页；朱邦兴等编：《上海产业与上海职工》，第312~313页。

⑪ 姜沛南：《徐阿梅》，第209页，215页；朱邦兴等编：《上海产业与上海职工》，第319页。

⑫ 即便政府当局也对罢工表示同情。因为死难者是被法国巡捕打死的，国民党中央指示外交部向法国方面发出照会，抗议这一“侵犯中国主权”的事件。见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档案，#1:2-747。

⑬ 蒋阿龙：《五十七天大罢工》，载《在艰苦斗争的岁月里》，上海，1958年，第13页。

⑭ 姜沛南：《徐阿梅》，第217~218页；朱邦兴等编：《上海产业与上海职工》，第353~354页；《上海工人运动的一座坚强堡垒》，第14页。

⑮ 朱邦兴等编：《上海产业与上海职工》，第354~356页。

⑯ Brian Martin, "Tu Yueh-Sheng and Labour Control in Shanghai," *Papers on Far Eastern History*, no. 32(1985): 134~135; 薛畊莘：《我与旧上海法租界》，载《文史资料选辑》，第6辑（1979年），第157~158页；薛畊莘：《我所接触过的上海帮会人物》，载《旧上海的帮会》（上海，1986年），第93~94页；朱邦兴等编：《上海产业与上海职工》，第359页。

⑰ 陈卫民：《黄福林烈士小传》，载《上海工运史料》，1984年第4期，第41~43页。

⑱ 《上海法商电车》，第24~25页。

⑲ 《上海法电工人运动历史资料》，上海，1957年，第2册，第82~95页；权琳甫等：《法电工人为了实现“三不停”而斗争》，载《文史资料选辑》1979年第2辑，第134页；《“大请客”和“劫法厂”》，载《在艰苦斗争的岁月里》，上海，1958年，第27~34页。

⑳ 《上海法电工人运动史料》，第2册，第96页。

㉑ 《上海工人运动的一座坚强堡垒》，第20~21页。

㉒ 《解放前上海法商电车、电灯公司共产党组织沿革》，载《上海工运史

料》1987年第4期,第37~38页。

⑲《上海工人运动的一座坚强堡垒》,第22页;权琳甫等:《法电工人为实现“三不停”而斗争》,第137页。

⑳ 权琳甫等:《法电工人为实现“三不停”而斗争》,第138页。

㉑ 李次山:《上海劳动状况》,载《新青年》第7卷第6期(1920年),第72页;上海市社会局编:《上海人力车夫生活状况调查报告书》,载《社会半月刊》第1卷第1期(1934年),第100页;朱邦兴等编:《上海产业与上海职工》,第673页。

㉒ 雷景敦:《上海杨树浦人力车夫调查》,上海,浦江大学毕业论文,1930年,该调查显示,几乎所有被调查者(占94%)都是因为家乡遭受自然灾害而作为难民来到上海的。

㉓ 见 *Shanghai Municipal Archives*, #13-1-2131,其中排列了属于人力车同业公会的所有业主——绝大多数都来自盐城和阜宁二县。

㉔ “陈彩图谈话”,转引自雷景敦:《上海杨树浦人力车夫调查》。

㉕ 朱邦兴等编:《上海产业与上海职工》,第676页。

㉖ 《上海人力车夫生活状况调查报告书》,载《社会半月刊》第1卷第3期(1934年),第41~42页。

㉗ “史芝林谈话”,转引自雷景敦:《上海杨树浦人力车夫调查》。

㉘ “陈殷裕谈话”,引同上。

㉙ Eleanor Hinder, *Social and Industrial Problems of Shanghai* (New York, 1940), p. 135.

㉚ 雷景敦:《上海杨树浦人力车夫调查》。

㉛ 《时事新报》1919年3月9日11日。每天一角五分的利润落到大承包商的腰包,承包人则赚取五分钱。

㉜ Ernest O. Hauser, *Shanghai: City for Sale* (New York, 1940), p. 135.

㉝ 朱邦兴等编:《上海产业与上海职工》,第677页。

㉞ 《上海人民的反帝反封建斗争》,载《上海地方史资料》,1983年第2期,第173页。

㉟ 《时报》1915年12月3~9日。为了扩展电车业务,工部局决定将黄包车数量从1万辆降到6000辆。

④《民国日报》1918年4月12日,19日,20日,21日,22日,26日;《时事新报》1918年4月18日,19日,20日,21日,26日。

⑤《上海人力车夫生活状况调查报告书》,载《社会半月刊》第1卷第1期(1934年),第103、107页。

⑥这一请求是律师兼国民党党员陈国梁提出的,他和部分车行老板很有交情。其请求被拒绝的理由是他本人并非车夫。见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档案,#722:4-513。

⑦朱邦兴等编:《上海产业与上海职工》,第678~679页;骆耕漠:《上海公共租界人力车纠纷结束之后》,载《中国经济论文集》,北京,1936年,第1卷,第240~252页。并见 *Shanghai Municipal Police Files*, D-3482 中有关车主与车夫相勾结反对工部局规定之事。

⑧ *North China Daily News*, Aug. 23, 1935. 因为有些车夫在登记过程中按手印达19次之多,他们的担心不无道理。

⑨ *Shanghai Municipal Police Files*, D-5670;《申报》1935年8月7日,8日。

⑩《东方日报》1939年12月2日。

⑪《全党争取黄包车夫总罢工的实现》,1930年9月20日,台北,调查局档案,#556.696/817。

⑫《中国现代政治史资料汇编》,南京,第2卷,第44册,第5551号文件。

⑬ *Shanghai Municipal Police Files*, D-5864.

⑭ 同上,D-5670.

⑮ *Shanghai Municipal Archives*, #1-14-237. 即便如此,当局仍然怀疑共产党卷入了人力车夫发动的小规模的反对政府禁令的罢工。

⑯ David Strand, *Rickshaw Beijing* (Berkeley, Calif., 1989), pp. 243, 28~64.

⑰ 参见 *Shanghai Municipal Police Files*, D-5661, 其中详细记叙了1934年2月板车苦力和挑米工之间为了争夺苏州河上卸米的权利而大打出手的情况。

⑱“江元青和宋三妹访谈录”,1957年9月12日,上海社会科学院历



史研究所工人运动档案。

⑥① “钟盛发(音)访谈录”,1957年1月9日,同上。

⑥② “郑长山(音)访谈录”,1957年3月7日,同上。每日的罢工费尽管比工厂底层工人的日工资来说还低点,但对“野鸡”每日所期望的收入来说可能要高些。

⑥③ “上海港访问记”,1987年5月26日,1988年9月26日。

⑥④ 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档案, #720-33, #722: 4-233, #722: 4-502, #722:4-504。青帮闻人常玉清、朱学范和陆京士等人都卷入了处理把头建立妨碍政府条例实施的工会的事务。

⑥⑤ “上海港访问记”,1988年9月26日。

⑥⑥ 转引自 David M. Mandel, *The Petrograd Workers and the Fall of the Old Regime* (New York, 1983), p. 13.

⑥⑦ University of Liverpool Department of Social Science, *The Dock Worker* (London, 1956), pp. 5, 74, 78 ~ 81, 122 ~ 123.

⑥⑧ *Shanghai Municipal Police Files*, D-8976.



## 结 论

不同的工人有不同的政治。简言之,这就是本书的论点。在探讨上海罢工问题时,我力图追溯这些工人是些什么人,他们来自何处,他们开始进厂时有些什么习惯,在厂里结成了什么团体,这些习惯和组织对其集体行动产生了什么样的影响。我发现,技术水平是识别工人的一个关键变数。技术性、半技术性和非技术性工人在地缘祖籍、性别构成,以及教育、文化和适应城市生活的程度都存在差异。这种差异不仅反映在他们的思想上,也反映在他们的抗议中。

通过将工人阶级文化——以其工作经历为中介——与抗议行动联系起来,我试图将“新工人史”的有关方面(特别强调大众文化和劳动环境)与对罢工的常规看法和其他形式的工人斗争结合起来。就中国的情况而言,这种联系尤为重要,因为上海工人阶级不同的文化特性和团体倾向是与主要政治党派战略联系在一起。对以行会为基础的江南籍工匠与共产党的关系、以及以帮会为基础的北方籍机器工人与国民党的关系的探寻,充分揭示了两党的力量和局限性。这两个对立的政党都产生了各自的政权(中华民国之后便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所以,以上海工人运动为对象的这一研究,在一定程度上也是对现代中国政府之社会基础的研究。

当然,在现代中国,工人与政府相互影响的方式并非与世界

其他地方的情形丝毫不差。确实,近年关于工人研究的一种有益趋向是避免将工人阶级的形成普遍模式化,而是更关注国家的发展和演变。<sup>①</sup>但是,如果每个国家的(以及每个城市的)工人历史都是独一无二的,其基本变数就明显是不一样的。在“结论”这一部分,我将探讨这些共性——先从中国的其他地区人手,然后再看看世界其他地区的情况。

## 中国内部的比较

对中国其他地区工人状况的研究为数不多,但这些已经出现的成果有助于支持我关于工人阶级内部差异的先入之见。第二次世界大战时期,云南省对工厂工人的一次调查揭示了主要来自江南地区的技术工人和来自内地的非技术工人之间的鸿沟:

三十八号工人,来自上海,他对自己长期在现代企业工作感到自豪。他的父亲是名汽车修理工,他的兄弟也是一名技术工人。他们家住在一家工厂附近,在他儿时,常常随父亲去厂里,摆弄各种零件。……所以,他很熟悉各种现代机器。

来自本地乡村的工人只熟悉庄稼和土地,……对于各种机器,中国农民由于没机会接触,完全是外行。当他们进厂后,往往一筹莫展。他们举手投足,看起来很愚蠢,因为他们从没有接触过这些新东西。<sup>②</sup>

在云南,就和在上海一样,技术水平和地缘关系互相关联。那位研究云南的学者抱怨道,这种关系使工人们过分重视乡土关系的重要性:

人们普遍认为,提升靠的是同乡关系,而不是技术水

平。我收集的大量抱怨和谣言也证实了这一点。……无疑，一定的同乡关系确实起着作用，对工人们来说，技术水平是次要的。那些不刻意讲究这种关系的人觉得技术高不可攀，越来越泄气。必须看到，讲究同乡关系的人，事实上都是非技术工人。……在采访过他们后，我惊奇地发现，许多人并不想成为效率高的工人。他们的兴趣与其说是在厂里，还不如说是在农村的家里。<sup>③</sup>

241 尽管此项云南研究的作者希望工人们能超越同乡情结，直面更重要的技术问题，但这两个问题是互相缠绕在一起的。这不单单是因为非技术工人留恋乡村社会的问题，而是技术工人常常炫耀其更为城市化和工业化的背景的问题。还因为“技术”一词的定义是主观性的。正如查尔斯·蒂利 (Charles Tilly) 所说：“技术是一种社会产品，一种谈判的身份。尽管知识、经历和聪明都与技术密切相关，但技术最终并不取决于单个工人的特性，而是取决于工人和雇主的关系；技术工人很难被取代或是可有可无，非技术工人很容易被取代，或有或无均无大碍”。<sup>④</sup>

当绝大多数雇员都是江南籍人时，地缘关系占了上风，工作能力退居其次。就像蒂利说过的，技术是“一种建筑在社会基础上的关系”，它的定义外延甚广，远不止于工厂的主观要求本身。这个定义过程不单单是雇主偏爱的结果，而是反映了技术工人严格控制进入某个行业的潜力。作为必备知识的垄断者和向那些需要知识的工作提供工人的看门人，工匠在形成与其技术相联系的标准时发挥了关键作用。在这样一种体制下，同乡关系很容易被视为一种必不可少的因素。

虽然与现代机器业联系在一起，工厂技术工人几乎与其来自乡村的非技术工人同伴一样，仍然生活在一个封建的环境里。并不是现代性，而是特权地位给了工厂工匠先锋队的角色。

工厂兴旺和地位,加上公共组织及其发挥的作用,就具备了工匠进行激烈反抗的条件了。

工匠在上海共产主义工人运动中的显著作用并未脱离常规。琳达·夏弗(Lynda Shaffer)在湖南省找到了可以对比的情形。琳达在其对中共湖南劳动组合书记部领导的四次罢工研究的基础上,得出结论:“在共产党领导的湖南工人运动中,工匠或其他传统型工人扮演了领导角色;也许,其他省份的情况也是如此。”<sup>⑤</sup>值得注意的是,在天津——一座工人表现十分本分的城市——盖尔·赫尔沙特(Gail Hershatter)发现,工匠所得津贴甚少,以至很难将他们与非技术性工人相区分。工匠和工厂工人一样,都与被称之为家乡的华北乡村保持着密切关系。<sup>⑥</sup>天津“贵族工人”的缺乏,伴随着该市作为重要的工业都市而缺乏活跃的工人运动,可能不仅仅是巧合。\*

工厂工匠与共产主义工人运动之间联系的一个例外是珠江三角洲。那里的工人政治性很强,但往往是站在国民党一边,而不是站在共产党一边。例如广东机工协会——从1911年辛亥革命以后就与国民党人保持着密切关系<sup>⑦</sup>——在20世纪20年代对共产党的动员工作一直持公开抵制态度。正如陈明铨指出的,在这一时期,几乎所有国民党工运领袖都是广东人,而且他们都是在当工人时作为同县或同乡人一起做工的。相反,共产党往往

\* 1918 - 1926年间,据一位中国学者的计算,天津只发生了14次罢工,与同时期上海发生的638次罢工形成了鲜明的对照。见《近八年来国内罢工的分析》,载《清华学报》1926年8月。这种差异可能与两个城市工人力量的悬殊有关。1928年,上海产业工人的数量据估计有222670人,而天津只有47519人。见Maxwell S. Stewart and Fang Fu-an. "A Statistical Study of Industry and Labor in China," *Chinese Economic Journal* 7, no. 4 (1930): 1083, 1087.



是外来人,无法渗入适宜国民党领导的工会生存的工匠行会。<sup>⑧</sup>在这种情况下,地缘政治和政党政治(在服务于国民党的广东工运组织的操纵下)将当地工匠剥离于共产主义事业之外。然而,从比较中不难看出,这种情况并不多见。

## 工匠和欧洲工人运动

对欧洲工人的最新研究,明确界定了特权工人在工人阶级抗议之增长和激进化过程中的关键作用。从汤普森的《英国工人阶级的形成》开始,一批卓有成效的研究均倾向于认为,在欧洲的工人运动中,技术性工匠是斗争的先锋。<sup>⑨</sup>对于这种现象有各种各样的解释。有一种说法强调的是工匠的社会网络。同行业工人居住毗邻,常常相聚于非正式的聚会场所:在英国,常常是小酒馆或音乐厅;在法国,则是咖啡馆或是有歌舞表演的餐馆;在中国,就是茶馆之类的地方。这些场所既为工人抗议提供了传播公众不满的机会,也是组织的中心。<sup>⑩</sup>此外,到19世纪中叶时,工匠们为了发展其事业,组成了许多互助团体。<sup>⑪</sup>这些组织在圣诞节举行宗教仪式,在其成员遇到丧葬、疾病和其他个人困难时提供帮助(这种情况与上海的会馆公所如出一辙)。

243

第二种说法揭示了技术工人的流入问题。工匠数量的相对繁荣,为互助组织提供了可靠的后备源,互助组织的壮大又为工会的充分发展打下了基础。积储于这些组织的钱财又为维持长期罢工准备了经济条件。<sup>⑫</sup>

技术工人集中的劳动条件也常被人认为是促使他们走向政治行动主义的一个附加因素。这一点对作为前工业化时代工匠的工厂匠人确实如此。正如埃立克·霍布斯鲍姆(Eric Hobsbawm)所注意到的,在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机器工人“成为世

界上绝大多数国家富有战斗精神之工人运动的当之无愧的领导者”。米切尔·汉纳根(Michael Hanagan)也看到,“工厂之工匠,没有什么地方比机器制造业更多了。尽管被圈在工厂的围墙里,机器工匠仍与以前在小作坊里一样我行我素。”<sup>⑤</sup>实际上,这种现象在第一次世界大战前的半个多世纪就出现了。1851年,图卢兹警方在竭力解释工厂机器工人为什么“几乎都是社会主义分子”时指出,他们的宣传工作那么快捷便利,主要是因为他们都集中在大车间里。<sup>⑥</sup>

作为工作关系密切——还有学徒制的盛行——的结果,技术工人对其职业感到自豪。他们习惯于稳定的工作和优厚的待遇,对雇主的要求甚高。对自身经济价值的认识促使这类工人常常与资方较真。<sup>⑦</sup>杰弗里·海杜(Jeffrey Haydu)指出:“技术工人总是想凭借其在生产中的关键作用对雇主施加更大的影响,并为自己被取而代之以制造更大的麻烦。由于人数较少,在车间里活动的空间更大,他们在发泄不满、提出要求和协调行动时,遇到的麻烦要比非技术工人少。”<sup>⑧</sup>虽然工厂工匠是工人阶级内部的一个特权阶层,但他们常常把自己视为整个工人阶级的代言人。在他们的脑子里,“工匠觉悟”与“阶级觉悟”这两个概念并不必然是矛盾的——所谓“工匠觉悟”,就是某个特定技术群体对集体利益的认识;所谓“阶级觉悟”,就是人们对自己及工人阶级其他阶层的共同利益的认识。<sup>⑨</sup>

绝大多数技术工人与非技术工人不一样——后者与城市的联系常常是暂时的、不稳定的,他们则习惯于城市生活。作为城市社会的永久居民,他们不单对工厂,同时也对公共事务感兴趣。大多数工匠都受过良好的教育,进一步刺激了他们的政治化

244 倾向。\*工匠不但有着响当当的城市化、工作稳定、受过教育、充满自豪感等特性,在工人阶级的战斗性方面,表现也特别突出。很多学者都在研究中指出了这一点,如娜塔莉·戴维斯(Natalie Davis)以印刷业为对象的研究,罗伯特·贝祖查(Robert Bezucha)以丝织业为对象的研究,埃立克·霍布斯鲍姆(Eric Hobsbawm)和琼·斯各特(Joan Scott)以制鞋业为对象的研究。<sup>⑧</sup>我们有必要回顾一下上海几位最活跃的共产党工运领袖的背景:陈云曾在该市最大的印刷厂商务印书馆做过学徒;张祺是上海前丝织业巨头美亚绸厂的熟练工匠;从北方南下的刘长胜曾是一名制鞋工。

但是,如果工匠们在组织上和文化上的条件都已具备的话,那么,是什么因素激发了他们的战斗性呢?有鉴于以往学者只是强调机器生产给工匠带来的是失业和苦难,最近的研究提出了不同看法。首先,机器的引入并不总是对工匠构成威胁。正如威廉·塞韦尔(William Sewell)已经指出的,工厂的增长没有降低,反而增加了对工匠及其产品的需求。<sup>⑨</sup>另外,生活水平的下降和凝滞很少能激发罢工浪潮。<sup>⑩</sup>

然而,罢工确实反映了因工业发展而带来的重大变化。许多分析家认为,工匠激进主义的最初爆发并不是在“第一次工业革命”——当时在城市工人中引进了大量女工和童工,而是在“第二次工业革命”——当时出现了半技术性、工厂培养的男工。在

---

\* 1908年的莫斯科调查显示,技术工人——绝大多数都是机器工人——有文化者约占90%,与纺织工人比起来,他们的城市生活经历更久(以其城市出生者的百分比来衡量)。参见 Diane Koenker, *Moscow Workers and the 1917 Revolution* (Princeton, N. J., 1981)。正是这类工人——有技术、收入高、有文化、生活城市化——在20世纪初年俄国发动了一波又一波的罢工。见同前, pp. 76-78.



后一阶段,工匠历来对技术的垄断受到了挑战,他们的怒火被激发出来。此后又是弗雷德里克·泰勒(Frederic Taylor)科学管理方法(即所谓“泰勒制”——译者注)的引进——资本家试图以此将工匠的立身法宝即自主性劳动过程连根拔除。这些生产体制上的变化有助于解释早期工匠罢工的目标:劳动纪律和工厂工头,而不是工资或机器。<sup>②</sup>

尽管这些作者没有从其观点出发,进一步对技术性工人和半技术性工人展开调查,但现在对上海的研究表明,这条途径是值得一试的。近代中国工人政治的动力大部分都可以从曾经是独立的工匠之激进主义和资方养成工之保守主义之间内在的紧张关系中追溯根源。共产党和国民党都在利用这一原生敌意的现象有助于解释两党形成鲜明对比的工运计划之优势和弱势。

245

## 半技术性工人和美国工人运动

虽然欧洲工人运动常常被视为国际比较的标准,但就上海的情况而言,把它与美国的工人情况做个比较也是可行的。两者的相似之处包括招收工人的过程——两国从一定地区和背景中流泄出来的工人都进入了一定的工作行列。就像约翰·坎布勒(John Cumbler)在讲到美国的情况时所说:

挑选、招收移民工人时,他们不同的技术和经历往往决定了其今后特定的工种。往往在移民之前便已存在的亲戚关系和朋友关系,规定了新来者进入既有的以地缘祖籍相划分的工作和居住环境……社会的人种的区分通过传统、习俗和他们原有的技术水平将工人分隔开来,又在他们目前根据人种群体相划分的生活和工作经历的基础上得到了加强。<sup>③</sup>

美国和上海一样，技术和地缘的差异也在政治倾向上反映出来。斯坦利·阿龙诺维茨(Stanley Aronowitz)在研究美国工人运动时指出，最初，社会主义者发现，他们在技术工人中的主要支持力量，要么是在本地出生的，要么是从北欧移民而来。相反，非技术工人——绝大多数来自东欧和南欧——则很少参加激进的工人运动。<sup>246</sup>

但是，无论是在美国还是在上海，都有一个以半技术性工人构成的中间群体，他们也在工人政治中发挥重要作用。由于缺乏技术工人那样的稳定性和地位，这类人往往依赖帮会网络(在美国以黑手党为代表)求得保护。帮会有助于农村移民渐渐适应城市生活。帮会还充当工人与政治家之间的中间人。19世纪与20世纪之交出现的、臭名昭著的曼哈顿民主党组织“坦慕尼(Tammany)协会”之案例，就充分说明了这种联系。

和中国一样，在美国，20世纪20年代经历了一个帮会活动向更为复杂的政治活动转化的过程。当时该国的禁酒，就像中国的禁烟一样，有助于加强政治家和帮会之间的联系。<sup>247</sup>为了换取政府对其非法勾当的保护，帮会分子答应发动工人支持政客。<sup>248</sup>1923年，《纽约时报》曾对旧式黑帮手法的终结发出哀叹，并带着赞赏的口吻谈论其新手段——刻意插足工人问题——的出现。<sup>249</sup>

有组织的犯罪染指卡车司机工会\*就是这种趋势的先兆。还在四轮马车时代，声称代表车夫利益的该工会创立伊始，便已贿赂公行。有位出道不久的黑帮分子在解释黑帮对美国运输工

\* 此处“卡车司机工会”之卡车司机的英文为 Teamsters，即运货马车夫的意思。——译者注

人的控制情况时说：“每个工人都是一个处于危险境地的小人物，所以很容易恐吓得手。”敲诈勒索和保守政治是这类工会的标记。在20世纪50年代初，凡是被怀疑为同情共产党的人，就是被开除的理由。<sup>②</sup>

卡车司机工会之臭名昭著随着工会活动分子吉米·霍法(Jimmy Hoffa)受到底特律紫社(Purple Gang)和芝加哥黑手党的青睐而至于极点。霍法凭借黑帮关系被推上政治舞台的情形，与依靠工人和帮会而日益闻名的上海闻人杜月笙及陆京士、朱学范相去无几。对所有这些人来说，帮会关系是他们迅速攀升的阶梯。霍法追求社会名望的心思在他最后一次对其工会信徒的演讲中表现得十分露骨：“我的儿子女儿刚刚大学毕业。无论是对我们霍家还是对我妻子波齐瓦克(Poszywak)家来说，这可是从未有过的大事。对我岳父岳母来说，对我父母来说，都没机会读大学。正是美国制度之伟大，才使我从一个看仓库的站到这里来，才使我妻子从一个洗衣妇得到了她现在的位子。”<sup>③</sup>所谓“伟大的美国制度”，实际上不是别的，就是黑手党。霍法家族上升的机遇与杜月笙家族利用青帮关系上升的情况如出一辙。杜月笙修建家庙以及让儿子接受高等教育同样是为了追求社会名望。<sup>④</sup>

对普通工人来说也是一样，保护与被保护的帮会关系既是进步的阶梯，又是恐怖的陷阱。正如霍法所说：“个人关系是接受服务的关键，帮助下属是我们做买卖的惟一原因。至于政治的和社会的关系，并不那么重要。我想，司机们并不希望我在为他们主持什么社交聚会，或是在广播里讲什么德国做错了什么，意大利做错了什么。我们所做的就是出卖劳力。我们要尽量敲定最好的价钱。”<sup>⑤</sup>

帮会通过公开否定政治兴趣来赢得半技术性工人的支持，<sup>247</sup>而在同时，他们的工会又在竭力构筑与当局的关系。正如安东·



布洛克(Anton Blok)在分析黑手党时所说,黑手党与普通土匪相区别的关键是,前者与执掌权柄者之间是共生的关系。在联系政客与普通人之间的保护和被保护网络中,黑手党成员扮演着政治中介或权力掮客的角色。<sup>④</sup>半技术性工人由于地位不稳——他们的未来有赖于城市,但他们在为自己争取永久性城市空间的斗争中并没有得到什么好处——使得他们特别容易接受这种有组织的犯罪。作为资方养成工,他们没有技术工人那种自治性行会传统,很容易成为强调经济利益而非政治抵抗的黄色工会中人。

## 非技术性工人——农民与工人运动

如果说工匠天生就能响应激进派工人领袖的号召,而半技术性工人与保守派工人领袖则相伴而生的话,那么,非技术性工人与无论哪一种政治类型的组织都缺乏密切联系。这类工人对农村的亲近甚于城市,他们倾向于按照旧习惯采取突然而简单的行动,一遇苗头不对就打退堂鼓。<sup>⑤</sup>他们的抗议很少产生持久的政治组织。

非技术性劳动者割不断的乡村关系遭到了其城市同伴的歧视。就像有位俄国机器工人在世纪之交说过的一番话一样:

人人都知道机器工人占尽优势,高人一等……纺织工人的古怪外表却令人感伤。他们当中的许多人还穿着农民的服装。他们看起来就好像是走错了路而徘徊于城市街头的乡巴佬,明天就要寻找回家乡的路。妇女在其中占了多数,人们一见到这些人,就露出不屑一顾的表情。与纺织工人相比,机器工人完全是另一类人,他们已经习惯于都市生活,更具有独立性。<sup>⑥</sup>

由于对未来城市生活缺乏信心，这些农民—工人难以成为工会主义者的依靠力量。正如戴维·曼德尔(David Mandel)在其对俄罗斯的研究中指出的：“在彼得格勒工人阶级中，非技术性工人是最不活跃分子。”<sup>98</sup>

248 当非技术性工人真的走上街头时，他们的抗议常常不由得使人联想到乡村的集体行动。查尔斯·萨贝尔(Charles Sabel)曾对1973年克罗根(cologne)的福特汽车制造厂的罢工作过描述，当时工厂各大门都被来自土耳其各乡镇的农民移民所占据。他说：“这些移民的斗争方式——在他们占据的工厂里跳舞欢宴，他们的妻子也加入了纠察队的行列——与其说是工业化时代的冲突，还不如说是传统的乡村冲突。”<sup>99</sup>

几乎所有工人史学者都认为，不同技术层次的工人之间的合作不是工业化过程的自然结果。<sup>\*</sup>实际上，在相当程度上，工人的历史就是工人之间互相冲突的历史。<sup>100</sup>然而，尽管在绝大多数城市中的技术性和非技术性工人之间存在巨大差异，两者之间的联合并非不可能。大规模罢工浪潮(如五四运动、五卅运动和内战时期上海工人的斗争等)正是依赖于这种合作。在俄国革命时，黛安·柯恩克尔(Diane Koenker)指出：“机器工人帮助催化，将他们的激进主义传导给技术含量较低的纺织工人，激发他们的行动主义。”<sup>101</sup>史蒂夫·史密斯(Steve Smith)解释道：在革命过程中，这两个群体扮演着不同的、但在很大程度上是互补的角

---

<sup>\*</sup> Charles F. Sabel, *Work and Politics: The Division of Labor in Industry* (New York, 1982). 例如，萨贝尔指出，技术性工人和非技术性工人对什么是公平工资有着很不相同的理解。农民—工人往往反对工厂的工资分类原则，认为工资应当按照工人劳动量的比例而不是按价值来支付。技术工人——其劳动创造了更大的价值——自然与他们的观点相反。

色。那些发动工人运动的都是“干部”工人，特别是机器工人，因为他们有较多自由支配的时间和金钱，视厂如家，文化水平较高，有参加非正式团体的经历，有责任心，所以能积极参加工运和政治活动。另一方面，新工人的举动比起“干部”工人来更为狂暴，因为他们糅合了低工资工人的种种不满、贫农的愤怒、女工和童工所遭受的特别沉重的压迫。<sup>249</sup>

## 无产阶级罢工的意义

是什么原因使工人们克服差异、进行共同的斗争？许多分析家强调刚刚萌芽的阶级觉悟之重要性——克服既有差异，将技术性和非技术性工人团结起来采取阶级行动。对早期社会主义革命理论家如马克思、苏莱尔 (Sorel)、列宁和托洛茨基来说，总  
249 罢工是工人阶级之阶级觉悟产生的戏剧性预兆。\*虽然目前许多论者喜欢用其他词汇来取代“阶级觉悟”一词，例如“反抗的亚文化”或是“团结文化”之类，但其内容仍是人们所熟悉的：只有当工人们认识到他们有着作为被剥削的劳动者共有的处境，超越他们之间的差异，他们才有可能采取争取改善其利益的政治

---

\* 马克思把经济斗争向政治斗争转化过程中的罢工视为无产阶级军火库的一件重要武器。见 Karl Marx, *On Revolution*, ed. Saul K. Padover (New York, 1971), p. 61. 对乔治·苏莱尔 (Georgs Sorel) 来说，罢工表达了无产阶级“最高贵、最深厚、最激动人心的感情”。见 *Reflections on Violence* (New York, 1961). 列宁在强调只有外来的革命者才能将真正的无产阶级觉悟灌输给工人的同时，又把 19 世纪俄国的罢工视为“酝酿中的阶级斗争”。见 *What Is to be Done?* (Beijing, 1975), p. 36. 对列昂·托洛茨基来说，罢工是无产阶级内在激进主义的显示，也是比较落后的工人被卷入阶级冲突大漩涡的一种方式。见 *History of the Russian Revolution* (London, 1967), 2: 243.

斗争。\*

总罢工是不是表现了源自对工人被剥削的认识而产生的政治行动主义呢?可以肯定,大规模罢工反映了更广范的经济和政治背景。可以说,国家繁荣与罢工浪潮是紧密相连的。<sup>⑨</sup>但是,国家繁荣并不总是伴随着工人自身生活水平的改善。特别是常常与经济增长相伴而生的通货膨胀可以被视作无论是待遇较好还是待遇较差的工人都会产生不满的一种警报。然而,正如詹姆斯·克罗宁(James E. Cronin)指出的,通货膨胀问题是在消费点上而不是在生产点上使工人们团结起来。当工人在工厂里被技术、性别和人种区分开来的时候,在市场上,所有的工人都是遭受通货膨胀负面影响的消费者。<sup>⑩</sup>当然,发生在第一次世界大战和内战时期上海的罢工浪潮就与当时的通货膨胀密切相关。

政治因素也可能激发罢工浪潮。就象像德华·肖特(Edward Shorter)和查尔斯·蒂利(Charles Tilly)发现的那样,政治危机——和经济繁荣一样——容易提高跨行业罢工活动的水平。<sup>⑪</sup>在1905年的俄国,“血腥星期日”的悲剧使沙皇统治人心大失,在城市技术性以及非技术性工人中激起一波反抗大潮。<sup>⑫</sup>在中国,“五卅”悲剧也有着相同的催化作用。很有意义的是,20世纪中国的政治危机常常包含民族主义的因素。五四运动是因为第一次世界大战后日本的侵略而引起,五卅运动同样是由针对英日帝国主义的愤怒而引起,内战时期的抗议则涌动着反美情绪。就

---

\* Richard Jules Ostreicher, *Solidarity and Fragmentation* (Chicago, 1986), p. 60, 作者认为,“如果存在一个有力的工人阶级的话,不同的工人阶级文化就会汇合成一种超越人种差异的工人阶级反抗的亚文化。” Rick Fantasia, *Cultures of Solidarity* (Berkeley, Calif., 1986), p. 238. 作者认为,“团结文化……能够破除工人之间的地位差异,更大范围地团结起来。”

250 像经济竞技场的通货膨胀问题一样，政治竞技场的民族主义问题以一种超越工人分裂的方式将城市居民动员起来。男人和女人，北方人和南方人，有技术的和没技术的——全都加入到反对外国人压迫的斗争行列中来。正如上海一位纱厂工人回忆五卅运动的情形时所说：

当时反帝情绪不仅盛行于工人当中；所有在上海的中国人都有这种情绪。罢工时，甚至连警察、掏粪工人、外国人家中的仆役以及厨师无不参加进来。这当然是一场群众运动。共产党以前从来没能激发出这种情绪。当人们听说外国人杀害了我们一名中国人时，都被激怒了，觉得我们必须起来反抗。<sup>9</sup>

工人们发动罢工并不总是为了爱国的目的；如同我们在前面的个案研究中所见，在激发工人战斗性的原因上，企业的外资性质并不比企业的繁荣及其工人的构成更重要。工人们也不因为通货膨胀的压迫就立即起来反抗；同伴的被开除或是管理措施上的变更更容易刺激他们的情绪。在这些激发工人骚动的更为普遍的原因里，工人们以所在的车间组织起来，而且常常是以唤起大家对雇主剥削的认识的方式组织起来。但是，这种认识并

---

\* 就像亚当·普尔泽瓦斯基 (Adam Przeworsky) 和约翰·斯普拉格 (John Sprague) 在他们关于工人阶级政治的重要著作中所指出的，情况可能是，“与决定政治行为的阶级特点有关的历史变迁，可以归因于政治党派所实施的战略。”见 *Paper Stones* (Chicago, 1986), p. 11. 但必须记住，成功的政党往往在一定程度上将其战略裁剪得当，以适应其选民的感情。工人阶级中的有些群体，最著名的如工匠，看起来对阶级召唤特别敏感。关于从合作传统走过来的工匠容易产生阶级觉悟的情况，可以参见 William H. Sewell, Jr., *Work and Revolution in France: The Language of Labor from the Old Regime to 1948* (New York, 1980), pp. 179 - 213.



不必然包含阶级团结的内容。并不那么简单的是,就象马克思和恩格斯清楚地认识到的,“要把无产者变为一个阶级,然后再变为一个政党,总是要受到工人自身之间竞争的困扰。”<sup>90</sup>可是,无产者的行动主义(罢工的发动和政党的形成)常常就是这种工人内部之间竞争的产物。

合理选择论者迫使我们面对横亘在集体行动道路上的障碍。即使当人们分享他们所看到的共同利益时,由于缺乏信任可能妨碍他们采取一致行动。<sup>91</sup>在同一容易导致工人阶级分裂的人种/性别/技术的群体里,信任更有可能产生,自由散漫更容易克服。同行业无产阶级的倾向看起来会按照这些阶级内部的(往往是竞争性的)群体来划分,而不是按照某种通向阶级团结的进步道路发展。绝大多数工会、罢工和政党都是建立在这种或那种阶级内部团结的基础上的。\*

换句话说,工人的战斗性并不等同于阶级觉悟。确实,正是看到了工人内部实际存在的差异,才常常使工人行动主义受到了鼓舞。工人们依赖于他们所处的工作地位,在力图缩小、维持或扩大他们自己与其他工人之间在工资或工作条件上的差别时,往往显示出斗争精神。<sup>92</sup>即便是在不同技术和工资水平线上的工人开展联合斗争的重大案例中,他们的联合也不必定反映阶级觉悟。<sup>93</sup>就上海的情况而言,如同前述,通货膨胀和民族主义激发了多次大规模罢工。这类事件的参加者都是以消费者或市民的身份出现的,而不是作为阶级的成员出现的。而且,导致大规模斗争的动员通常都是建立在原已存在、规模较小的组织的基础上的。只有将虚拟的血缘关系、地缘关系、秘密结社之类引人合作,才可能有大动作。正如戴维·斯特兰(David Strand)在研究20世纪20年代北京的情况时所说:“群众组织并非一个能打破基于地位、地缘或不同工种等而产生的障碍的解决办法,而

251



只不过是公共场合展示其分裂的机会。”<sup>49</sup>

克雷格·卡尔洪(Craig Calhoun)说：“传统团体给了其成员开展持续斗争的社会力量，给了他们保证全体参加的‘选择动机’，给了他们一种为什么而战、并且是立竿见影的感觉。”<sup>50</sup>卡尔洪加入了当前否定马克思的时髦潮流，认为传统工匠和农民比起现代工厂工人确实更具革命性（因为他们原本就有团体），后者的工会和党派不可避免地要受到资本主义制度的影响。但是，在“传统”的工匠或农民与“现代”的工厂工人之间真那么容易划出一条界线吗？<sup>51</sup>我要说的是，工人阶级行动主义在很大程度上植根于前工业化时代长时期形成的习惯之上。正如赫尔伯特·古特曼(Herbert G. Gutman)所说，工人阶级仍然与前工业时代的传统紧密地联系在一起，“家庭、阶级和人种等关系不可能轻易化解。”<sup>52</sup>

252 技术因为作为“一种建筑在社会基础上的关系”而成为工人政治的一个强有力的预言者，它常常与长期的文化与组织习俗联系在一起。技术水平不同的工人往往来自不同的地区，熟悉不同形式的组织，受过不同程度的文化教育，享有不同程度的工作保险系数，对城市生活的适应程度也不同。就上海来说，江南工匠依赖茶馆文化和行会组织，经常发动罢工，以保护其传统特权。由于受过良好的教育，有较高的文化，适应城市生活，这些工人很容易接受激进学生组织者的动员，后者很多也来自江南。相反，来自华北的非技术性工人，对当时知识分子争论的问题很少有兴趣。由于缺乏教育，与城市生活联系不紧密，这类工人在言谈举止上还与农民无异。介于前两类工人之间的是半技术性工人。虽然仍然不相容于“精致”的江南文化，但这些来自北方的机器工人倾向于在容纳他们的城市生活下去。因为他们的背景严重限制了他们升迁的机会，半技术性工人便转向秘密帮会寻求

帮助。

反映各自背景的技术性、非技术性和半技术性工人,虽然倾向各异,但并不能冲淡其历史意义。即使工人们没有显示出阶级觉悟,但他们仍在扮演着重要的政治角色。半技术性工人,通过他们与帮会和国民党的关系,有助于界定国民政府的特征。技术性工人,通过他们与共产党工人运动的联系,成为城市革命发展中的一个关键因素。非技术性工人,尽管他们对两个相互对立的政党相对缺乏兴趣,但他们在改变近代中国历史的大规模抗议中是重要的参加者。无论是国民党政权还是共产党政权,都是紧接在技术性、半技术性和非技术性工人共同参加的罢工之后建立的。

植根于其成员色彩斑驳的生活环境和工作经历,上海无产阶级显示出多重战斗性。绝大多数学者,无论是中国的,还是外国的,向来把“中国工运史”研究限定在“中共党史”的范围内。<sup>⑤</sup>谢诺(Jean Chesneaux)把现代中国工人运动阐释为阶级觉悟的觉醒,并认为这是中国共产党领导的结果。<sup>⑥</sup>根据这种观点,中国工人阶级的形成,在很大程度上是外来指导的结果。安德鲁·瓦尔德(Andrew Walder)以同样的角度观察当代中国工人运动,提出在社会主义政党/政府的政策指导下工人阶级的“重塑”问题。<sup>⑦</sup>这些分析强调了共产党在塑造以及重塑一个先是有阶级意识的、后来是依附性的工人阶级过程中的决定性作用。

本书在对上海工人的研究中对这些观点提出了质疑。中国工人的形成在一定程度上受到了其背景文化和工作地位的影响,他们不是党派陶工手里的陶土,可以随意捏弄。原有的经历虽有局限,但也开启了不同的工人群体开展不同形式的政治之可能性。我认为,中国工人运动之动力,在很大程度上是这些各

253



具特色的倾向相互作用的结果——其中只有一种倾向的主体被证明是共产党的忠实盟友。

## 中国工人运动的遗产

探讨工人运动的历史，对我们了解当代中国政治有着重要的借鉴作用。我们将在本书研究的第二卷中看到，共产党人，就像他们之前的国民党人一样，很快就会明白，在国家权利得到巩固之后，不能忽视一支政治化的工人力量的存在。相反，他们不得不面对某些新的矛盾。

尽管有人说中国工人阶级被共产党政府改造过了，但千万不要忘记，在 20 世纪 50 年代和 60 年代，制定共和国政策的许多官员都是从前工人运动的积极分子。陈云，50 年代中期工商业社会主义改造的主要设计者，当他 20 年代在商务印书馆当学徒时就加入了共产党。馆内的激进工会——陈是其中的一位积极分子——是从早于共产主义运动之前很久的印刷工人行会演变而来的。<sup>⑤</sup>陈云来自江南，是上海早期参加共产党工人运动的许多人中的一个典型。（大跃进时，他主持制定的政策受到冷遇，便以写有关其家乡江南地区的戏剧传统的文章打发日子。<sup>⑥</sup>）国家主席刘少奇，是在一个面向工人的工学计划里接受教育的，其政治生涯的第一步，是在上海以工运组织者的面目出现的。周恩来总理曾经在 1927 年 3 月成功地领导了第三次上海工人武装起义。皮革工人出身的刘长胜，在抗战时期和内战时期负责上海的共产党工人运动，曾经在 1949 年担任中华全国总工会副主席。张祺是江南籍熟练织工，作为上海地下团组织的成员参与领导了 1934 年美亚绸厂的罢工，后来担任上海市总工会主席。即使是邮务工人出身、参加过帮会的朱学范，建国后担任邮电部

长,参与制定社会主义建设政策。作为杜月笙插手工运事务的主要助手,朱学范在产业领域积累了丰富的经验,1949年后,他开始把这些有价值的经验转而应用到新政权的建设中去。后来,上了年纪的朱学范作为民革中央主席在全国政协里担任要职(按:朱学范已经在几年前去世——译者)。

共产党新政权为这些从前的工运组织者提供了机会,他们在制定国家政策时扮演了关键角色。考虑到技术工人在革命运动中发挥过的重要作用,他们在1949年以后得到优厚的工作保障和福利待遇——这些都是全世界工匠拥有或希望拥有的——就不令人感到奇怪了。<sup>⑥</sup>

富有讽刺意味的是,在最能说明社会主义制度的工业经济中,工匠遗产成为最显著的一部分,即国有企业。这种企业组织形态保障了工人的工作、高工资和良好的福利待遇。正因为有了这些好条件,人们常把国有企业的工作称为“铁饭碗”,与之相对应的便是集体企业不那么持久、不那么称心的“泥饭碗”。<sup>⑦</sup>

共产党企业的排他性和家长式管理容易使人联想到工匠行会。要进入这些对其职工提供终身保险和特权的工厂工作,必须通过亲戚朋友的介绍。就像早先的行会一样,社会主义企业也对其成员规定了一定的行为准则。<sup>⑧</sup>但是,传统行会只不过依赖行业神的权威来实现其价值,而新型国有企业却从共产党的合法统治中伸张权威。

在各个省市,国有企业职工的特权受到当地总工会即政府分管工人事务的分支机构的监督。\*就上海而言,该市总工会的

---

\* 20世纪50年代初,上海市总工会主席同时也是该市中共市委副书记。参见 Paul F. Haper, "Trade Union Cultivation of Workers for Leadership," in *The City in Communist China*, ed. John Wilson Lewis (Stanford, Calif., 1971), p. 125.



位子一直由以前的共产党工运积极分子占据，其中绝大多数人都来自南方工匠行列。

如果说共产党新政权充分体现了技术工匠的许多优点的话，其他遭到压抑的工人不可避免地会产生不满。对国有企业老工人特权的怨恨，是激发1949年以后工人动乱浪潮的重要因素。

255 早在1956-1957年间，在百花齐放运动的刺激下，成百的工厂爆发了罢工。这些工人罢工很多都是由边缘工人——临时工、合同工、服务业人员、学徒以及其他享受不到国有企业技术性老工人之特权的工人——发动的。<sup>⑥</sup>无论当时如何喧闹，国有企业工人与临时工、合同工之间的裂缝在后来的岁月里并未消弭。<sup>⑦</sup>

1966-1967年“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期间，严重的斗争又重新在全国各地工厂爆发出来。在上海，国有企业老工人中充斥着所谓保守的“红卫兵”，这些人主要来自江南，都曾经历过1949年以前的工人运动。他们的领导人很多都是以前地下党的工运组织者，也都来自江南地区。相反，革命造反派绝大多数都是年轻工人，部分人由20世纪50年代初期从苏北南下的干部领导。造反派中，有不少人是非技术性的合同工和临时工。<sup>⑧</sup>对于没有特权的工人的造反动机，琳·怀特(Lynn Whyte)解释道：

最初，失业工人和合同工并没有被历史学家的错误、小说家的思想或是音乐家的宗旨激起狂热反应——虽然正是激进派在1965年底1966年初炮制的有关这些问题的社论导致了“文化大革命”。然而，失业工人对他们不喜欢的政治领导人还是有些看法的。当上海市长曹获秋之类人物——他们曾经拥护过“工农制度”——因为在文化政策上犯错误时，在下层无产阶级中开始激发出一些热情。<sup>⑨</sup>

老厂最紧张的是派别之争,那里在1949年前就有不少积极分子,并明显存在着特权工人与年轻工人的区别。在这些厂里,不仅在工作待遇上存在着明显的不平等;至于令人骄傲的工人罢工的光荣历史,也只有老工人才有资格夸称。当老一辈“革命英雄”在厂史室大讲自己的辉煌经历时,两代之间的对立情绪便不可避免地产生了。

老工人对新工人的不满,在20世纪50年代中国历史工作者对从前的工运积极分子的采访中即已显露出来。被采访者经常在其谈话中流露出对年轻一代的批评。一位纱厂老工人称:“现在的年轻人对我们过去的艰苦奋斗根本不理解。他们总是抱怨工资低,待遇差。……青年工人要是在工作中掌握了一些技术,就要翘尾巴,自认为老子天下第一。……年轻人总以为自己受过教育,把老工人都看作是没文化的人。”<sup>⑤</sup>

256

耳朵里不断听着老工人唠叨他们以往岁月的革命功劳,青年人便产生了寻找机会拉平比分的渴望。文化大革命给他们提供了这种机会。然而,十分有趣的是,年轻的革命造反派在他们自己的斗争中所采取的方式,与老一辈的反抗内容有很多相似之处。<sup>⑥</sup>上海国棉十七厂——王洪文的发迹之地,在20世纪20年代中期曾是工人发动暴力的场所,“文化大革命”时成为斗争的策源地,历史与现实何其相似,可能并非巧合。在1925年发生在该厂的一次事件中,工人们将一个人人痛恨的工头骗去参加一次群众大会,对他进行了公开声讨。这个倒霉的工头被迫跪在众人面前,双手被反绑着,头上戴着高帽子,胸前挂着一块大牌子,上面写着“打倒走狗卖国贼”!工人们还将这个工头的狼狈样拍成照片,挂在厂门口,警告厂方不得恢复其职位。<sup>⑦</sup>

“文化大革命”中,当激进派工人采取同样的策略时,他们的斗争矛头指向了老一辈和总工会之类的组织(在共产党新政权

里,这些组织拥有特权地位)。在1967年的上海,以王洪文为首的革命造反派对从前的中共地下党工运组织者、后来是上海总工会的领导人发起了一连串的进攻。担任上海市总工会主席、解放前曾任中共上海地下党书记的张祺,被迫在群众斗争大会上不断遭到羞辱。她的双手被紧紧反绑着——当时叫做“坐喷气式”,头上戴着高帽子,胸前挂着写有“走狗”的大牌子——因为犯下了“修正主义罪行”。当年12月,张祺被关进了她亲自监督建造的总工会大楼的地下室。<sup>⑥</sup>虽然张祺是“文化大革命”的幸存者,而且身体还很好,但她的许多战友就没那么幸运了。最近有资料显示,在造反派对上海总工会的攻击中,受迫害者很多都是以前的地下党干部,其中绝大多数是来自江南的技术性工匠。<sup>⑦</sup>

257 只有反观国民党时代的工运历史,我们才有可能理解“文化大革命”的裂痕。国民党在其统治初期,在处理工运事务方面,采取了更为主动的姿态。无论是国民党还是共产党都在大力气争取工人阶级的支持。两者都力图把工人行动主义变为政府控制的组织:国民党控制下的黄色工会,共产党控制下的总工会。两者都在国家政权巩固后对工人中的冲突抱一种矛盾的心理。\*两者都意识到并且成功地把工人领袖吸收为政府官员。(王洪文及其革命造反派在1967年“一月风暴”之后的飞速攀升,不禁使人联想到1927年四一二政变之后青帮工运领袖的飞黄腾达。)更有甚者,两个政权的中央领导都被迫削弱由工人参加建立的新政治组织:1927年春第三次工人武装起义之后建立的上海临

\* 毛泽东于1957年2月发表的《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中,针对前一年爆发的罢工指出,要加强教育,要改进领导方法。1957年春,刘少奇提出,工会和党员干部应该更勇敢地亲自投身到罢工中去,重新赢得工人的信任。参见 Joint Publications Research Service, #41889, p. 58.



时市政府，以及1967年1月夺权风暴之后建立的上海人民公社。后者还受到了毛主席的严正指责：“成立公社，就会产生一系列问题。……在镇压反革命的问题上，公社没有那么大的力量。如果什么事都由公社来管，那么把党放到哪里去了？……必须要有一个党，必须要有一个核心，……不管它叫共产党，……还是国民党，……必须要有一个党。”<sup>69</sup>对毛泽东来说，就像对蒋介石来说一样，一支政治化的工人力量可能是一个有用的盟友，但也有可能对政府控制构成潜在的威胁，无论是得到资产阶级拥护的国民党政权，还是声称无产阶级专政的社会主义政权，都是一样。

尽管共产党政权无疑比其前任要强大得多，但当前的中国政府与其社会力量相比还没有做到完全自主。这并不是说，现在的政权就是工人政府，就像国民党是上海资产阶级的一个委员会一样。但它有可能竭力行使专制统治，政府不得不面对各种社会势力可能产生的反抗。政府必须与这些势力达成妥协，其中工人阶级应该是优先考虑的对象，因为他们在历史上的反抗给人的印象太深刻了。因为在政治上利用过工人运动，1949年以后的中国领导者一直对工人阶级的影响十分警觉。今日国有企业工人所享受的特权，可以部分地解释为政府对这一处于战略地位的群体潜在的经济、政治力量的认同。<sup>\*</sup>

258

和过去一样，工人阶级仍然存在分裂。<sup>70</sup>而且和过去一样，政

---

\* 1974 - 1975 年间，中国的许多工厂发生了罢工和怠工，要求发放奖金和增加工资，在当时，毛主义的正统对这种现象十分反感。杭州连续举行罢工，情况最为严重，还是邓小平亲自赶到该市，向充满愤怒情绪的工人保证实行工资改革，才将事态平息。见 Lowell Dittmer, *China's Continuous Revolution* (Berkeley, Calif., 1987), pp. 165 - 167.

治倾向和政治行动仍然可能按照分裂的界线形成。<sup>20</sup>对研究中国政治问题的学者提出的挑战是，必须追溯普通工人因来源和地方传统不同而形成的差异及其对现行政治制度所产生的影响。

### 注 释

① 这一趋向发端于汤普森 (E. P. Thompson)，见汤著 *The Making of the English Class* (New York, 1963)。对美、法、德工人运动之间差异的探讨，可参见 Ira Katznelson and Aristide R. Zolberg, *Working - Class Formation* (Princeton, N. J., 1986)。

② Kuo - Heng Shih, *China Enters the Machine Age: A Study of Labor in Chinese War Industry* (Cambridge, Mass., 1944), p., p. 14 - 15。

③ 同上，第 16 - 17 页。

④ Charles Tilly, "Solidarity Logics: Conclusions," *Theory and Society*, no. 17 (1988), p. 453。

⑤ Lynda Shaffer, *Mao and Workers: The Hunan Labor Movement, 1920 - 1923* (Armonk, N. Y., 1982), p. 210。

⑥ Gail Hershatter, *The Workers of Tianjin, 1900 - 1949* (Stanford, Calif., 1986), pp. 49 - 63。

⑦ 参见本书第 49 页脚注。

⑧ Ming Kou Chan, "Labor and Empire: The Chinese Labor Movement in the Canton Delta, 1895 - 1927" (Ph. D. dissertation, Stanford University, 1975), pp. 171, 258 - 60。

⑨ 参见导言的注 1 和注 2，以及第一部分引言的注 4。

⑩ Ronald Aminzade, "French Strike Development and Class Struggle," *Social Science History* 4 (1980): 63 - 78; James E. Cronin, "Labor Insurgency and Class Formation," *ibid*, p. 143。

⑪ William H. Sewell, Jr., *Work and Revolution in France: The Language of Labor from the Old Regime to 1848* (New York, 1980); Ronald Aminzade, *Class, Politics and Early Industrial Capitalism: A Study of Mid - Nineteenth - Century Toulouse, France* (New York, 1981);

⑫ Dick Geary, *European Labour Protest, 1848 - 1939* (London, 1981), pp. 40, 72。

⑬ Eric Hobsbawm, *Labouring Men* (New York, 1963), p. 424; Michael P. Hanagan, *The Logic of Solidarity* (Urbana, Ill., 1980), pp. 10 - 11。

⑭ Aminzade, "French Strike Development and Class Struggle," p. 76.

⑮ 约翰·弗兰奇(John French)对巴西工人的研究也证实了这一点,他发现,技术工人无论是在工会中还是在共产党里都显得特别活跃。见弗著:"Activism in the Workplace: The Not So Powerless Prevail," unpublished paper, 1991.

⑯ Jeffrey Haydu, *Between Craft and Class: Skilled Workers and Factory Politics in the United States and Britain, 1890 - 1922* (Berkeley, Calif., 1988), p. 13.

⑰ 关于这一点,可参见 Hanagan, *The Logic of Solidarity*, p. 210. Victoria Bonell, *Roots of Rebellion: Workers' Politics and Organizations in St. Petersburg and Moscow, 1900 - 1914* (Berkeley, Calif., 1983), p. 444.

⑱ Natalie Zemon Davis, "A Trade Union in Sixteenth - Century France," *Economic History Review* 19 (1966), pp. 48 - 69; Davis, *Society and Culture in Early Modern France* (Stanford, Calif., 1975), pp. 4 - 10; Robert J. Bezucha, *The Lyon Uprising of 1834* (Cambridge, Mass., 1974); Eric J. Hobsbawm and Joan W. Scott, "Political Shoemakers," in *Workers: Worlds of Labor*, ed. Eric Hobsbawm (New York, 1984), pp. 103 - 30.

⑲ Sewell, *Work and Revolution in France*, pp. 155 - 156. 正如塞韦尔所说,这种工厂和工匠工作共生关系的一个重要例外就是纺织业——新的纺织厂排挤了手工纺纱织布。

⑳ Hanagan, *Logic of Solidarity*, p. 79; Edward Shorter and Charles Tilly, *Strikes in France, 1830 - 1968* (New York, 1974), p. 76.

㉑ Cronin, "Labor Insurgency," p. 138; Hanagan, *Logic of Solidarity*, pp. 12 - 13; Aminzade, "French Strike Development and Class Struggle," pp. 63 - 78; Sewell, *Work and Revolution in France*, p. 160. 同样的关于美国情形的看法可参见 David Montgomery, "Workers' Control of Machine Production in the Nineteenth Century," in *The Labor History Reader*, ed. Daniel J. Leab (Chicago, 1985), pp. 129 - 130.

㉒ John Cumbler, "Migration, Class Formation, and Class Consciousness: The American Experience," in *Confrontation, Class Consciousness, and the Labor Process*, ed. Michael Hanagan and Charles Stephenson (New York, 1986), p. 42.

㉓ Stanley Aronowitz, *False Promises: The Shaping of American Working Consciousness* (New York, 1973), chap. 3.

㉔ 提出这一类比的是魏斐德(Frederic Wakeman, Jr.),见魏文:"Policing Modern Shanghai," *China Quarterly*, no. 115 (1988): 416.

㉕ 关于黑手党担当工运捐客之事,可参见 Howard Abadinsky, *The Mafia in*

America (New York, 1981), pp. 4 - 11; Joseph L. Alhina, *The American Mafia* (New York, 1979), pp. 143 - 144.

②⑥ *New York Times*, Sept. 9, 1923.

②⑦ Jonathan Kwitny, *Vicious Circles: The Mafia in the Marketplace* (New York, 1979), pp. 143 - 144.

②⑧ Jim Clay, *Hoffa!* (Beaverdam, Va., 1965), p. 163.

②⑨ 范绍增:《关于杜月笙》,载《旧上海的帮会》,上海,1986年,第221-225页。

③⑩ Clay, *Hoffa!* p. 163.

③⑪ Anton Blok, *The Mafia of a Sicilian Village* (New York, 1974), pp. 6 - 7, 177.

③⑫ 参见 David M. Mandel, *The Petrograd Workers and the Fall of the Old Regime* (New York, 1983), pp. 31 - 32, 其中对俄国非技术性工人的抗议模式进行了探讨。

③⑬ 转引自 S. A. Smith, *Red Petrograd: Revolution in the Factories, 1917 - 1918* (Cambridge, 1983), p. 29.

③⑭ David Mandel, *Petrograd Workers*, p. 23.

③⑮ Charles F. Sabel, *Work and Politics: The Division of Labor in Industry* (New York, 1982), p. 134.

③⑯ 参见 Richard Jules Ostreicher, *Solidarity and Fragmentation* (Chicago, 1986)。其中对底特律工人中的工资、技术水平,尤其是人种等问题的差别做了有趣的探讨。关于中国的情况,艾米莉·荷尼格 (Emily Honig) 对上海纱厂女工的分析、盖尔·赫尔沙特 (Gail Hershatter) 对天津工人的研究均对工人阶级之分裂作了详尽描述。

③⑰ Diane Koenker, "Moscow in 1917: The View from Below," in *The Workers' Revolution in Russia, 1917* (Cambridge, 1987), p. 90。同时参见 Diane Koenker, *Moscow Workers and the 1917 Revolution* (Princeton, N. J., 1981), p. 359。

③⑱ Smith, *Red Petrograd*, p. 255.

③⑲ 参见本书第二部分引言注2的有关内容。

④⑰ James E. Cronin, "Labor Insurgency and Class Formation," *Social Science History* 4 (1980): 144 - 145.

④⑱ Edward Shorter and Charles Tilly, *Strikes in France* (Cambridge, 1974), p. 104.

④⑲ Victoria Bonnell, *Roots of Rebellion* (Berkeley, Calif., 1983), p. 447.

④⑳ "朱连科访谈录",1958年5月6日,上海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工人运动档案。

④㉑ Karl Marx and Friedrich Engels. *Manifesto of the Communist Party* (Beijing,

1975), p. 45.

④⑤ Mancur Olson, *The Logic of Collective Action* (Cambridge, Mass., 1977); Russel Hardin, *Collective Action* (Baltimore, 1982).

④⑥ 关于这一观点的进一步阐述, 可参见 John R. Low - Beer, *Protest and Participation: The New Working Class in Italy* (Cambridge, 1978), p. 175.

④⑦ Haydu, *Between Craft and Class*, p. 212, 该书作者发现, 美国和英国的工人团结中往往伴随着占上风的经济主义。

④⑧ David Strand, *Rickshaw Beijing* (Berkeley, Calif., 1989), p. 196.

④⑨ Craig Calhoun, "The Radicalism of Tradition and the Question of Class Struggle." in *Rationality and Revolution*, ed. Michael Taylor (Cambridge, 1988), p. 153.

⑤⑩ 关于工匠之“传统团体”与工厂工人之“现代组织”的类似区分, 还可参见 Charles Tilly, *From Mobilization to Revolution* (Reading, Mass., 1978), pp. 62 - 64, and in Edward Shorter, ed., *Work and Community in the West* (New York, 1973), pp. 17 - 20.

⑤⑪ Herbert G. Gutman, *Work, Culture and Society* (New York, 1977), p. 41.

⑤⑫ 参见《努力开创党史、工运史资料征集工作新局面》, 载《上海工运史料》1984年第4期, 第1-7页。

⑤⑬ Jean Chesneaux, *The Chinese Labor Movement, 1919 - 1927* (Stanford, Calif., 1968).

⑤⑭ Andrew G. Walder, "The Remaking of the Chinese Working Class, 1949 - 1981," *Modern China* 10 (1984): 3 - 48. 同时参见其 *Communist Neotraditionalism* (Berkeley, Calif., 1986), p. 85.

⑤⑮ 《商务印书馆工会史》, 上海图书馆, 第1-2页。

⑤⑯ David G. Bachman, *Chen Yun and the Chinese Political System* (Berkeley, Calif., 1985), pp. 72 - 73.

⑤⑰ 瓦尔德 (Walder) 对当代中国工人对国有企业的依赖关系进行了富有创见的研究, 见 Andrew G. Walder, *Communist Neotraditionalism: Work and Authority in Chinese Industry* (Berkeley, Calif., 1986).

⑤⑱ Martin King Whyte and William L. Parish, *Urban Life in Contemporary China* (Chicago, 1984), p. 33.

⑤⑲ Walder, *Communist Neotraditionalism*, chap 4.

⑤⑳ François Gipouloux, *Les cent fleurs à l'usine* (Paris, 1986), pp. 198 - 205; 同时参见 Lynn White III, "Workers' Politics in Shanghai," *Journal of Asian Studies* 36, no. 1

(1976): 105 - 7.

① White III, "Workers' Politics in Shanghai," pp. 107 - 115.

② 对上海部分前红卫兵的访问, 1987年5月27日, 7月2日。

③ White III, "Workers' Politics in Shanghai," pp. 114 - 115.

④ “顾兴盛(音)访谈录”, 1958年5月13日, 上海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工人运动档案。

⑤ 关于在耳熟能详的反抗方式中吸取营养的重要性, 可参见 Charles Tilly, *The Contentious French* (Cambridge, Mass., 1986)。关于上海学生的研究中对这一论题进行了创造性的论述, 见 Jeffrey Wasserstrom, *Student Protest in Twentieth - Century China: The View from Shanghai* (Stanford, Calif., 1991)。

⑥ 《上海国棉十七厂工人斗争史》, 载《上海工人运动历史资料》, 上海, 1953年, 第61 - 70页。

⑦ 《上海市总工会被砸纪实》, 载《上海工运史料》1986年第5期, 第1 - 6页。

⑧ 《铮铮铁骨垂青史》, 同上, 第13 - 22页。

⑨ Stuart Schram, ed., *Chairman Mao Talks to the People* (New York, 1974), p. 278; Harry Harding, *Organizing China* (Stanford, Calif., 1981), pp. 251 - 252.

⑩ Walder, *Communist Neotraditionalism*, 1986, chap. 2. 其中对当代中国工人阶级中存在的主要社会差别(如年龄、工作保障和工资级别等问题)提出了有益的看法。然而, 在他的分析中, 这些社会群体无法解释政治网络(行动主义的、非行动主义的和对立派别之间的, 等等)。

⑪ 关于1949年以后社会差别(性别、工作保障等)与政治抗议相联系的工人运动情况, 可参见 Gipouloux, *Les cent fleurs*。

## 附录

附录 A 上海工匠罢工情况, 1902—1919 年

涉及行业	罢工缘由	资料来源
船厂(木工)	要求增加工资	《北华捷报》1902年5月21日
铸造	要求撤换工头	《北华捷报》1904年1月29日
兵工厂	要求增加工资	《中外日报》1904年6月6日
纱厂	要求撤换工头	《时报》1905年4月30日
印刷	要求增加工资	《时报》1905年11月10日
印刷	要求释放因散发反美传单而被捕的工友	《时报》1905年12月5日
煤气	要求增加工资	《北华捷报》1906年9月7日
自来水	要求发放扣留工资*	《申报》1910年7月22日
豆腐业	要求增加工资	《时报》1911年6月17日
裁缝	反对延长工作时间*	《时报》1911年7月12日
印刷	要求增加工资	《时报》1911年7月27日
铸造	要求成立工会	《太平洋报》1912年7月15日
油漆业	要求增加工资	《时报》1912年11月6日
木作	要求增加工资	《时报》1912年11月26日
豆腐业	要求增加工资	《时报》1912年12月2日
珠宝业	要求增加工资	《时报》1912年12月11日
木作	要求增加工资	《时报》1913年1月5日
铸造	要求掌握雇佣权利	《时报》1913年2月16日
制墨	要求增加工资	《时报》1913年3月8日

续表

涉及行业	罢工缘由	资料来源
铸造	要求撤换工头	《时报》1913年3月20日
印染	受工匠公所操纵	《时报》1914年3月18日
家具业	要求增加工资	《时报》1914年6月3日
石工	要求停止购买宁波石器	《时报》1914年6月19日
木作	要求增加工资	《时报》1914年8月20日
印染	要求更换公所董事	《时报》1914年9月29日
油漆业	要求增加工资	《时报》1914年11月6日
木作	要求增加工资	《时报》1914年11月19日
裁缝	要求增加工资	《时报》1914年11月30日
铜匠	要求增加工资	《时报》1915年1月17日
木作	要求增加工资	《时报》1915年2月1日
珠宝业	要求增加工资	《时报》1915年4月2日
印染	要求增加工资	《时报》1915年5月7日
印染	要求增加工资	《时报》1915年7月20日
裁缝	要求增加工资	《时报》1915年10月10日
屠工	要求增加工资	《时报》1915年12月14日
铸造	要求增加工资	《时报》1916年5月26日
油漆业	要求增加工资	《时报》1916年8月25日
兵工厂	要求发放扣留工资*	《时报》1916年9月21日
兵工厂	废除监工	《民国日报》1916年11月26日
印刷	要求成立工会	《时报》1917年3月31日
刀剪业	要求增加工资	《时报》1917年10月8日
白铁	要求解雇工头	《时报》1917年10月20日



续表

涉及行业	罢工缘由	资料来源
理发	要求增加工资	《时报》1918年1月1日
理发	要求增加工资	《民国日报》1918年1月10日
白铁	遭受门岗虐待*	《时报》1918年5月3日
木作	要求增加工资	《时事新报》1918年5月7日
皮箱	要求增加工资	《时报》1918年5月12日
草席	要求增加工资	《时报》1918年5月15日
制柜	要求增加工资	《时报》1918年5月18日
豆腐业	要求增加工资	《时报》1918年6月29日
船厂	要求增加工资	《时报》1918年7月15日
制柜	要求增加工资	《时报》1918年9月18日
皮箱	要求增加工资	《时报》1918年9月23日
丝绸印染	要求增加工资	《时报》1918年9月24日
裱糊业	要求增加工资	《时报》1918年9月27日
金属加工	要求增加工资	《民国日报》1918年11月1日
灯笼	要求增加工资	《民国日报》1918年12月9日
制伞	要求增加工资	《民国日报》1919年3月13日
图书装订	要求增加工资	《时报》1919年3月17日
机器业	要求重新雇用 被解雇的学徒*	《时报》1919年3月22日
印刷	要求增加工资	《民国日报》1919年4月5日
皮箱	因公所控制钱财	《时报》1919年4月28日
刀剪业	坚持公所雇佣制*	《时报》1919年4月29日

注:有\*号者为“防御性”要求。

附录 B 上海非技术性工人的罢工, 1898—1919 年

涉及行业	罢工缘由	资料来源
棉纺织业	削减工资	《中外日报》1898年1月10日
棉纺织业	削减工资	《时务日报》1898年6月24日
棉纺织业	扣留工资	《时务日报》1898年6月30日
棉纺织业	从计日工资变为计件工资	《北华捷报》1898年9月26日
丝织业	削减工资	《中外日报》1898年11月8日
丝织业	工友受伤	《中外日报》1899年1月25日
棉纺织业	削减工资	《中外日报》1899年6月4日
丝织业	扣留工资	《申报》1899年12月15日
丝织业	扣留工资	《北华捷报》1904年5月27日
棉纺织业	对工头不满*	《北华捷报》1905年5月5日
丝织业	削减工资	《北华捷报》1906年6月10日
烟草业	要求增加工资*	《北华捷报》1906年6月10日
自来水	要求增加工资*	《北华捷报》1906年9月3日
丝织业	扣留工资	《北华捷报》1909年5月8日
丝织业	增加工时	《北华捷报》1909年8月6日
丝织业	扣留工资	《申报》1910年1月8日
丝织业	罚款	《申报》1910年2月13日
丝织业	扣留工资	《时报》1911年1月22日
丝织业	削减工资	《时报》1911年2月9日
棉纺织业	扣留工资	《时报》1911年4月25日
丝织业	扣留工资	《时报》1911年5月30日

续表

涉及行业	罢工缘由	资料来源
丝织业	扣留工资	《时报》1911年6月20日
丝织业	削减工资	《时报》1911年8月7日
丝织业	扣留工资	《时报》1911年8月9日
丝织业	削减工资	《时报》1912年10月8日
丝织业	要求增加工资*	《时报》1912年11月2日
棉纺业	工友受伤	《时报》1912年11月2日
织布业	削减工资	《时报》1913年2月25日
造纸业	工头虐待	《时报》1913年6月16日
澡堂	经理与工头发生纠纷	《时报》1914年2月1日
棉纺业	削减工资	《时报》1914年10月9日
掏粪	颁布新的公共卫生条例	《时报》1914年10月26日
丝织业	扣留工资	《时报》1914年10月30日
掏粪	扣留工资	《时报》1914年12月8日
码头装卸	要求增加工资*	《时报》1914年12月14日
烟草	要求增加工资*	《时报》1915年2月2日
棉纺业	扣留工资	《时报》1915年4月7日
搬运业	工头之间械斗	《时报》1915年12月23日
烟草	削减工资	《时报》1916年3月10日
棉纺业	要求增加工资*	《时报》1916年12月2日
丝织业	与外方经理发生冲突*	《时报》1916年12月30日
烟草	削减工资	《时报》1917年7月21日
丝织业	要求增加工资*	《时报》1917年7月30日

264

续表

涉及行业	罢工缘由	资料来源
棉纺织业	要求增加工资*	《时报》1917年9月4日
修路	要求增加工资*	《时报》1918年5月22日
铁路	害怕终结合同制	《时报》1918年5月31日
烟草	增加工时	《民国日报》1918年8月4日
棉纺织业	要求增加工资*	《申报》1918年8月14日
棉纺织业	与工头发生纠纷*	《民国日报》1918年9月20日
棉纺织业	工头辞职	《申报》1918年10月18日
棉纺织业	中止病假制	《申报》1918年10月30日
棉纺织业	从计日工资转为计件工资	《时报》1919年2月11日
棉纺织业	要求增加工资*	《时报》1919年4月19日

注:有\*号者为“防御性”要求。

附录 C 上海人力车夫数量

年 份	公共租界	法 界	华 界
1882	2500		
1883	2000		
1884	2000		
1885	2100		
1886	2500		
1887	2600		
1888	2682		
1889	2730		
1890	2633		
1891	2723		
1892	3016		
1893	3081		
1894	3218		
1895	3248		
1896	3610		
1897	4074		
1898	4308		
1899	4500		
1900	4647		
1901	5076		
1902	5217		

续表

年 份	公共租界	法 界	华 界
1903	5323		
1904	6345		
1905	6629		
1906	8129		
1907	8204		
1908	8173		
1909	8741		
1910	7786		
1911	6508		
1912	8445		
1913	8621		
1914	8718		
1915	8920		
1916	7487		
1917	7954		
1918	8000		
1919	8000		
1920	8000		
1921	8000		
1922	8000		
1923	8000		
1924	11485		

266

续表

年 份	公共租界	法 界	华 界
1925	10000		
1926	9953		
1927	9996	13188	17304
1928	9995	13717	17776
1929	9995	14076	17764
1930	10390	14193	18767
1931	9995	15597	20069
1932	9990		21220
1933	9990		22335
1934	9990		22335
1935	9990		22335
1936	9946		22335
1937	9609		
1938	9497		
1939	9497		
1940	9498		
1945			20424
1946			26890
1947			20582

资料来源：Annual Reports of the Shanghai Municipal Council, 1882 - 1904；罗志如编：《统计表中之上海》，南京，1932年，第58页；《中央日报》1947年5月7日；上海市市政局档案，#331-1。

注：本表不包括私人雇用的人力车夫。例如，1931年，在公共租界，私人雇用的人力车夫为11446人，法界为3420人，华界为7523人。